

学术研究

郭沫若題

Academic Research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郭秀文 罗 萍

学术研究

(1958 年创刊)

2022 年第 6 期

总第 451 期

出版日期：6 月 20 日

哲学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

对劳动的第一哲学思考

——兼论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

曹孟勤 1

经济生活的哲学批判史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精神现象学问题

高惠芳 9

恩格斯与康德自在之物论断

盈俐 16

“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哲学意蕴

刘秦民 23

论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的哲学基础

安晖 30

岭南文化研究

岭南文化的现代性阐扬

——以广东为例

李宗桂 36

文化共同体视野中的南粤古驿道与文化遗产

——以潮州古驿道与民间布马舞为例

张霖 李志刚 48

政法社会学

落单的批判

——从马克思《资本论》到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

任剑涛 52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刘顺峰 63

避免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因应

殷峻 68

· 治理现代化与区域治理创新 ·

制度执行的统筹治理逻辑：基于河长制案例的研究

吕志奎 钟小霞 72

社会组织党建中的借力逻辑：以广州 D 社工机构为例

张紧跟 庄少英 78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政法 gzpol@126.com
哲学 gzphil@126.com	历史 gzhist@126.com
经济 gzecon@126.com	文学 gzliter@126.com

经济学 管理学

福利国家模式、增长悖论与再平衡：对中国现代化及共同富裕的启示 袁富华 吴湛 **85**
经济发展变迁中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 姜子莹 封凯栋 **96**
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与效应
——基于 S 生态农业公司的案例研究 许 悅 陈卫平 **106**

历史学

章学诚学术成就析论 陈其泰 **116**
开明的心智，不凡的史书
——评苏克拉提及其《教会史》 林中泽 **124**
张文彬领导广东党组织对余汉谋部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1937—1942） 王英俊 **136**

文学 语言学

看见她，歌谣中的理想美人
——董作宾歌谣研究的百年对话 施爱东 **146**
知识与趣味的内在张力
——以五本梅谱为例 薛富兴 **155**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传统的建构 朱寿桐 **164**
论“风人之致” 徐国荣 郭亚超 **171**

英文摘要 **177**

CONTENTS

No.6, 2022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of Labor ——Also Discuss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Cao Mengqin</i> (1)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Critique in the Field of the Economic Life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about <i>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in 1844</i>	<i>Gao Huifang</i> (9)
On Engels and Kant's Thesis of Things-In-Itself	<i>Ying Li</i> (16)
The Eco-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Life"	<i>Liu Qinmin</i> (23)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Neo-Darwinism Approach to Consciousness	<i>An Hui</i> (30)
On the Modernity of Lingnan Culture: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i>Li Zonggui</i> (36)
Southern Guangdong Ancient Courier Route and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ty: Taking Chaozhou Ancient Courier Route and Folk Cloth House Dance as an Example	<i>Zhang Lin and Li Zhigang</i> (48)
The Segregated Critique: From Marx's <i>Capital</i> to Piketty's <i>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	<i>Ren Jiantao</i> (52)
The 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Paradigm of Legal History	<i>Liu Shunfeng</i> (63)
The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 i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Reforms	<i>Yin Jun</i> (68)
The Logic of Overall Governance of the System Implementation: An the Study of the Case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Lv Zhikui and Zhong Xiaoxia</i> (72)
Logic of Leveraging Party Building of CPC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Taking D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i>Zhang Jingen and Zhuang Shaoying</i> (78)
Patterns of Welfare States, Growth Paradox and Rebalance: Enlightenment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Yuan Fuhua and Wu Zhan</i> (85)
State Capacity for Understanding Industrial Activ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i>Jiang Ziyang and Feng Kaidong</i> (96)
The Local Embedding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Capital to the Countryside ——A Case Study Based on S Eco-Agriculture Company	<i>Xu Yue and Chen Weiping</i> (106)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Zhang Xuecheng	<i>Chen Qitai</i> (116)
A Liberal Mind and a Remarkable Historical Book ——An Evaluation of Socrates and His <i>Ecclesiastical History</i>	<i>Lin Zhongze</i> (124)
A Historic Survey on the United Front Between the Guangdong Party Orga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Zhang Wenbin and Yu Hanmou's Army Group (1937-1942)	<i>Wang Yingjun</i> (136)
Seeing Her, the Ideal Beauty in Folksong: Revisiting Dong Zuobin's Folksong Study after 100 Years	<i>Shi Aidong</i> (146)
The Tens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Taste: Taking Five Books on Plum as Paradigms	<i>Xue Fuxing</i> (155)
Lu Xun and Academic Tradi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Zhu Shoutong</i> (164)
Discussion on "the Purport of Fengren"	<i>Xu Guorong and Guo Yachao</i> (171)
English Main Abstracts	(177)

哲 学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

对劳动的第一哲学思考

——兼论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

曹孟勤

[摘要]保护自然环境并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世人的普遍共识，但怎样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其本体论基础是什么，这些都尚需要进一步澄清。无论是工业文明对自然界的破坏，还是生态文明对自然界的保护，都必须通过劳动活动才能够得以完成，劳动是改变自然界的物质性力量，因而生态文明建设的本体论基础应当是劳动。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创造人类历史，这意味着劳动本身拥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目的。长期以来人们总是用主观性目的代替劳动的客观性目的，致使劳动的本真性始终处于遮蔽状态。只有人自觉意识到劳动的目的就是人的最高目的，并将人的最高目的与劳动的客观目的合二为一，劳动才能够复归自己的本真状态。在创造自然世界和创造人的劳动关系当中，创造自然世界具有优先性，人怎样创造自然世界就怎样创造人自身。这一逻辑决定了人必须通过创造美丽的自然世界，才能够担保自己走向崇高和伟岸。

[关键词]劳动 第一哲学 生态文明建设 哲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 B0-0; 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001-08

人类的劳动活动作为物质性力量，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促逼自然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可悲的是，劳动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播种下灾难，造成了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于是，一系列哲学问题便随之而来，人类通过劳动本来是要谋求自身的幸福，为什么会被自身置于糟糕的境地呢？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劳动？抑或一种什么样的劳动既保证创造出美丽的自然界，又保证人自身的完美和幸福？人类凭借着劳动活动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自身，可是除了马克思之外，人们尚未洞察劳动的本质是什么，对劳动的本体论思考较多地表现为盲目。哲学对劳动活动的思考不是确认劳动本身的各种功能，而是在第一哲学层面分析劳动如何保证人与自然世界的合理存在，让自然世界、让人本身真正地“是其所是”起来。如果我们不能从第一哲学上真正解决人为什么劳动、如何劳动这一根本性问题，自然世界和人的真实性问题就会始终处于深渊，自然世界的存在风险和人存在的危机就会始终伴随着我们。

一、思辨本体向劳动第一哲学的转向

第一哲学是由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写作完研究自然是什么的《物理学》之后，认为在物理学后面还应该有一门处于第一位置的学科，用于专门研究能够让自然万物“是起来”的关于“是”本身的学问。“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这与任

作者简介 曹孟勤，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210023）。

何所谓专门学术不同；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①大概在公元前 60 年，吕克昂学园的主持人安德罗尼珂在重新整理亚里士多德手稿时，将阐述“是”本身问题的第一哲学著作安排在《物理学》之后，于是国人将“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的学问译为形而上学。由此，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第一哲学就被确认为专门研究世界本体和本原的问题，追求世界上最普遍永恒真理的学问。第一哲学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探究万事万物的存在根据和缘由，以便为万事万物的存在进行普遍性和真理性奠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依赖于“是”而成为“是什么”，是“是本身”才使万事万物“是起来”。“是”本身是万事万物得以存在的根据，它自身之外再没有根据，如果有根据也是以自身为根据，因而“是”本身是自因性的存在，是第一性存在，因而研究“是”本身亦称为第一哲学。

由于对“是”本身的研究属于世界上最普遍性问题，而最普遍性问题不能被感觉、知觉所把握，只能借助于思维性概念并在思维中把握，于是柏拉图认定，世界的本质抑或第一哲学只能是“理念”，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只不过是对“理念”的分有和模仿。根据柏拉图对第一哲学的这一规定，整个西方哲学就沿着这一发展道路而成为柏拉图主义。近现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则通过普遍怀疑而确认，思维是第一哲学的出发点，并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由此，思维、自我、自我意识等主观性、主体性因素被提升到了本体论地位，成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最终原因和人类一切行为归责的最终根据，一种强势性的主观和主体主义哲学占据了西方哲学的主导地位。主观主义哲学的出现对于将人从上帝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提升人的主体性地位，完成现代性启蒙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对主观性、主体性的无限提升，第一哲学就脱离了客观基础，失去客观性支撑，陷入主观性自身的空虚。如康德在主体自我与“物自体”之间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主体自我在此岸可以无限地为自然立法，而“物自体”本身则在彼岸仅仅作为一种信仰而存在，由于其不可知性，使得客观绝对者几乎对知性和理性不发挥任何作用。尽管黑格尔哲学试图避免主观主义哲学的空虚性，从客观性的“绝对精神”出发建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但是当他把“绝对精神”的逻辑起点归结为纯存在，而纯存在本身即是思维时，“纯存在或纯有之所以当成逻辑学的开端，是因为纯有既是纯思，又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②这就不可避免地又陷入主观性哲学之中。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做的一项指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就彻底切中了以往哲学的要害，尤其是切中了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因为要解释世界就不得不依靠思维，解释世界本身所内在隐含的前提和根据必然指向思维，没有思维就不可能发生对世界的解释。马克思反对从纯思维出发的主观性哲学，将第一哲学研究范式转变为对世界的改造，认为世界的改变和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通过思维思考出来的，而是通过现实性的劳动活动造就的，劳动才是改变世界的物质性力量。虽然黑格尔反复强调，思维具有现实性，但思维要想转变为现实，不借助于劳动实践活动，就只能是一种想象或幻象。劳动活动本身是一种物质力量，物质世界只有靠物质性力量才能够得以改变。“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④自然环境的改变只能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劳动活动的结果。马克思坚信，人对自然界的思想并不是从思想本身生成的，人的思想根源于劳动实践活动，人的全部生活的本质就是劳动实践活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⑤马克思由此告别了以往的思辨性第一哲学，开辟了自己的实践性哲学道路，从劳动活动现实出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形成了劳动第一哲学的样态。“我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6页。

②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

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人类生存”和“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问题，也就是人类得以存在和人类历史得以发生发展的始因和本体论问题。“第一个前提”无疑有亚里士多德所言说的“本原”和开端的意蕴。所谓“第一个前提”，也就是没有前提的前提，是作为始因、始原、原初根据而存在的前提，除了它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有能力作为第一前提。马克思把“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作为“第一个前提”，亦将劳动活动本身作为第一哲学，并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现实化，开始了改变世界的哲学逻辑进程。就连对马克思劳动思想表达不满的汉娜·阿伦特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发展中，马克思的杰出贡献不在于他的唯物主义，而在于他是唯一一个一以贯之地把他的唯物主义利益理论建立在人类无可置疑的物质活动基础上，建立在劳动上，即人身体与物质的新陈代谢基础上的政治思想家。”^②

在马克思视域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劳动创造了世界。从劳动创造人本身来说，马克思指认：“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③恩格斯则提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④劳动是人诞生的根源，人怎样劳动，人就怎样存在，人的劳动与人的存在具有内在一致性，人是在劳动活动中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存在。从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来说，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劳动的历史，人类历史形态的更迭是由劳动方式的不同决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⑤从劳动创造了世界来说，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指认，“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⑥尽管自然界是先于人而存在的，但是经过人类劳动加工和改造的自然界，才是现实的自然界。总之，人类正是通过劳动活动的物质性力量，改变了世界面貌，改变了人自身，使人类历史不断得以进步。没有人类劳动活动的创造性，就没有当今的世界，没有当今的人类和当今的人类历史。

既然劳动创造了自然世界、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历史，那么，劳动本身在逻辑上必然具有先在性，是自然世界、人和人类历史生成的本体论前提和根据，是第一哲学研究的对象。就像恩格斯所确认的那样，马克思和他自己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⑦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一场革命，人本身的存在、人类历史的存在和整个世界的存在，由此不再是思辨解释的成果，不再是精神自我异化的成果，而是劳动活动创造的结果。劳动是改变世界、改变人、改变人类历史的现实性力量，由此就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本文所谓的劳动，泛指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及与生产实践相关的人与人关系活动和科学技术创造活动。从第一哲学视域研究劳动，也就是探究劳动本身怎样使人、使人类历史、使自然世界真正地“是”起来。由于自然世界、人本是和人类历史同时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因而它们就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长期以来，重视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学者更多的是从劳动的社会关系方面研究对人的创造，以及从劳动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方式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79页。

②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14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

解释人类历史形态的变化和自然世界的生成，而较少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探究劳动对人的创造和对自然世界的创造，留下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劳动空白。本文对劳动做第一哲学思考，是从劳动所创造的自然世界出发探寻人的生成与合理存在，最终表明真正的劳动是生态性的劳动，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哲学基础。根据马克思的劳动第一哲学思想，有什么样的劳动活动，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人与有什么样的人类历史，以及有什么样的自然世界。对此，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对当今自然世界残破现象的理解，对建构一种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生态文明建设，理应从劳动第一哲学出发进行研究与建构。劳动活动本身是一种创造、一种生活，唯有劳动本身具有了生态正当性，才能够担保自然世界和人的生活的生态正当性；唯有劳动活动本身在生态上文明了，其所创造的自然世界、所创造的人和人类历史，才是生态文明的世界、生态文明的人和生态文明的人类历史。

二、劳动目的的客观性

第一哲学所研究的本体、本原作为绝对者，不仅是整个世界存在的根源或根据，而且还有自己所追求的让万事万物“是”起来的目的。本体所具有的目的性属于终极目的，万事万物都在它的滋养下而存在和运行。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作为第一哲学的实体本身包含着目的因，其促使万事万物朝向终极目的运行，并按照终极目的最终完成自身。正是本体自身带有自己的目的性，使得本体不仅作为“真”存在，还作为可欲的“善”存在，成为真与善的统一体。他说：“为自身的目的也就是善自身，是最高的善”，^① 它是所有行为和实践的目的和终点。在马克思视域中，劳动本身具有自身的目的性，它通过自身的创造能力创造出一个最终的合乎自身目的的世界。按照亚里士多德对本体的规定，本体是“是”本身，其追求的目的必然是让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都“是”起来。本体如何使所有事物都“是”起来？显然思辨哲学自身是没有这种力量的，必须通过劳动的创造，通过劳动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够使所有事物“是”起来。因此，劳动必有自身所追求的目的，这一终极性目的应当是、也只能是创造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存在，让世界、让人本身、让人类历史真正“是其所是”。就是说，劳动自身所追求的目的应当是让自然世界按照自己的存在法则去存在，让本真性去存在，让人类历史成为真正人的历史，这应当是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创造人类历史的本意。当劳动被置于第一哲学的地位之后，人们将根据劳动本身的目的创造整个世界，而不再像黑格尔所言的那样，绝对精神根据概念创造世界。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劳动思想的研究，提出了劳动具有目的性，并且认为正是劳动的目的性存在，才使得人的劳动活动与动物的谋生活动彻底区别开来。“只有当我们理解到，社会存在的形成过程、它对自己的基础的超越以及获得独立的过程，都是以劳动，就是说，都是以不断实现目的论设定为基础的，我们才能合理地谈论社会存在。”^② 卢卡奇在此所主张的思想是，动物的谋生活动完全是由自然必然性所决定的，人的劳动活动则是有目的性的活动，是被目的性所支配的活动。卢卡奇认定马克思关于劳动目的论的设定是本体论性质的，除了劳动具有目的性之外马克思否认有任何目的论存在，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当卢卡奇把劳动目的视为一种“设定”时，则使劳动目的性蒙上了一层主观性色彩，淡化了劳动目的的客观性。我们应当看到，卢卡奇在反对苏联哲学教条的过程中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能动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把马克思的劳动哲学完全归结为主观能动性哲学，似乎又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初衷。劳动一旦被马克思置于第一哲学的地位，劳动目的一定不再仅仅是主观性设定，无论如何要包括劳动自身所追求的目的，即劳动目的还具有客观性。劳动本身是客观性活动，尤其是劳动本身具有第一哲学的地位，其目的就应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劳动的终极目的是劳动本身自有的，它使得劳动本身成为自因性存在并具有了独立性，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的运行和发展。正是劳动活动的自我支配性，保证了劳动活动本身成为马克思所指证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本身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其所创造的世界才能够充满自由性，所创造的人才能够拥有自由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② [匈]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的本质，人类历史最终趋向大同。

劳动拥有自己的目的，这一目的担保着劳动自我发展和自我运行，既保证劳动本身作为实体而存在，又保证劳动作为主体而存在，实现了实体与主体的统一。黑格尔就将作为本体存在的“绝对精神”规定为实体与主体的统一，认为这是哲学获得真理性知识的关键步骤。“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①黑格尔指认真理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目的在于确认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是一个自我发展过程和完整体系。绝对精神作为一种追求自身目的的客观精神，其发展必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由此黑格尔表明了一种被马克思所欣赏的历史真理，即人类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任何存在都有其产生和消亡的必然性。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头脚倒立的哲学，将哲学本体置于现实性的劳动身上，就使得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不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想象和自我追求，而是劳动本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强化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劳动活动本身具有目的性，必然驱使劳动活动向着自身的终极目的运行，劳动活动的这一自我运行过程的展开就构成了人类发展的历史。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坚信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黑格尔认为这一历史目的必然趋向于人的普遍自由，马克思则强调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必然是大同世界。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存在于绝对精神的自我严密的逻辑演绎过程当中，马克思则认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存在于劳动的目的性追求当中，即存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运动过程当中，这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②当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将导致大同世界的出现，导致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已经隐喻了劳动活动本身具有自己的目的性，这一目的性是客观必然的，不管资产阶级如何不满意和不同意，都必将实现。

劳动是人的劳动，是人在从事劳动，人总是抱着自己的目的投入劳动活动当中，结果使得劳动本身的目的必然被置换成为人的主观目的，呈现为人的主观目的性。由此可以确认，劳动存在着两种目的：劳动的本体论目的和人的主观性目的。劳动的本体论目的是劳动本身的目的，具有客观性，它追求的是真正地使人“是”起来，真正地使世界“是”起来；劳动的主观性目的则是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让所加工改造的自然万物为人的生存目的服务。不可否认，人在劳动之初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目的而劳动的，就像马克思所承认的那样，劳动开始的这一步是由人的肉体需要决定的。但是，当劳动一旦作为整个世界的本体存在时，劳动就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实体性，自我规定自己的终极目的，表现出自我性追求。人将自己的纯粹主观性目的代替劳动本身的目的，劳动必然丧失第一哲学的地位而沦落为谋生的手段，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③劳动沦落为异化劳动，所创造的世界和所创造的人必然是异化的世界和异化的人。当今世界发生的生态危机实际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就是说，人是劳动的主体，于是人就将自己的主观目的误认为是劳动本身的目的，产生了劳动目的论假象。

劳动追求自我目的实现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以否定自己的形式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从肯定自身出发而必然走向对自身的否定。黑格尔在讨论主奴关系时表明，人类历史虽然趋向普遍的自由，但不得不经历奴隶不自由的阶段。“为了成为自由的，为了获得自制的能力，一切民族最初都必须经历屈从于一个主人的严格训练。”^④劳动本身的目的也如此，必然经历一个异化劳动的过程，把劳动客观目的误认为是人的主观目的。古希腊人将劳动活动视为被自然必然性支配的谋取生存的活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将劳动视作上帝对人类祖先的惩罚性手段，现代人将劳动活动看作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都莫不过如此。劳动的现代异化及其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劳动活动并不

^①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③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④ [德]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2页。

仅仅是完全为自己的，还应该是为世界的。劳动不可避免地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这是劳动能够得以发生和持续的前提条件，但劳动又不能纯粹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否则人就永久处于动物世界而不能超拔出来成为人之为人的存在。劳动要真正履行第一哲学的功能，就必须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基础上超越生存需要，向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的本真状态生成。当今国际社会轰轰烈烈开展的环境保护运动和中国大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显示出对异化劳动，即对劳动是为了人生存的主观目的再进行否定的诉求，把自然万物的存在，以及将自然界的美丽纳入劳动目的之中。

人的生存与动物生存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追求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人存在的最高目的和最高价值是成为人本身，就像黑格尔所言：“人间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①古希腊神话故事斯芬克斯之谜告诉我们，人只有知道什么是人并且成为人，人才能够战胜怪兽而存活；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是人，只有面临死亡的结果。因此，人所追求成为人的最高目的与劳动创造人的本体论目的是统一契合的，人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不过是对劳动本身目的的表达而已，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够达成自己成为人的这一最高追求。当人自觉意识到劳动本身的目的就是自己所追求的最高目的，自己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亦是劳动本身的目的，实现劳动的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的统一和同一，劳动由此就从异化当中解放出来而复归为真正的劳动。劳动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当人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与劳动本身的目的合二为一时，劳动的自我主体性就转化为真正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亦代表着劳动的自我主体性。在异化劳动的状态下，人与劳动是对立的，人作为劳动主体与劳动本质是分离的，主体的目的与劳动客观目的亦相割裂。在真正的劳动中，人与劳动是内在一致的，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人通过劳动显现自己的最高价值追求，劳动则通过人达成自身的创造目的。人在劳动过程中既是劳动的客体，被劳动所创造，又是劳动的主体，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实施劳动活动。劳动创造人，由此也意味着人自我创造自己，人类历史亦是人自我创造的历史。当人自觉意识到人的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是劳动本身时，即人必须通过劳动才能够完成人之为人的存在，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由此劳动就必然升华为人的存在方式，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第一需要”。尽管在劳动诞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劳动活动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目的且付出了破坏自然环境的现代性代价，但生产力发达起来和劳动现代化的合理性是使人摆脱了贫困，摆脱了对自然的愚昧和崇拜，并且向自身证明劳动活动具有创造世界的能力，从而为劳动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人的存在目的与劳动本身目的逐渐趋向一致的过程。

三、在创造美丽自然界中创造人自身

劳动的客观目的是创造世界、创造人、创造人类历史，扬弃异化劳动的社会也是谋求自然世界的美丽，以及人之为人的存在和大同社会的实现，因此，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里，劳动的客观目的与人类追求的主观目的是同一的。在劳动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的关系中，由于人是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劳动活动中生成的，因而逻辑上决定了先有劳动对自然界的改变，后有对人自身的完成。就是说，人怎样生产自然界，也就怎样生产人自身，让自然界“是”起来才能够让人“是”起来。黑格尔最早发现了劳动创造自然与创造人自身关系的秘密，他在《精神现象学》中谈到，奴隶通过劳动在陶冶自然物时也陶冶了自身：“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②自为存在是人的主体、主观性存在，自为存在只有与陶冶事物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才能够上升到自在自为存在，而自在自为存在则是人的独立自由存在，是对人本质的完成。马克思赞赏黑格尔这一思想：“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③不过马克思也指出，黑格尔所谓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活动，所谓的人是纯粹抽象的自我意识，要想真正完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6页。

②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31页。

③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1页。

成劳动对人的创造，必须将抽象劳动变成现实劳动。

马克思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实现了解释世界哲学向改变世界哲学的转向。马克思将劳动主体视为“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①将劳动首先视为生产吃喝住穿的感性活动。在这一规定中，作为具有自然力和生命力的能动个人出于生命本能的需要，必须去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本身，没有这种现实劳动，就没有人自身的存在。现实个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劳动，当他投入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劳动中后，就开始了人自身的创造过程。“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②人并不存在一种固有的普遍本质，人性是在后天劳动中生成的。人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无法直观，因此人性必须显现于外部世界，显现在劳动所创造的自然世界之中，方能直观到自我形象。所谓人怎样创造自然界就怎样创造人自身，所谓陶冶事物的同时也陶冶了人自身，是指劳动所创造的自然界就是人本身，即现实自然界是人本质的对象化，是人性的现实呈现。“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③自然界是对象性的人，并不是说人先有一个现成的本质，然后对象化给自然界，而是说劳动所创造的现实自然界就是人本质的显现，现实自然界是一本打开了的人本质力量的书，现实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正是人生产的现实自然界亦为本身，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这样。因此，它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它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④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现实自然界是人性的显现，通过现实自然界人能够反观自我形象，现实自然界的美丽意味着人性的美丽，现实自然界的丑陋则指证着人性的丑陋。虽然说劳动创造了世界和创造了人，但这并不能保证劳动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真善美的自然界和真善美的人，还有可能由于劳动的异化而创造出假恶丑的自然世界和假恶丑的人。就像科西克在《具体辩证法》中所指认的那样，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创造了琳琅满目的物的丰富性，但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伪世界。德波也指证：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人类的生活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都转化为一种表象，成为一种被展示的图景。“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分离出来的影像群汇成一条共同的河流，这样，生活的统一便不再可能被重建。重新将他们自己编组为新的整体的、关于现实的片断的景色，只能展现为一个纯粹的静观的、孤立的伪世界。这一世界之影像的专门化，发展成一个自主自足的影像世界，在这里，骗人者也被欺骗和蒙蔽。作为生活具体颠倒的景观，总体上是非生命之物的自发运动。”^⑤当今发生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经证实，现代性劳动所创造的自然世界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世界、残破的世界，人在其中并不能直观到自己的真实人性。笔者曾经多次表达过：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性危机，是人对自然世界的恶人性才造成了生态危机的恶结果。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人们为了谋生而去劳动，一旦将谋生的需要固化为劳动本身的目的，劳动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异化劳动必然造成异化的自然界、异化的人和异化的人类历史。超越异化劳动并使自然界真正复活和美丽起来，必须将谋生劳动还原为创造性劳动，使自然界、人本身、人类历史得以真正存在。马克思毕生的努力就是要超越异化劳动，以及与异化劳动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原劳动创生性的本来面目，最终通过创造美丽自然界而完成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那么，真正劳动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形态呢？马克思的规定是：“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

①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5页。

②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7页。

③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68页。

⑤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①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我们可以说，劳动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的关键在于全面生产，在于劳动本身不受人肉体需要的支配，不能把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设定为劳动的根本目的，而是依据任何一个物种的存在尺度、按照美的规律再生产出整个自然界。劳动作为本体是让自然界“是”起来，而让自然界“是”起来意味着人要依据每个物种自身的存在尺度对待自然万物，让树枝繁叶茂，让花绚丽多彩，让虫儿鸣叫，让鸟儿歌唱，让空气新鲜，让水纯净潺潺，即让自然界美丽起来。让自然界“是”起来亦是让自然界“美”起来。自然万物争奇斗艳，自然界本身郁郁葱葱，这就是美丽自然，即让自然界本身是其所是。当人按照生态规律和美的规律再生产出美丽自然界之时，人自身的人性也就随之生成出来。人能够欣赏自然界的美，能够对自然界追求美和创造美，美象征着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市侩只看到自然物的有用性，根本看不到自然界的美。“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②由此不难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真正劳动是生产整个美丽自然界的劳动，人性的生成就蕴含在其中，让自然界美丽了，人性自然而然也就变得美丽和崇高起来。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让自然界美丽并不完全是人的纯粹主观目的，还蕴含着劳动本身创造自然世界的客观目的，是人的主观目的与劳动客观目的内在一致性的呈现。从弱肉强食的生物竞争法则来说，人完全没有必要维护自然界的美丽，工业文明掠夺自然完全符合达尔文主义。但是，人要成为人，就必须合乎劳动的客观目的，保证自然世界美丽起来。劳动创造自然世界是指创造美丽的自然世界，合乎自然界存在的生态法则，而不是指创造破烂不堪、惨不忍睹的自然世界，背离自然界存在的生态法则。就像马克思所言，要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存在尺度来进行生产。如果我们承认人之为人的存在不是主观任意的想象，而是在现实劳动中生成出来的，那么，人的生成就一定要合乎劳动本身的法则，合乎劳动本身的客观目的。虽然追求人之为人的存在是人的最高目的，但这一最高目的在背离客观目的的异化劳动中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审美虽然具有主观性，不同的人可能对美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是，臭气熏天，污水泛滥，没有花开和鸟唱，到处充斥着死亡，到处是破败景象，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美丽自然。所以，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美丽自然世界，实现人之为人的存在，恰恰合乎劳动作为本体的目的善。劳动必然要改变自然世界，但改变的自然世界有残破和美丽之别，让自然美丽不仅是人的刻意努力，也是劳动本身之目的的现实要求。

生态危机教育了世人，使得人们开始觉醒并意识到，人与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活着也必须让自然界活着，人存在也必须让自然界存在；人让自然界美丽，人自身的人性才变得伟岸起来。当今全世界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轰轰烈烈地展开，都指向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人类的劳动活动作为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力量不能再破坏自然界了，必须将蕴含在劳动客观目的中让自然美丽的善要求解蔽出来，成为人对待自然的行动指南。当前保护自然环境的道德诉求落实到实践行动上，一方面是复归劳动本身的目的善，恢复劳动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自然界的本有目的性；另一方面是人将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与劳动本身的目的合二为一，人在保护自然环境、让自然界美丽的劳动过程中走向自身的本真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从来还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超越利己主义而尽保护自然环境的道德义务，当人在劳动活动中切实做到对自然界的守护，将利他主义精神贯彻到自然界，还自然界宁静、和谐、美丽，让自然万物按照自己所属物种的尺度去存在之时，人才真正与动物携手相别，走向崇高和伟岸。

责任编辑：罗 萍

①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7-58页。

②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7页。

经济生活的哲学批判史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精神现象学问题^{*}

高惠芳

[摘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思辨的哲学的逻辑学。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仅再现了经济生活的一般性，而且仅在思维中描述了人的运动、生成的历史，是经济生活在意识中的抽象物的历史。马克思认为，应该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思辨的对象性活动的实质，突出人的本质性的自然性，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性，以及人的自然性与历史性（社会性的总和）在人身上的同一。

[关键词]马克思 国民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 精神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A811；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2）06-0009-07

“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①显然，国民经济学诞生之初，也必然作为历史的进步力量而存在。概读国民经济学家的一两部著作，即可知悉其基本观点与大略倾向。譬如，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一、五、六章大致展现了彼时社会经济全貌以及国民经济学的当代走向，尤其体现了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倾向判断。作为时代精神的产物，李嘉图的经济学思想显然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即他阐发了人类历史中的阶级斗争思想，甚至有学者以为“李嘉图当推为宣传阶级斗争的领班生”。^②国民经济学始于亚当·斯密，大成于大卫·李嘉图，毋庸置疑，其自始至终都在为资本主义辩护。然而，在一定条件下，国民经济学家又作为资本主义自我消解的潜在力量，成为人类经济学说“现代史”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社会生产活动的全部过程，分析了劳动是财富、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承认工人是劳动财富、资本积累的主体和动力，如是，便产生了国民经济学实为市民社会的精神现象学的哲学问题。同样继承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却鲜明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反动，阐释了历史运动的唯物辩证法。于是，新的问题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现象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接受了这样一项历史任务，既要对劳动、资本、工资、利润的事实进行概念的抽象，还要在经验的感性直观中对概念的抽象进行具体的再现（《资本论》中方法论的任务，已经隐含在这里）。换句话说，将国民经济学认作精神现象学，同时揭示其抽象的思辨辩证法的谬误，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和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同现代的批判即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经验性方法”（20FZSB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高惠芳，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100101）。

①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5页。

②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0页。

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或者更正确些说，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①

一、国民经济学是经济生活的精神现象学

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的思辨的哲学的逻辑，认为任何意愿将国民经济学的现实性说成纯粹的哲学史的行为，都可以归属到哲学上的形而上学。国民经济学如何演绎概念的哲学史？它依据的是形而上学的思辨的逻辑学，黑格尔将这种逻辑发挥到极致。一般来讲，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和真正秘密，即是《精神现象学》和否定性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否定的否定看成与自身同一的肯定性的方面，从而将其保留下来，他所祛蔽的恰恰是纯粹的否定性的方面，即被自身扬弃了的经验事实。一切概念的思维的活动，最终都与感性直观和经验知识没有关联。从国民经济学的经验事实到经济学的概念的思维活动，人的活动包括人自身的思维活动都被消解了。国民经济学仅再现了经济生活的一般性，仅仅是在作为抽象物的经济学家头脑中的人类活动的运动史、生成史，是经济生活自身的抽象思维的历史。

黑格尔哲学是思辨的哲学的逻辑学。其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以纯有或纯粹的存在为开端，经过抽象的知性、否定的理性、肯定的理性等思维形式，分别对应了概念学说的三种形态：自在的概念的学说、自为的概念的学说以及自在自为的概念的学说，或者说，一一对应于存在论、本质论和理念论。从自在的潜在状态，到间接性的表象状态，再至自身持存的知识状态，反映了概念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马克思概括了抽象思维的逻辑学的观念，他说：“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②既然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那么，现实的货币与货币的现实就是国民经济学的现象学，劳动价值则是社会生产生活的逻辑学。^③问题不在于货币之于国民经济学的现象学，而在于劳动价值之于社会生产生活展现了经验的历史的逻辑学，而非思辨的哲学的逻辑学。关于思辨的哲学的逻辑学，我们只需再现市民社会的经验事实即可予以辨识；而关于经验的历史的逻辑学，则是国民经济学未完成的道路，它不仅要求依据经济事实还原概念的生产史，更重要的还在于把概念的生成史同一化为作为主体的人的历史。

从国民经济学的意识看，黑格尔是市民生活的现时代的剧作者与剧中人。不可否认，现代国民经济学是以绝对知识（精神、意识和自我意识）与思辨的辩证法及其相互关系为依据的。在黑格尔看来，意识从进入自我意识的一刹那，精神就进入真理的王国了。而这一步的关键在于外部的感性存在，自我意识原本作为感性直观的对立面出现，并由此获得存在论的存在；如果缺失了感性世界，即是说，自我意识作为运动仅把自己同自身区别开来，那将是毫无意义的同义语的反复，并不包含任何真实的差别在自身内，不产生任何实在的内容。^④因此，差别是真实存在着的，有着某种特定的形态和实在的内容；自我意识的内在的差别必须在感性世界的整个范围内持存着，并确定为自身的对象。这种实在的感性世界由市民生活表现为感性直观，这正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及绝对知识的一大结果。这也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做的客观的陈述，及其对思辨辩证法所做的中肯的评价：“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2页。

③货币是经济范畴的中心点，因为在货币这个中心点上集中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的本质。简单的货币形式是政治经济学上最抽象、最苦难的部分。同货币联系在一起的有商品、价值、价格这些范畴，理解这些范畴是正确科学地考察所有其他经济范畴的必要前提。

④[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4-175页。

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①

尽管国民经济学一般地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然而事实上，它只看到了劳动的概念与现实的劳动相统一的现象学部分，没有看到劳动的概念与劳动的现实相异化的经济事实。作为概念的劳动不再是科学的、历史的哲学概念，相反，它变为前科学的、意识形态的虚假范畴。从严格意义上讲，国民经济学甚至没有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自在存在，而径直进入了意识的自为阶段。他们把劳动看成现成的人的劳动，没有从劳动的最直接、最原始的存在谈起，认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的存在物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因此，国民经济学把劳动当作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言外之意，国民经济学不仅把劳动产品的结果，而且连同劳动产品所依附的经济关系一起，全部当作“庸俗的”意识形态摒弃掉了。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便无始无终，没有了前因后果。一谈起商品，便只有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也就只有资产阶级的产品分配与消费，商品自此便失去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价值。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因其无根，便也成为永恒。国民财富的增加便成为经济学家思考的主体，事实上，单一的个人被所谓“全体国民”的福祉抹杀了。国民经济、社会全体财富的变动，便成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家也成为经济学的自我意识外化的产物。换句话说，经济学家便以市民社会内部互相异化的社会良知与资本道德之间的差距而存在着。作为抽象思维的国民经济学的最后产物及成果，经济规律发挥着同一物的作用，它支配着资本、劳动、生产、分配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由此可看出，劳动的占有情形可一分为二，作为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被分配给劳动的产出者——工人，一部分被用来补偿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支出的回报，它被资本所有者无偿占有。前者反映了劳动占有的主观能动性，真正表现了人的历史的主体地位；与劳动的实际占有情况大不相同，后者与前者的矛盾表明，劳动过程与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的历史被异化了，劳动成果的“不占有”状态，标志着人的非现实化、人的“非人的”历史的演化。

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不好的”一面。一方面，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把劳动对象化的过程统一为经验的人的感性的外化过程。另一方面，他把劳动成果的“不占有”经验化为工人阶级的“非人的”感性直观，从而将劳动的“不占有”视作人的本质的历史。就此说来，国民经济学本能地承认劳动是人的本质，但仍旧把它当作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国民经济学也曾一度认为，哲学的本质正在于劳动的人的本质，或人的劳动的本质；归根结底，人的本质无非是外化到生产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凝结物。显然，国民经济学在更多时候忽视了这种关系，它将人的生产连同自然界全部看作自我意识的抽象物，而且是无中介的抽象物，这反而使得抽象物外化成为人类生产的一般形式。它不仅仅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在于它是经验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并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作为精神现象学的国民经济学的本质与还原

国民经济学何以称为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学是包括意识、自我意识、社会意识、绝对精神等在内的广义的意识的科学。具体而言，它要展现意识在科学或知识的形成道路上所经历的一系列的形态，即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形成史。精神现象学是历史的，它是在时空范畴中连续性的阶段性形态。如黑格尔所说，最晚出现的体系往往是对此前一切体系的概括和总结，是最丰富、最渊博、最具体的哲学系统。^②且不论抽象思维和现实存在的颠倒，黑格尔所谓现象学的“科学”涵盖了这样一个任务，即“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了的、同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因此，“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内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③是故，国民经济学作为精神现象学，在马克思看来，必须得到彻底的改造才能发挥出科学的功能。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应有所指向，它指向作为精神现象学的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哲学运动。在哲学的精神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

②[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0、21、2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6页。

现象学失足的地方，隐藏了国民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接受批判的全部真相。因此，所有的工作要以批判黑格尔哲学为起始，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批判的开端，同时它也表现为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它的完成。哲学的批判是现实批判的向导与完成。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作为自然物的对象被意识消解掉了，存在的仅是自我意识的存在。（2）自然物与社会的一切关系，只能由自我意识提供并加以说明。（3）自我意识的外化与复归是辩证法的一般。（4）否定的否定推动着自我意识的形成发展史。（5）知性思维规定了普遍性的范畴，自我意识的外化物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范畴也具有特殊的普遍性，从而思维的知性阶段具有理性发展史上的特定性质，它具有自为的性质。（6）知性思维必然向着否定之否定的理性发展，进而，自在存在的意识发展到自为的自我意识，直至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7）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与思维逻辑的进展大体上是一致的。（8）在运动的每一环节中，自我意识都取得了它的外在的形式，而这也正是它自身存在的历史。^①

具体地说，所谓对象本身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正是对象向自我的复归。其中，“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抽象思维看来，人的本质就是自我意识，故而人的外化的、对象性的本质即物性，就必然是自我意识的本质的外化，或者说，物性是对象性的人的本质。因此，矛盾出现了，要么所谓的物性必然就是自我意识自身，即“外化的自我意识”；要么自我意识就是作为存在物存在着的“人”，即真正的个人。黑格尔最终不承认人对自我意识具有优先性，他仅仅认为精神具有自然界、生命的对象性。马克思慨叹：“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它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而它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相反的情况倒是神秘莫测的。”^②可以看出，能够完成外化的存在物必须是自然的存在物，即“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③那么，国民经济学有没有设定物性的存在物并以此作为主体呢？是的，国民经济学不仅发现了劳动，还发现了劳动的对象化过程。然而，“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不仅是劳动，就连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也被视而不见，“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④说到底，国民经济学只看到了“劳动的一般”，即“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仅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马克思对此严厉地予以驳斥，认为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⑤看作是商品，如此，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连同人的现实的主体性、人的自然的历史一起被埋葬了。因此，马克思认为应首先恢复劳动，以及劳动着的人的主体性，只有对象性的本质力量才能够设定异己的对象。（1）当劳动者具有完全自主的独立属性，能够充分享有自己劳动的主权的时候，他才能被认为是自己的外在性力量的占有者，即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人，能够自由支配劳动力的供给与回报。（2）对象性的本质力量是存在着的活动。（3）设定对象性的存在物的力量不是来自主体，而是来自对象性的活动力量本身，这一设定不是概念从自在到自为状态的过渡，其实质是存在物自己证实自己，证实对象性产物与主体间相统一的活动。（4）人既是间接地中介了的存在物，也是直接的存在物，归根结底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人是能动的主体性，与自然的存在物发生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人是自然的客观存在，是天然的对象性的存在物。（5）人天然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类存在物，是能够在历史中证明自己本身的存在物。^⑥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对它的思辨本质进行了详尽的哲学批判。在国民经济学家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7-2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4、12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9、210、211页。

看来，马克思似乎“过分地”突出了人的本质性的自然性，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性，以及人的自然性与历史性（社会性的总和）在人身上的同一。^①在马克思看来，思辨辩证法的失误之一，在于设定的主体与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之间的差别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它们都是自我意识或“非人的”人的存在物。外化的主体的本质性的力量向着自身的复归，事实上就是一场虚无的没有实质的运动，而且必须是在抽象的思维中的运动。此时，现实的感性存在物，无论对于主体、主体的活动，还是对于感性存在自身，都是没有实际用处的。国民经济学就是把劳动放在抽象的思维范畴中，使其丧失了一面作为主体、一面作为对象化客体相互依存、对立运动的属性，这样，劳动的工人阶级连同无偿占有劳动的资本所有者一同丧失了本质性的力量，失去了重新恢复人性、道德、自然属性等的权力。

因此，国民经济学要复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功能，自觉地接受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可能带来的结果。为完成这一使命，马克思认为首要的就是现实的、自然的、感性的人的主体性，以及他们每一时刻进行着的感性活动。劳动着的人将成为现代性经济学研究的主体，进一步，劳动着的人——工人阶级，连同与劳动者外化的现实的力量一起，全部被看作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只有它才具有对象性活动的前提和可能。为保证这一前提和可能性同时是“完成了”的形态，马克思认为，确证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能动的和被动的两种属性才是至关重要的。其一，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能动的属性，这是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能力。^②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着重阐释的，人的思维是现实的，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属性，是主体的主观性与自然的客观性的统一；在思维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理论一定要与现实紧密结合并从现实中得到解答，因此，人的思维首要地是实践的问题。^③其二，人具有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属性，这是确证在自身之外有任何存在物附属于主体性存在的对象的可能性。这即是说，存在着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是对象性的存在，这无异于同义反复。从理论上说，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作为本体存在，又不作为客体存在，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唯一的存在物，其次它是思维的存在的虚无。国民经济学恰恰把劳动成果作为劳动自身的异己存在物的存在给摒弃了，事实上，没有形成经济活动中劳动者与劳动属性的内在对立，以至于缺失了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人的主体性渐渐淡出了经济活动的视角。从国民经济学的概念出发，马克思认为必须保证它的双重属性，而这是作为本质性的力量的活动所必备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换句话说，“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④

概言之，国民经济学家一般地看到了经济活动的经验事实，发现了劳动者不能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果实的经济现象；然而，他们却没有将劳动以及作为劳动的主体的人纳入一种自然史的考察过程，没有发现自然的、肉体存在的、感性的人具有对象化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能动性，也忽视了在人之外首先是他的自然存在的前提性。费尔巴哈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上述问题的现实性及合理解决它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还是类存在物。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的现象序列中，马克思经验地揭示了异化劳动（劳动的外化）蕴含的四层关系：一是对象性的产物与直接的劳动占有者之间关系的异化；二是直接的劳动力占有者与间接的劳动力的所有者之间关系的异化；三是生产关系与劳动所有物之间关系的异化；四是作为劳动的人与社会自然人的关系的异化。^⑤上述关系是国民经济学无论如何发现不了且不愿意承认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9、216、791-7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9、2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0、163页。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

马克思论述了国民经济学对经济生活的现象学分析，指出了思辨辩证法在经济生活领域有限的历史意义。他提出，只有科学客观地将唯物辩证法的逻辑与政治经济学融合在一起，才能对劳动、资本等经济学范畴做出科学的解释，也才能真正阐明经济生活意识的哲学史。马克思论述了辩证法的一般对思辨辩证法的批判。

(一) 否定的否定的真、假本质之分

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只在乎真本质，而对于假本质却漠不关心。否定的否定从来只是针对真本质的假象来形成理论的，关于假本质，它唯一能够确定的知识，恰恰是使其超出形式之外的东西。或者说，否定的否定是表象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感性经验的存在，进而使其自身转化为有限性的普遍性。

从意识的发展史来看，思辨意识的外化一般地具有否定的意义，同时，它也包含肯定的特殊意义。黑格尔认为，关于对象性本质的占有不是发生在对象性的产物之内，而是自我意识对自我本质的占有与复归，它无关对象性产物任何实质的内容。^①故而，在唯心主义那里，对象是思维的抽象物的对象，是自我意识的外化与复归的材料，从而是间接地中介过了的存在的对象性。事实上，这种肯定没有增加任何有益的东西，因为，虚无性是对象性的非存在，是与自身毫无差别的自我外化。即是说，意识知道它本身只表现为对象，对它来说表现为对象的那个东西仅仅是它本身。意识的外化是一场骗局、一场戏剧，作为意识的对象的感性现实，根本没有获得任何出场的机会，这场戏剧就“圆满地”落幕了。也可以说，感性的现实从未被意识视为客体，从未显露出它的本质属性对意识的任何影响；意识独立完成了一出双簧剧。正如马克思评价的那样：“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理性在作为非理性的非理性中就是在自身”，由此，矛盾就出现了，“作为意识的意识所碰到的障碍不是异化了的对象性，而是对象性本身”。^②

思辨的意识没有为对象性准备舞台，它把所有机会毫不保留地只奉献给自己的异化了的对象性。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观念将会带来关系的紧张与秩序的失控。马克思对它做了形象的描述：在宗教中得到确证的是我的外化的自我意识，而不直接是我的自我意识，因此，如果想要真正认识我的自我意识，那么，只能求助于宗教的被消灭、扬弃了的内容与形式。而在宗教的一般形态中，我们发现不了任何真理，所有存在着的只能是自我意识外化了的假象。“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真正的人的生活。”^③

唯物主义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在其中，对象性表现出丰富的异己的内容，主体把对象的本质视作自己的外化的本质。即是说，唯物辩证法把对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从客体方面去理解它，还把它上升到主体的地位，从它的对象化的角度上去理解。唯物主义的概念认真地对待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现实，将感性的现实的活动视为自己的外化了的本质，在现实中真正触动、克服了自己的对象，从而使对象实在地成为概念的思维的一个环节，思维的对象从而以产物的形式被自我意识确证为主体性力量的抽象物。不可否认，黑格尔辩证法也存在积极的环节。譬如“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这是异化的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④对象世界起着中介的作用，这种中介是必要的前提，它通过他人的现实的对象化得以实现。对象世界的本质是人的现实的对象化的真本质。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3、214、21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6页。

(二) “人”与“自我意识”

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他“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简单地说，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黑格尔的异化的主体是错误的，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不是“人”的自我意识，而是自我意识的人。他把人设定为自我意识，设定为意识、精神、绝对的无。在国民经济学那里，作为异化主体的劳动不是过程，而是结果——仅是结果；这个结果，是经济学的规律，是财富增长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在这一思辨的过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②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在“对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或自我对象化的行动”上陷入了形式的抽象的理解。归根结底，原因在于黑格尔设定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外化=思维的对象性的存在，从而使得人的真实存在着的现状，无非就是理性在概念中的自为存在的假象，人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结成的生产关系无非就是概念的形式的运动。外化的扬弃也不外是对这种无内容的抽象进行有限性的、形式的扬弃，即否定的否定。如此，自我对象化的特殊的普遍性的内容，连同它的具体丰富的经验事实，全部向着思维范畴的规定性的否定性运动，“所以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去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③

在国民经济学的经验事实面前，马克思反思了经济生活的异化运动，尤其反思了其中对象性的主体的人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而不至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一切将人与人的自我意识分开，并以任一能动性的主体进行单独活动的可能性，都将失去自然的人和人的自然，也都将失去历史的科学的发展机遇。

四、结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其形式和内容来讲是一致的。它直面经济生活的感性的现实，无论在经济学还是哲学等领域都做出了丰富的理论贡献。通过对国民经济学说中的工资、资本和地租等三个经济学范畴的分析，马克思论述了劳动、劳动的一般、劳动的时间属性以及空间属性对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的突出贡献，指出整个历史不外是人的劳动的生产关系史以及基于此的意识形态史的总和，人正是通过劳动而成就了人的主体性的存在，从而创造了所有劳动产品与财富。进一步来说，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思辨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从对异化劳动的剖析中揭示出私有财产与劳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指出只有消除私有财产才能消除异化劳动。在其中，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在批判德国意识形态史学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阐明了自然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从哲学史上开启了唯物方法论的新研究。

责任编辑：罗 莹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8页。

恩格斯与康德自在之物论断^{*}

盈 例

[摘要]恩格斯数十年一直坚持批判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论断。该论断是康德先验哲学的核心命题。它所蕴含的矛盾和多种发展方向，既是我们正确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关键，也是恩格斯展示德国古典哲学之出路的一个典型案例。康德坚持自在之物论断的原因，一是他误解了时间和空间范畴的来源；二是他不理解行动对认识的本源性意义；三是他将方法论上的自我中心困境默认为人类认识本身的困境。恩格斯诉诸实验和工业等实践活动对自在之物论断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恩格斯的批判遭到了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的攻击，也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误解。列宁对切尔诺夫的有力反击和卢卡奇的自我检讨都进一步确证了恩格斯自在之物批判的真理性。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 自在之物 不可知论 自我中心困境 行动在先 独断论

[中图分类号] B0-0；B51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016-07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德国古典哲学结出的“唯一的真正”果实。对这一理论的“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的明确表述都属于马克思，“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恩格斯的贡献主要在“几个专门的领域”，^①其中包括哲学领域。马克思曾想要写《辩证法》，^②但始终未能如愿；恩格斯持续地“投入辩证法的研究”，^③并撰写了“长篇文章”，即《自然辩证法》；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④但恩格斯认为《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他所知道的对历史唯物主义“最为详尽的阐述”。^⑤恩格斯对其理论贡献的自我定位或许有谦虚的成分，但无论怎样理解，都改变不了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共同创立者、权威阐释者和卓越宣传者的历史事实。倘若我们以“回到马克思”的方式忽视恩格斯的重大贡献，那会有失公允。在此，我们仅用解剖一个案例的方式来考察一下恩格斯对认识论中怀疑主义问题的处理。这个哲学案例就是恩格斯对康德自在之物论断的批判性处理。自在之物论断就是康德及其跟随者“关于我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论断”。^⑥1841年初，恩格斯在评论德国作家伊默曼的《回

*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的语言哲学及其时代价值研究”(22SKJD0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盈例，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讲师(重庆，401120)。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6-29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00、48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6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4页。

忆录》时首次提到康德的自在之物；^① 1868年11月、1874年9月和1876年5月，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三次提及康德的自在之物；^② 在后来的《反杜林论》（1876—1878年）、《自然辩证法》（1973—1882年）、^③ 《终结》（1886年初）^④ 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恩格斯又多次谈到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由此可见，康德的自在之物论断始终是恩格斯谈论学术或进行哲学思考时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为何自在之物论断一直纠缠着恩格斯的思绪？恩格斯对这个论断进行了怎样的批判？恩格斯的批判又遭到了什么样的误解？对此我们将依次进行解答。

一、哲学基本问题与康德自在之物论断

知识不是单纯的命题，而是问题和相应答案的综合体。和答案相比，问题是首要的，因为问题是前提，也是探究的起点，而且问题可能具有比答案更持久的理论价值。恩格斯在《终结》中讲：“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恩格斯也认为这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⑤

哲学基本问题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方面。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关键是对其性质进行判定。对此主要有四种不同看法：一是说，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性质的问题”，因为它是在人的意识与外部世界的理论关系中产生的问题；二是说，哲学基本问题“应该从本体论角度去理解”，因为它主要论述自然界是本原的问题；三是说，存在两个独立的哲学基本问题，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要“分别提出基本问题”，因为“不能把一方还原成另一方，两者应当并存”；四是说，我们应该强调哲学基本问题的“意识形态性质”，因为哲学属于意识形态，我们应该阐明“这一问题的历史发生的基础”。^⑥ 在这四种看法中，看法一和二之间的差异最大。看法三似乎有割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不是独立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它只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总体性呈现而已。阐明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发生无疑是理解它的一个重要维度，但若因此而将其性质归结为意识形态，这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所以看法四没有什么吸引力。

哲学基本问题性质的本体论解读者将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理解为主导性的方面，第二方面被理解成派生性的方面。这虽然符合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对恩格斯的具体论述和语境有所忽视。恩格斯在阐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时明确地说：“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⑦ 欧洲近代哲学主导性的问题框架和解答思路无疑是认识论的架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唯理论者的基本问题是认识论性质的，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经验论者的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性质的，康德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而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依然将认识论的问题置于其理论思考的基础地位。因此我们有理由初步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总体性质是认识论的，而非本体论的。

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本原性”问题本身也只有在人们思考或认识自身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才可能产生，而且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过程也是人类认识领域的成果。恩格斯自己对第一方面的阐述也是在认识论的脉络下展开的。他在《终结》第二部分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给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定理式表达，马上就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它得以产生的原因。恩格斯甚至概括性地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⑧ 无论是作为第一方面的本原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96、400、4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67、493-49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9-28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7、278页。

⑥ [日]牧野广义：《论“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性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2辑合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3-34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8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8页。

问题，还是作为第二方面的认识之真理性问题，我们对其的理解都应以认识论为背景框架和轴心。

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是无效的。对本体论问题的有效解答要以认识论探究为前提。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哲学基本问题总的性质，绝不意味着取消其本体论的方面，而是说其本体论的方面只有在确立起有效认识论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和阐释。这也是恩格斯从认识论的角度阐释本原性问题的原因。列宁对物质概念的经典定义也是从认识论角度加以界定的。在列宁看来，是否承认自然或物质的先在性、本原性和客观实在性，首先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认识的源泉的问题”。^①

恩格斯从青年到老年一直放心不下康德的自在之物论断，根本原因是该论断集中展现了康德在认识论的框架内综合前人成就以便创造性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重大尝试。自在之物论断可以说是整个康德哲学的枢纽。跟康德同时代的著名批评者雅可比曾中肯地评价说：“没有自在之物的假定，我就无法进入康德哲学体系，但有了这个假定，我又无法停留在这体系之中。”^②这既是对康德的批判，也说明了自在之物论断的重要性，无论是“走进”还是“走出”康德哲学体系，自在之物概念及其相关论断在其中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一直致力于从不同方向来消解“自在之物”。如果我们将康德哲学比作德国古典哲学的“采种母树林”，自在之物就是出入此母树林的通行证。

恩格斯所关注的康德哲学的核心正是自在之物不可知论断。康德断言：“我们关于作为自在之物本身任何一个对象不可能有什么知识，而只有当它是感性直观的对象、也就是作为现象时，才能有知识”。^③虽然我们不可能有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但我们有自在之物向心灵显现出来的现象的知识。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似乎有一层我们的认识能力永远也无法穿透的帷幕。何谓自在之物？其细节依赖于对康德整个哲学体系的理解，对其整个哲学体系的不同解释路径决定了自在之物概念的细节。但无论如何，自在之物的核心意思是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的外部事物。跟自在之物相对应的是现象（Erscheinung），现象就是对人的心灵显现出来的东西，现象是依赖于心灵而不是独立于心灵的。自在之物属于“本体界”（Noumena），现象属于“现相界”（Phänomena）。我们只有关于现象的知识，而不可能有关于本体的知识。为何自在之物不可知呢？康德认为，我们的知识来源于经验，但自在之物不能被人们经验到，处在我们经验之中的只能是外部事物向我们显现出来的现象。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时间和空间，这二者都不是外部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而是人的心灵所固有的先天的感性形式。我们只有通过永远内置于我们心灵之中的时空“透镜”才能经验到对象，因此我们必然地将事物知觉为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东西。但空间和时间不是我们从经验到的事物中推导出来的，它们是任何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经验到的知觉印象再加上我们先天的思想范畴的收纳整理才能最终产生知识。自在之物作为最初刺激我们感官的对象，是还不具有感觉经验形式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可能对其加以认识。

自在之物论断显示出康德的认识论不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唯物主义断言我们知道外部世界独立于心灵而存在；它也不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的，因为它假定了有作为自在之物的外部事物存在，而且它还是我们能够认识的现象的基础，并对我们的知觉印象起原因性作用。康德也不会认同自己的认识论是不可知论，因为克服怀疑主义的困境恰好是他的目的之一，他认为不可知论得以产生的原因是人们误以为知识的对象就是独立于心灵的自在之物。但康德的自在之物论断又表明了他的不可知论立场。康德自在之物论断的这些理论特征恰好使得它处于恩格斯要解答的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核心地位。自在之物论断既可全面展示出哲学基本问题需要面对的问题框架，也为人们正确解答哲学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经典反例。因此，恩格斯一有机会就要对它进行批判。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53、36页。

② F. H. Jacobi, *Werke II*, hg. v. F. Roth u. F. Köppen, Leipzig: Fleischer, 1812, S.304.

③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序”第20页。

二、自我中心困境与行动在先

康德自在之物论断所蕴含的基本思路是从主体自身来寻找知识的正当依据。我们通常的看法是“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康德反其道而行之，“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①此即“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他看来，知识的获取不是我们围绕外部事物转，而是外部事物围绕我们的观念转，即围绕我们的空间、时间、因果关系等范畴转。这显然是从以外部事物为中心转向了以认知主体为中心。因此，与其将它称作“哥白尼式的革命”，不如将它称作“托勒密式的革命”。哥白尼恰好是在天文学领域打破了托勒密式的自我中心幻想，而康德却是在笛卡尔、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的基础上决定性地发展了认识论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康德之所以下很大功夫捍卫认识论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因为人类认识似乎面临一种普遍的自我中心困境（egocentric predicament），即“人们不能离开意识而设想事物存在，因为这设想本身就已将其带入到意识之中。”^②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在认知关系之外来证明不以认知关系为转移的事物独立存在。此种困境似乎普遍存在，所以自在之物似乎确实是人的认识所不能到达的领域，自在之物不可知似乎有其合理依据。

恩格斯在批判不可知论时，没有提到过“自我中心困境”这个词，但他明确地描述过这种思路。恩格斯在《导言》中讲：“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又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③恩格斯在这里描述的显然就是包括康德在内的不可知论者所面临的自我中心困境。既然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只能以感官印象为基础，我们直接知道的始终只是感官印象，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基于感官印象所获得的知识就是对外部世界自在之物的正确反映呢？我们无法将进入感官知觉关系之后的东西与未进入感官知觉关系的自在之物进行比较。我们知道的不过是“感官所产生的印象而已”，^④自在之物永远处在我们的认知关系之外，因而它不可知。对于这种诉诸自我中心困境的不可知论，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论点，看来的确很难只凭论证予以驳倒。”^⑤因为单纯的理论论证开启的是观想的态度，这种静观默想式的理论态度极易让人陷入经院哲学式的虚构。自我中心困境实际上正是人类理智虚构的产物。对此，恩格斯讲：“人们在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⑥

理论论证开启的是反思性的我思模式，反思性的我思必是将意识本身当作对象的思维模式。在此，意识活动不是直接指向外部事物的，而是指向关于外部事物的意识的。反思性的我思依附的是前反思性的我思。前反思性的我思是直接指向外部事物的，此时意识本身尚未构成我思的对象，这种前反思性的我思是原初性的、第一性的。前反思性的我思不可能离开外部事物，而反思性的我思却要以自我跟外部事物的分离为前提，否则它就不能以意识本身为思考的对象。因此，反思性的我思不能在其自身的思维模式中证成思维对外部事物的客观真理性，即不能证明我们可以有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因而它虚构出了我们能否正确反映外部事物的难题。反思性的我思预先斩断了自己同外物的联系，然后又要在反思性的思维框架内重建这种联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在反思性我思的框架内走出反思而达到自在之物，要在自我中心的意识内捕获不在意识之中的外部事物，这本身就是在前提和目标之间人为地制造矛盾。因此，要解答不可知论的难题，我们首先要跳出反思性的我思模式，直接诉诸行动来证明。约翰逊博士是用力踢一块大石头来驳斥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的，^⑦摩尔是举起双手来显示我们知道有

①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第15页。

② Ralph Barton Perry, *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2, p.129.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0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0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06页。

⑦ H. F. Hallett, “Dr. Johnson’s Refutation of Bishop Berkeley,” *Mind*, vol.56, no.222, 1947, pp.132-147.

外物存在的。^①这绝不是哲学笑话，而是驳斥哲学怪论的睿智行动。

在任何反思性的我思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人的行动当然是有意识的，但跟行动融为一体的思想不是反思性的我思，而是原初性的前反思性的我思，它直接指向的对象就是作为自在之物的对象。倘若我们前反思性的我思不能正确反映外部事物，那么我们的行动就不可能成功。“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②我们能否认识独立于认识关系而存在的自在之物，这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③在人类利用反思性我思的才智颠倒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的关系时，就会虚构出不可知论的难题。实际上，在我们虚构出这样的难题之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否则人类就无法存活至今。行动先于反思，实践先于理论。认识论上的自我中心困境实质上不是认识论的困境，而是错误方法论的困境，它源于误将反思理解成先于行动、先于实践的东西，并企图在此基础上解答哲学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行动在先”的认识论。行动就是感性活动，即实践。以行动或实践为基础的反思才是解答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路径，也是走出自我中心困境的决定性方式。“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④离开实践的观点而任由反思性我思进行自由设想，就必然陷入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种种怪论。因此，恩格斯在《终结》中说，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⑤从行动在先的思路出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概括了康德自在之物论断的三个缺陷：一是“离开了科学，陷入了幻想”；二是“这个论断没有给我们的科学认识增添任何东西”；三是“这个论断是纯粹的空话，永远不会被应用。”^⑥这些批判主要还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来看康德自在之物论断的价值的。这论断由于离开了科学实验，从而陷入了纯粹思辨的幻想：时间和空间都只是人类的感性形式，经验的结构和秩序都是人类认识添加进去的，我们从事物中先天地认识到的东西“只是我们自己放到它里面去的东西”。^⑦这些都是离开科学和实践的幻想。即便它们不是幻想，也不能将它们用于探索事物，更不可能将它们用于指导行动。

三、独断论和实践概念

恩格斯对自在之物论断的批判曾遭到一些歪曲和误解，这些误解要么因为经典作家的批判，要么因为误解者本人的学术影响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二章专门谈论了当时俄国马赫主义者维·切尔诺夫对恩格斯有关自在之物批判的攻击和歪曲。切尔诺夫“为了‘自在之物’直接攻击恩格斯”，^⑧其攻击主要有两点：一是攻击恩格斯从煤焦油里“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并讽刺恩格斯用茜素的例子来反驳康德的自在之物论断“真是个了不起的闻所未闻的发现”；二是谴责恩格斯的学说陷入了独断论，其根据就是“恩格斯反对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谟的哲学路线”。^⑨

切尔诺夫承认当时人们确实可以用便宜而简便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茜素，但没有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他认为，“恩格斯知道了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于是他就从这个定理改成了逆定理，断言一切未被认识的东西都是自在之物”，^⑩这是闻所未闻的奇怪看法。对此列宁指出，自在之物不可认识，其逆定理不是“一切未被认识的东西都是自在之物”，而是“不可认识的东西是自在之物”。^⑪如果康德所谓的自在之物不可知“定理”成立，那么它的“逆定理”也成立。因为康德自在

① G. E. Moore, *Philosophical Pap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146.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0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94页。

⑦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第16页。

⑧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⑨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99、96页。

⑩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99页。

⑪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99页。

之物的领域就等于不可知的领域。恩格斯确实用“未被认识的”代替了“不可认识的”，从而对康德的自在之物论断进行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改造，其结果是：一切未被认识的东西是自在之物，一切已经认识的东西都成了为我之物。切尔诺夫的“胡扯”只是在不懂得恩格斯究竟说的是什么的情况下想要去“‘捣毁’它”。^①

切尔诺夫的独断论指责似乎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列宁在指出这个攻击后，花了较大的篇幅引用《终结》中论述哲学基本问题的原文，但未直接驳斥独断论的指责。独断论的基本意思是超出证据允许的范围而不适当地坚持某种看法，或对反对意见和其他选项没有给予足够的考虑，或超出理性的界限而非理性地坚持某种观点。在康德看来，盲目地、非批判地相信人类的认知能力可以超出经验的范围而获得知识就属于独断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断言人类能够认识自在之物，那就是独断论，因为在他看来这就是对人类认知能力的盲目相信和不合理运用，这种运用超越了经验现象的范围而进入了自在之物的领域。恩格斯断言我们能够认识自在之物，其证据就是人类的实践，包括科学实验和工业。恩格斯的这个断言是否有充分的证据呢？外部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心灵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源泉”，而“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源泉”，这些结论都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②恩格斯将其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这不但是充分的证据，而且是任何没陷入幻想的人都不可能否认的证据。

对恩格斯自在之物批判的另一个重要误解是由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引起的。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专门“有点离题地”谈论了“恩格斯对自在之物问题所作的评论”。卢卡奇在援引《终结》中关于康德自在之物论断的批判后，首先责怪了恩格斯“使用专门术语不够精确”。^③其实恩格斯对“自在”和“为我”这对概念，根本就不是在黑格尔技术化的专门用语意义上使用的，所以卢卡奇基于黑格尔的用法来责怪恩格斯，这是没有道理的。卢卡奇认为：“恩格斯的最深的误解在于他把工业和实验的行为看作是——辩证的和哲学的意义上的——实践。”这就是说，恩格斯误解了实践的概念。恩格斯误解了谁的实践概念呢？卢卡奇指责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卢卡奇的依据何在？他主要有两项依据：一是他认为“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直观”；^④二是他“否认工业是一种实践”。^⑤科学实验历来是我们认为的一种典型的实践形式，它怎么会是观想的行为（kontemplative Verhaltungsweise）而非哲学上的实践（Praxis）呢？卢卡奇的理由是科学实验排除了主客体方面的不合理因素，创造出了一种人为的抽象环境，实验者“力求把他的观察的物质基础尽可能地归结为纯理性的‘产品’，归结为数学的‘理念的’材料。”^⑥这种行为似乎确实包含着“静观设想”的态度而非单纯的前反思的实践的态度。工业也是我们认为的典型的物质生产实践，为何卢卡奇否认它是实践呢？因为他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在根本的意义上，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们不是真正的主体，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一个“主动轮”。且“‘工业’，即资本家作为经济、技术进步的化身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⑦因此，资本主义工业似乎不是真正的实践。

实验和工业究竟是不是“辩证的和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呢？实践的根本意思是“感性的人的活动”，^⑧即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科学实验确实可能是在理想的、抽象的环境下进行的，也确实会将实验结果归为“纯理性的‘产品’”，但这改变不了科学实验本身是人的能动的感性活动的事实。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 99 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 126、101 页。

③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204-205 页。

④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 206 页。译文有改动，译者将“kontemplativ”译为“直观”，笔者将其改为“观想”。

⑤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 14 页。

⑥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 206 页。

⑦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 206、207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499 页。

因此科学实验不可能是“纯粹的观想”。“观想”是对实验结果的理解和解释，而不是实验活动本身。卢卡奇本人在40多年后也明确承认：将实验归为纯粹的观想，“这是完全错误的”。^①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就其宏观的经济总体而言，确实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产物，不受任何资本家个体的意志支配，资本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总体结构中具有重要功能的活的工具。但并不能因此就将每个人具体的工业生产活动归结为被动的社会机器的产物，就个体从事生产的行为而言，这依然是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是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的行为，而不是凝视和设想，更不是自然规律的直接产物。对此，卢卡奇晚年也明确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在工业生产中，每一个活动不仅代表着一种有目的的劳动行为的综合，而且它本身就是这种综合中的一种有目的的，即实践的行为。”在此，他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总体与“单个的活动”之间的重要差别。就经济生产的总体而言，那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②就单个的活动而言，那是“实践的行为”。他早期对恩格斯的批判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结构与单个的工业生产劳动之间的根本区别，因而陷入了谬误。

四、结论

哲学基本问题在近代欧洲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之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③认识论是哲学基本问题获得其“完全的意义”的背景框架。认识论不是哲学基本问题中依附性的问题，而是赋予其总体性质的关键性问题。离开了认识论的本体论认定是无效的。近代欧洲认识论在康德哲学体系中来了一次全方位的综合和拓展，同时也暴露出了其先验哲学体系无法克服的矛盾。康德的自在之物论断就是其矛盾和问题的一个焦点。该论断既可被改造成唯物主义，也可被改造成彻底的唯心主义；既可被改造成彻底的可知论，也可被改造成更加彻底的怀疑主义。正因为康德自在之物论断自身的矛盾性和其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多重可能性，恩格斯才数十年来持续不断地提到它、批判它，从而让德国古典哲学结出了真正的理论果实。

批判自在之物论断，让其结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果实，绝不是简单地宣布它是“胡扯”或“幻想”就能实现的。任何真正的批判都需要揭示错误在人们头脑中的内在形成过程。康德自在之物不可知论的诞生，一是因为他对独断论过于敏感，硬要在感觉经验的限制范围内追问知识的客观真理性是否具有正当根据，因此将知识的对象限制在人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中；二是因为他在方法论上的自我中心困境，导致他无法将认知关系之内的事物与独立于认知关系的事物进行比较，以便确定其认知关系是否或如何改变了认知对象；三是因为他未能正确理解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误以为时间和空间仅仅是感性直观的形式，而非事物存在的根本形式；四是因为他不理解感性实践活动的认识论意义，在他构造自在之物问题之前，他的行动早已解答了这个问题。感性的根本的含义不是“直观”，而是“实践活动”。^④在实践中我们直接跟外部事物打交道，绝不是跟感官印象打交道。

恩格斯诉诸行动和实践来驳斥康德的自在之物论断，这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攻击或误解：一是说恩格斯陷入了独断论；二是说恩格斯所说的实践不是“辩证的和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独断论的攻击不能成立，因为人们千百年的实践活动所提供的证明比任何理论论证都更加充分、更为有力。如果我们采用理由的理由这种无限后退的追问方式，任何本体论断言最终都可被指责为独断论，因为理由的链条不可能无限延伸，总要有一个无法再追问的终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康德本人固执地坚持在做知识断言之前要考察清楚我们的认识能力，这也是一种新的独断论。实践的根本特征是能动的感性活动。无论如何，实验和工业生产都是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感性活动，因而都是纯粹的实践。卢卡奇的自我检讨进一步确证了恩格斯自在之物批判的真理性。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4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哲学意蕴^{*}

刘秦民

[摘要]“生命共同体”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维的全新理念，它既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判断，又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命性与整体性的现实肯定。“生命共同体”一方面是从生命的有机性、生成性、活动性和系统性来描摹人与人的对象世界的，超越了人与自然对立二元思维对自然或人的单一肯定；另一方面更是基于社会历史的现实与中华文化的优秀理念表达出来的全新生态哲学理念。因此，“生命共同体”既是生命反思生态问题中的哲学理念，强调从生命视野出发去考察生态问题；又是追求生态和谐的实践理念，强调自然内部各要素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共建三者的有机统一；更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以实践作为构建原则，以具有“生命”属性的自然存在物作为对象，以共同体的方式，为解决当今人类生态问题以及实现生命繁荣所提出的现实方案。

[关键词]生命共同体 生态哲学 人与自然

[中图分类号] B0-0；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023-07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①它贯穿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始终，是生态哲学领域最基础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首先指向的便是如何看待自然本身以及如何正确认识人类生命与其他自然生命的关系。基于对这一关系问题的理论思考以及破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的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它从生命视野出发考察生态问题，赋予了自然生态系统“生命”的属性特征，并将共同体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解决生态问题，勾勒了人与自然中其他生命共生共存的共同体图景，为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生态需求、推进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从生态哲学视域来看，“生命共同体”不仅对生态问题中的生命进行反思，还是一种追求生态和谐的生命理念，更是一种实现生命繁荣的科学方案，凸显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生命赋予和生命关怀，是对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破解全球生态难题的新的突破口。理解“生命共同体”理念中的生态哲学意蕴，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认识，而且有利于推进生态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更能为“人同自然的和解”提供新的现实路径选择。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2ZDA00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重大研究专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广东实践研究”(GD22ZDZ01-19)、国家社科基金思政课专项“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研判与防控机制研究”(20VZS021)、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颠覆性技术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1YJA7100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秦民，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67页。

一、思考生态问题的生命视野

生命的存续是一切历史活动、社会关系的前提。自然界与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是无数生命个体为了生命存续而不断集聚、抗争和扩展的过程。在这一活动过程中，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人类不断超越自然所赋予的动物本能，“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①作为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②一方面，人类“工具—技术”系统的进步决定了这种再生产的方式和程度；另一方面，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交往形式深刻影响着人们改造、利用自然的形式。在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活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不合理的“物质变换”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随着人类改造自然实践活动的深入，生态问题的日益凸显促使人们开始思考生态问题中的生命视野，探讨如何实现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和谐相处。

对生态问题中的生命的认知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但也表现出内在发展逻辑的连贯性。在蒙昧阶段，人类以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来理解生命，因而畏惧自然。在这一阶段，个体未能将自身视为能动的生命主体，对自然的改造完全服从于自然规律。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细化，个体生命开始从纯粹附庸于自然的状态走向主体本身，开始思考生命的起源。并且，扩大的社会交往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社会性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他者生命对主体的意义不再局限于最原始的自然关系，而成为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个体是社会存在物”的意识在人们社会交往的活动中开始萌芽，同时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个体的关系从被动地依赖转变为主动的改造，“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③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理性与科技理性在社会现实中的应用以及启蒙运动的开展致使生态问题中的生命视野发生巨大转变。人类征服自然的欢呼颠覆了以往“万物与我齐一”“顺应自然而生活”的价值追求。自然的概念从原本的“生长”、事物发生的“内在根据”变成没有灵魂、只是单纯进行机械式运动的自然事物的总和。人由此从自然界中脱离，并将自身视为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与自然“主—奴”模式的建构标志着人与自然的本质断裂，也导致了人类中心价值观的强势运行。在认知方式上，以主客对立、非此即彼来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方式过度吹捧了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将其他非人类生命存在物视为服务于人之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在价值追求上，“在物质丰饶中纵欲无度”的目的取向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盲目开发，物质财富成为衡量自然价值的唯一标准。任何单纯的反动必然“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④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单纯颠倒，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又陷入了另外一个极端。它以生态学的知识为根据，证明人类不过只是生命之网中的普通物种，强调生命个体具有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偏好的权利和价值，认为应将自然视为目的，并对其进行尽可能原封不动的保护。这种极端的自然中心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将人的实践活动与自然分离开来，从而撇开了具体历史条件来考察自然，是一种非实践的抽象自然观。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⑤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在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把握陷入了彼此对立的极端。前者将人视为“抽象的人”，忽视了人与其他生命个体的有机联系，认为自然演变与其他生命个体的发展“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⑥而人则是“万物的尺度”，是规则的制定者。后者将自然视为“抽象的自然”，以“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自然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④[德]马丁·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林中路》（修订版），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页。

以及其他生命体，忽视了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看不到自然界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从“自然界的客观独立性及其地位先在性”以及“现实的人”出发，在承认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以及自然界在人生存、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同时，指出“有生命的个体”是具体的历史的个体，是存在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中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个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他们“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①此外，马克思坚持从“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出发把握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存在物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②人要生存与发展，必须在自然界中与其他生命个体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活动，自然界及其他生命个体成为“人的存在的基础”，而“人化自然”的出现是人能动地改造自然界中自我意识的对象化的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再现。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中得到合理阐释。

然而，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性社会中，无论是人类个体、自然环境还是其他生命存在物都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流动性状态之中。“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③这种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能，一方面衍生了人“普遍利用自然属性”的本性，导致了人对自然的“祛魅”以及对其他非人类生命存在物的蔑视。在人看来，自然环境以及生命物种只是单纯作为资本的要素服从于其增殖的逻辑的，成为满足人类感性需要的“有用物”。另一方面产生了资本“普遍利用人的属性”的现象。资本不仅将自然作为资本增殖的要素，更将人本身视为实现其自身增殖的工具。人的“类特性”、主体性在无限的资本循环以及单向度的社会交往活动中开始丧失，最终沦落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如今全球化的进程并未改变资本的实质，资本不仅试图“超越一切空间界限”且“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而且同时在生命的时间方面也破坏一切界限，力图以“用时间消灭空间”换取剩余价值的增殖。这种资本增殖的“时空压缩”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环境破坏，致使人类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体处于一种纷争对抗的紧张关系中。资本主义社会在制造人与自然冲突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加剧，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也日趋严重。基于这一时代背景，“生命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理论特质，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从生命的视野出发强调了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体共生共存共荣的辩证统一关系，回应了当今世界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个体“应如何相处、怎样相处”的时代命题，坚持以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个体的和谐相处提供了价值导向与实践方案。

二、追求生态和谐的生命理念

生态和谐意味着自然内部各要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原本强制斗争的状态转变为彼此共促进、同发展的状态。“生命共同体”强调以整体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去协调生命存在物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生命存在物之间和谐统一的辩证关系，其本质上就是追求生态和谐的生命观念。生态和谐内在包含着自然内部各要素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人的和谐共建三个方面，其中自然内部各要素的和谐共生是基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核心，人与人的和谐共建是保障。

（一）共在共生的自然生命

自然生态的创生过程是一个自组织演化过程，自然内部各要素以及自然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演化，形成了其独有的本质联系与发展规律，并且各要素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生命关联。而这些内部要素的生存状态以及彼此关联的合理优化关涉到自然生态的和谐稳定。“生命共同体”理念认为，“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④它追求自然内部各要素共存的和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0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4页。

谐状态。

所谓的“和谐共存”绝非意味着斗争的消失。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共存”即共同生存，其本身就意味着相互依赖与相互斗争。一方面，自然内部各要素的“和谐共存”表现为某一自然存在物与其他存在物处于一种生存斗争的状态，彼此之间为了各自的生存发展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进行物质能量的争夺。另一方面，这种“和谐共生”的状态更突出表现为自然存在物之间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各要素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生成和谐、统一的内容，从而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这充分说明了自然内部各要素及其环境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它“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①这些链条彼此之间进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循环，构成了多样性的生命共生状态，并由此形成了整个自然界的生命网络。这一生命网络是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维持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并在自然规律的状态下呈现出和谐共生的景观。整个自然界正是在这些自然存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中得以繁荣和进化的，因而自然内部各要素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然而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导致了这一生命网络自我调节能力的失衡，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实存。为此，“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呼吁构建自然内部各要素的和谐共生状态，重新恢复并改进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共同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有机的身体”。

（二）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②“生命共同体”理念将人与自然视为不可分割的、和谐统一的有机生命躯体，坚持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最基本的原则。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这一对共生共存共荣的矛盾体在对立统一中获得相对稳定有序的联系和发展。这种和谐共生并非意味着双方的绝对同一，和谐共生是在承认彼此差别性、多样性的前提下，在对立统一的运动中形成的有序、协调、稳定的状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在包含着两层意蕴。一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③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界最懂自然界”，自然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使其能以最有利于完整系统的生态平衡方式而存在，因此必须尊重并顺应自然规律，将自然视为独立的、平等的生命个体，像对待生命一样尊重它、保护它。二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改造自然。“只有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④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相较于其他生物的优势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并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然而改造本身就蕴含着“更好”或“更糟”两个基本向度，忽视自然规律的改造将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生态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表明了人们忽视自然规律改造自然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断裂，其实质上是对自然存在物生命本质的否定，因此能动地改造自然应以尊重、顺应自然规律为前提。

（三）人与人的和谐共建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⑤生态和谐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依托于人与人平等互利、和谐统一的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这里所指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⑥作为“现实的个人”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在自然层面上表现为人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凸显的是自然的人化过程，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8页。

④ 刘思华：《关于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学术论坛》2006年第5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页。

即“自然界向人的生成”；在社会层面上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及交往形式。“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①生产活动的社会层面作为生产活动更为基础、本质的层面，规定并制约着人改造自然的方式、性质和前景，也规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与本质。因此生态和谐的实现亦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如果脱离了社会关系，生态和谐将会变得极其抽象。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折射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人与自然的失衡实际上是人与人关系的失调，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介体现出来的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化与对抗。”^②因此，生态和谐的实现不应当只着手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更要关注背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建构。“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③作为一种关系性存在，个人总是在某一共同体之中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而正是通过个人联合起来的共同体对社会生产条件的控制，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生态的和谐。“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生命共同体”是通往“自然必然性的王国”的科学途径，是“真正共同体”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也是人与人和谐关系构建的具体方式。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命运、人与人的生命是休戚相关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生态的和谐必须建立在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携手共建的基础之上。

三、实现生命繁荣的科学方案

“生命共同体”不仅是倡导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物彼此之间保持和谐状态的生态理念，更是追求实现生命繁荣的科学方案。其具体表现为，首先，“生命共同体”将人视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强调以实践为中介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坚持“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④在本体论上深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生命共同体”在强调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进行有机统一，在认识论上将对生态的理解上升到生产的高度。最后，“生命共同体”基于整体系统的科学方法，注意处理自然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内容关联，注重内部各要素的协同建设，在方法论上以共同体的方式丰富发展了“人同自然的和解”的现实路径，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实践遵循，为化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本体论层面：基于感性实践活动深化人与自然的关系

基于本体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自然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二是人与自然是否有联系以及怎样联系。在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以前，对自然的本体论认识陷入了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潭中。自然要么被当作某种存在于“头脑的天国”中的抽象的存在物，要么被视为“与人无关的自然”或“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⑤自然内在联系的丰富性与客观的发展性、自然与人主体能动性的内在关联被忽视了。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唯心主义将自然的客观性置于纯粹的抽象家园的荒谬，又批判了机械唯物主义“客观的或直观形式的”局限性，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⑥同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上，无论是蒙昧时期的天人合一、主客一体抑或近代科技理性盛行下的天人分离、主客对立，都是脱离感性生存实践来看待这一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人与自然“主客体对象共在”这一内核。主客体截然决裂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陷入了无谓又无望的对立状态之中。“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0页。

② 周志山：《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视阈与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1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8页。

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①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同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应始终处于对象性的共生关系之中，并且只有将这种关系“当作实践去理解”才能辩证看待二者关系，实现“人向自然而生”与“自然因人而美”的动态平衡。

“生命共同体”是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以及结合当今全球生态的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关于如何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一方面，它坚持以实践为导向，将这一关系视为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历史生成的关系性存在，“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②只有在实践中二者才能达到高度的统一。另一方面，“生命共同体”在生命的意义上深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③意味着整个自然界无论是有机体抑或无机体，都被赋予“生命”特征，自然各个要素之间有着高度的关联并在整体上相互耦合，这本身就是对生态系统开放性的承认，是在本体论上对自然界涌现性与完整性的合理界定。同时，它表示了人类对待自然万事万物应秉持的正确态度与科学认知。生命作为个体存在与活动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最高的目的和意义。“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意味着要对生态环境存有生命的敬意，不应将其视为满足人们物欲的毫无生气的自然存在物，而应将其纳入生命属性范畴来考察，视其为某个活生生的、与周围事物发生联系的有机生命体，对其予以关怀与保护。

（二）认识论层面：将生态问题的理解上升到生产力的高度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以“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④的生产劳动为中介的。这种物质变换形式构成了人与自然间最直接的生产关系形式，而这一形式的程度、性质与方式取决于人们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生态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发展的问题。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以及解决路径的探寻长期以来拘泥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之中。“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⑤“生命共同体”超越了以往割裂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局限，将对生态问题的考察置于发展的社会视域中，在厘清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从发展生产力入手来探索“人同自然和解”的科学路径。

从生产力的高度来理解生态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要辩证看待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自觉将对生态环境的维护与改善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⑥在人与自然发生本质关系的过程中，自然通过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以“人化自然”的方式成为人的对象性存在，成为“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必要的、重要的对象”，并且这种对象性存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是人“无机的身体”。因此人与自然具有原初性关联，处于一种共存共生共荣的状态中，生态环境的保护构成了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内容，必然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维度。这意味着人们应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得益彰。二是要自觉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成果的应用丰富了人与自然交往的形式，扩大了人与自然交往的范围和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⑦生产力的发展固然能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方式直接关涉到人改造自然的形式。近代以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频发，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恶化。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8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6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6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3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19页。

“生命共同体”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但这绝不意味着单方面强调GDP的增长，而是“既要GDP，又要绿色GDP”，坚持走绿色发展的可持续道路。

（三）方法论层面：坚持系统整体的科学方法

“生命共同体”以共同体的方式关照生命个体的有机属性以及生命群体的共生共荣的特征，这决定了它必须坚持系统整体的科学方法。它运用系统思维和方法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它将生态文明理念与原则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渗透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之中，全面统筹了陆海空、城乡、区域、国际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依照整体性和关联性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合理设计和布局，从而优化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凝聚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合力，维护全球生态动态平衡。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关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变革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的科学方法在具体落实运用上要求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向、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的丰富完善、治理方式的创新转换、个体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转变等各领域各环节的变革，“做到相互促进、齐头并进，不能单打独斗、顾此失彼，不能偏执一方、畸轻畸重”，^①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和谐生态与美丽环境的向往与追求。

此外，以共同体的方式解决生态问题是“生命共同体”从方法论层面上对生态哲学的拓展与创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说明了人是在一定关系共同体下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的、具体的个体。然而以往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要么依托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要么注重地域性的保护，鲜少从人类的整体视角去看待生态问题。对于共同体的认识大多围绕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而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个体的关系维度被忽视了。直到马克思主义出现，它将共同体的实现置于现实的人具体的历史的活动之中，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③自然作为“人无机的身体”应被纳入“真正的共同体”之中，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称为“自然必然性的王国”。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追逐资本增殖的资本逻辑导致个体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自然的“祛魅”导致了“自然必然性王国”运行秩序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共同体成为一种“虚幻共同体”。如今“生命共同体”就是在生态危机全球性蔓延的历史语境中，探讨如何破解资本逻辑下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不合理”困局，并基于共同体的维度重新思考和修缮人与自然、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进而探索一条通往“自然必然性王国”的科学路径的科学理念。这一理念绝非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它是时代的回响，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为解决当今人类生态问题所提出的科学思想。“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④这一理念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事关人类共同的命运与未来，因此我们应秉持“只有一个地球”的理念，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于人类共同的努力与建设之上，坚持以共同体的形式以及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共同解决全球的生态问题，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享全球生态发展成果。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2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17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138页。

论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的哲学基础^{*}

安 晖

[摘要]意识领域的新达尔文主义路径以严格的科学厘定和定量模型为基础,研究意识现象的生物学基础以及与意识现象密切相关的心灵认知机制。首先,意识神经相关物研究在形而上方面并非含糊不清的,它体现了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试图实现的关于“意识是什么”的自然化解释。其次,从演化的角度看,将意识的产生作为一个信息共享机制,有助于解决认知科学哲学中“通用问题求解”和“专业模块”之间的矛盾。最后,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正试图运用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为自由意志、自我、泛心论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模型。这些趋势表明,意识的新达尔文主义自然观正在呈现一种整合趋势,它以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的新发现为内容,以新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为框架,试图完成心灵哲学中各个论题的大综合。

[关键词]新达尔文主义 意识 意识神经相关物 理论模型 整合趋势

[中图分类号] B016.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030-06

在认知科学中,意识被誉为心智研究上的“皇冠”;在哲学中,意识被视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与“人在自然界的位”这一根本问题直接相关。因此,意识研究纲领既是形而上的,又是科学的。如果说还原式的物理主义因为过于粗暴地将心理等同于物理而受到批判,那么新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观则期望从自然主义的立场为意识体验的主体性以及意识的神经机制提供统一的解释框架。从学术谱系上看,新达尔文主义是在科学内容上对经典达尔文主义的拓展和深化,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社会普遍法则的纠正和反叛。更重要的是,新达尔文主义在挖掘社会现象的生物学基础和机制时以严格的科学厘定和定量模型为支撑,因此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思潮。^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神经生物学的蓬勃发展,意识研究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神经生物学家们也开始尝试对意识这个曾经被视为导致了心—身关系二元分离的关键问题进行自然化解释:他们寻找意识产生的神经相关物,通过对比分析确定意识的定义,运用组分建构意识产生的理论模型,甚至从生物学角度试图解释与人类精神世界密切相关的自我、自由、情绪、理性等概念的起源与发展。所有这些倾向似乎表明,当代意识神经生物学所依赖的新达尔文主义自然观正在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以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的新发现为内容,以新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为框架,试图完成心灵哲学中各个论题的大综合。

一、意识神经相关物研究及其哲学辩护

一直以来,如何研究意识或者说意识能否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横亘在科学家面前的难题,毕竟

* 本文系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当代新达尔文意识研究路径的哲学基础分析”(2020YJ07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迪昂全局神经工作空间意识理论”(2016M60195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安晖,山西师范大学社会学与法学学院副教授(山西 太原, 030092)。

① 关于新达尔文主义、经典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学术谱系上的关系,参见徐英瑾:《演化、设计、心灵和道德——新达尔文主义哲学基础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

意识事关主观体验，而科学涉及客观测量，其困境正如莱布尼茨在其磨坊论证中所提出的：假如我们将磨坊的各个部分按照一定比例放大到我们可以进入其中参观，我们能看到的将仅仅是一个零件作用于另一个零件，但绝对看不到任何可以被称为意识的东西。其实意识研究面临的困境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人类认识的一种惯性或者说局限性：我们总是习惯于从实体的角度，确切地说是从事物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出发去理解事物，例如桌子有桌子的样子，花朵有花朵的形态，这种可视化的认知模式使我们相信“眼见为实”，对于无法可视化的实体我们则束手无策。我们要如何研究“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呢”？这种侧重意识内容的研究在纯粹的思辨中可行，但是却难以被纳入科学的研究范式中。

从理论上讲，对于某个事物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面向，即它是什么（对 what 的求解）、它如何（对 how 的求解）以及为什么（对 why 的求解）是这样。既然我们难以从内容的角度研究意识是什么，那么是不是可以从过程的角度研究？得益于 20 世纪中期因信息理论被运用于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而爆发的认知革命，神经元开始被作为一个信息处理的基本单元，而脑则被视为一个传输、处理信息的系统。这为从过程的角度理解意识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及实践基础。事实上这也从时间点上获得印证，意识研究开始突飞猛进正是在计算主义、功能主义在研究范式上获得普遍认同之后。

既然意识被视为一种实现某种功能状态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必然有其起点，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找到意识所产生的物理基质。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新颖，被当代神经科学所诟病的笛卡尔早就做过这样的探索，他在对身体的机能进行物理的、机械化的解释之后，发现这些都无法解释意识的产生，因而将身体唯一不对称的松果体视为意识产生的地方。因此在笛卡尔那里，二元论不是逻辑起点，而是一种逻辑论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睿斯（Chris D. Frith）和李斯（Geraint Rees）主张当代意识研究中的物理主义进路在研究方法上与笛卡尔没有不同；^① 迪昂（Stanislas Dehaene）甚至将笛卡尔视为一种还原论者，认为笛卡尔的二元论为意识的自然化解释提供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大脑如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它自己？其二，大脑如何用灵活的思维进行理性判断？”^② 如果笛卡尔可以被视为在自然化解释意识道路上的前车之鉴，那么如何才能避免重蹈二元论的覆辙呢？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关键的理论和实证基础——认知无意识理论的发展。笛卡尔时期，物质和精神具有绝对的对立性，非此即彼。虽然物质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细分，但是无论借助于哪种术语，“心”“灵魂”等都是难以被分割的。意识此时还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被视为理性思维和意志力的必要条件，是心灵中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是认知无意识的研究使得精神这一绝对的实体被细分了。心灵所进行的思维过程被“认知加工”这一上位概念所统摄，其下则包括意识加工和无意识加工两种类别。正是这样的分类使得意识可以作为一个变量被加以研究。研究者通过各种可以随意操纵被试意识内容的实验手段，例如双目竞争、注意瞬脱、掩蔽等，使得“意识的神经相关物”研究正式被提上日程。

最早提出“意识的神经相关物”概念的克里克（F. C. Crick）和科赫（C. Koch）将其定义为“足够产生特定有意识的现象状态所需的神经活动的最小集合”。其具体的研究策略是根据被试有意识的主观报告，探测一个刺激物（即某个信息）进入大脑后，从无意识状态转换为有意识状态所需的时间、在上述两种状态下脑活动的差异，包括无意识加工和有意识加工是否在某个脑区存在明确的分界线、是否在某种认知能力上具有明确的劳动分工、是否在脑激活的发放模式中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等等。

意识神经相关物是新达尔文主义介入意识研究的第一步。虽然它与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大相径庭，但是反对者认为“相关”一词仍然不足以将其“祛魅”。从实证经验上看，它所能界定的神经集合只是某个意识状态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③ 因为虽然意识状态变化必须以其神经状态变化为基础，但是不同的

^① Chris D. Frith, Geraint Ree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onsciousness”, Max Velmans, Susan Schneider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Consciousness*, Second Edition, John Wiley& Sons Ltd, 2017, p.3.

^② Stanislas Dehaene, *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Deciphering How the Brain Codes Our Thoughts*, Penguin Books, 2014, p.6.

^③ David J. Chlmer, “What is a Neural Correlate of Consciousness”, Thomas Metzinger (ed.),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 Empirical and Conceptual Question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p.21.

神经状态却可以支撑相同的意识状态。从解释力上看，“相关性”较“同一性”“因果性”力度更弱，它并没有指明意识状态与神经状态之间的关系。从学者们坚持的术语就可窥见一斑：塞尔（J. Searle）主张脑导致体验，格林菲尔德（S. Greenfield）认为脑生成意识，查默斯同意脑引起意识，而丘奇兰德（P. Churchland）坚持脑就是意识等，以至于布莱克摩尔（S. Blackmore）怀疑这些立场以及措辞能否真的避免二元论。^①还有些学者认为，当代的意识神经相关物研究的实质是意识内容的神经相关物，当我们拿掉意识内容后，那个作为意识本质的东西也应当是存在的，只有那个东西的神经相关物才是意识真正的神经相关物。

我们认为上述形而上的诘难恰恰是基于二元论提出的反驳，因此当然与意识神经相关物的哲学预设不相融通。在意识神经相关物研究中，意识与无意识的对比既是其哲学基点，也是其工作平台。本着挖掘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生物学基础这一哲学动机，它所要表明的立场是意识的产生取决于脑神经系统的某种活动，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科学厘定和定量模型为支撑，为意识的产生机制提供复杂的理论模型。

就“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反驳而言，不同的神经状态可以表征相同的意识状态这一论据完全是以意识定位于某个确定的、具体的脑区为预设的。但是这个观点已经被目前的科学证实为错误的，意识不是限于某个特定的物理位置，而是作为一种特定的神经发放模式而存在的，这也就有了后来关于意识理论模型的建构问题。“解释力度弱”的指责则更是二元论思想的残留。意识神经相关物有其特定的适用语境，即一个信息被神经元接收、表征、加工后从无意识转换为有意识的变化过程，尤其是那些能够作为意识产生的标志性生理特征。因此学者们对于“相关性”的解释显得生硬且有乞题之嫌。

至于“意识内容神经相关物”则可能是最棘手的质疑。其实质涉及意识与语言，确切地说是与语义理解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意识实证研究是以被试的主观报告为变量测定相应的神经状态的，因此得到的只能是意识报告内容的神经相关物，而不是那个纯粹的意识的神经相关物。回击这一质疑的关键在于意识实证研究能否区分意识状态与语义理解功能：如果能证明语义理解可以被无意识加工，那么这种报告就不仅仅是意识内容的功能，而可被认为是真正的意识的功能。通过近两代意识研究者们不断的努力甚至激烈的拉锯战以及当前脑成像技术提供的证据，无意识的语义理解终于获得了证实。^②这也表明当前的意识神经相关物完全可以从意识内容的神经相关物中剥离出来，被赋予专有的“意识”这一标签。

二、意识产生机制的理论模型以及基本预设

意识神经相关物研究涉及意识状态下脑神经活动呈现的特征，属于“是什么”的范畴，确切地说是一种外延性的界定，是对“什么是意识”的甄别。这些意识的相关物或脑的特征还不能解释“为什么”脑的这类活动会产生意识。因此如果说意识神经相关物研究在面对心身二元论时采用了一种迂回的战术，那么新达尔文主义要完成对于意识的自然化解释，就必须直面心—身问题，提供意识产生机制的理论模型。从研究策略看，意识神经相关物自下而上地观察意识状态与脑状态的系统联系，而意识机制的理论模型提供了一个包容性的理论框架、一系列的对应法则去解释意识状态与脑状态如何联系在一起，以及意识状态为什么会展现出如此的脑活动特征。唯此才能够充分驳斥“充分非必要条件”的质疑。

故此，意识理论模型的建构成为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的核心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解释意识产生机制的理论。^③这些理论虽然因为研究者各自的学术背景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偏好和侧重点，研究者在论战中常常相互批判，但他们又都立足于对当时意识实证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析取，

^① [英]苏珊·布莱克摩尔：《对话意识：学界翘楚对脑、自由意志以及人性的思考》，李恒威、徐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7页。

^② 关于这一问题相关的研究史，参见 Stanislas Dehaene, *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Deciphering How the Brain Codes Our Thoughts*, Penguin Books, 2014, pp.64-71.

^③ 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以下理论：巴尔斯、迪昂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克里克和科赫的神经生物学理论，埃尔默（G. M. Edelman）的动态核心理论，里贝特的时控理论，托诺尼（G. Tononi）的信息整合理论，达马西奥（A. Damasio）的意识的感受理论，汉弗莱（N. Humphrey）的演化理论，丹尼特的多重草稿理论，塞尔的生物自然主义，罗森塔尔（D. M. Rosenthal）的高阶理论，威尔斯曼的反身一元论，等等。

其理论模型总是建立在对科学内容的基本理解和尊重之上，其许多理论组件也都来源于实证研究的既有成果，因此它们也彼此借鉴和融合。其中，巴尔斯、迪昂等提出的“(神经)全局工作空间”理论和托诺尼、科赫等主张的“整合信息理论”脱颖而出，成为目前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意识理论。

尽管目前意识理论彼此间的整合并不意味着即将出现一个统一的、综合的关于意识的数学理论，能够达到科学史中麦克斯韦-玻尔兹曼所创立的气体的数学模型一样的理论高度——后者可以通过气体中原子的运动解释压力、温度等宏观变量，也可以通过还原论的链条解释分子、等离子体等微观物质。毕竟相对于其他存在的物质，脑具有更多的层次，需要更为复杂的数学模型才能解释意识是如何被还原到神经元层面的。但是这种整合也说明了某些关于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的共识正在逐渐成形，这构成了他们意识理论建构的哲学预设。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其积淀下来的假说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心灵或思维过程被假定为一种因自然选择而产生的信息加工处理器。当代意识研究的复兴离不开“认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背景。这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心理学和哲学界的重大思想革命，在产生之际就具有“跨学科研究”这一显著特征。米勒(George A. Miller)将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和哲学等视为这门综合性学科的“碎片”，并认为从中会“看到一种步步为营的建构，以及……相互协作。”^①但是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综合并不仅仅基于相同的研究问题——对于认知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基于信息加工的角度去理解认知的，例如心理学需要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去解释记忆、学习、问题解决等，语言学需要从信息加工出发解释语义表征、语义理解等，神经科学则根据信息加工探究脑活动的特征、模式等。因此，信息加工是统摄认知科学的基本前提。其次，这些信息加工最终导致心智系统内部形成了功能模块分工。最初学界将认知信息加工理解为一种抽象、通用的问题解决程序，即认为认知程序只有几个通用的步骤，且它们能够解决所有认知方面的信息加工问题。但是这种观点很快被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习得机制和马尔(David Marr)的视觉理论证明是研究方向上的错误。因为他们的理论都表明，存在着某种专门性程序，诸如语言习得、视觉认知都需要一套专门性程序。而福多(Jerry Fodor)则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心灵模块说”，认为心智不可能是单一的、通用的程序，而是几个专门性程序的集合，其中每一个专门性程序都有其独特的规则。考斯米德(L. Cosmides)、托比(J. Tooby)、^②卡鲁瑟斯(P. Carruthers)^③则进一步提出了大规模模块理论，将福多有所保留的中央语义系统也扩展到模块化解释中，试图彻底从心智模块中去除通用问题的解决程序。最后，意识是心智模块间一种交流信息的网络。因为心智系统中存在大量的功能模块化的劳动分工，这必然导致某个模块的运作对于其他模块而言是不可通达的，所以需要一个使各个模块的输出信息得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意识。因此意识是一个由进化而来的，用于提取相关信息并将其配送到对应区域的结构，意识的功能是使全脑的高级决策系统都能够共享某个信息。

事实上前两个假设是认识科学的基本哲学预设，应当由认知科学对其进行辩护，只有第三个假设才是新达尔文主义在意识研究领域设立的一般理论假设。这里我们以“通用问题求解”与“专有模块化”在信息加工理论中的竞争史为第三个假设提供论证和分析。通过上述对历史发展的梳理，通用问题与专有问题构成了信息加工理论中的一对主要矛盾(见图1)。对其研究的思路要么试图取消通用问题解决程序，以便与认知科学中计算主义的认知纲领相吻合；要么试图兼用专有模块与通用程序，以便缓解计算主义认知纲领所无法解决的诸如语义关系、框架问题、具身认知等问题。两者间的矛盾似乎成了认知科学中的死结。但我们认为这种矛盾或许并不成立，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其一，即使通用程序为错，那么专有模块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结，能够使模块之间的最终输出信息彼此关联(这与模块内部运行不可通达并不矛盾)？或许有人提出，将“功能模块”界定到足够大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但是足够大的

^① George A. Miller,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3, vol.7, no.3, p.143.

^② J. Tooby, L. Cosmides,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D. M. Buss (ed.),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Hoboken, NJ: Wiley, 2005, p.25.

^③ Peter Carruther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44-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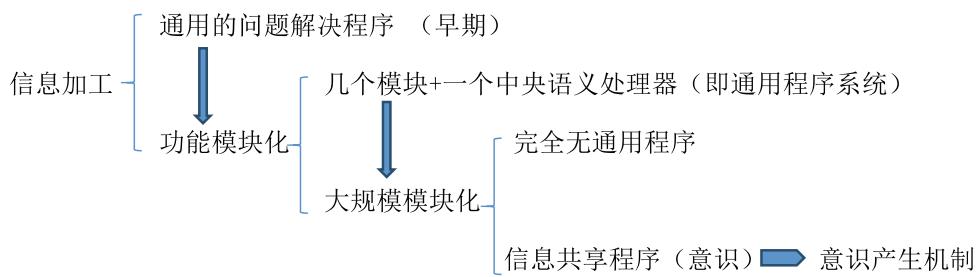


图 1

模块定义不但与模块化的初衷——认知构架被分解为具体的、专有的、特化的成百上千个功能模块的假设相违背，而且足够大的模块不可避免地将囊括某些相同的功能。诚如“大规模模块化假设”所承认的“生物学系统本身是以增量的方式慢慢演化而来的”，^①那么基于经济考量，生物体中新的认知模块也应当建立在原有模块间的新联结的基础之上。专有模块在面临新问题或者专有模块间输入互相矛盾时徒有速度而不畅通，这个系统就会陷入混乱，甚至“死机”，最终模块化所追求的高效性亦无法实现。其二，如果我们将上述必要的模块间的联结称为通用程序，那么这个所谓的通用程序是否有与之相对应的运行规则呢？传统观点对于通用程序的辩护总是立足于认知活动的灵活性和创新性的，主张“需要一种和特定问题求解程序相脱离的一般问题求解能力”。^②但是提出“通用程序”“一般能力”这类概念还仅仅是第一步，还需要对它进行一种操作定义，因为在科学的研究中，“只有当概念所指涉的对象以及概念同这些对象据以对应起来的规则能够被显示出来时，概念才是有意义的”。^③我们认为，结合福多对于中央语义系统的论证和模块化“速而可能不达”的缺陷，可以将通用程序从操作上界定为“有意识通达”。相对于专有模块，这个通用的“有意识通达”也有其专属的运行方式。按照这个思路，目前关于意识理论模型的理解，实质就是对这个通用程序的求解，其可以使认知中的一般能力具体化。

三、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对传统心灵哲学的入侵

通过赋予“意识”一种神经生物学定义，将“意识”视为一种神经生物机制，从而探讨这种机制赖以存在的神经基础、据以产生的神经模型，这类意识的神经相关物、意识的理论模型探讨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范畴。它们构成了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的理论大厦。虽然被冠之以“意识”，但实际上它与传统哲学所探讨的“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出入，不过这并不妨碍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涉足传统心灵哲学中的重大论题。

我们认为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范式对于心灵哲学的入侵主要有以下三个标志性大事件。其一，20世纪80年代，里贝特（B. Libet）、苏恩（C. S. Soon）等科学家就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提供了神经科学实验证据，重燃了学界对自由意志这个古老问题的大讨论。在这个实验中，里贝特将自由意志界定为自愿行为（voluntary act）中有意识的行动意志，通过比较导致该自愿行为的脑活动启动时间、有意识地觉知到该自愿行为意图的时间以及该自愿行为实际的发出时间的先后顺序，他们证明：有意识的自由意志并不启动一个意志过程，因为关于该意志行为的脑活动早于该有意识的行为意图约400毫秒；虽然自由意志并不启动一个自愿行为，但是它却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否定最终实现对于自愿行为的控制，因为对自愿行为的有意识觉知早于实际做出的自愿行为约150毫秒。^④里贝特等人关于自由意志的神经科学实验带来的重要启示在于：长期以来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间的争论可以完全按照当前意识与无意识对比研究所规定的严格科学方式来进行，我们完全有希望以严格的神经生物学模型分析自由意志与行为间的关系。其二，20世纪90年代末，达马西奥（A. Damasio）提出了关于自我的神经生物

① Peter Carruther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2.

② 徐英瑾：《演化、设计、心灵和道德——新达尔文主义哲学基础探微》，第160页。

③ [美]沃尔特·艾萨克森：《爱因斯坦传》，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75页。

④ [美]本杰明·里贝特：《心智时间：意识中的时间因素》，李恒熙、李恒威、罗慧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3-88页。

学基础。达马西奥认为，关于意识的奥秘，仅仅解释我们是如何产生心理意象或注意到这些意象并不够，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意识产生的理论还必须对自我感是如何进入心智的这个演化问题进行解释。据此，达马西奥的自我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在生物的生存和演化过程中，生物有机体自我保持、自我产生的价值具有根本的、原则性的地位。二是在演化历程中，可以区分出三种生物的生命调节方式：行为层面上的自体平衡、意象层面上的神经表征、意识层面上的自我感。行为层面上的自体平衡是生物的身体对外部刺激的直接反应，即生物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意象层面上的神经表征是生物体神经系统对其身体状态所形成的“映射”，即生物体对自身身体的认知。三是唯有意识层面上的自我感突破了前两者生物体的自动化反应，正是意识赋予了生物体一种自我感。当生物体与客体发生作用时，生物体在建立客观意象的同时，其神经系统也会映射因建构客观意象而被改变的身体状态，自我感便产生在这两个神经映射的组合中。因此意识与自我感是同在的。^① 达马西奥意识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从身体演化的视角为意识、自我感的产生提供了解释，将认知哲学中的具身理论适用于意识领域，使意识得以从非物质的我思中解放出来，并试图在物质的身体上找到其根源。其三，托诺尼（G. Tononi）和科赫（C. Koch）在意识的整合信息理论中为泛心论提供了一个更为精妙的现代版本。他们根据意识的基本现象学属性（包括内在存在、构成、信息、整合和排他）假设，提出意识体验就是“某个状态下，由一个复合体各要素组成的规定概念的高阶机制所形成的一个内在的、最大的且不可还原的整合信息”。整合信息理论的主要推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意识是具有特定因果属性的物理系统所拥有的一种基本属性，这是一种根本的、独立于观察者的属性。二是意识多种多样的品质由复合体中神经元各种不同的组合规定。三是意识具有适应性，因为具有高度信息整合能力的脑拥有复杂的且跨越多重时间尺度而变异的因果结构，故其能更好地与环境匹配。四是意识具有等级性，随着神经元的数量和连接的互动关系增加，整合信息和意识体验也会更丰富。五是从神经元的连接看，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复合体共存于一个单一系统中，可能会产生多重意识。六是内部不具有真实因果效力的物理系统，如聚合物、意识神经系统的模拟物等，可能是无意识的。^② 整合信息理论的重要历史作用在于它将泛心论与自然主义联系在一起，它不是对历史中唯灵论的回归，而是一次将意识纳入生物演化，从而对意识进行彻底自然主义化解释的突破性尝试。

从上述论题看，自由意志、自我、泛心论都是传统哲学中的重大议题，但是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仍然贯彻了新达尔文主义在介入其他社会科学时所秉承的朴素的哲学动机、严格的科学方法。虽然在表达内容上，它们基本上没有跳出目前普适的伦理价值，但是在表达方式上，其论证模式已经出现了重大不同。

四、结语

新达尔文主义对于意识的理解是方法论先行的，即它并非从一开始就追问什么是意识的本质，而是在可操作性层面上对意识进行界定，逐步建立意识的定量模型。虽然其操作性定义有标准过高之嫌，但是其在模型建构过程会不断地检测该操作性定义的涵盖范围，从而推进意识的科学研究。

就新达尔文主义意识研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入侵或者介入而言，其步伐虽然刚刚开始，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虽然还没有被真正撼动，但也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通过聚焦人类的自由、自我甚至理性的生物学根基，它在形而上层面有望实现“物性”和“人性”的统一：对于物理主义，它可以给出“存在并非荒凉和空虚，生活仍有意义”这一回击；对于人文主义，它可以给出“人类并非自然界高贵的存在者，无需傲慢”的警示；在认识论上，它可以远离“俗常心理学”关于心理活动粗疏的分类，从信息加工角度更加细致、凝练地区分心理种类及其过程。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参见安东尼奥·R. 达马西奥：《感受发生的一切：意识产生中的身体和情绪》，杨韶刚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关于生物体三种生命调节方式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本书中的第5-7章。

^② Giulio Tononi, Christof Koch, “Consciousness: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15, vol.370, no.1668, pp.117-134.

岭南文化研究

岭南文化的现代性阐扬

——以广东为例

李宗桂

[摘要]岭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广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典范性代表。现代性既张扬于现代社会里，也蕴涵于传统社会中，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正面作用。近代岭南文化有着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精神，重视从实际出发，既张扬传统更重视现实，既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又自觉学习西方发明的长处，既要变革中国振兴中华又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文化的民族性的坚守、时代性的变革、世界的激荡，在近代岭南文化中表现得相当充分，并在实践中通过三者的整合而彰显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以及由此现代性而糅合出的也许不甚清晰但却信念坚定的现代化图景的追求。当代岭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所创造的体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精神的文化形态，是岭南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从“建设文化大省”到“建设文化强省”，都离不开对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文化建设，典型地反映出当代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主旨的“广东时代文化精神”，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岭南文化所包蕴的务实、进取、创新、开放、敢闯、包容、平和、重商、诚信、敏行、敬业等卓越品质，能够自觉衔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其现代性，整合中外优秀文化精神，提升当代文化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践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帮助。

[关键词]岭南文化 广东文化 现代性 当代中国 精神特质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036-12

岭南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特质如何、影响如何，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可谓见仁见智。本文拟从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角度，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角度，探讨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为传承和弘扬岭南优秀文化助力，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资源。

一、岭南文化、现代性的内涵辨正

鉴于在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中都有把岭南文化、现代性这两个概念笼统化、模糊化甚至误读误解的情况，也为了有助于本文关于“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的主题阐扬，故先对这两个概念做内涵辨正。

(一) 岭南文化

岭南，是指五岭以南。至于五岭是指哪五岭，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五岭不单指五个岭名，而且主要是指穿越南岭的五条通道。岭南便是由五岭通向南方的大片土地……五岭至海这块土地就是我们所说的岭南，其范围大抵包括广西东部往南至越南中部，广东大部往南至海南省。宋朝以

作者简介 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275）。

后，越南部分才分离出去。”^①有学者认为，岭南包括今天的广东省、海南省和广西大部分地区。^②在笔者看来，简略地说，从地域范围讲，岭南是指五岭往南至海的地区；从行政区划讲，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和海南，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鉴于上述认知，笔者认为，所谓岭南文化，便是在岭南这块独特的地域范围内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化。该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精神气质。如多元、开放、进取、包容、务实、重商、敢闯等精神，便是区别于诸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的重要特质。即使别的地域文化也有与岭南文化相同的某些质素，但岭南文化在表现形式和目标路径上也并不相同。

就地域色彩和精神气质而言，岭南文化是整体性、贯通性概念，包括整个岭南地区的范围，包括从古到今的时代。从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文化结构三层次说”而言，岭南文化包括物质的层次、制度的层次和思想的层次。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岭南文化包括古代文化、近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从文化价值观的层面看，岭南文化包括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革命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本文论题所涉及的岭南文化，并非地理范围和生活方式、精神价值方面的全部岭南文化，而是指广东地域内的文化，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广东省的文化，略称广东文化。毫无疑问，广东文化并不等同于整个岭南文化，岭南文化也并不仅仅是广东文化。但笔者认为，以广东作为岭南文化现代性阐扬的对象和范例，其代表性已经足够，这就如同前些年广东政界和学界提出广州（广东）是岭南文化中心地的概念，人们乐于接受并由衷认同一样。^③可以说，理解了广东文化的特质，就理解了岭南文化的特质；把握了广东文化的现代性，就把握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因此，以广东为例，阐扬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在学理上和实践中都是说得通的。

（二）现代性

关于现代性的概念问题，学术界争议多年，至今没有简明扼要而且取得共识的阐释。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学理问题，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和实际运用，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问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从鸦片战争时期算起，至今快要两个世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整个国家都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下凝为一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人民幸福的获得，民族复兴的实现，其重要目标和基本标志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学术理路看，现代化是与现代性紧密联系的。而如何理解现代性，不仅涉及如何看待现代化的特质、价值、功能，而且关联到我们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也涉及如何看待全球化时代的西方文明问题。具体而言，如何看待岭南文化的现代性，本质上是如何理解岭南文化的特质、价值和功能的问题，涉及文化自信的问题，同时也是如何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建设当代广东文化的问题。

所谓现代性，国内外学术界都有颇多论说。限于篇幅和论题要旨，这里只介绍讨论国内学者的代表性看法。唐文明指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时代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现代性造就的是一种注重现在的精神气质，但由于对“现在”的不同理解使之呈现出差异。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祛魅的过程，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理性作为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除了理性和个人主义，

^① 胡守为：《岭南古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② 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③ 前些年，广东学界和政界有人提出“四地”说：广州（广东）是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笔者赞同此说，故本文阐扬岭南文化的现代性，是以广东为例。

进步的观念也是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① 万俊人强调，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从根本上说，隐含在这三个基本要素背后的核心理念则是自由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权利或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为了激发社会的价值创造力（效率或实际效用是现代社会文明的第一目标），它确定并确信“个人主义”或个人自由权利优先，认为这一价值信念是激活社会物质生产的价值之源。^② 汪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通过词义由贬到褒的历史转变，现代性话语重构了人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启蒙运动制造的现代性话语是建立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意识之上的历史目的论的承诺，其核心是“理性”与“主体的自由”；现代性话语利用理性、主体的自由等普适性概念及其反宗教姿态遮盖了它与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联系。^③

赵景来指出，综而言之，探讨现代性问题的学者们所谓的现代性，所指称的是一种复合性对象，而非单一性对象，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被公认为是“现代性”的基本元素；这一概念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层面。但诸多论者关于“现代性”的几种不同的表述都不是确切的定义，现代性更复杂的含义必须到“现代性问题”中去寻求；只有把握住了“现代性”之为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什么叫现代性。^④

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是人们对当下时期一切历史事物的总的特征的描述和概括。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⑤ 沈湘平指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与过去决裂、注重现在的观念。这种观念包含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性反映，也具有价值判断和规范的意味，它建立在一种对人的智识能力和信任的基础上，有一套系统而严密的哲学支撑，包括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总之是完整的意识形态性的世界观，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现代性最为核心的观念是理性，与此相关的是自由、人权、进步等观念。^⑥

其实，从学理探究和社会实践的双向探讨中，从开放世界和开放眼光看问题，现代性是与现代化紧密联系的。但如同现代性遭到质疑、批判一样，现代化其实也遭到了某些人的质疑和批判，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表现于世界范围的反现代性、反现代化思潮，足以证明问题的存在甚至严峻。^⑦ 2000 年前后一度流行于国内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可以算作一个侧面的例证。

根据 30 多年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观察和思考，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笔者认为，所谓现代性，是指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的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治理方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伦理观念等制度性、思想性因素。它可以是一整套的体制机制或价值系统，也可以是某些具体的思想要素或者文学艺术的构成。从时间维度看，现代性并不仅仅涵括现代社会，而是可以蕴涵于传统社会之中，但却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正面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正面价值。质言之，体制机制、精神旨趣都具有现代意味，至少是具有能够通向现代、与现代相融合相协调的性质，就是现代性。

① 唐文明：《何谓现代性？》，《哲学研究》2000 年第 8 期。

② 万俊人：《普世伦理及其方法问题》，《哲学研究》1998 年第 10 期。

③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12 页。

④ 赵景来：《关于“现代性”若干问题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4 期。

⑤ 周宪、许钧：《“现代性研究译丛”序言》，[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2-4 页。

⑥ 沈湘平：《全球化与现代性》，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7-18 页。

⑦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

从价值论的层面看，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过头了，而是甚为不足。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离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之日还有相当岁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中提出：“站在百年历史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中国将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可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不是过载了，而是需要大大增强。因此，本文所谈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从正面价值讲的，是从要积极追求、尽心尽力去实现的角度讲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质疑和批判否定。质言之，现代性、现代化是当代中国要竭心尽力而为的正当事业，而不是自我设限、庸人自扰的空头讲章。有鉴于此，本文所谓“岭南文化的现代性阐扬”，是从认可、光大的角度而言，而不是相反。

二、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何在

岭南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之一，作为颇具典型性的地域文化，与同为地域文化的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一样，无疑既有历史性，也有民族性和时代性。而广东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地，广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典型，也是其载体和重要标志，把握了广东文化的现代性，就把握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

从文化发展的历时性维度考察，岭南文化的现代性贯穿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论说的方便，此处把以广东为例的岭南文化分为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历史时期。古代的岭南文化，本文姑且称为传统岭南文化；^②近现代岭南文化，本文姑且略称为近代岭南文化；^③当代岭南文化，是指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期的文化。

（一）传统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渊源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即百越的存在及其风尚习俗之类独特样态。但具有现时学者所讲的地域文化意义上的岭南文化的形成，则是在秦汉统一以后。汉初贾谊在《过秦论》里，说秦王朝“南取百越之地”，并没有用“岭南”一词，甚至也没有用“南越”之名。其后的司马迁在《史记》里有了“南越列传”的安排。南朝宋国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德行》里注释“小吴遂大贵达”时，引《晋安帝纪》有“桓玄欲革岭南之弊，以为广州刺史”的记载。唐代贞观元年设“岭南道”，为全国十道之一，治所在广州，辖区大约相当于现今的两广地区、福建全部、云南的东南部以及越南的北部地区。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岭南文化，其发展演变有着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北京大学学者赵世瑜指出：“从‘百越’这样的‘以人名地’概念到‘岭南’这样的‘以地名地’概念，又从他者与我者对‘岭南’一词的不同看法，到屈大均以‘广东’替代‘岭南’的主张，最后到清代以‘岭南’专指广东，‘岭南’这个概念的意义在历史上是被不断建构、不断变化的。这个过程的背后，是帝国扩张、区域开发、地方文化发展、我者与他者的互动，以及观念的变化”。^④笔者认为，赵世瑜先生的见解是中肯的。

传统岭南文化的发展，途经漫长，内容繁复，从阐扬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的角度审视，若干历史人物值得注意。汉代南越王赵佗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岭南，其“和辑百越”“汉越杂处”的思路和方略，主张并带头实行汉越通婚，对于汉族和百越族的包容、共存、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其所创造性革新后的佛教经典《法宝坛经》，被毛泽东称为老百姓的佛经、劳动人民的佛经，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2页。

② “传统”是个内涵丰富而又不断发展的概念，从时间维度看，既有古代的传统，也有近现代的传统，甚至还有形成中并发展着的当代传统。此处“传统岭南文化”的“传统”，意即古代社会的传统。

③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过去很长时期是划到1919年。最近40年史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近到何时”展开了讨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近到1949年，而不是1919年。其理由是：从1840年到1949年，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没有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整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变，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本文赞同这种划分。

④ 赵世瑜：《“岭南”的建构及其意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肯定了慧能把佛经大众化、中国化的成就。明代江门陈白沙，治学主张“学贵知疑”，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学原理，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沉闷繁琐僵化，突出人在天地万物之间的主体价值，开明代心学的先河。复旦大学学者朱维铮高度肯定陈白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陈献章（白沙）“是王守仁学说的真正教父”，^①“广东，正是王学的策源地”。^②陈白沙的弟子湛甘泉，光大陈白沙学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命题，要求“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③抓住了儒家孔子仁学的精髓。

此外，明代邱濬的《大学衍义补》，清代陈澧的《东塾读书记》，都是能够从文化大传统与文化小传统的张力之中寻绎出中华文化与岭南文化辩证关系，从传统与现代相互贯通的层面阐释出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资源。

传统的岭南文化，相较近现代和当代岭南文化而言，其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一面固然显著，但世界性的一面相对单薄。总体而言，传统岭南文化从赵佗、慧能到陈白沙、湛甘泉，其思想都有和合、包容的显著特征，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学派，能够共存共融。同时，更能打破旧规范，突破旧框框，真正是敢于开拓、勇于创新。邱濬、陈澧对于传统儒家经典的阐释，既能够保守其中原文化的内核，又能够结合岭南环境，有所创发，做到了在守成中创新。

（二）近代岭南文化

近代时期的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的巨变。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矛盾的日益深化，传统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逐渐成为有志之士自觉承担的历史责任。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孙中山等广东人，都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变革中国的代表性人物。^④

洪秀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农民起义的领袖。^⑤在内忧外患深重的晚清时期，洪秀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利用和转化，特别是把西方文化中国化，把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价值理念相结合的思路和手法，实际上体现了岭南文化务实、敢闯、平民化特质的某些方面。概略而言，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和农民平均主义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理论和策略。洪秀全在科考不中后，逐渐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他通过学习《劝世良言》而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利用西方的平等博爱思想，表达对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的不满。他巧妙地利用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等贵贱均贫富的农民理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追求“太平”理想。他运用传统文化的歌谣形式，把基督教平等、博爱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相关理念相结合，编写了《原道救世歌》，并编写了《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通俗易懂的读物，宣传群众、唤起群众，传播自己的思想。形式是中国的、传统的，内容却杂糅了西方思想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宣称：“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天下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⑥他劝导世人拜上帝、学正人、去妄念，惩富济贫，建立公正太平的社会。他创立拜上帝会，遵奉西方的上帝。洪秀全宣扬“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鼓吹“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号召普天之下的兄弟姊妹团结奋斗，改变“乖漓浇薄之世”，努力

①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68页。

②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第70页。

③ 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85页。

④ 本文以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孙中山为代表说明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并不认为他们的所有思想都形成于岭南，更不认为他们的所有活动都发生在岭南。但认为他们的基本价值理念、文化性格的形成是在岭南，岭南文化的现代性是他们思想的底色。

⑤ 学术界对洪秀全的评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甚至在同一时期不同学者之间的评价也大相径庭，涉及甚为复杂的因素，而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且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此展开。

⑥ 广东省太平天国研究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洪秀全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营造“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最终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①的美好理想。显而易见，洪秀全是把儒家的大同理想与基督教思想糅合起来了。从学理辨析和实践操作的层面看，洪秀全对于西方文化的吸纳和利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诠释，特别是对于中西文化的主观比附及其硬性扭合，有其荒诞不经之处，但他确实达到了为己所用的目的，为他的造反取天下称天王的目标起到了推动作用。可以说，洪秀全是行无定式、思无套路（框框），怎么有利怎么干，反映出带有实用性质的“务实”的一面。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具有很强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的启蒙思想家，勇于并善于学习西方文化优长之处的实践家。他在中西文化交汇之地的澳门撰写《盛世危言》，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观点。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他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他在书中还主张学习商战，兴办学校，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诸多切实的改革方案，一般认为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盛世危言》出版后，反响强烈，直接影响了戊戌变法。从实际出发，敢于提出问题，勇于自我解剖，大胆学习西方，推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郑观应《盛世危言》的鲜明特色。郑观应的思想世界和价值领域的显著特点，是面向世界，学习西方，立足时代，依托传统，勇于开新。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反对军阀混战，力图通过改良增强国力，抵御外侮，改变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收回海关，保护关税，自由投资。这些都反映出他思想对于现代性的适应和热望，体现了他把文化的时代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推动文化民族性的变迁和提升，展现了开放性的一面。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发动“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他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宣传变法维新改变中国的思想。他熟悉西方文化，深谙传统文化，重视对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国与西方的互鉴。他撰写的《大同书》《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作，固然谈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但却是他用其改铸后的传统思想批判现实社会，用西方思想观照中国问题以解决弊端的重要武器。康有为虽然没有找到实现大同的正确之路，但他具有强烈的改造中国、推动中国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愿望和理论，并有中西结合、古今贯通的学术功底及其治学方法，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守成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先行者之一。他的治学之路和方法，并不纠结于纯学理的阐释，而在于怎么有利怎么干，其今文经学的主体性极强。重视文化的世界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融合中西，力图找到通向大同之路，是康有为思想的重要特色，也是他的“新学”的思想动力。

梁启超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他力推“诗界革命”，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中华民族”一词便是他的创发。他相信中国是有希望的，有生命力的，不是衰老腐朽的，中国正处少年时期，中国大有希望。他在《少年中国说》中指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②梁启超这个少年中国说，鲜明表达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承载着捍卫民族独立、争取国家富强的强烈的时代精神。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清醒意识到中西文明碰撞之下，中国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思想层面逐步学习西方，逐步增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家。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梁启超有十分深刻的阐析。^③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解释：“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

① 广东省太平天国研究会、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编：《洪秀全集》，第12-13页。

②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7页。

③ 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25页。

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①质言之，保存更新本民族文化的优长之处，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优长之处，增强本民族文化的机体。不难看到，梁启超这些见解，充溢着深厚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意识，张扬了文明互鉴的理念。正因如此，梁启超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便成为他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的必然归结。可以说，梁启超思想及其社会政治实践，是把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与世界性圆融结合，推动“中华民族”在日新又日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进步的知行合一的典范，在相当广阔的层面昭示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终生。他创立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并举，是创造性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相结合而形成的救中国于危难之际的方案，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很强的时代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尽管由于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并未实现，但他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他希望大力发展经济但又要“节制资本”的思想，至今令人感受到其深刻之处。他高呼要把中国文化从根上救起来，把西方文化迎头赶上去的思想，在当时具有强烈的震撼感，为挽救民族危亡在思想上警醒了国民。全球意识、世界眼光、家国情怀、时代精神，在孙中山的精神世界和政治实践中融贯为一，中国文化立场的坚守、世界潮流意识的张扬、新型国家理念的建构，是孙中山成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价值支撑。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务实、开放、创新、进取、多元、包容等滋养岭南文化的精神品质，在孙中山这里得到了生动展现。

概括而言，近代岭南文化有着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精神，重视从当时的情况出发，既张扬传统更重视现实，既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又自觉学习西方文明的长处，既要变革中国振兴中华又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文化的民族性的坚守、时代性的变革、世界性的激荡，在近代岭南文化发展中表现得相当充分，并在实践中通过三者的整合而彰显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以及由此现代性而糅合出的也许不甚清晰但却信念坚定的现代化图景的追求。

朱谦之曾以“海洋文化”说明岭南文化的特质，并以“科学”“贸易”“维新”“革命”来揭示岭南近代文化的内容。他将“南方文化”视为代表“实用”知识的“革命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和“产业的文化”，深信“南方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前进的方向。^②当代学者以“实”“新”“活”“变”来概括岭南近代文化的特征。其中“实”就是注重实效、实利，不尚空谈；“新”就是勇于接受新事物，创造新文化；“活”就是明快活泼，反应迅速、灵活；“变”就是变化发展，与时俱进。^③其中，开放性与兼容性在岭南近代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注重实效，勇于纳新，灵活处事，与时俱进等品质，则为岭南文化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创造了条件，赋予了岭南文化接受现代性、转向现代化的能量。

（三）当代岭南文化

当代岭南文化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所创造的体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精神的文化形态，是岭南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激活了岭南文化的生机。岭南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逐渐大放异彩，在广东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如果说，之前岭南文化的传承主要是在民间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对岭南文化的重新认识、发掘、建设，则是全社会的共识。从“文化沙漠”的自卑到“文化北伐”的自傲再到“文化广东”的自信，激发了广东人对岭南文化的再认识热忱。进入21世纪以后，广东省推行的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的文化建设方略，在新的更高的层面上推动了对岭南文化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的研讨、认识和开掘。^④广东

①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211页。

② 朱谦之：《文化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84、224-225页。

③ 华茗：《岭南近代文化特点研讨会综述》，《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④ 李宗桂等：《广东文化改革发展40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

省于2003年出台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大省规划纲要（2003—2010年）》，将“拥有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作为文化大省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2003年抗击“非典”胜利以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认为“岭南文化大放异彩”是抗击“非典”胜利的重要原因。^①2009年，广东省出台《关于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将“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岭南特色文化”作为“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之一。2010年，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将“建设文化强省”纳入会议议程，强调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力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和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示范区，形成具有中国气派、岭南风格、广东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②随后颁布的《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将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发展目标确定为：到2020年，形成特色鲜明的岭南文化和现代开放型文化体系，文化在综合实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化精神更加彰显，文化凝聚力、竞争力、创新力、辐射力显著增强，各项主要文化指标居全国前列，努力树立广东文化事业发达、文化产业强大、文化生活丰富、思想品德高尚、文化氛围浓郁、精神家园和谐的文化形象。^③可见，从“建设文化大省”到“建设文化强省”，都离不开对岭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岭南文化所展现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秉承，对近代革命文化的价值的坚守，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特别是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对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光大，都典型地反映出当代岭南文化的现代性。^④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视野看，当代岭南文化体现了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三、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文明

（一）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

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蕴涵于岭南文化的长期发展进程中，体现为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追求、行为方式、交往方式等诸多方面，范围广大，内容丰富。如果从最具代表性、最具本性特征的方面看，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可以概括为多元、开放、包容、务实、重商、创新、敢闯、平和。这些精神特质的概括，本身就是比较平实的，没有玄理，没有让人望而生畏的深奥，于平实处见深刻，于日常中见精微，正所谓担水劈柴皆是妙道，刚好体现了岭南文化的注重实际、不尚雕饰的质朴本色。

从岭南文化发展的时代性的一面看，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相统一的“中国精神”的层面看，当代岭南文化所追求的精神建构和价值指引，是更为广阔更为深刻的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这就是“广东精神”的凝练，具体表现为“广东人精神”“广东精神”“广东时代文化精神”的讨论和凝练，以及大湾区人文精神的培育。

（二）广东精神的凝练

当代岭南文化在广东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环是在不同时期对于广东精神的提炼和弘扬。

“广东精神”是指在广东生长、实践的精神，是反映广东这块土地上人们奋发有为、不断进取的精神，是广东经济社会进步、人民素养提升的内在动力。不分户籍、祖籍，只要在广东这块土地上生活、工作、学习的人，都是广东精神的创造者、承载者、实践者和分享者。

“广东精神”源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源于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源于全体广东人

^① 张德江：《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南方日报》2003年9月25日第A01版。

^② 《加快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新跨越》，《南方日报》2010年7月17日第A01版。

^③ 《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南方日报》2010年7月30日第A06版。

^④ 李宗桂：《广东文化的多维思考》，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

民的共同努力，是全体广东人民智慧的结晶。“广东精神”是当代中国文化精神构建的生力军和示范者，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广东时代文化精神的凝聚，是传统中国文化精神转型、创新的生动体现。“广东精神”的内涵主要是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而体现出来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时代文化精神。它包括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开放兼容等，这也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固然，它包涵了传统岭南文化的精神，但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要张扬当代岭南文化精神。

广东是当代中国新文化精神的生长地、滋养地，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转型和创新的试验田。广东思想文化的先进性最主要体现在敢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既不拘泥于传统，也不拘泥于现实，怎么有利怎么干，这方面它完全和邓小平理论相一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怎么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怎么有利于提升广东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怎么去做。从实践角度来讲，广东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办深圳特区就是由广东开始的。广东敢于面对实际，打破旧有体制的束缚，重视实际，敢为人先，不务虚名，不空谈政治，这是广东思想的先进性的体现。

“广东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从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生动实践来看，从已经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来看，从广东文化大省特别是文化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来看，“广东精神”无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一致。

从文化的民族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一面来看，“广东精神”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一致。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没有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怀，就没有广东生机勃发、物阜民安的今天。

从文化的地域性的一面亦即从地域文化传统来看，“广东精神”与务实敢闯的传统岭南文化精神高度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时代精神高度一致，因此，“广东精神”是当代岭南文化的核心价值。

1. 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大讨论，是落实中央关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这一战略任务的具体行动。2003年，经过广东省大半年广泛热烈的讨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于2003年9月23日在全省文化大省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概括了“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内涵。他说：“‘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广东人精神，激励着广东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①同年11月11日，广东省精神文明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一致确定用“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作为“广东人精神”的规范表述。^②2004年2月11日，这一表述首次写进广东省的政府工作报告。

敢为人先。这是反对守旧、力主开新的精神。近代以来，广东率先接受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熏陶，由昔日的“蛮荒之地”一跃成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先行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在中央的支持下，率先启动改革开放步伐，揭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大胆冲击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思维模式，破除过去空头政治的弊端，明确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开启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尊重经济规律、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先河。

务实进取。这是不务虚名，讲求实效。在岭南文化崇尚实用思想的熏染下，广东人摒弃了传统儒家文化中“耻言利”的传统观念，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和效益意识，形成了重利、务实的精神气质，养成了不事声张、埋头苦干的良好品格。无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还是文化生活、日常生活，广东人历来反对空谈，重视实干，重视实效，当有的地方还沉浸在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是计划还是市场、

^① 张德江：《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南方日报》2003年9月25日第A01版。

^② 朱小丹：《弘扬广东人精神 建设和谐广东——序〈“广东人精神丛书”〉》，董玉整、程潮等：《春华秋实：广东人的学术精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是公有还是私有的争论的时候，广东人已经埋头苦干、先行一步，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用生动的实践诠释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平凡的真理。

开放兼容。这是指能够接受不同意见，能够对外开放，兼容不同人群，容纳不同意见，吸纳海内外优秀人才。从整体上看，岭南文化从属于中原文化；但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它又具有远儒性的特征，在古代交通和通讯不便的情况下，接受正统思想的束缚较少，易于接受新事物、吸收新思潮，呈现出“不拘一格、不守一隅”的文化个性。近代广东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西学东渐”的文化热潮正是由西方传教士从澳门引入广东，并逐步在全中国传播开来的。改革开放后，广东利用地缘优势，勇于并善于学习境外域外的好观念、好经验、好方法，吸纳了大量的外资和人才，吸引并接收了大量的内地人才。

敬业奉献。这是倡导现代职业意识和价值理念。广东有悠久繁荣的商业活动，从商现象不仅在广东相当普遍，而且商品意识已渗透于整个广东社会之中，与之相应的是契约观念的生长，恪尽职守意识的形成。这种传统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新的精神，接受中央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重托后，广东人团结一心，勇于拼搏，历经艰难，为把广东率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家园而做出了创造性的无私奉献。

2. 新时期“广东精神”。培育和践行新时期“广东精神”，是2011年广东省委省政府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满足广东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战略举措。2012年5月9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郑重提出，要大力宣传和实践“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新时期“广东精神”。^①揭开全省培育和践行新时期“广东精神”的序幕，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尽了应尽的义务。与此同时，在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与之呼应的概括，这就是“先天下，纳百川，重实干”，^②也颇得当代岭南文化的精髓。

3. 广东时代文化精神。建设文化强省，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和理性价值观念的引导。在笔者看来，广东时代文化精神便是我们需要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理性的价值观念。

“广东时代文化精神”的提法，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首创。其实，在学术界，从学理的角度进行研究，人们习惯上一般是把时代精神、文化精神单列，要么是时代精神，要么是文化精神，基本不会将其并列。汪洋自己诠释了“广东时代文化精神”的内涵：解放思想，改革开放。^③纵观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透过繁茂芜杂的诸多表象，从思维方式和精神实质的层面考察，应当说汪洋关于“广东时代文化精神”的理念及其内涵诠释，是符合实际的，既是对既往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当下的精神激励，更是对未来的价值引领。^④要论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广东时代文化精神”是最为充分最为典范的归纳概括和价值指引。

从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实践的层面看，“广东时代文化精神”是时代精神与文化精神的有机统一。所谓时代精神，是指特定时代的主流价值趋向和社会精神风貌。通俗理解，可以借用已故哲学学者李秀林的话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是时代精神。所谓文化精神，是指特定民族的基本精神特质，是该民族特定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社会心理、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基本精神风貌的反映。^⑤通俗地说，文化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体现出来的精神价值追求。所谓时代文化精神，其主题是文化精神，其取向和内蕴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质言之，时代文化精神是指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价值追求，或者说是文化价值追求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独特精神表现。而所谓广东时代文化精神，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在追求实现现代化的途中，在广东这块热土上所孕育、成长起来的，以解放思想、改革

^① 汪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南方日报》2012年5月16日第A01版。

^② 《广东征集提炼“广东精神”表述语》，《南方日报》2012年1月22日第4版。

^③ 吴春燕、张景华：《广东新追求：建设文化强省》，《光明日报》2010年7月21日第1版。

^④ 李宗桂等：《时代精神与文化强省——广东文化建设探讨》，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⑤ 李宗桂：《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省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开放为轴心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它是广东人民在奔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正是有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文化精神的激励和引领，才有了突破旧有体制和旧有观念的诸多创举，才有了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生动实践，从而创造了连续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先后超越了当年名盛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的各自经济总量的伟大成就。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主旨的“广东时代文化精神”，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岭南文化的现代性，道理简单而又明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凝练体现，是为中国式现代化而生的。

4. 大湾区人文精神。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在当下的一个制度性安排和价值理念的引导性方略，便是更高水平的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其间，粤港澳大湾区人文精神的培育，是重头戏之一。大湾区建设的精神特质或者说风貌品味，是人文湾区，而人文湾区自然需要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

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在开放多元的条件下，见仁见智属于情理之中。但是，从根本上讲，从思想实质和价值准则方面而言，我们可以说人文精神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人之所以为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回答，是对人这个族类的精神追求的探讨、提升，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发展的兴衰存亡的“终极关怀”和自觉奉献。人文精神并不是一个内容单薄的孤立性概念，而是具有丰富内容和厚实思想的观念集合体。就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而言，人文精神包含着并体现为仁民爱物、修己安人、义以为上、天人合德、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就现代文化发展历程而言，人文精神包含着并表现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等最为基础的价值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数十年的艰难探索，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文精神正在神州大地发育、成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具有社会主义时代色彩的、充分显示中华民族人文意识的精神因素，不断增强，并成为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重要凝聚力量和激励力量。以重人情为特征的传统人际关系，正在逐渐转变为契约关系而又不乏人情；一度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运作系统，正逐渐转变到权力受到应有制衡的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过去以他制他律为根本要求和显著特征的个体自我，正在转变为以自制自律为特点，并与他制他律相结合的觉醒的主体意识；片面宣扬动机而忽视甚至蔑视效果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正在为动机与效果并重、不尚空谈、重视效益的新型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所取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要而言之，契约观念、法制观念、民主观念、主体意识、效益观念等，正在成为新型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①

立足当代中国，吸取本土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大胆创造转化，以为新人文精神的滋养，是大湾区建设中在文化建构方面的应有之义。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把已经产生出来并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新人文精神予以提炼、升华，使其成为新时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事业前进的精神动力。概括而言，我们要建设的人文精神系统中，主要内容有：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求新务实、讲求效益、科学民主、法制观念、独立意识、公正公平、竞争协同、宽容和谐、义利并重而以义统利等。

同属大湾区的粤港澳地区，尽管在历史上有过不同际遇，现今也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归根结蒂都同属中华民族，都同属中华文化，都同属岭南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大湾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务实进取、开放兼容、和而不同、各美其美而又美人之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主法治、改革创新、家国情怀，这些充满中国特色、中国价值的理念，将是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精神滋养，也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进一步发展的价值支撑。质言之，这些价值理念，将是大湾区建设中应当倡扬、应当追求并落在实处的人文精神。这样，我们就能够找到大湾区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最大公约数。也正因如此，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理解它，培育它，壮大它。^②

^① 李宗桂：《民族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重建》，《哲学研究》1994年第10期。

^② 李宗桂：《大湾区需要新型的人文精神》，《南方》2021年第20/21期合刊。

(三) 岭南文化的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文明

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并不仅仅呈现于当代社会，而是从它作为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出现之后，其所追求、包蕴、践行的诸多价值理念中展现的民族精神，便已逻辑地蕴涵着通向未来的必由之路，亦即能够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旨趣。诚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所指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华文明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与中国历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相适应，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愿望相一致”。^①本文阐扬岭南文化的现代性，就方法论而言，其思维路径和价值理念与这个论断相一致。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近期正在研究、凝练“精神谱系”。笔者认为，在理论形态的、国家层面的精神谱系的探讨和制定过程中，可以而且应该重视以省域文化为范围和载体的属于文化小传统的精神分支。广东省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总结提炼出的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新时期“广东精神”、“广东时代文化精神”、“广东人文精神”，以及培育中的“大湾区人文精神”等理念和价值观，都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值得珍视的思想文化成果。这些成果，正是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包括传统岭南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支撑和智力支持，是重要的精神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②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充满现代性的，是以现代化为追求目标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在综观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后，在总结我国近代以来现代化道路的探寻规律后，前瞻性地提出的既有深厚历史感、又有强烈现实感的基本方略。这样一种充满世界文明现代性和中国文明正当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然把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推向新的发展高度，创建新的文明形态。在这个认识框架中，笔者认为，岭南文化所包蕴的务实、进取、创新、开放、包容、平和、厚德、诚信、敏行、敬业等卓越品质，不仅能够自觉衔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其现代性，而且能够整合中外优秀文化精神，提升当代文化价值，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践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帮助。

学者金耀基指出：“从根本上讲，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中国旧文明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演变。”^③ 他还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本质上是中国寻求新文明秩序的一个转化过程。”“中国的文化传统应该也必然是中国建构新文明秩序的一个文化资源，以是，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④ 平心而论，金耀基这些论断是深刻而理性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我们在阐扬岭南文化的现代性的时候，在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在面对西方文明对我们的挑战的时候，能够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文明形态的建构方面理解现代性，把握现代化的目标，那我们一定能够建立起一个“中国的”“现代的”新文明，我们就一定能够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责任编辑：王冰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第 24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3-14 页。

^③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1 期。

^④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1 期。

文化共同体视野中的南粤古驿道与文化遗产

——以潮州古驿道与民间布马舞为例^{*}

张 霖 李志刚

[摘要]2016年11月广东省政府公布了《南粤古驿道文化路线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规划提出整合串联沿线的历史文化资源，弘扬岭南优秀文化，并推动南粤古驿道成为知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除了驿道与驿站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外，沿线的民间音乐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与内容。从历史维度以及跨地域视角出发，以潮州古驿道与民间音乐舞蹈布马舞为例，有助于探究两者之间的文化共同体关系与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古驿道为民间布马舞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布马舞也推动了饶平走出潮州并走进国家视野，同时也丰富了饶平古驿道的内涵。因此，古驿道与民间音乐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地域—艺术”互融的文化共同体关系。

[关键词]潮州古驿道 布马舞 文化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G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048-04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基础

(一) 问题的提出

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异质性，地理空间文化性格的不同会导致艺术创作的明显差异。地域文化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之中，在长期的形成过程中与特定的地域环境互为关联，并在一定阶段相对稳定。^①以潮州为例，自古以来一直是广府地区与闽赣地区联系的东部门户，古驿道则是地域联系的纽带，许多本土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与中原地区相同又相异，例如中原地区汉族男子的成年礼“冠礼”，在潮州就演变成“出花园”习俗。后因当地文人林大钦高中状元，根据其人物事迹形成“出花园”要穿红屐、抱大公鸡祭拜孔子的习俗。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共同体”思想，并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相应地，艺术与地域可能也存在着“共同体”的关系，本文暂且称之为“文化共同体”。在文化共同体视野中，研究艺术与地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原理，探讨两者互为关联、碰撞、演替的机制，有助于为推动当代艺术百花齐放提供理论基础，丰富“共同体”内涵。因此，本文选取潮州古驿道与民间文化遗产布马舞展开实例论证。

* 本文系“‘一带一路’视阈下岭南音乐文化对外传播实践”项目(21GJCB04)和“探寻南粤古驿道上的文化艺术元素”项目(2019G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霖，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510640)；李志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① 刘方、刘瑶：《当代艺术的地域性》，《美术观察》2016年第4期。

(二) 理论基础

1. 共同体。该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 1887 年发表的《共同体与社会》，主要以血缘（家庭亲属）、地缘（邻里）和精神共同体（友谊信仰）为基本形式，^① 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也是共同体赖以生成的基本要素，^② 其核心观点是共同体是以满足成员需求为目的而产生的组织，且能够创造出高于个体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学术研究的深化，出现地域共同体、想象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虚拟共同体、脱域的共同体、后地方共同体、不邻近共同体等细化概念。^③

2. 地域与艺术。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主要依附于人，在口传心授、代代传承延续中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④ 因此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特定的地域环境、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发展。^⑤ 目前，国外学者已开始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地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如有学者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入和发展对本土文化认同感与当地生活的影响。^⑥ 国内学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域关系的关注较少。关于古驿道与文化遗产的研究，有学者以南粤古驿道上的音乐艺术为研究对象探讨音—地关系，对推进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活化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现实意义。^⑦ 总的来看，既有研究鲜有从动态的视角切入，在文化共同体视野中剖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传播过程及其与传入地的关系。

二、潮州古驿道与布马舞的发展特征

第一，潮州古驿道发展源于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门户和联系闽赣商贸的主动脉。从中国历史发展长河来看，古驿道是古代中国陆水交通、经济文化、军事行动的通途大道。驿，置骑也，^⑧ 古驿道本身就是古代国家为政治、军事、财政需要，从中央向各地传递谕令公文、官员往来、运输物资而开辟的道路，在沿途设有驿站，配备驿卒、驿马、驿船等设施，提供易换马匹、暂住服务的地方。^⑨ 在广东众多古驿道中，与中原文化南下传承相关的客家迁徙、禅宗南传、陶瓷外销、西学东渐等重大事件都与南粤古驿道息息相关，可谓一部驿道变迁史演绎着一部文化发展史。潮州是一座拥有 16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文化底蕴深厚，是潮汕文化的发源地，古为“闽粤要塞”。据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记载：“潮州昔时交通，水以韩、榕、练三江为主，陆有官道驿铺。”^⑩ 潮州是唐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和对外通道，海运和贸易十分发达。潮州古驿道的建设与发展与其作为“闽粤要塞”和海上丝绸之路门户通道密切相关。潮州境内古驿道主要为韩江—汀江古驿道以及潮惠下路古驿道两段。其中，韩江—汀江古驿道由元代兴建，是潮州与北部福建汀州（长汀）、江西兴隆（南昌）等地联系的主动脉，线路顺梅江、韩江而下，经梅州、潮州到达韩江出海口，溯韩江而上，可接汀江，达福建长汀县。另外，潮惠下路古驿道源于宋代，是沟通粤闽的广东沿海交通要道，线路从惠州转陆路，经海丰、陆丰、惠来、揭阳、潮州，可达泉州、福州，最终抵达临安。^⑪

① 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

② 张志曼、赵世奎等：《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 年第 10 期。

③ 孙九霞、黄秀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族群“跨地方共同体”构建研究》，《学术研究》2021 年第 8 期。

④ 程乾、凌素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地理科学》2013 年第 10 期。

⑤ 董明慧：《地域文化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州学刊》2013 年第 9 期。

⑥ Hyung Yu Park, “Shared National Memory as Intangible Heritage Re-Imagining Two Koreas as One Natio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38 no.2, 2011.

⑦ 李志刚：《南粤古驿道音乐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岭南音乐》2019 年第 5 期。

⑧ [东汉] 许慎：《说文解字》，[清] 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59 页。

⑨ 杨正泰主编：《明代驿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23 页。

⑩ 饶宗颐：《潮州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5 年，第 671 页。

⑪ 唐曦文、梅欣等：《探寻南粤文明复兴之路——〈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简介》，《南方建筑》2017 年第 6 期。

第二，布马舞是潮州古驿道上中原非物质文化南下交融的典型代表。从整个南粤古驿道来看，广东省迄今发现的古驿道及附属遗存 202 处，粤东地区是南粤古驿道遗存较多的地区，以潮州市最为丰富，广泛分布在潮州古驿道沿线周边，其中饶平布马舞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已有研究表明，布马舞起源于中原地区民俗事象竹马，是古中原文化南下的历史见证者。竹马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东汉初年之竹马戏，具有一定的礼仪功能，可能起源于先秦时代的“拥彗先驱”；汉末晋初至唐的竹马，主要以儿童游戏的形式广为流传，多见诸晋人文章及唐人诗歌；宋金以后，由民俗游戏向竹马艺术方向发展，一是进入歌舞艺术表演之中，二是进入戏剧艺术表演之中。有资料记载：“乞冬”演竹马戏是自南宋以来闽南、粤东地区一直流行的民间习俗，几百年盛演不衰，以至于当地人们把竹马戏就叫做“乞冬戏”。^①竹马在宋代朝着艺术化方向发展，潮剧正好也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推测戏剧艺术可能是竹马传入潮州的文化媒介，为竹马的艺术化创造了历史条件。但是，关于竹马通过何人、何事、何种路径传入潮州后演变为布马舞，目前尚无明确的史料记载。根据民间普遍流传的说法，布马舞历史上起源于江西一带，宋末元初通过江西陶瓷师傅传入潮州饶平。而自宋以来，潮州是东南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地，境内的韩江水道作为潮州古驿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明末清初江西景德镇外销陶瓷的主要内陆运输通道。^②可以推测，竹马可能随着古驿道上的陶瓷贸易传播，并因潮剧文化与竹马戏剧艺术存在共同的文化语言，逐渐在潮州发生融合并演化为后来的布马舞。

三、潮州古驿道与布马舞“文化共同体”关系分析

第一，韩江—汀江古驿道为宋代陶瓷商贸南下奠定了基础。潮州地处韩江流域，韩江—汀江古驿道是以韩江为主要通道的航道，从唐宋开始就承担潮汕地区与中原的商贸沟通作用，韩江向北经大埔县三河镇之后，沿汀江往福建，^③经汀州府(今长汀县)进入江西境内至瑞金东，到达瑞金后再沿贡水经虔州(今赣州)、顺赣江至洪州(今南昌)，达长江流域。^④明代隆庆年间徽州商人黄汴编撰的《一统路程图记》记载：赣州府。水。六十里岑口岗。六十里雩都县。百二十里会昌县。八十里瑞金县。十担小船。四十里古城。陆路。五十里汀州府。下水。九十里三洲驿。九十里蓝屋驿。七十里上杭县。四十里大孤市。七十里峰头。遇山。一十里石上。属潮州。六十里大埔县。四十里三河驿。百里产溪驿。七十里潮州府。陆路自赣州六十里，岑口冈又六十里，沉香村宿。又六十里瑞金县。四十里古城。五十里汀州，下航。赣州两浮桥，东去汀州，西去两广。虔镇者御史驻扎，惠、潮、汀、赣、南安、韶州六府隶焉。^⑤

古代水路交通地位重要，韩江—汀江古驿道为潮州府向北联系闽赣等中原地区创造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因途经饶州(今上饶)，为宋代饶州陶瓷师傅南下商贸活动提供通道。位于韩江、汀江交汇处的大埔县高陂镇是古代南方瓷器的重要集散中心，^⑥是流域瓷器销往海外的中转地。据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古代饶平九村由于前往饶平沿海的路途遥远，因此“九村窑”生产的陶瓷往往是挑夫经过 20 多公里的新丰古驿道运到邻近的高陂镇，与“高陂窑”生产出来的陶瓷混装后沿水路运至韩江出海口，由海运销往世界各地。商贸活动的集聚客观上为不同地域文化传播创造了条件。

第二，南宋时期竹马舞艺术化推动了布马舞的传播与形成。从布马舞的表演形式上可以看出，今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马舞，同饶平布马舞存在异曲同工之处：表演时，骑布马者将马形道具(分马头和马尾两截)前后系在腰上，如骑马状；马道具下部蒙以围布，以遮掩表演者而定脚腿；马脖子上系一串小铜铃铛，舞蹈时可发出清脆的响声。布马巡游时，有锣鼓从旁助兴，舞者分别穿上状元、榜眼、

① 黎国韬：《珠三角地区传统舞蹈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62-267 页。

② 曾丽洁：《韩江商路在陶瓷外贸中的地位——以历史典籍和考古材料为中心》，《潮商·潮学》2018 年第 5 期。

③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体育局、广东省旅游局：《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2017 年，第 52 页。

④ 郑向东：《古代韩江流域的交通》，《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 年第 9 期。

⑤ [明]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 7，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43 页。

⑥ [法]劳格文等：《中国客家地方社会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01 页。

探花、进士官服以及各位夫人的宫妆，各马童则身穿短打武士装，共同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马队。^①布马舞的道具制作和表演形式，与流传于中原地区的南宋时期的竹马舞队十分接近。《武林旧事》卷二《舞队》记载：男女竹马。其品甚夥，不可悉数。首饰衣装，相矜侈靡，珠翠锦绮，炫耀华丽，如傀儡、杵歌、竹马之类，多至十余队。^②据饶平县文化馆馆长介绍，“布马舞最开始的道具是用竹编的。”（访谈材料，2022年4月22日）因此，潮州布马舞与江西竹马显见有渊源关系，可能是因为竹马艺术化以后，通过古驿道商贸传播并与本土潮剧发生交融与根植。

第三，布马舞在地化发展与古驿道知名度提升形成了良性互促关系。一方面，布马舞传入潮州饶平后，在形式、配乐、工艺等方面实现在地化发展。例如，明代布马舞的表演形式呈现“王爷和娘娘出巡”和“状元游街”的地方特色，与潮州先民以畜国王“有功于国，宏庇于民”有关。又如，清代布马舞加入了潮州大锣鼓等音乐元素，背景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九村人刘大力得中武进士，将原来的九只布马增加到11只。在道具上，据饶平县文化馆馆长介绍，“过去的马是竹编的，现在是注塑的，因为竹编的不利于运输，到外地演出不方便，现在马的形式比过去要好看。布马舞可以根据主题进行变化，马穿什么服装就代表什么主题，一般伴奏都是潮州音乐。”（访谈材料，2022年4月22日）另一方面，布马舞在饶平发扬光大，也大大提升了古驿道上潮州府的知名度。20世纪80年代，布马舞由饶平北部传播到县城黄冈镇。2004年，布马舞登上了广东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发源地饶平县被誉为“布马舞之乡”；2006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饶平县黄冈镇被省命名为“广东民族民间艺术之乡”，备受国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

第四，古驿道与布马舞互促发展与地域—艺术组成的“文化共同体”本质高度契合。共同体是以满足成员需求为目的而产生的组织。当年由江西饶州兴起的竹马，确实是伴随着陶瓷商帮的迁徙，顺着古驿道一路南下，并在沿途的闽粤赣地区传播开来。有学者从舞蹈生态学视角的研究发现，除了饶平布马舞以外，赣江—汀江—韩江古水道沿线的其他地区确实存在同属于“布马舞系”的民间舞蹈，它们在舞蹈道具、动作、队形、流传渊源等多个方面均有共性，典型的例子如汀州府（今福建长汀县）的竹马灯，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的马仔灯以及吉安市新干县的竹马舞等。同时，竹马舞在地化以后其表演形式、艺术价值、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的确创造出高于原体的经济社会价值。因此，潮州古驿道与布马舞的案例印证了艺术与地域存在文化共同体关系。

第五，古驿道与布马舞“文化共同体”的关系是古代非物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古时的文化传播方式单一，商贸往来是最主要的形式。布马舞传入的主要路径是依托古驿道，由来自江西的陶瓷商人带到饶平九村。而闽粤赣陶瓷商人在贸易中相互交织，异质文化和同质文化发生了相互碰撞、比较、筛选、演替。随着历史的变迁，布马舞的内涵与形式不断衍生，以新的面貌、借助新的交通路径继续传播至其他地区，最终将知名度打响至国内外。可见，“古驿道——个体与活动——民俗文化”的植入、演化和传播交流的过程，正是古代文化传播的基本路径。根据“共同体”理论判断，布马舞在古驿道上传播的过程中因地域差异而衍生出丰富的艺术形式，反过来也推动了古驿道上的城市因文化而兴，彼此都创造出高于个体的价值。可见，古驿道与文化遗产之间确实存在着地域—艺术的文化共同体关系，作用机制属于双向传播，传播动力来自于流动在古驿道上的个体与经济社会活动，属于传播、演替、再传播的过程。

责任编辑：王冰

^①《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中华舞蹈志·广东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162-164页。

^②[宋]周密：《武林旧事》卷2《舞队》，[宋]傅林祥注，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40-41页，

落单的批判

——从马克思《资本论》到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

任剑涛

[摘要]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资本时代刚刚显露生机之际的先知性批判作品。他对资本与权力展开了双重批判，从中凸显了理想的社会模式。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明显是秉承马克思的思想余绪，在资本取得全球胜利之际，对其展开持续批判。但相比于马克思对资本的双线批判而言，皮凯蒂的批判仅限于对资本的单线批判，而对权力不仅网开一面，甚至认定那是矫正资本造成的不平等的希望所在。这是一种落单的批判。不问国家权力是否能够矫正资本错失的单线资本批判，其系统性、彻底性与有效性都将受到影响。在影响人类社会活动方式的资本与权力两种巨大力量面前，只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处于一种要么坚持马克思的批判理念，要么将其放弃的决断状态。

[关键词]资本 马克思 皮凯蒂 双线批判 单线批判

[中图分类号] D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052-11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于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接连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轰动一时。经过数年的思想过滤，透过当时热烈过头的反响，沉潜反思，如今似乎可以对其做出更为理智的评价。无疑，皮凯蒂是想继承并修正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以秉承资本批判的传统，并同时保有资本批判的时代性。由此，呈现出一条资本批判的递进线索。缕析资本批判的传统，对于人们理解资本—权力的现代基本结构，保证两种庞大的社会建制造福于人类，而不至于危害社会，具有重要影响。这不仅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机制健全运作，而且会影响人们面对资本与权力时的健全态度与适宜行为；不仅关系到人类的当下利益，还关系到人类的长远幸福。

一、批判资本

在人类社会的长期活动中，广义的资本是一直存在的。但在现代汉语的理解中，资本一词的泛义，大致被狭义的理解所遮蔽。这从与资本相关的三个核心词汇的释义上，就可以得到鲜明印象。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资本”一词的含义有三。一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生产资料和用来雇佣工人的货币。资本家通过资本来剥削工人，取得剩余价值。二是经营工商业的本钱。三是比喻牟取利益的凭借：政治资本。^①与之相关的两个词汇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资本家”即“占有资本，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获取剩余价值的人。”“资本主义”即“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

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北京，100084）。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732页。

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就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①这三个词汇的最大公约项，就是以资本雇佣工人来剥削剩余价值。但这个最大公约项，并不是理解人类历史上存在的“资本”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因为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的公约性定义，是对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的“资本”，及其人格代表“资本家”和相关社会体系“资本主义”所做的特殊界定。而且这样的界定，也只是对三者所具有的一个特定面相的有意彰显。如果排除三个词汇的特定现代含义，且不考虑它的比喻性意义，那么“资本”这个词具有着比资本家、资本主义更为悠久的历史含义，也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社会含义。

资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被权力全方位高度施压，因此并没有展示出它的惊人力量。^②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古代国家权力直接支配或压制资本力量，以至于资本始终屈从于权力意志、社会意志，商人或成为红顶商人、或成为地主，很难有自己发挥作用的独特空间；二是资本本身的发展也极为不足，因此很难以自己的力量拓展出资本运作的独立空间。在这一特殊的意义上，可以说前现代是一个有权力、无“资本”的时代。虽然也有资本的存在与作用发挥，但资本是被权力完全压制了的社会力量。

资本的巨大作用，是在古今之变的大局中浮现和展示的。16世纪被认为是一个“大分流”的世纪。从16世纪起，由掌握“资本”的人格载体“资本家”推动、促成了“资本主义”的飞跃性发展，从而划出了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明确分界线。有学者指出，现代早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而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中世纪根源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但从16世纪起，最晚到18世纪，欧洲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绩效出现了清晰的分流态势。一种起源于西欧的新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成熟阶段，并让“资本”发挥出空前的经济活力。这样的变化，让曾经几乎齐头并进的世界经济多重心光景不再，而让西欧经济一枝独秀并长期领先于世界。“迟至1750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即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使用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因而，19世纪只在西欧出现的进一步的巨大发展再一次成为一种有待揭示的断裂。”^③这一断裂，就是西欧的工业化。“只是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一个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有意义。”^④仅从经济方面观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兴起与成熟，成为资本主义的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断裂性分流发展的一个标志。但如果放开视野，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可能会更加复杂。

如果以“欧洲奇迹”而不是“英国奇迹”，审视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分流发展的历史的话，那么就注定会敏于西欧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这样的较大分析单位之间的差异。但如果将更大地理范围的“欧洲奇迹”还原为较小地理单位的“英国奇迹”、甚或还原为更小地理单位的“英格兰奇迹”来看的话，那么1215年英国贵族与约翰王达成的《大宪章》，因为其限制王权恣意妄为的尝试，而开启了一个不同于古代国家在政治上由王权决定一切的时代。正是由于国家权力受到限制，资本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出现等看似偶然的历史突破，才具有了经济发展断裂性状态出现的社会政治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要把世界的大分流时限划到13世纪。原因在于，政治上限权的突破，并没有直接诱导经济的发展。两者错位而在的现象长期存在。从社会诸要素的互动视角以及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分流发展的时间点上看，16世纪是一个比较公认的现代世界起点。从16世纪到19世纪，作为“现代”兴起的标志性事件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勃兴，构成了“现代”发展的一个长过程。“资本主义主要是复杂的社会逻辑，是变化和自变力量的承载者，它在15、16世纪悄悄地浮现，通过19世纪的工业化确立了统治地位，而如今又趋于主宰社会和世界的主要方面。”^⑤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1732页。

② 广义的“权力”概念，国家与资本都被视为权力的具体形态。在这里，权力特指国家权力，即用合法暴力支撑的一套国家建制。而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它对社会不具有直接的支配能力，即便尝试支配，因为缺乏合法暴力的支持，社会也不会接受。为了表述的简明性，文中将国家权力简化为权力，资本则不被纳入权力的考察范围。

③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④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3页。

⑤ [法]米歇尔·波德：《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郑方磊等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它呈现出发育、发展、成熟与占据全球统治地位四个阶段。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带来了人类物质生产巨大飞跃，打破了此前地域性发展的局面，让人类进入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时代。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自由劳动者和有产阶级驱动下，古代社会的地租从劳动向实物与金钱转变，手工工业迅速发展，商业或集市贸易活跃，城市大量出现，商人资产阶级开始形成，一个替代古代社会的现代社会形态浮现出来。^①到了18世纪，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商业、农业、制造业大幅进步，价格上扬，人口剧增，财富积累显著增长。英国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成型，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因素日益明显。随着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出现，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与工业机制成体系地出现。^②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欧地区的确立，世界资本主义的雏形已经形成。与资本主义发育、成长与成熟相伴的思想史，是一部分裂成为两个阵营的思想演进史。一个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阵营，这促成了一个为资本辩护的知识传统。另一个则是对资本主义加以毫不留情地批判的阵营，这塑就了一个资本批判的知识传统。所谓资本辩护，是就其肯定资本所具有的积极价值与正面作用而言的；所谓资本批判，是就其痛斥资本的极化贫富与损害公平而言的。这两个传统是紧贴资本主义演进史而展开的。但在其形成相应的知识传统之后，它们本身也就拥有了某种可以进行单独考察的理由。相比而言，资本的辩护传统不如批判传统强势。这是受两个原因注定的态势。一是因为资本生产大大驱动了财富的积累，但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为资本辩护，似乎就此丧失了道德支持；而痛斥资本牟利，会赢得公众喝彩。二是因为资本批判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寻求的是更为理想的社会，这让那些基于现实理由为资本辩护的人落了下风。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甫一出现，资本批判的传统就相应萌生。但把资本批判思潮升华为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的系统理论，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以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起始的。从资本的现实批判来讲，没有一部著作能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媲美。这部著作是现代资本批判最重要的思想源泉、知识源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承继了自莫尔以来的思想传统，既对现实形态的资本私有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又系统地展望且勾画了一个更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蓝图。但与此前的资本批判不同的是，马克思在现实批判上注重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建构，为此撰写了《资本论》，同时经由《共产党宣言》，将资本主义的出路实际地勾画出来，从而开创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③此后，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实践双线并进，掀起了20世纪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动潮流。这一潮流，在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和政治方向。从理论上讲，在第二国际转向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即通过议会竞争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实践以后，催生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模式与理论形态。而在西方传统内部接引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则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武器的批判”转变为“批判的武器”，形成了资本批判的现代经济学思潮。^④但这两种关于资本的批判理论，呈现出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批判大为不同的批判路向：马克思对资本和权力的双线同时批判，似乎已经在后者那里变成了对资本的单线批判。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转向，它不仅转变了资本批判的理想社会指向，而且将克制资本弊端的希望寄托于现实国家权力体系。这是一种在精神上完全不同于马克思资本批判宗旨的根本变化。本文选择19世纪首开资本系统批判的马克思《资本论》，与21世纪秉承资本批判传统的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来观察两种资本批判理论的不同趣意。

二、双线批判

马克思是资本批判的先知性人物。他在资本刚刚在国家体系中取得支配地位之际，就对其进行展开

① [法]米歇尔·波德：《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第3页。

② [法]米歇尔·波德：《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第86-88页。

③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胡文建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199页。

④ [南斯拉夫]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胡文建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216页。

的、全面的学理与政治批判。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以《资本论》对资本的系统解剖为核心，但不受这部著作的局限。因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经由资本批判来展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刻画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只有结合《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才足以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一方面，前者为后者的理想社会设计提供了现实支持理由。由于这些支持理由论证的学理性，让其具有既紧密联系经济史、政治史，又可以脱开两史而另具学术史的意义。另一方面，后者为前者提供总体断言和前路指引，使资本批判的路向被规定得清楚明白。因此，围绕《资本论》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概观，其实是借助这部著作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及其前路的总体概观，而不是对这部著作的提要钩玄。

马克思将资本批判的依托点设定为商品，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东西。但这正是人们得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或“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细胞”。“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计较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做的那种琐事。”^①正是以当时最发达的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英国为例，马克思对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最贴近时代的观察与分析。他从商品及其关联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因后果、自身结构、根本矛盾、前途命运。马克思明确指出，他以英国为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描述、分析与批判，实际上是针对一个世界进程展开的理论解剖工作。在他看来，欧洲大陆以及经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美国，都无一例外地在进入或展开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以最为系统的学理建构，以四卷篇幅展开了资本批判的丰富内容：第一卷旨在通过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细胞，描述与分析资本的本质，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第二卷考察资本的流动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旨在揭示资本在连续的运动过程中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第三卷考察资本运动的总过程，上升到社会的层次，解释资本生产的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结构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原计划的第三卷被恩格斯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单独以《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名义出版，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历史源流的梳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宏大的理论意向。他在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与批判，而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展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考与设想。仅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以比较的方法呈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差别。“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②从一种小生产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就在于生产资料的集中化，“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③

马克思对资本增值秘密的揭示不是这里分析的重点，但构成分析的必要中介。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就运行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基点上。资本是如何实现增值的呢？本来，如果一个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8页。

家投入一定资金，进入生产过程，产出商品，然后在市场上出售，这个纯粹物的加工过程是不会产生资本增值的。资本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工人投入的劳动。资本家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提高劳动强度的方式，让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统一起来，从而使人力、物力投入同一个商品生产过程，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方式实现资本的增值。这就是马克思的两个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剩余价值论的核心论点。

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工人受到剥削的定势殊难改变，并且即便是试图谋利的资本家之间，因为竞争的作用，也会造成恶性竞争的结果。诚然，在资本生产的过程中，主导者是致力于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但同时，“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①

如果说从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解剖资本增值的秘密，是马克思《资本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取得历史霸权之际的独特贡献，那么，马克思更早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就在政治理论上合乎逻辑地展示了资本分析的出路构想。从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审视出发，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以断言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铺垫，对整个人类历史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概括。“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②与历史上这些生产方式的状态与结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社会关系极大地简化了，并极为鲜明地体现出它的特点。“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③这是对历史趋势的一个断定。这一历史趋势如何体现为一个实际的社会进程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刻画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呈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后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自觉推动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历史进程。“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④这就由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的资本批判，转向了国家权力或上层建筑的资本批判。带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共产党人明确的使命。“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起来的国家，不再是为了自己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掌控国家权力。相反，它致力于达成的目标，注定了它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4页。

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①两种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对比是完全不同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②而获得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围绕这样的历史使命，也就会将国家权力完全用于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全方位的批判。从批判的基本线索上看，是围绕两条线索同时推进的：一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批判，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严重社会不公的生产机制，以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特质的先知性把握，以及对资本弊端的准确诊断，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系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二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后的国家权力建构目的的揭破，将资产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秘密曝露出来，从而将国家权力的转移问题、共产党的使命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与远期目的关联性地陈述出来。这样的资本批判是一种总体批判，同时在知识线索上又明显地是一种双线批判：经济领域的资本批判与政治领域的权力批判紧密地扣合起来，从而促使人们意识到，尝试改变资本的剥削与压迫本性，必须从改变资本的私有制入手，进而从改变国家权力性质深入，才可能扼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咽喉，从根本上救治其痼疾，扭转因其形成的极度不公态势，建立公平的社会机制。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马克思不仅在资本与权力，即经济与政治双线展开对资本的批判，而且对资本促成的观念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正是他和恩格斯的“两个决裂”论的旨趣所在。“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③循此可知，透彻的资本批判，不仅必须同时在经济、政治领域，以及经济学、政治学领域展开，还必须在社会文化领域同时展开。

三、单线批判

从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以降，资本的历史又延续了 150 余年。其间，不仅社会主义的挑战让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形有了极大的改变，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修正也让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特点。在 20 世纪中后期，由于苏联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近 50 年的时间跨度内的前半段，与资本主义的衰颓景象相比，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曾经让人怀抱极高的期待；后半段，社会主义的低度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富庶繁荣形成鲜明对照。到了 20 世纪晚期，由于苏东剧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成败影响似乎出现逆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阐释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由民主政体的现代国家搭配，似乎成为一段时间的不易之论。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奏出凯歌之际，对资本的批判随之再起。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出版的《21 世纪资本论》就是其中之一。

皮凯蒂指出：“尽管经济增长与趋同的速度令人惊叹，不能因此忘记贫富不均问题在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存在。”^④这正是他聚焦于资本 / 收入比的主题，从此出发去分析贫富不均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现实缘由。前者，让皮凯蒂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降的 150 余年来，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结构还原，发现了“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当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 19 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然而，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并且保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保持经济开放度，同时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⑤这段话是皮凯蒂对致力于研究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2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21 页。

④ [法] 托马斯 · 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XVI 页。

⑤ [法] 托马斯 · 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1-2 页。

本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浓缩或概观。它至少给人们三个重要提示：一是从 19 世纪至今，资本造成的不平等一直按照既定的脉络延续下来了；二是资本的发展态势已经与民主政制相冲突，威胁了民主及其所支撑的精英价值观；三是必须重建民主，以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强大力量抑制资本，从而让其发挥出维护公众利益、经济开放的正面作用，以及扼制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另一面作用。

皮凯蒂尝试从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及其导致的不平等的全面数据统计资料出发，探究资本增值如何导致社会不公。为此，他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位置。他一方面批评经济学家们长期无视财富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则试图以足够多的数据来凸显分配不公的现状，再一方面是推导出解决分配不公的累进资本税方案。三者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围绕其主题的、较为自洽的分析闭环。

如果说皮凯蒂对于资本生产各国的统计资料的分析是一个相当专业且令人乏味的技术性工作的话，那么他这种分析进路所仰仗的基本思路，则是人们理解他秉持的上述基本观点的适当进路。他指出，经济的增长依赖于某些趋同的力量，即知识与技能的扩散。但其自然和自发的性质较强，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政策、获得培训和适当技能的途径以及与之相关的机构。恰恰因于后者成为一种明显的分化力量，导致了高收入者的收入要远高于其他人。尤其在经济增长疲软而资本回报高企时，这种状况会更加明显。因此，他将分化的根本力量确定为一个简明的公式： $r > g$ ，即资本收益率（ r ）大于经济增长率（ g ）。他由此得出结论：“当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时（这种情形在 19 世纪前一直存在，并也有可能在 21 世纪再次出现），从逻辑上可以推出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产出和收入。继承财产的人只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部分，就可以看到资本增长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那些劳动一生积累的财富，继承财富在财富总量中将不可避免地占主导地位，并且资本的集中程度将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可能有违现代民主社会最为根本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公正原则。”^①从皮凯蒂的这一断言可以推断出：倘若不矫正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结果，任由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那么其后果不仅是导致直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而且会在政治上直接威胁现代民主制度和基本价值。

皮凯蒂全书的两个基本结论，凸显了他的资本批判的鲜明特点。第一个结论是，每个人都应该警惕任何关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决定机制。“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是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的。尤其是在 1910—1950 年，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发生的不平等的减少主要是源于战争以及为应对战争冲击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同样，1980 年以后不平等的重现很大部分是源于过去几十年，尤其针对税收和金融方面的政治转变。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看待‘什么正当，什么不正当’的方式，各社会主体的相对实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共同选择——这些共同塑造了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历史。不平等是所有相关力量联合作用的产物。”^②第二个结论是，“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很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此外，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③这两个结论是皮凯蒂讨论资本运作引发的不平等的核心结论，完全主导了他的资本批判思路。因此，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是预设。而全书就是为了验证这两个预设而展开分析与论述的。他的论述，明显是针对苏东剧变后对不平等的忽略甚至是无视而展开的。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皮凯蒂在第一、二部分的描述，旨在凸显自己的预设性结论，即没有什么自然力量降低历史进程中资本和资本所有权带来的收入的重要性。在不平等的历史演进中，资本由此被置于绝对主导因素的位置。^④他认为，20 世纪曾有过的降低不平等的原因，是相应公共政策的出台；而 20 世纪后半期不平等的再度加剧，制度和政治差异发挥了核心作用。于是，在认定资本 / 收入关系成为不

① [法] 托马斯 · 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20 页。

② [法] 托马斯 · 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16 页。

③ [法] 托马斯 · 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16 页。

④ [法] 托马斯 · 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184-185 页。

平等的直接导因的情况下，皮凯蒂同时认定了政府及其公共政策乃是解决这种不平等的关键所在。他认为，现代增长天然地重劳动轻遗产、重能力轻出身，是完全不成立的。根据他的考察，情形可能正好相反。在他看来，“财富不平等的缩小及其中相应收入的减少，是 20 世纪上半叶总收入不平等缩小的唯一原因。”^① 相应地，不平等缩小的最直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入的锐减”。^② 基于此，他将资本所有权置于考察不平等问题的中心位置。因为正是资本所有权问题，不仅导致财富差距不断拉大，而且直接引发了资本/收入比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皮凯蒂经由这样的思路对英、美、德、法等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考察后，进一步展望全球情形，得出如下结论：“新的全球经济带来了无尽的希望（例如贫困的消失），也带来了大量的不平等（某些人的财富真可谓富可敌国）。”^③ 因此，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将资本主义建构成趋近和平、更加持久的社会，要么坐等下一次危机甚或战争。实现前一目标的有效做法是什么呢？皮凯蒂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防止贫富分化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这一税制还有另外的好处：让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这对于有效监管银行体系和全球资本流动也是必要条件。资本税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如果只能在某些或针对某些机构实行资本税，那么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但如果最理想的政策无法实现，那么可能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④ 很明显，在他看来，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资本税，既是改变发达国家资本/收入关系，也是在新兴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改善相关关系、治理不平等的唯一出路。

皮凯蒂何以会对征收累进资本税的功用怀抱这么大的信心呢？这与他的两个诉求紧密相关。一是他拒绝采取彻底摧毁现行社会机制或制度体系的做法，认为那无助于改变不平等的现状。这让他只能在要么诉诸资本或市场力量，要么诉诸政府或政策力量之间做出选择。尽管他对公共部门的规模、职能与效用也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但却对基于权利哲学的政策落实后果保有极大的信任态度。他认为，“以 20 世纪发达国家所构建的社会形态为代表的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基于一系列的基本社会权利：教育权、健康权以及退休权。无论这些财税和社会支付体系在今天面临多大的制约和挑战，这些制度与过去相比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⑤ 基于这样的判断，他强化了沿循这一线索去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路径依赖”。二是他对累进资本税及其功用有一个保其效用的定位。一方面，他将税收确定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认为“没有税收，社会就没有共同命运，集体行动也就无从谈起”。^⑥ 另一方面，他通过对累进税所发挥或发挥过的功能的肯定性评价，认定累进税在现代收入分配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针对所有人征收的统一税与针对富人征收的累进税之间，后者旨在调节贫富差距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累进税所具有的“杀富济贫”性质是明显可见的：防止降低富人的赋税，让累进税不至于成为累退税，既让中产阶级不会成为纳税最多的阶层，也让社会底层人群从税收制度中得益。如此一来，累进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累进税是社会形态的关键要素：它在社会形态的发展和 20 世纪不平等结构的转型中占据核心地位，为确保社会形态的未来活力，它仍然至关重要。”^⑦ 累进税不仅在一国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试图扭转全球不平等的严峻局面中也必须借重全球累进资本税。“这种税收制度提供了一个好方法，来避免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并且能够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⑧ 虽然因为解决不了税收征收主体、征集方式（国际协调与区域政治一体化）与分配方案等问题，皮凯蒂也认为这种设想带有乌托邦色彩，

①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267 页。

②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267 页。

③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373 页。

④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373 页。

⑤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380 页。

⑥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391 页。

⑦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394 页。

⑧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409 页。

但他执意将累进税制作为解决不平等的唯一出路。

如何保证累进税制的可靠运作呢？皮凯蒂并没有明说依赖于民族国家的政府，更没有明言如何征收全球范围的累进资本税以及各国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他对主权国家的政府似乎带有一种若隐若现的不信任感，对民主国家的政府也没有表示多少好感。但因为他选择了一条拒绝颠覆国家权力体系，尤其是不仅拒绝颠覆民主国家政府、甚至承诺了民主国家政府之作为公平分配依托之前提条件的进路，因此他实际上将克制国家/全球范围不平等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他承认需要改进现行政治框架，但同时也等于承诺了这一框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了管理 21 世纪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反思 20 世纪的财政和社会模型并使之适用于今天的世界仍是不够的。无可否认，适当更新 20 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财政自由主义程序是必要的。”^①这种调整，正需要“社会国家和累进所得税”扮演关键角色。这明显是在承诺现行国家体制的前提条件下给出的资本批判结论。相对于马克思对资本和权力展开的双线批判而言，这是一种明显的单线性资本批判进路，而且鲜明地体现出优化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意愿。其间，为马克思所表述的彻底重建生产方式与国家机制的设想，完全隐而不彰了。

四、尴尬的批判

由上可知，皮凯蒂对资本的批判，在方向上有一个明显的逆转。这个逆转，首先体现在他对资本批判锋芒的自觉弱化上。他是一个以资本体系改良者面目出现的批判者。这一角色定位，与他的两个基本判断具有密切关系。一是他认为马克思在 19 世纪开创的、不妥协的资本批判进路，在 21 世纪的当下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效力。皮凯蒂的 21 世纪资本批判，在批判传统上可以说自觉承接了马克思。在马克思时代，资本的运作方式相比于此前的大卫·李嘉图时代，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成长，让资本经历了一波高度繁荣，但却导致社会严重的不平等。这正是马克思资本批判极其尖锐且颇具革命性的原因。工业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导致了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并引发反抗运动的蓬勃发展。在皮凯蒂看来，这正是工业资本主义高奏凯歌与共产主义勃然兴起，同时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原因。他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断言，以及在《资本论》中的深入系统分析，都凸显出一个重心：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进行分析。由此马克思断然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萨伊、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区分开来，并以一种资本的“无限积累原则”，揭示了资本不可逆地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趋势，且因此注定了资本收益率的下降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消亡。^②

皮凯蒂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前途的预言是悲观的，但这一预言却没有实现。因为 19 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的运作出现了马克思始料不及的新情况：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使不平等在惊人延续的情形中出现社会矛盾缓和的状态。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反而仅仅出现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发达的欧洲国家，在此时致力于寻求有利于社会民主的其他途径，并在出现一些有利于平衡资本力量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使生产力也有了稳定增长。在皮凯蒂看来，尽管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在方法上和前途预测上存在一定缺陷，以至于让他的总体断言无法兑现。但他也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累），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获得启发。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 21 世纪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其 19 世纪的影响。”^③虽然资本积累的结果不像马克思认为的那么严重，但其影响仍非常巨大，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的资本现象，还“直接辅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显然，皮凯蒂在知识传统上继承了马克思及其前后的资本批判成果。而且，他也明确意识到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沿循资本与权力双线批判的轨道展开的，这从他对《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的关联审视上可以佐证。但皮凯蒂并不是马克思资本批判遗产的忠实继承者。他的资本批

①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409 页。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6-8 页。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第 8 页。

判相对于马克思而言，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一是他拒斥了马克思的双线批判进路，转而从较为单纯的经济—经济学路径，展开资本批判的思想旅程。二是他认定，资本自身批判的任务，不是全方位对资本进行清算式的毁灭性打击，而是对资本/收入关系进行有效调整。这是一个改良型的资本批判进路，是19世纪以降资本批判的社会政治处境变化一个必然的结果。在皮凯蒂看来，因为资本批判早已经出现了明确的转向：经济学已经从马克思的“末日预言”转变为库兹涅茨的“理想主义”，所以权力革命的理由似乎消失。库兹涅茨认为，“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或者不同国家间的其他差异，收入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①这显然是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前途的截然不同的断言。皮凯蒂既不同意马克思的末日预言，也不同意库兹涅茨的理想主义，他尝试在自认的末日预言已经证伪的情况下，以残酷的不平等现实矫正库兹涅茨的说法。但矫正的办法，不是马克思倡导的革命，而是在现行国家框架内的改良。也就是以对资本征收累进税，改变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从而缓和社会矛盾、对立与冲突，确保公共利益与公共福利的落实，以求维持民主社会与精英价值。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转变，皮凯蒂既明确承接、又尝试超越资本批判的两个传统。只有在两个相对放大的传统中，皮凯蒂的研究进路才能获得更准确的理解。一个传统，可从马克思、第二国际到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线索来理解。另一个传统，则沿循库兹涅茨、凯恩斯、新凯恩斯到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这条线索来呈现。^②前一变化的轨迹，让人们明白，在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同时革命的预言未曾实现的情况下，经由第二国际的议会斗争推动资本主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并最终形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即在立宪民主政制的框架内推行极具社会主义色彩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尤其是以建构福利社会主义制度来满足社会中下层的需要。这让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国家权力革命的外部指向，转变为以公共导向优化现行国家权力机制的内部指向。这正是皮凯蒂资本批判的大思路。后一变化的过程让人们意识到，一旦设定资本主义的运作不会走向被革命颠覆或推翻的极端，那么就需要在维持资本运作体制的前提下，设法缓解资本运作导致的不平等，从而使社会保有一种民主与精英主导的机制。库兹涅茨在这种思路中设定的理想稳定状态，沿循下行路线，自然就会落到政府调节资本运作，以避免资本收益过大，引发社会的尖锐对立，保证社会不至于陷入僵死之局。这是一种旨在杜绝革命、让已经似乎民主化的国家保有其社会民主功能的思路。这在立场大致相同的西方左翼阐释者那里，都表现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效率、社会主义的公平两者跨界欣赏的趣味。这种资本批判，已将批判转变成旨趣大不相同的建设想象。同时，在承诺现代政经体制的经济学知识传统中，曾经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面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因为在解决滞涨上的效用，让皮凯蒂这些经历了20世纪重大经济学争论的学者们意识到，两者各有施展才能的空间。这正是皮凯蒂在资本批判的诸流派间辗转腾挪、择善而从的理由和动力所在。

假如不考虑资本批判透入社会政治过程所引发的规模浩大的社会革命的话，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批判本已经形成了实践与理论相携出场的知识传统。这就是由马克思确立的资本批判大思路所确定的资本批判与权力批判不能割裂的原则。这一批判原则，在实践上经由第二国际的根本改造，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改造模式。这也是皮凯蒂资本批判所仰赖的社会政治条件。在知识传统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传统，在被民主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让资本主义在其自我调适与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寻找到了不同于“武器的批判”的“批判的武器”的广阔空间。结果，导致资本批判的批判特征发生重要转变。第一，在批判的定位上，马克思奠定的资本批判之彻底重构进路，转变为局部改良，也就是政治/政策的改良来显示其批判锋芒。针对资本与权力的双线批判转变为只针对资本的批判，经济与政治机制的革命转变为分配方式的改良，实践指向的批判转化为书斋的数据分析，资本社会的结构转型诉求

①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第8-9页。

② 前一线索是笔者论述的主要线索，后一线索则是论述的辅助线索。对后一线索的经济思想史梳理，[英]彼得·德·哈恩：《从凯恩斯到皮凯蒂：20世纪的经济学巨变》，朱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转变为对政策调适的指摘。第二，在批判的使命领承上，马克思先知性的全方位、不妥协的批判，奠定了资本批判之痛诋不平等现实、寻求理想社会建构的大思路。但随着资本及其关联性的权力体制，也就是资产阶级国家转变为公共国家，随之而来的是革命性批判精神走向温和化批判，各种思潮之间的相互借鉴成为常态。^①像皮凯蒂那样着力因应体制改良需要所确立的、以税制改革改变不平等现实的批判理念，实际上已经将批判的使命转化为对公平分配原则的捍卫。否定现实的批判似乎转变为维护现实的建设。第三，在批判的位置确定上，马克思将其确定在新社会建构的前提条件上。因此，批判是为了重构所做的准备工作。这是透彻的资本批判之指向革命的一个必然。马克思并不将资本批判与权力批判割裂，而是以双线批判指向双线重构，革命的逻辑贯穿其中。在非革命的语境中理解，双线批判的实践论进路，似乎渐行渐远；但这一批判的方法论原则，似乎依然具有指引资本批判的方向性价值。皮凯蒂的资本批判将批判作为手段，而且仅仅指向资本一个方面，尤其是集中指向资本收益方面。因此，他将批判限定在资本运行的一个端点上，将国家（政府）作为矫正资本造成的不平等的希望寄托。这就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位置大大降低了，使之变成了资本社会自我维护的一种手段。

皮凯蒂的资本批判正是想左右逢源。在被视为《21世纪资本论》先导著作的《不平等经济学》中，皮凯蒂自觉和明白无误地表白了这一点。他认为，“不平等与再分配问题，历来是政治冲突的核心。”^②在面对旨在校正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时，他拒斥推崇市场的“右派的自由立场”，同时也拒斥积极进行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左派的传统立场”。因为这种左右冲突，是对催生不平等的经济与社会机制进行了矛盾分析的结果。似乎存在一个超越左右冲突的第三条路线。“实际上，在社会公正的多个根本原则上存有一定的共识，即如果产生不平等的部分原因是个人不可控因素，如由家庭传承或赶上好运气获得初始财富而产生不平等，那么，相关的个人不应受到指责该对不平等负责。而此时正需要国家寻求可能有效的方法，旨在改善最底层居民（需要面对不可控因素，处境最为不利的居民）的命运。社会公正的现代理论已经以‘最大化原则’的形式对这个概念加以表述。据此，一个公正社会应该通过社会制度将机会最大化并提供最低的生活条件。”^③这是一种明显的罗尔斯式的想法。但约翰·罗尔斯不属于资本批判的知识阵营。他的论述宗旨是提供基本价值与基本结构的优化来保证“公平的正义”（justice of fairness）。换言之，这是一种建设性取向的知识进路。皮凯蒂对左右两翼的拒斥，为他打上了价值取向与知识建构含混不清的烙印。这让他对资本批判的透彻性大为下降。因此，评论者认为皮凯蒂的资本批判没能保持逻辑一贯和完全自治。其批判逻辑的错位，让一个皮凯蒂实体呈现出三个皮凯蒂面目。“皮凯蒂有三副面孔，而不是两副：其一，在发达国家财富分配方面，他是位政治经济学家；其二，在回答如何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时，他是位主流经济学家；其三，在收集整理收入分配的数据时，他是个国民收入会计师。”^④以其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他承继的是马克思一脉的批判传统；以其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他从事的是承诺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析进路；以其国民收入会计师的身份，他使用的是数量统计分析方法。如此看来，皮凯蒂并没有打算、也实际上也成为不了马克思那样以透彻的逻辑进行彻底的资本批判的人物。

责任编辑：王冰

^① 萨拜因指出：“简而言之，对自由主义理论做现代化的处理所依凭的乃是这样两种努力：一是打破哲学激进主义在知识上的孤立性，而这种孤立性正是使它成为教条主义的主要原因；二是使它同其他各社会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接触，同欧洲大陆各种思想潮流进行勾连，并同各种新的科学调查领域进行接触。只有这样，自由主义才能宣称自己是一种社会哲学，而不只是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1页）这样的状况，出现在19世纪晚期，其结局，不仅影响了自由主义的存在方式，相应地也影响了其他各个知识流派的存在方式。

^② [法]托马斯·皮凯蒂：《不平等经济学》第7版，赵永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页。

^③ [法]托马斯·皮凯蒂：《不平等经济学》第7版，第8页。

^④ [澳]克里斯·格雷戈里：《皮凯蒂的三副面孔》，陆雪飞译，《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刘顺峰

[摘要]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关键词]法律史 边缘学科 法理学 研究范式 法律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D9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2)06-0063-05

法律史作为法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自20世纪初叶于中国学术场域诞生至今，有关其范式的讨论从未间断。^①总体来看，主要围绕如下三端展开：一是本体论问题，主要关注的是法律史研究中范式的有无判断及类型划分；二是知识论问题，主要聚焦的是法律史的知识生产、传播与更新方式，对其范式形成有无作用与意义；三是技术论问题，主要探究的是法律史研究中每种范式对具体分析技术有无要求。如上争论虽为学界理解法律史学科的性质提供了素材与经验，但法律史学科现已成为法学“边缘学科”的事实，却要求我们须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才能让法律史走出困境。笔者拟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论证、法律史叙事的法理修复及“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三个层面展开探究。

一、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论证

关于“中国学术场域的法律史研究有没有范式”，学界虽存在争论，但大多学者还是持肯定态度。^②不过，这些秉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对法律史研究范式的本质理解却存在明显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其不同研究旨趣与研究目的。以百年来中国学术场域的法律史研究为对象，如果从法理学视角来审视，在不同历史时段，基于经济、社会、文化等特殊性，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旨趣大致有三方面。

(一) 外国传统法制可否具有可移植性的法理论证

中国法学界对外国法的集中关注，大概始于20世纪初叶的清末变法修律运动。在修律过程中，围绕外国传统法制可否具有可移植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之间展开了激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司法政策百年发展史研究”(21ZD1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顺峰，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湖南 长沙，410081)。

①关于范式的概念，学界一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在广义上使用范式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并在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套共同或相近的分析话语、方法与模型”。

②朱腾：《走出中国法律史学“危机”论——从缺乏共享平台的学科间的对话说起》，《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

烈争论。^①面对礼教派的批判，沈家本借用西方传统“社会学法学”分析框架，认为“窃思法律之为用，宜随时运而转移，未可胶柱而鼓瑟”，^②强调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不但需因应时势发展而做相应变动，其间还要兼顾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内在法理逻辑。^③其有关中国传统法律史问题的法理学论证，却为后世学者理解与分析传统法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二）中国传统法制可否为当下借鉴的法理论证

21世纪初，国内法学界发生的有关“本土传统法律资源”与“外国传统法律资源”孰优孰劣的讨论，是对法律史问题法理学分析逻辑的充分展示。“本土传统法律资源”与“外国传统法律资源”的各方支持者，不论争论目的为何，但关注的核心是“可否借鉴”。如果从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逻辑出发，阐释中国传统法制是否具有可借鉴性的问题实质，以及分析中国传统法制是否具有可借鉴性的问题依据，可能就会获得不一样的认识。以“法律资源本土论”“民间法论”“习惯法论”等为例，虽然其都坚持认为，传统法制是中国当代法制/法治建设的“先验出发点”，但“法律资源本土论”更为强调的是“现代法—传统法”框架的稳定性，^④而“民间法论”“习惯法论”则更倾向于表达“传统法优于现代法，充分发挥传统法价值”的逻辑。^⑤如果保持“法律史分析”与“法理学分析”在有关“中国传统法制是否具有可借鉴性问题分析”中的平衡性，即关注“历史—过程”中的“法理”，对有关中国传统法制是否具有可借鉴性的论证必然更具有说服力。

（三）法律史可否为法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贡献知识的法理论证

相较于部门法，法律史与当前法制/法治实践之间的关系相对较为疏远。特别是在司法领域，法官不可能以中国古代法作为裁判依据，当事人也认为古代法不具有直接的权利保护功能。既然传统法对现代法制/法治的作用无法显现，那么，法律史的知识属性是什么？如果借由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逻辑，可为推进有关该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提供一个新视角。法律史以历史上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与法律意义为研究对象，由此，当前由国家制定、认可并实施的法律规范，可循沿“法律史”的脉络找到其最早的法律渊源。只是，纯粹的历史追溯并不能从本质上证成传统法律制度或文明的现代价值。一旦借用法理学逻辑，以法律概念的形式、意义、特征为对象，通过分析类似法律概念之间的关系、法律概念在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中的表达方式、比较法视域下同一法律概念的不同意义范围等，便可有效解决法律史意义上的时间界定准确与否问题。所以，在面对“法律史对法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究竟有无知识贡献”的问题时，单纯从法律史的内部视角来讨论与分析，即纯粹只是停留在“传统法律史可以为现代法律制度的确定与完善提供历史镜鉴”层面，而不是以外部视角，即“通过法律史的法理学逻辑，探究线性时间意义上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契合度、某一时间坐标点上具体法律制度组成部分诸要素之间的契合度、当前法律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法律史的应然性与实然性价值就无从体现了。

二、“偏颇的”法律史叙事的法理学“修复”

揆诸过往百年中国法律史场域的知识生产过程与总体特征，可以看到，对发现与介绍材料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分析材料。似乎法律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对法学史料的发现与介绍，离开了史料，法律史便不复存在，“偏颇的”法律史叙事观由此形成并不断发展。那么，其间的“偏颇”究竟是什么深层次原因导致的？如何才能修补其间的“偏颇”？笔者拟以“楔形文字法”为考察对象，就这一“法律史问题”的法律史分析与法理学分析之间的差异予以揭示，并探究形成此种差异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国内学界关于楔形文字法的学术关注大概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开始是历史学界基于《汉穆拉比法典》《苏美尔法典》的世界史意义，就楔形文字法的内容、作用与意义等予以一般性介绍。^⑥大概

① 邹丽君：《中国法律思想的近代转型与启示》，《时代法学》2020年第2期。

② [清]沈家本：《沈寄移先生遗书》甲编（下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881页。

③ 李贵连：《沈家本评传（增补版）》，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124-125页。

④ 陈柏峰：《送法下乡与现代国家建构》，《求索》2022年第1期。

⑤ 邹涛：《古代无讼法律思想对现代纠纷解决的作用——以民间法为视角》，《民间法》2017年第1期。

⑥ 杨炽：《谈汉穆拉比法典结构的逻辑性》，《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法学界才从东方法的视角对其法律史意义与影响展开讨论。^① 目前，学界有关楔形文字法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法律史层面。厘清楔形文字法产生与演变的基本路径、归纳楔形文字法的特征，再以楔形文字法的代表作《汉穆拉比法典》与《苏美尔法典》为分析对象，对其做体系化介绍，是法律史学界有关于其研究的习惯性路径。^② 然而，这样一种历史学层面的有关其“是什么”的介绍，阻却了学界对楔形文字法的法律意义的追问。作为一项学术探究，当然不可能停留在仅仅知道其“是什么”，而更应发现与揭示其“为什么”。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传统的法律史视角不能为探究“为什么”带来直接帮助。由此，需要换个视角 / 框架来审视该问题，比如，以法律史的事实陈述为基础，籍由法理学的视角来展开“为什么楔形文字法是学界现在所理解的此种样态，而不是其他样态”的分析。如果要形成有关楔形文字法的学术认知，要进一步就其内部法规范展开详细探究。从法律史的“历史法律事实陈述”，到“对法律史事实背后的形成机理及内在运作机制”的分析，法律史与法理学之间开始形成了“对话”。法律史影响着法理学有关其“法律事实的应然形态”分析，法理学影响着法律史有关其“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或现象的真相”判断。离开了法理学的分析，法律史知识本身不仅略显单薄，其合理性与可信性也相对较低。

基于“楔形文字法”的法律史分析与法理学分析，二者的差异较为明显。事实、个案或制度的法律史分析，注重的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是什么”，重在表达时间意义上的“其早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就存在，而不是其他时期才出现”。换言之，一项具体事实、个案或制度的法律史分析，是以“事实—时间”为分析框架的。而一项具体制度的法理学分析，是以“事实—原因”为分析框架的。法律史分析与法理学分析，侧重点不同，形成的有关事实、个案或制度的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也不同。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在面对一个具体事实、个案或制度分析时，采用法律史分析与采用法理学分析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结论’，仅仅是因为法律史注重时间意义层面的历史分析、法理学注重事实层面的原因分析吗？”在以“楔形文字法”为例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分别循沿法律史与法理学的“习惯性视角”会各自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但这些问题之间存在诸多交集，如“楔形文字法的诞生背景”与“楔形文字法的内容、特征呈现出的特定时代的法观念”，“楔形文字法的内容”与“楔形文字法代表性法典的序言、结构等是否具有科学合理性”。倘若将由法律史视角观察出来的问题列为 A、由法理学视角观察出来的问题列出 B，可以发现，B 问题的解决是以 A 问题的解决为前提，或者说厘清 A 问题对于把握 B 问题的属性及解决 B 问题至关重要。将对历史上的法学问题分析，人为地划分为两条互相独立且平行的问题线条的做法，显然阻碍了法学研究的科学性步伐。如果不能认识这种人为划分所带来的弊端，任由其问题线条无限地延伸，将难以洞悉历史上的法学问题的本质。与“偏颇的”法律史叙事专注于借由史料发现问题、表达问题、回答问题的方式不同，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是对历史上的法学问题研究的理性回归，其强调的是“历史—事实—原因”的分析框架。运用此框架对“楔形文字法”展开研究，就不会停留在对其内容做事实陈述，还会进一步关注其在特定时段形成、发展与灭亡的原因，甚至会将其与同时代或相近时代的其他法律文明予以比较。

三、“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

(一) 认可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解释框架

在现代法律人类学经典理论体系中，有关“不同时间观和空间观视域下的比较可能性”的讨论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孟德斯鸠提出的“比较法律观”。他认为不同空间意义上的法律是不可展开比较的，^③ 因形成其内在属性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地理等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一味忽

^① 王立民：《古代东方的宗教与法律》，《法学》1994 年第 5 期。

^② 王云霞、何成中：《东方法概述》，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年，第 8-18 页。

^③ 马剑银：《孟德斯鸠语境中的“法”及其“精神”——重读〈论法的精神〉》，《清华法学》2016 年第 6 期。

略或抛却这些因素而展开比较，结果将是无意义的。^①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格拉克曼（Max Gluckman）超越孟德斯鸠狭隘的“法律时空观”的限制，结合法律人类学的研究目的与时代使命，提出了一套旨在解决不同时间、空间意义上的法律文明比较框架——“可翻译性”框架。借用格拉克曼的“可翻译性”框架，可为理解法律史的法理学范式建构过程中的法律概念翻译问题提供清晰的思路。

如何理解或阐释古代法律概念，一直是法律史研究的困境所在。不仅如此，其也是法学内部其他学科，尤其是部门法学对法律史形成“误解”的缘由所在。虽说有很多古代法律概念自其诞生之日起一直被沿用至今，但还是有一些概念随着时间的迁移不断发生改变。相较于外国法律史研究，中国法律史研究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古代的“法”“盗”“贼”等，能否用现代法学概念来予以阐释，学界至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尝试借用“历史事实—推动历史事实变化的动力—新的事实”的逻辑，会发现一系列“缠绕”古代法律概念解释问题的“法律史事实”。一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法律史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古代便存在法学”已然成为法学界的普遍共识。二是既然中国古代有法学，法学的基本构成要素又是一系列概念，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古代便有法律概念。三是一系列可信的史料表明，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开启的学习西方的历史、社会实践，其间便包括了对西方近代法律制度与体系的学习。在此过程中，西方的法律概念或是通过坚船利炮、或是通过传教士的宣传而不断在古老中国“扎根”。因此，从时间层面来审视，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古代法律概念与西方近代法律概念在中国场域发生“碰撞”。四是关于“碰撞”的意义，虽然学界有不同认知，但“从中国传统法律概念来理解近代西方法律概念”与“从近代西方法律概念来理解传统中国法律概念”，却在19世纪中叶成为“困扰”官方与民间认知法律概念的应然与实然问题的最大阻碍，且这种“困扰”随着其后中国基于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而制定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策略而加深。然而，格拉克曼的“可翻译性”解释框架，却为学界消除长期存在的“困扰”提供了方案，因其论证并肯定了“不同法律文明在‘互动实践’中的相互作用”。^②既然混合法律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源于两种在时间或空间上均有差异的文明，因此，不同法律文明内部的法律概念的相互理解、相互阐释就必须要坚持“可翻译性”原则，即“既可以用落后法律文明的概念来表述先进法律文明的内涵，也可以用先进法律文明的内涵来阐释落后法律文明的概念”。此种模式从形式上看，似乎只是对不同法律文明之间互相作用这一事实的承认，但本质上却为不同法律文明之间如何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方案。当然，对于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建构这一主题来说，格拉克曼有关不同时空场域下法律概念间的“可翻译性”证成，只是叙说了法律史问题可以用法理学方法来分析的事实，如果要让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成为一种范式，除了借由“可翻译性”框架来联通历史上的法律概念与当下的法律概念之外，还要自研究目的视角厘清“法律史的静态法理分析”与“法律史的动态法理分析”之间的关系，让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同时自静态与动态的双重视角展开。

（二）法律史的静态法理分析与法律史的动态法理分析

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从形式上来看，表达的是法律史研究过程中借用法理学的理论、方法及逻辑来分析具体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学界虽有诸多自法理学视角对法律史问题展开研究的著述，但受法理学知识传统及生产方式的限制，其大都是以静态意义上的法理分析为表现形式。比如，在中国法律史学界，有关《唐律疏议》对东亚国家影响的研究，法律史学界虽然也有学者自法理学视角对其影响原因、可能性范围、意义等展开探究，并得出了一些较有说服力的结论，然而却忽略了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如作为中华法系封建成文法典代表的《唐律疏议》，它对周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虽已为学界普遍承认，但在这些受到影响的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如庶民、官员、奴婢之间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理解差异？与此同时，官方历史档案记录的影响与民间文学作品记录的影响之间有无不同？若有不同，其原

^① Frederick Pollock,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vol.5, no.1, 1903.

^② Max Gluckman, “Civil War and Theories of Power in Barotseland: Africa and Medieval Analogies”, *Yale Law Journal*, vol.72, no.8, 1963.

因是什么？到底哪个记录更为可信？如果只从静态的法理学层面去分析，是难以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的。一旦尝试转换思路，采用法律人类学的“静态—动态”并存的分析路径来展开探究，其就要求应以法律史问题的静态法理分析为基础，同时关注动态法理分析，从中将会获得更为丰富可靠的法律史知识。当然，法律史问题的动态法理学分析包含的内容很多，如法律史问题在实践层面的表现形态与方式、推动法律史问题形成、发展与消亡的动因等。不过，对于范式建构而言，动态的法理学分析主要关注两个点：一是法律史问题在社会实践与生活实践中的各自呈现方式，探究其是否存在“交集”；二是法律史问题循沿历史时空脉络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空中，于社会实践与生活实践层面呈现出的差异。

为了更清晰地表达笔者有关此问题的思考路径，在此以“德国法的产生与演变”为例。法律史的静态法理学分析的最大问题在于，其遮蔽了可以厘清问题本质的各个事实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就“德国法的产生与演变”这一主题而言，法律史的静态法理学分析，仅仅停留在分别对推动德国法产生与演变的经济要素、政治要素、文化要素、社会要素等予以归纳与总结层面，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加入法律史的动态法理学分析，有关“德国法的产生与演变”的探究，将会细化为如下几个具体过程。一是根据历史学亦或法律史学的“让史料来说话”“在史料中发现事实”的基本原则，研究者借由可资借鉴与援引的与主题密切相关的史料来抽象出德国法产生的社会背景。二是藉由法理学知识，对归纳与总结出的德国法产生的社会背景予以进一步核实，判断先前归纳与总结出的“背景”是否符合法的一般形成原理。三是以归纳与总结出的且经过法理学知识证成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为基础，相继推导出德国法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原因。四是循沿历史学的“事件逻辑”——重大事件可能会引起重大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分析德国法在不同事件“链条”中演变的内在与外在动力。五是对推动德国法演变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之间的关系予以分析，揭示二者之间的关联。六是围绕德国法在不同历史时段的表现形式，借由具体实践意义上的典型个案来分析演变的一般规律。可见，法律史的静态法理学分析与法律史的动态法理学分析，虽然都被标以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但二者的侧重点却明显不同。前者关注的是以史料意义上的事实为基础，叙说事实发生与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原因，后者关注的是以实践意义上的事实为基础，概括与归纳事实发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将法律史的静态法理学分析与动态法理学分析共同置于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框架内部，不仅会增加有关法律史问题分析的可信度，还会为发现新的法律史问题创造可能。

“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要求遵循“可翻译性”的解释框架，允许并鼓励用现代法律概念与术语来翻译或表达古代法律概念与术语。与此同时，其还要求将静态法理学分析与动态法理学分析并重，注重对法律史问题形成、发展与消亡的一般性规律的发现。只是，作为一种范式建构的尝试，其间还有诸多细节有待进一步讨论，但不论怎样，有关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问题，所关涉的不仅是法律史学科本身的发展方向预测，还涉及法律史与法理学之间应然关系与实然关系的讨论。

四、结语

法律史与法理学同时作为法学的基础理论学科，除了各自充任其内部知识的体系化与系统化之建构任务外，还承担着为部门法学贡献知识与方法的重任。通过对近百年来法律史学界主要研究旨趣的梳理，以及围绕这些旨趣而展开的法理论证，似乎重新绘制了一幅传统法律史叙事的知识图谱，其间不仅展示了法律史与法理学之间紧密的知识关联，还显示了法理学对于推进法律史研究科学化的方法论价值。然而，建构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并不只是一个法律史学术共同体有关其研究过程中概念、术语与方法认识的统一化过程，还是法律史学术共同体有关其研究目的、意义、价值认识的趋同化过程。虽然建构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至今还存在诸多知识、经验与技术层面的困境，但尝试一旦展开，至少就离达成目标更近了一步。因为，它会叙说一个新的事实，即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可让法律史更具有科学性。法律史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将会随着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的实践运用而不断获得证明。

责任编辑：王冰

避免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因应^{*}

殷 峻

[摘要]后疫情时代全球卫生治理面临重大变革，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全球卫生合作与博弈中展开较量，中西方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发生正面碰撞，从而引发“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讨论。安全困境说、霸权论、权力转移论、身份认同论等理论为分析全球卫生治理话语权问题提供了思考角度。为避免陷入西方理论界构造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国理论界应当保持警惕。在理论构建层面，应尊重既有理论体系，完善特定部门领域理论；在理论博弈层面，应当保持中国特色卫生法理论自信，勿将良性理论交锋恶意升级；在理论话语风格塑造层面，应当始终保持客观理性，实行防御型和进取型相结合的理论外宣策略。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 全球卫生治理 国际卫生法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9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068-04

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间关于全球卫生治理话语权的竞争引发了“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通过观察世界大国竞争历史提出的国际关系学概念，意指崛起国发展迅速并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守成国是既得利益者并想维持现状，当崛起国对守成国的主导地位造成威胁并引起恐惧时，将大概率导致冲突或战争。^①我国高度重视“修昔底德陷阱”之说。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只要坚持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②全球卫生治理是国际卫生法中的重要理念和实践，以保障人类的卫生健康权为核心要义，正式及非正式的机构、规则、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主体在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时，在国际卫生法律规则及相关制度的框架下，共同采取跨国性的集体措施，并有效解决其中产生的问题，以实现维护全人类良好卫生健康状态的共同价值和目标。新冠肺炎疫情使当今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遭受冲击，因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国际争端频频发生，国际卫生合作在大国博弈的影响下举步维艰，全球卫生治理正发生重大变革，其中同样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来源与全球卫生治理变革，应当如何从理论层面予以应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研究专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研究”(20VYJ051)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师生共研项目“创新国际公共卫生法合作机制问题研究”(20SS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殷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510006)。

①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pp.8-11.

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二、“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来源与全球卫生治理变革

安全困境说是西方学者解读“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路径，意指守成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而对潜在的国外威胁及全球风险高度敏感，与崛起国之间的竞争将加剧不安感，而这种不安感并不会随着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打压而消失。约翰·赫兹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较早对“安全困境”进行阐释，其核心要义指出，无政府社会中的群体或个人易受到攻击，为了在攻击中获得安全而被迫掌握更多权力，但这样反而使其更加紧张不安。^①在充满权力竞争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普遍缺乏安全感，相互恐惧与不安感的持续累积形成恶性循环，安全困境本质上是国际关系中难以平衡的权力冲突。罗伯特·杰维斯、巴里·布赞、查尔斯·格拉泽等学者也对“安全困境”问题展开讨论，并将安全困境大致分为体系型安全困境和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安全困境说敏锐地指出守成国在维护自身安全时的矛盾心态，无论是否采取行动，不安感均难以消除。全球卫生治理变革的重点在于建立更完善的全球卫生体系，维护全人类的卫生健康安全，其中也存在安全困境。体系型安全困境主要表现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性和执行力较弱，在其指挥引导下的国际卫生合作缺乏有效的保障监督机制，尤其在面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崛起国和守成国间由于不信任而难以取得合作成果。而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则表现为守成国一味维护现有体系的权威，排斥或贬低崛起国提出的新方案，甚至以退出国际组织相威胁，进而导致崛起国倡导的卫生治理理念搁浅。

也有西方学者提出霸权论，将国家间的实力对比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论点，崛起国激增的经济、文化、科技实力将滋生新霸权，并在全球范围内谋求迭代扩张，从而威胁守成国的实力地位。伊曼纽·沃勒斯坦最早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角度阐释国家实力和霸权等概念，指出国家间竞争的非平衡性，农业、商业、金融等在内的实力是国家获得霸权的重要基础。^②罗伯特·基欧汉、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威廉·罗宾森等人补充了霸权论，分析了美苏两级格局、地缘战略、全球自由主义中的霸权问题。霸权论不仅在国际政治领域广受认可，而且在传媒、娱乐、网络、新兴权利等领域均有其拥趸。^③该理论聚焦于从国家实力向全球霸权过渡的历史规律，其中的因果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对崛起国迅速增长的实力持怀疑态度，在大国竞争带来的安全问题上具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全球卫生治理变革如何推进取决于多种因素，但主权国家在抗击疫情时取得的成绩是获取话语权的关键。崛起国的卫生医疗实力在疫情中得以充分展现，在守成国一贯擅长的领域取得了重点突破和相对优势。此时，霸权论者会认为，崛起国将以其卫生医疗科技方面的“硬实力”支持全球卫生规则制定方面的“软实力”，并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形成合力，夺取全球卫生霸权，并利用其地位优势，强势推广卫生治理标准，对不服从或持有异议的国家采取孤立与打压措施，以维持其全球卫生霸权地位。

权力转移论指出国际体系是动态变化的，其本质是权力转移和大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重新排列组合，崛起国通常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满意，不满意国家和满意国家之间的均势状态更容易造成冲突和战争。阿布拉莫·奥根斯基在综合分析国家主义、国家权力自然性因素、国家权力社会性因素等概念后，认为国际秩序的不稳定主要缘于人口、政治组织、工业力量的剧烈变化。^④与霸权论聚焦于因果性问题和较为激进的论调相比，该理论更关注对国家权力的实然考察，由于与守成国间的国际势力差距逐渐缩小，均势状态更容易引发大国间的争端，国际体系将随着大国间权力重心的转移而变迁。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不少国家对现行全球卫生治理模式表示担忧，对当前国际卫生秩序感到不满。崛起国向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卫生产品，在卫生领域的影响力不减反增，逐渐与守成国形成卫生医疗治理的均势状态。此

^① 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2, no.2, 1950.

^②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37-46.

^③ John Ikenberry,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4, no.3, 1989.

^④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pp.300-338.

时权力转移论者会认为，在卫生医疗领域，崛起国不满于现行全球卫生医疗体系和话语权体系，需要与守成国重新划定势力范围，包括对诊疗标准、疫苗研发、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竞争，疫情将诱发全球卫生权力重心的转移。

也有学者结合人类学研究成果对群体身份认同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了身份认同论，意指由于血缘、语言、宗教、习俗等核心要素的重大区别，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难以对国际社会中其他群体形成完全的身份认同，差异性将导致冲突。威廉·布鲁姆、艾弗·诺伊曼、约瑟夫·拉彼德等人较早阐释了该理论，通过长期的社会建构，人们对国家或群体象征和符号进行内化，形成共同的群体身份，而其他群体具有不同的历史根源及发展路径，与本群体在文化信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本群体利益及团结遭受威胁时会自发地对其他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予以排斥，引发身份认同冲突。^①该理论着重关注国家与个人的互动关系，强调国家或群体间通过构建认知圈在国际社会中形成身份和话语认同。全球卫生治理变革的重点在于治理范式和规则的革新，无论是守成国主导的传统方案还是崛起国创造的新理念，能否得到更多国家与国际组织的认同和支持才是关键。身份认同论者会将卫生领域的规则和标准与群体的文化传统及价值理念相挂钩，守成国与其盟友所构建的卫生规则体系是他们共有的身份标志，通过划定价值观范围的隐蔽手段将崛起国排除在身份体系之外，而不考虑崛起国提出的卫生治理方案是否合理，其主要目的在于给崛起国开展国际卫生合作制造隔离屏障。

三、我国避免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因应

首先，在理论构建层面，在构建符合我国发展利益的全球卫生治理理论时，应当尊重既有的理论体系，并创新完善特定部门及领域的有关理论。“修昔底德陷阱”强调新秩序理念将大概率取代旧秩序理念，这是现阶段西方国家对我国提出的诸多全球治理理念、区域发展倡议、领域合作构想抱有深厚“敌意”的根本原因。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国在国内公共卫生治理、国际医疗物资援助、科研合作攻关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展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方位地贯彻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②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依然对我国提出质疑，主要涉及地区间防疫政策的不协调、严格的人境防疫措施、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等，这些质疑恰恰反映了西方对我国卫生治理理论和实践的不认同。在应对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修昔底德陷阱”时，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国际话语权和规制权，^③不能对西方卫生治理理论一味排斥或攻击，将当前的全球卫生治理理论体系彻底推翻，亦不能摆出全球卫生新秩序唯一创造者的姿态，否则将跌入理论话语陷阱，导致我国在后续推进工作时遭遇西方的围攻。应当针对现有理论体系中尚有缺漏、还未充分开发的领域进行深耕，尤其应当加强卫生法分支部门理论的研究，丰富国际卫生制度框架，^④如基因安全、疫苗公平分配、公共卫生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

其次，在理论博弈层面，应当保持中国特色卫生法理论自信，在探讨全球卫生治理学术理论问题时，勿将良性理论交锋升级为互相恶意攻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涉及全球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多方面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逻辑延伸，站在全人类卫生健康利益和安全的高度，倡导国际社会协同配合，各方共筑包容开放、共同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具有宏大美好的理想愿景，但该理念能否为西方国家所认可和接纳是我国在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中能否占据主动的关键。一国设想及提出的国际治理理论和观念只有得到国际社会实践的检验，^⑤

^① Iver B. Neumann, “Self and O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 no.2, 1996.

^② 梁爱文：《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进路》，《理论月刊》2020年第10期。

^③ 吴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④ 王明国：《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与构建路径》，《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

^⑤ 陈春会：《新时代文化自信理论的形成和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4期。

才具有普遍的信服度和可供选择的说服力。当前我国卫生医疗水平得到很大提升，法律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正努力从静态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向公共卫生法治体系转变，^①形成的卫生管理、国内卫生法、国际卫生法理论都是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理论资源，也是我国理论界与外国同行交锋的学术手段，必须保持中国特色卫生法理论的自信。^②“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把今天的美国（守成国）和中国（崛起国）直接等同于历史上的斯巴达（守成国）与雅典（崛起国），是对历史的有意歪曲和简单比附。^③应当警惕使理论博弈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应当仅认同或赞扬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治理理论，也应当吸收西方理论中对全人类卫生事业发展有益的部分，避免将理论对话恶意升级为简单的意气之争。

最后，在理论话语风格塑造层面，在应对西方理论的冲击时，应当塑造客观理性的理论话语风格，采取防御型和进取型相结合的理论外宣策略。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中国学派的全球宣传工作，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治理理论出现在西方视野之中。在塑造理论话语风格时，应当从客观事实出发，考察资料数据的真实性和信息源的可靠性。无论是霸权论还是权力转移论，均指出守成国普遍带有较为明显的认识偏见和主观臆断，而安全困境说和身份认同论则体现了守成国在关键利益上的矛盾心态和狼群战术。而全球卫生治理涉及全人类未来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在推动变革时应当持有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④在向全球推广中国特色卫生法理论时，应当采取防御型和进取型相结合的外宣策略。在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国时应当保持谦虚谨慎，持续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思想；在我国涉外卫生活动遭遇攻击时应当采取进取态度，积极运用国际法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的动态变化中求得平衡。基于身份认同论，通过和平方式向其他国家和群体输出具有中国人文关怀的医疗卫生理念，逐渐形成跨群体的思想认同，组织多学科专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向国际理论界宣传我国的卫生治理理论，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⑤

无论西方学者选择哪条支持“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路径，都是要论证崛起国如何处理与守成国在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中的国际关系问题。安全困境说、霸权论、权力转移论和身份认同论均以西方守成国家的视角出发，侧重阐释“国强必霸”议题的某一方面，原因在于不同社会对大国崛起、全球问题治理、国际关系发展规律、国际法治进程的理解存在差异。在应对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修昔底德陷阱”时，我国理论界既不能自说自话、自我表扬，也不能恶意揣度、一味驳斥，应当以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自信包容的竞争方式及客观理性的话语风格回答中国作为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崛起国如何处理好与守成国的关系问题，推动我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和平崛起。

（感谢赖思行同学对本文的贡献）

责任编辑：王冰

① 陈云良：《促进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向公共卫生法治体系转化》，《法学》2021年第9期。

② 韩喜平：《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生成逻辑》，《学术论坛》2019年第4期。

③ 黎海波、宋瑞芝：《“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与战略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9期。

④ 韩庆祥：《“意识形态建设内功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1期。

⑤ 晏辉：《政治传播的哲学基础论》，《学术研究》2017年第12期。

• 治理现代化与区域治理创新 •

制度执行的统筹治理逻辑：基于河长制案例的研究^{*}

吕志奎 钟小霞

[摘要]制度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制度执行过程的纵向、横向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激励与约束。强化制度执行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党建引领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动员与整合治理主体和各种治理资源。河长制是中国流域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创造了党建引领治理机制的中国制度优势效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河湖长制”列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成果。强化制度执行力的关键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本文基于D县河长制实施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纵向分层对接和横向多部门协同共同塑造了河长制制度执行的系统化治理格局，运用党政统筹协调治理机制的嵌入、流域化党建的治理共同体责任体系和纵向闭环管理的整体性治理体系等要素，能够实现多层级治理主体的制度化动员与积极响应，释放制度化治理效能。

[关键词]河长制 制度执行 统筹治理 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 D6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072-06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强调“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昭示我们，强化制度执行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党建引领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国家治理体系才能不断完善，治理能力才能不断提升。从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到各个条线的制度执行，唯有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切实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①

制度在国家治理中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问题。制度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有效执行。制度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制度执行过程的纵向、横向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激励与约束，如何在制度执行中有效动员与整合治理主体和各种治理资源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破解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强化制度执行力研究”(20ZDA1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吕志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小霞，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博士生(福建厦门，361005)。

① 《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4日第5版。

制度执行与治理效能问题。制度执行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治理效能。^①制度执行中存在制度“空转”的问题，需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大局意识、加强执行效能管理等，以增强制度执行力。^②因此，强化制度执行力对于制度效能的彰显至关重要。制度执行是靠政治势能推动的，政治势能通过发文的形式来传导。^③在此过程中，政策环境的营造至关重要。部分学者关注到了我国治理体制的特点，主张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的领导，以增强制度执行力。^④有研究关注了制度执行的主体，主要聚焦于微观层面的个体，认为制度执行面临复杂情形，需要强化主体的担当激励，提高个体主动性，从而激发其责任感。^⑤制度执行必然要求获得多元主体协同，^⑥从而获得多元化的执行资源。提升国家治理制度执行力的关键是要构建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政策执行系统，将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密切联系起来，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⑦

河长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流域治理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完善水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决议》将“河湖长制”列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成果。2016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时间节点，2018年如期全面建立河长制、湖长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省级总河长，省、市、县、乡（镇）四级河湖长共30万名，村级河湖长（含巡河员、护河员）超90万名，实现了河湖管护责任全覆盖。^⑧河长制是以党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河湖治理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的系统。各地以河长制为制度化平台，形成了党政主导、水利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河湖保护治理机制。

河长制的出台反映了我国流域治理中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关制度和政策执行在实践中常常受制于部门间的协调困难。这一重大制度的创建，主要初衷就是促进涉水部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合，提升河湖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保障和促进水治理高效能目标的实现。本文致力于探讨地方在全面推行河长制中如何强化制度执行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制的运行逻辑是什么？通过对河长制制度执行的研究，有利于挖掘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机制的设计原理，同时对于理解并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创新和制度执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二、理论建构与分析框架

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地方在中央和上级的宏观政策因素和激励机制影响下，综合考虑自身的资源条件，因地制宜构建相应的统筹协调治理机制以推进制度落地。现有治理体制中的权责关系配置结构是强化制度执行力需要破解的一个重要问题。条条和块块之间的关系，使得职能交叉重叠，需要通过构建党政统筹机制强化制度执行的政治空间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以提升制度化治理体系应对复杂问题的统筹能力和整体合力。本文基于D县河长制实施案例，探讨多种约束条件下制度执行的统筹协调治理机制及其运行逻辑。

（一）构建流域自然空间上的党政统筹治理机制

流域治理是系统性工程，必须树立系统观念，强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由党政领导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党政统筹协调机构中任职，嵌入现有的流域治理体系，构建流域自然空间上的政治行

^① 杨开峰：《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概念性框架》，《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年第3期。

^② 高小平：《优化机制，增强制度执行力》，《国家治理》2020年第2期。

^③ 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④ 臧秀玲、韩慧：《确立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是加强党对制度建设领导的关键》，《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3期。

^⑤ 李德国、蔡晶晶：《制度执行的复杂性、行为策略与担当激励》，《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⑥ 郁建兴、任杰：《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⑦ 宋雄伟：《提升国家治理的制度执行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28日第1版。

^⑧ 李国英：《强化河湖长制建设幸福河湖》，《人民日报》2021年12月8日第14版。

政组织协作制度，有助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党政统筹协调机构以某一领域的公共事务治理为中心任务，相较于一般的组织结构而言具有较强的灵活性，通过组织动员、责任分配和效能考核、监督问责的形式，将本属于某部门某科室的责任分配给部门第一负责人，并通过党政权威协调各部门行动，突破现有组织体制刚性约束，整合部门资源，完成治理任务。

（二）构建治理任务驱动的跨部门协同网络结构

在执行结构和机制的设计上，以党政统筹协调机制为核心，形成纵向分层对接和横向治理网络两个维度的治理合力来彰显制度优势与释放制度效能。纵向分层对接结构和横向治理网络结构相互贯通、不可分割，二者设计的关键是要建立明确的责任体系和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建立以某领域的专项任务为中心的责任链条，有利于责任的实化，强化制度执行力。纵向、横向设置的组织结构往往是以虚体形式设置，与正式的组织结构形成功能互补。虚体设置的组织结构以某一领域的 工作为中心，得到党政领导的充分赋权，使得组织能力和组织资源得到增强，这是现有体制结构对外部环境复杂性的创新性应对。

表1 制度执行的“党政统筹、多方协同”治理结构

执行结构类型	执行结构特征	协调的媒介	资源的分配
纵向分层对接	党政统筹治理结构	领导制度、行政命令	集中统一调配
横向部门协同	多方协同网络结构	部门整合、协同平台	协商信任共享

注：表格由笔者自制。

“党政统筹、多方协同”治理结构具有两个特点。第一，纵向分层对接结构具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建引领、党政统筹的特点，首先是围绕某一任务领域建立党组织体系，构筑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的治理链条，将党组织的治理体系嵌入行政体系中，改变以往制度执行主体只有政府部门、仅从行政层面来推动所造成的执行力度不足的局面。与此同时，以“闭环管理责任体系”为核心构建行政层级多层次联动治理体系，明确各层级的工作流程和落实各层级主体的权责分配。以业务为中心的纵向虚体设置的结构赋予纵向治理灵活性，对于正式行政体系有重要的补充作用。第二，横向部门协同围绕落实治理任务，以综合协调机构统筹多部门联动为牵引、以数字化治理技术为支撑形成跨部门横向治理网络结构。在横向治理网络结构中，通过整合部门职能组建新机构，建立部门衔接机制以形成工作的连贯性并构建智能化治理平台以实现部门间跨时间、跨空间的联动和业务的数字化治理，提高协同治理效能。

三、D县河长制制度执行的统筹治理结构要素

（一）以“县委河工委”为统筹协调机构强化河长制实施的制度化动员

D县是闽江、九龙江、晋江三大水系支流的发源地，拥有煤、铁、石灰石等42种矿产，被称为“闽中矿区”。D县于2009年开始推行河长制，成为福建省最早推行河长制的地方，受到水利部高度关注和肯定。2018年，D县河长制工作入选改革开放40周年“福建影响力”优秀案例。实践证明，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必须树立全局“一盘棋”思想，建立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的河湖管理保护格局，才能汇聚起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① D县为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于2017年10月建立了县委河长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委河工委”）统筹河湖治理和水环境保护工作，县委河工委下设办公室，与县河长制办公室合署办公。由县委书记担任县委河工委书记，县长担任县委河工委第一副书记，县委副书记担任县委河工委常务副书记，县政府分管副县长担任县委河工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和县长拥有会议召集权、任务部署权、重要事务决策权等。县委河工委是因非常规的治水任务而在行政序列之外设立的党政统筹协调机构，相对于正式的组织结构而言，是以某一专业领域的任务为目标的“虚体结构”，将“条条”的专项任务转化为“块块”的中心任务。县委河工委将任务领域相关的部门尽可能多地纳入其中，进行任务的重新分配，实现职责明确。

① 李国英：《强化河湖长制 建设幸福河湖》，《人民日报》2021年12月8日第14版。

1. 县委河工委通过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制度执行责任的系统性动员。强化全流域系统治理，进一步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流域治理体制机制。D县县委河工委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河长制工作的重大问题、重大事项、重大项目，对全县河长制工作实行统一部署、统一调度、统一考评。^① 县委河工委利用联席会议等机制促进部门间以自愿、平等为原则进行沟通交流、任务分配和责任动员。这种党政统筹协调机构能够有效动员政府、纪检监察、司法、人民团体以及社会组织的力量，整合多方的权力和资源，形成各类主体广泛参与的格局，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县委河工委作为党政统筹协调机制嵌入河长制中，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河湖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发挥中国共产党在跨部门议事和资源整合中的领导作用，协调行政区域内的下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促进了纵向分层对接体系和横向部门治理体系的整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一指挥链条，增强了河湖治理的向心力和系统性。

2. 县委河工委通过职责任务分配和治理效能驱动来激发部门积极性。确定责任主体和主体责任，进行职责任务和资源分配、效能督查和考核问责，才能激发部门的积极性。伴随治理重心的下移，地方执行制度必须配置相应的权力和资源，在考核压力的作用下，地方可能陷入责任大、权力小、资源匮乏的治理困境。D县县委河工委将相关部门纳入其中，重新配置责任、权力和资源，保证权力和资源能随着任务、指示的下发同步传导至各部门，增强部门的组织权力。县委河工委成员包括县水利局、生态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的主要责任人，采取归口管理、分工负责的形式，明确责任主体，实现“任务分配”和“效能驱动”。D县县委河工委整合了党委和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使其在政治和行政层面达成共识、建立共同目标。相关部门依照平等、自愿原则参与河湖治理问题的磋商，促进政策认同，增强了各部门对任务、资源分配结果的认同感。相关部门由于业务的相关性，奖励或问责时往往产生连带影响，继而形成了“效能共同体”。同时，D县县委河工委通过督促检查涉水部门负责人的河湖治理效能，创造了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

（二）以“流域化党建”构建河长制实施的治理共同体责任体系

河长制度执行的纵向分层对接治理结构是在现有的党政责任体制基础上，以河湖治理任务为中心所建构的治理机制，属于虚体设置机制。此类结构并不会破坏原有体制分工，更多的是对正式结构的一种功能性互补。D县为克服流域规则和区域规则不兼容的问题，建立流域和区域治理相结合的组织责任体系，把流域党组织体系嵌入行政河长体系中，通过流域党支部书记与行政河长之间交叉任职的方式，实现流域党组织体系对行政科层体系的嵌入，形成结构的契合。流域党组织体系和行政河长体系共同构成了党政统筹驱动的责任体系有机整体。

1. 以党建赋能流域治理纵向责任体系构建。流域党组织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宏观的方向引领进入到微观治理与党政协同的具体实施机制。在流域治理中，以行政区域管理为主的治理规则割裂了流域水资源间的相互关联性。由于专业分工带来条块分割，从而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而流域党组织体系则不受条块分割组织架构的影响，能够突破横向部门和纵向层级的壁垒，动员行政资源。D县构建了“县委河工委+流域党委+河流党支部+党小组”四级联动的流域党组织协同治理体系。流域党组织体系是增强党领导河湖事务的组织力和领导力的具体实施机制。D县以党建赋能河湖纵向治理，建立流域党组织责任体系，突破行政界线，形成了以流域为单元的治理结构，促进条块联动。D县设置两个流域党委，流域党委书记分别由县委副书记和分管副县长担任。设置17个河流党支部，将党支部建在河道上，河流党支部延伸到了河流的左右岸、干支流，打破了行政区域界限，以流域为载体构建党委统一指挥的全流域系统治理链条。

以行政区域管理为治理逻辑使得流域上下游在水资源开发、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存在利益分歧，只考

^① D县河长制办公室内部文件：《中共D县河长制工作委员会简介》。

虑本行政区域的利益而忽略其他区域的利益，造成行政区域割裂流域整体性。而“县委河工委+流域党委+河流党支部+党小组”四级联动的党组织体系的运作以流域为基础，弥合流域被行政区域割裂的权力空隙，解决上下游协同治理难题。河流党支部书记由所流经乡镇党委书记担任，纵向建立了党委统一指挥的治理链条。流域党委会议和河流党支部联席会议可召集上下游乡镇、村庄主要负责人，协商解决整个流域治理问题。河流党支部还通过区域化党建的方式，整合区域内的乡村党组织和相邻乡镇党组织，实现“跨村联建”和“跨乡联建”。流域党组织体系联动各级地方政府的同时，也带动了横向各行政区域的协同，打破了传统的行政辖区界线，形成全流域系统治理格局。

2. 建立权责利分配的闭环管理责任体系。D县为落实各级地方政府的河湖治理责任，一是分级分段设立行政河长，二是通过闭环管理流程理顺上下级政府职责分配。从纵向来看，D县流域治理的主体涉及县、乡（镇）、村三个层级。D县设置行政河长依据属地管理原则，便于流域公共事务的行政分包，而建立闭环管理责任体系则遵循职责不转移原则，将责任落实到行政河长和相关部门第一负责人。D县在县、乡（镇）、村建立三级河长体系。由县委书记和县长担任县级总河长，由各乡（镇）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任辖区总河长，由各乡（镇）驻村领导担任所挂包村河长，村两委成员担任河段长，将各级的党政领导纳入行政河长体系，有利于权责的层层分解。

D县为加强河道问题处置力度，明确河道问题处理工作流程，于2018年出台了《D县河道问题闭环管理工作办法（试行）》。河道问题处理的闭环管理工作体系分为小闭环、中闭环、大闭环。在小闭环中，以河道专管员作为问题发现的主要触角，问题自下而上逐层处理，逐级上报。先由河道专管员巡河发现问题，自行处理，处理不了的交由河段长和村级河长进行协调。各级河长办负责协调本级相关部门处理管辖范围内的问题，处理不了的再上报到上一级的河长办。当涉及跨县或跨市流域问题时，再上报到大闭环。闭环管理体系为河湖问题的“发现—解决”确立了清晰流程，使得各级河长的责任落实有章可循。各级河长办在闭环管理中发挥起承转合作用，实现“条条”和“块块”的勾联和对接，充当信息传递者、任务分配者以及纠纷化解者的角色。

（三）以“整合式治理”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响应机制

D县河长制度执行的横向网络结构呈现独具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同整合式治理特征，即以县委河工委为党政统筹协调机构，以河长办为协调平台，以牵头部门为主要参与者，以涉河涉水相关部门为协同治理主体，形成了包括环境执法层面的部门整合、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在内的整体性治理格局。

1. 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县生态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执法权涉及环保、水利、农业、交通、建设等多个职能部门，各部门在职能交叉领域出现“谁都能管，谁都管不好”的局面。为提高行政执法效能，D县集中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职责，交由一个新的部门——生态综合执法局统一行使。D县生态综合执法局是在2012年12月经省、市政府批准，在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的基础上集中水利、国土、环保、林业、矿业、安监等部门在生态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权，成立的全省首家生态环境领域的执法部门。生态综合执法局整合了分散在农业、水利、建设等部门的执法力量，组建了规范化的执法队伍。为进一步深化职能整合，根据市编委办于2020年2月印发的《关于核定S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事业编制的通知》要求，D县进一步集中自然资源、水利、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执法职责，划归县生态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执法职能的整合改变了以往多支执法队伍分兵作战的局面，对职责边界进行重新厘清和安排，解决了因多个执法主体带来执法依据多样、执法主体不清晰的问题，提高执法效率。

2. 构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由于流域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外部性，影响了一些部门的治理意愿。通过建立跨部门衔接机制，相关部门可就协同内容、成本分担以及矛盾纠纷进行沟通，达成共识，整合资源，提升协同治理效能。D县建立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构建生态环境执法和司法保护一体化智能治理平台。具体内容包括：设立固定的机构、配备固定的联络员来实现部门的常态化协作。县生态综合执法局组建执法大队、县公安局成立生态侦查大队、县检察院

成立生态检查室、县法院成立生态环境审判庭，四个部门还配备了专门的联络员进驻“生态环境保护指挥中心”集中办公，建立“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网络治理平台，通过数据运行突破组织结构壁垒，实现跨部门信息整合、业务联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将行政权、执法权、检察权、司法权整合到一个链条中，建立了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信息通报和信息交流机制、线索移送制度、重大案件通报咨询制度及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监督和审查机制，提升违法犯罪问题发现、查办、审判、结案全流程效率。

四、D县河长制度执行的统筹治理逻辑

(一) 党政统筹驱动多层级通贯治理与系统化治水格局

设立党政统筹协调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依托党政领导体制打造上下贯通、层层落实的善治指挥链条，推动制度有效执行。县委河工委把坚持党的领导融入到河湖治理各方面、全过程，重塑了党领导河长制实施的体制机制。县委河工委作为D县河湖治理的政治领导力量，以高级别的协调权对职能部门进行协调与整合，对部门权力和责任进行重新界定，催生多层级治理主体的制度化、组织化响应。通过分工和定责，清晰化河湖治理责任链条，避免责任被现行运行体制的组织分工所模糊。在党政统筹的领导结构中，党政同责的责任体系解决了“谁来干”的问题，充分调动纵向各层级和横向各部门制度执行的积极性。党政领导基于组织人事权的权威基础，建立了“依重点任务提拔”的可置信承诺，增强了相关部门制度执行的积极性。^①此外，县委河工委还负责跨区域、跨部门的统筹协调，统筹各类规划、资金、项目的使用，为各部门的制度执行增加权力和强化资源。县委河工委吸纳了组织部、效能办负责人在其中任职，有利于激发部门的执行动力。

(二) 流域党建赋能区域化协同和跨边界治理责任整合

传统行政边界与河流的跨境流动范围不匹配，造成了流域治理的制度困境。流域党组织体系通过建立“县委河工委+流域党委+河流党支部+党小组”的联动体系，指定高级别的党政领导对河流治理负总责，产生跨界权力，超越现有的流域和行政区域不匹配的难题，促进不同区域主体间的协同。流域党组织体系和行政河长体系共同构成了流域治理的纵向责任体系，实现责任体系垂直整合。D县通过流域党组织书记与行政河长交叉任职的方式，将流域党组织体系嵌入行政河长体系中，强化党组织对河湖治理的全面领导，深化纵向层级和横向部门协同推进河长制实施的动力。流域党组织体系发挥了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产生了超越层级导向和突破区域界限的制度执行力。通过党建引领，将党的领导延伸到村庄、社区等，将流域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生态治理共同体。

(三) 信息技术赋能治理智能化和数字化治理效能释放

D县采取部门整合、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智能化网络治理平台等协同机制将全流域内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执法部门、司法部门联合起来，形成多重协同网络。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生态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局、公安局、检察院及法院之间建立工作衔接机制，成立生态环境执法和司法保护一体化智能治理平台，将密切合作的部门整合到一个公共治理空间内。生态环境保护指挥中心通过智能化网络治理平台对河湖问题进行分析，可实现河湖问题数字化展示、信息化管理，智能化治理平台具有数据统计、数据查询、工作交流等功能，亦可对全县河长和河道专管员进行管理，实现任务的调试派遣、部门的统一调度和监督履职。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网络治理平台的建立，强化了相关涉河涉水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信息传递，减少了因政府部门的“内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推诿扯皮的问题，使得部门职能碎片化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向着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高效能治理体制转变。

责任编辑：王冰

^① 高翔、蔡尔津：《以党委重点任务为中心的纵向政府间治理研究》，《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4期。

社会组织党建中的借力逻辑：以广州D社工机构为例^{*}

张紧跟 庄少英

[摘要]社会组织党建是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体现。既有的政党中心论视角主要强调了党自上而下推进社会组织党建的政治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组织能动性。广州D社工机构这一案例从行动和结构两个层面揭示了社工机构主动推进党建工作的内在逻辑。通过借力于党建，既夯实了社工机构的政治合法性，又增强了社工机构的资源聚合性。这一发现既有助于深化对社会组织党建中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统一性理解，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关于社会组织党建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创造力的研究。

[关键词]社工机构 党建 借力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32.9;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078-07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组织党建持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内容。与之相应，社会组织党建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议题。从既有研究来看，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党与社会关系、中观层面的党与社会组织互动，还是微观层面的社会组织党建过程都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①但既有社会组织党建研究的政党中心论视角在相当程度上对社会组织能动性缺乏应有的重视，将社会组织党建简化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统合过程。社会组织党建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社会组织党建实践过程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一些社会组织积极主动地开展党建，而另一些社会组织仅仅满足于党建基本要求，甚至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回避党建工作。^②因此，社会组织党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双向互动的过程，除了从政党中心论视角来展开研究之外，还应立足于社会组织视角来展开讨论。立足于社会组织自身来思考社会组织党建，不仅有利于更精准地把脉社会组织党建过程，而且有利于更有效地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目标。

为此，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广州D社工机构为例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第一，社会组织如何积极开展党建工作？第二，社会组织为何会积极开展党建工作？第三，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党建工作意味着什么？案例研究中的一手资料来自于研究者持续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案例研究中的二手资料主要来

^{*}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州提升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效能研究”(2022GZYB6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紧跟，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庄少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广东广州，510006）。

① 刘蕾、邱鑫波：《我国社会组织党建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基于中文核心期刊（2000—2019年）的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② Lin Nie and Jie Wu, “Strategic Responses of NGOs to the New Party-Building Campaign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vol.36, 2022.

自于相关政策文本、媒体报道、社工机构内部工作总结、学术研究文献等。

二、文献综述

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关切点，社会组织党建持续成为社会组织研究的焦点和热点议题。一方面，研究者立足于政党中心论来探讨社会组织党建。首先，有研究认为社会组织飞速发展给执政党带来了一定冲击和影响。^①这些冲击具体表现在社会性、政治性、行为方式和政党认同等方面。^②其次，有研究将社会组织党建理解为政党调适的具体方式。在对社会变化进行预判基础上，社会组织党建是党延续其使命所采取的政治整合策略。通过社会组织党建，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和价值传递作用，改变了传统的双重管理模式，而资源渠道的建立与政治吸纳使政党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统合。^③通过社会组织党建，中国共产党将社会组织“编织成组织化社会网络，形成统合性需求和供给信息资源系统。”^④最后，有研究还梳理了社会组织党建面临的困境，存在着党组织覆盖率提升与功能作用强化不同步现象，党组织虚置或空转等问题凸显。^⑤必须同时采用观念、机构和行动整合，^⑥或通过制度建构、策略转向、结构嵌合、业务嵌合和文化嵌合来构建“嵌合式”党建模式。^⑦

另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党建中的社会组织能动性。首先，有研究强调社会组织党建的学术认知不应囿于政党中心视角。有研究显示，中国社会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⑧表现为党建中的社会组织能动性。^⑨其次，有研究分析了社会组织对党建的差异化策略。有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采取了默许、妥协和回避三种策略，而这取决于社会组织与政党和国家体系的利益相关性。^⑩最后，有研究分析了社会组织主动开展党建的动因。有研究从资源依赖、政治嵌入与能力建设三个维度剖析了社会组织开展党建的动力。^⑪有研究将社会组织开展党建的动力归结为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的耦合。^⑫有研究认为党建成为社会组织超越资源依赖、实现资源拓展的重要渠道，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则是制度契合和资源拓展。^⑬

毋庸置疑，既有研究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主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但最终依然回归加强对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引导其正确政治发展方向等政党中心立场；有学者虽然意识到社会组织在党建中的能动性，但聚焦于党社互动过程中的资源依赖、政治嵌入对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影响的微观机制。^⑭总之，既有研究依然缺乏对社会组织主动开展党建的动因分析。因此，通过深入观察和思考广州 D 社工机构何以主动开展党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案例描述：D 机构主动开展党建工作

早在 2004 年，广州市就决定把社会组织党建纳入区域化管理，并于 2010 年成立广州市社会组织党

① 林尚立：《两种社会建构：中国共产党与非政府组织》，《中国非营利评论》2007 年第 1 期。

② 罗峰：《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执政党的组织嵌入——政党权威重塑的社会视角》，《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 年第 4 期。

③ 李朔严、王名：《政党统合与基层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 年第 2 期。

④ 诸松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演进及其逻辑》，《探索》2020 年第 4 期。

⑤ 唐兴军：《从嵌入耦合到驱动引领：社会组织党建的逻辑与路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⑥ 崔开云、徐勇：《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问题分析——基于观念、机构和行动的综合性视角》，《教学与研究》2018 年第 6 期。

⑦ 肖金明等：《从“嵌入”走向“嵌合”：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创新探析》，《中州学刊》2021 年第 4 期。

⑧ 郑广怀、张政：《社会工作机构何以向劳务公司转变——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21 年第 4 期。

⑨ 李健、郭薇：《资源依赖、政治嵌入与能力建设——理解社会组织党建的微观视角》，《探索》2017 年第 5 期。

⑩ Lin Nie and Jie Wu, “Strategic Responses of NGOs to the New Party-Building Campaign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vol.36, 2022.

⑪ 李健、郭薇：《资源依赖、政治嵌入与能力建设——理解社会组织党建的微观视角》，《探索》2017 年第 5 期。

⑫ 葛亮：《制度环境与社会组织党建的动力机制研究——以 Z 市雪菜饼协会为个案》，《社会主义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⑬ 沈永东、虞志红：《社会组织党建动力机制问题：制度契合与资源拓展》，《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 年第 6 期。

⑭ 李健、郭薇：《资源依赖、政治嵌入与能力建设——理解社会组织党建的微观视角》，《探索》2017 年第 5 期。

工委，2012年更名为“社会组织党委”。2013年6月，成立“两新”党工委，通过“红苗工程”和“红联共建”等工程，实现了全覆盖。截至2020年1月，广州市登记8144家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1264个，管理党员14173名。市和各区均成立了社会组织党委，其中市社会组织党委直接管理党组织132个（包括3个行业党委），覆盖370个社会组织，管理党员741名。^①截至2020年12月，广州市共有社工机构336家，持证社工达2.1万人。其中现有在职党员720人，建立社工服务机构独立党支部88个，联合党支部28个，社工服务站党支部36个，开展党建服务项目203个，拥有广州社工红棉守护行动和广州社工红联共建行动两大党建品牌。^② D社工机构于2012年组建成立党支部，现有党员12名。该机构党支部因其党建工作方面的表现，于2019年被评为广州市先进党组织，2020年又被评为广州市社会组织党建示范点。具体而言，D社工机构采取了如下主要措施来积极开展党建工作。

1. 强调社工机构与党建的“融合”。在社工机构中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主要路径。组织建设是党建工作的基础，也是实现党建有效覆盖的基石。在许多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过程中常见的“重建党、轻党建”现象，在D社工机构中却是另一番景象。首先，D机构力求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机构发展同频共振。虽然机构创始人之一的L教授本身是民主党派人士，但身为理事长的她却提倡在机构中建设“红专能”社工队伍，将支部人才培养与机构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在重视业务骨干培养的同时，高度重视抓好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工作，仅在2021年就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2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6名。D社工机构党支部牵头组织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团员、职工等共12个项目。其次，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与社工岗位职责有效结合。D社工机构重视党组织的活动开展、党员教育等，并为此积极搭建相应平台。机构设置有专门的党员活动室，依托“市社会组织党建展览馆”“红色教育基地”“学习强国”APP等平台线上线下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教育活动。推出机构自主的“党建·每日一学”活动，截至2021年7月，已开播共562期，并出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辑1期。支部书记、委员、党员多次参加了广州市社会组织党委、广州市社会工作行业协会党委、荔湾区社会组织党委、西村街道党工委分别举办的各种党建相关的学习培训。最后，D社工机构着力于社会工作与群众工作的结合，以突出党建引领作用。社会工作虽然更侧重于个人能力建设，践行“助人自助”的理念，为基层社区居民提供相应的服务和资源。但也能搭建基层社区治理的平台，引导社区居民或“自组织”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从而将分散的社区资源聚合起来，为社区提供更多服务。这一特征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群众工作有很高的契合度。如D社工机构的社工站负责人C先生提及党建实现后的机构变化时，认为社工们提高了对基层群众工作的关注：“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社工从专业角度出发，自下而上地强调居民需求、社区需求，然后去开展服务、开展项目。但自从有了党建引领之后，因为对机构要实行双向需求评估，机构目标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访谈纪录，GZ20201123）

2. 突出党建引领作用。有研究发现社会组织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不强，日常生活中党员吸纳、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都存在着不足。^③ D社工机构则通过坚持突出党建引领作用，以化解这一困境。首先，突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由社工机构总干事兼任机构党支部书记。社会工作机构的内部结构并不像党组织结构那么严密，虽有完整的内部组织结构，却是一种相对松散的状态。虽有理事会，但实际机构的运营和管理却主要是由总干事负责。而且机构的运营通常以项目为主导，每个项目有相应的项目服务部，也有负责的项目主管，项目与项目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原本党支部与各个项目部并没有直接联系，但由总干事同时兼任党支部书记，由此间接为党支部与业务部门建立起联系通道，理顺社工

^①《广州市社会组织党委：深化“红苗工程” 打造“双强共同体”》，广东省民政厅网站：http://smzt.gd.gov.cn/mzzx/sxdt/content/post_2875569.html，2020年1月19日。

^②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广州市社会工作发展报告（2020）》，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21年，第53页。

^③李少斐：《“两新组织”发展党员的动力与阻力》，《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1期。

业务与党建的关系。其次，突出党员社工的先锋模范作用。D社工机构通过设置党员社工先锋岗、党员联系群众等硬件和制度，在服务上坚持党员社工走在第一线，亮出党员身份，突出党员社工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党员社工服务队走进社区，使“红专能”队伍成为该机构的一大特色。如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中，D机构这支“红专能”队伍就发挥了很大作用。由党员带领机构其他社工投身疫情防控前线，参与“三人小组”行动，积极协助街道、村居全力做好核酸检测、入户扫楼、防疫资讯提供、隔离人员情绪安抚、生活物资保障、药物派送、困境人群送餐送物、危机个案跟进等，总服务人次达43万。特别是在高风险区N街道积极参与前线抗疫工作，这支“红专能”队伍得到N街道办事处高度认可，向机构颁发了纪念牌匾和感谢信。最后，突出党建的引领作用。D社工机构不仅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机构发展同频共振，由总干事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还将优秀党员吸纳进机构的管理层或理事会。现在机构管理层中有近三分之一人员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充分发挥好政党的组织优势，通过党员社工的示范带动，让党员干部成为促推机构发展的“领头羊”。机构管理层中党员比例的提高既突出了党员社工的先锋模范作用，也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织在社工机构运营中的定位和作用，突出了党建引领作用。

3. 不断探索党建新模式。D社工机构通过多年的实践，逐步在机构发展中探索出“127N”的党建工作模式。其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党建引领贯穿机构整体中心工作，在各个服务项目环节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其二是依托社工服务站及禁毒专项服务站为两类红色阵地，大力培育“红专能”社工队伍；其三是从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学习教育、制度规范、阵地建设、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及作用发挥、专业品牌创新、党建带群建等七大方面狠抓落实，推进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其四是以N个社工服务项目为依托，搭建N个为民服务平台，发挥社会工作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困难人群兜底服务、社区治理、禁毒工作等中的专业优势作用。这一模式集中表现出D社工机构在行动上积极主动开展党建工作的能动性，不仅将党建嵌于机构建设中，还将党建嵌于机构的具体服务中。此外，在行动层面更强调与政党意志的一致性，紧跟基层党组织政策和文件要求，开展机构相应的活动。如2021年3月26日，D社工机构与C街道机关党支部、C街“两新”组织共同协办“学党史悟思想，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帮扶送温暖活动。同时，D社工机构提出社会组织“党建+”扶贫创新模式，以党建带动全体党员和社工投入脱贫攻坚服务中，并因此获得“广州市参与脱贫攻坚先进社会组织党组织”称号，获颁“广州社会组织脱贫攻坚捐资助力单位”牌匾。从该机构2021年的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机构落实党建工作要求的积极表现：充分发挥社工服务站党支部、禁毒专项服务站党小组两大红色阵地作用，把“党建引领为民解困”思想贯彻到为民服务全过程，积极参与国家民政部组织的“牵手计划”、广东社会组织支援“三区三州”建设专项行动、贵州毕节市结对帮扶、广州市特殊困难群体帮扶、从化乡村振兴等帮扶活动。

四、D社工机构为何主动开展党建

正是因为D社工机构通过将机构建设与党建融合、在日常运营中突出党建引领作用、不断创新党建新模式，所以D社工机构及其社工先后荣获广州市社会工作行业“先进党组织”“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多项荣誉，成为广州社会工作行业中党建的先进典型。那么，为何D社工机构会主动开展党建？D社工机构党建的开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这一政治话语的具体反映。但是，基于社会组织能动性，D社工机构主动开展党建有其内在的实践逻辑。尽管社工机构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和各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强力推动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已经被党和政府纳入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制度框架和主流话语体系，但依然面临着合法性和资源匮乏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的认同隔阂、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整合失调、专业合法性与职业合法性的衔接脱节，^①

^① 张超：《身份焦虑：社会工作机构的合法性困境及其突破》，《社会工作》2017年第1期。

导致社工机构因缺乏合法性而在运营中“悬浮”于社会之上。另一方面，社工机构也面临着资源缺乏的发展困境。^①资源短缺加剧了社工机构对政府的依附性，弱化了社工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不利于其良性发展。^②显然，要激发社工机构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活力和创造力，必须突破其所面临的双重发展困境。因此，对社工机构而言，借力于党建，是其在社会治理新格局中校正方向、找准定位和汇聚资源以实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方面，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通过将组织发展嵌入到党建之中，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通过党建引领下的资源整合，有利于缓解自身的资源困境。如图1所示，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工作体系，增强了资源整合能力，获得了机构发展中所需要的合法性和资源。

1. 结构借力：夯实机构的合法性。众所周知，在中国现有制度环境下的社会组织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获取作为其在社会立足“通行证”的“合法性”。而要获得合法性身份，需要获得国家的“象征性符号”。^③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社会工作，从发展之初就面临着政治和社会的双重认同困境。政府和社会对作为一个职业和专业的社会工作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认可，甚至面临着社工机构的一些从业人员的“承认”困境，专业化和本土化发展都受到限制。

为此，一方面，D社工机构将机构建设与党建融合，为其获得了合法性的象征。对于D社工机构而言，获得合法的政治身份实质就是获得了进入政治体系的“通行证”。因此，D社工机构乐意在行动中突出党建引领作用，让社工党员走在第一线，并对亮明党员身份提出明确要求。更重要的是，D社工机构通过将机构发展与党建融合，为其获得了“准体制性身份”。这在相当程度上夯实了D社工机构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不仅有利于其在社区中争取来自居民、社区企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等主体的认同与信任，也有利于增进其工作人员的“承认”。

另一方面，借助于党建，提升了D社工机构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通过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于是，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社会”二元框架开始向“党—国家—社会”的三元框架转型。这种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有助于弱化此前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社工机构对政府部门的结构性依赖，有助于提升社工机构的重要性。在原有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社工机构经由政府购买服务进入基层社会治理之中。而通过积极开展党建，社工机构使专业社会工作主动整合基层党政资源、聚焦社区生活实践，重塑和优化了社区治理结构。^④在党建引领之下，D社工机构不仅实现了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而且更加注重“从居民中来到居民中去”。于是，D社工机构积极推进党建所引发的社区治理结构变化（如图2所示），不仅突破了其与政府职能部门单一联系的局面，而且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社工机构不只是为自身生存而进入社区，而且能秉持“以服务社区居民为本”。这是因为，社工机构中的党组织通过链接和协调政府与社工机构间的关系，可以弥合政府部门与社工机构的合作因地位不平等所产生的缝隙。^⑤更重要的是，D社工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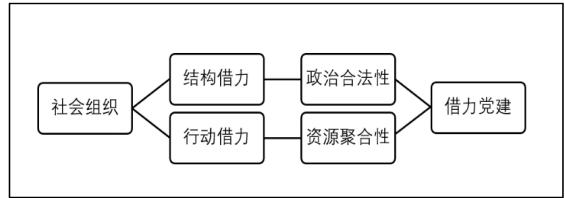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组织党建中的借力逻辑

^① 汪徐秋林：《14%社会组织生存堪忧，面临倒闭——“第三部门”疫后求生》，《南方周末》2020年8月13日专题版。

^② 谢敏、吴中宇：《资源依赖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策略研究》，《理论月刊》2016年第10期。

^③ 袁明：《政府购买服务中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综述》，《理论与现代化》2019年第6期。

^④ 徐选国、黄景莲：《从政社关系到党社关系：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情景变迁与理论转向》，《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⑤ 胡辉华、张丹婷：《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社会组织党建及其面临的挑战》，《新视野》2020年第3期。

构在基层社区发展目标制定、社区居民利益表达和聚合、社会化动员等诸多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伙伴”。因此，借力于党建，为社工机构赢得了更多机会空间，推动了其自主性成长，从而增进了社会认同。

2. 行动借力：增强机构的资源聚合性。在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中，资源依赖始终是一个突出问题。有研究认为社会组织在资金资源等方面对政府构成的必要性依赖，限制了其独立寻求治理空间。^①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资源依赖，这对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能力成长产生不利影响。当社会组织在获得最初的生存支持之后，会更多考虑如何增强多元资源聚合性以实现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拓展。而借力于党建，社会组织通过撬动其发展所需要的人、财、物等资源，不断增强自身资源拓展能力，无疑有助于缓解其“资源依赖压力”。这是因为，在积极开展党建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给予社会组织领导人以政治身份，不仅增强其政治资本、扩展其社会网络，而且有助于提升其资源聚合能力。^②

一方面，D社工机构利用专业化特点及优势，转化为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通过党建平台链接新资源。具体而言，针对社区内不同群体的需求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使D社工机构成为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因此，社区党委或相关行业党委会要求D社工机构能充分利用基层社区中的基层党组织，发挥中国共产党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促使社区党员参与社区建设。于是，D社工机构被塑造成为激发党员参与和引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平台。与此同时，在积极推进党建过程中，D社工机构因应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和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政策目标，不仅注重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共治，而且更加注重居民需求及社区生活实践，这无疑拓展了D社工机构的发展空间。如利用“百梯万人”党旗红旧楼宇加装电梯项目，D社工机构充分发挥“区—街—社区—网格—楼宇”五级党组织和党员作用，成功破解了老旧楼宇电梯加装难题。而通过开展一系列回应社区居民诉求的具体服务项目，D社工机构既与基层党建工作和群众工作有机整合，也使其专业化服务得以有效实现。两者结合最终让D社工机构在具体项目行动上实现“借力于党建”，获得更多和更稳定的资源，为自身发展获得更大空间。

另一方面，D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实现与社区多元主体的联合，形成了强大的聚合力，能更好地汇聚资源。D社工机构积极开展党建工作，不断强化对社工机构的党建引领，使社工机构突破了以往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界限，与社区公共事务中的基层政府、其他社区组织、社区居民间增加了新联结纽带。让社工机构不再囿于与某些政府部门的依赖关系，不必仅仅围绕着某个特定的政府机构而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也无需在政策和制度上更积极地依附于政府去获得所谓的“依附性自主”。^③作为广州市“红联共建”的试点机构之一，D社工机构充分利用党建平台，主动搭建共建平台，与社区内近30家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签订“红联共建”协议，成立“1+N”扶贫帮困联盟。以党建作为链接资源的新平台，充分发挥与共建对象各自专业优势，围绕困境家庭、留守儿童和长者、特殊人群的生计维持、疾病救助、就业增收、心理矫治、流浪救助、助学帮扶等共同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活动。既较好地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又增强了社工机构的资源聚合性。因此，D社工机构充分利用党建枢纽，把分散在社区的多元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这些分散在社区中的组织和个体或拥有社会地位与资金，或拥有人力与专业资源，党建引领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打造了资源整合平台，更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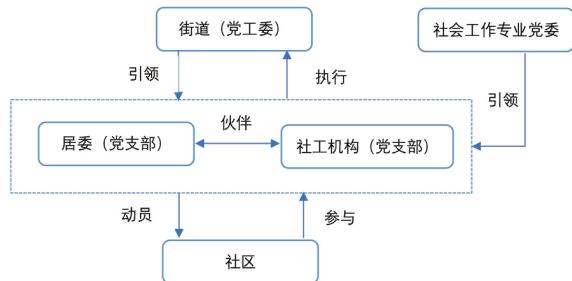


图2 党建引领下基层社区治理结构

① 孙欢：《资源依赖：我国社会组织自治权保障的一个框架》，《甘肃理论学刊》2017年第1期。

② 李健、郭薇：《资源依赖、政治嵌入与能力建设——理解社会组织党建的微观视角》，《探索》2017年第5期。

③ Lu Yiyi, "The Autonomy of Chinese NGOs: A New Perspectiv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5, no.2, 2007.

提升了社工机构的组织力、服务力和影响力。

总之，D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赋予了社工机构以政治身份，提高了社工机构的政治地位，为社工机构嵌入基层治理体系提供了制度化渠道，缓解了其外部合法性不足的发展困境。D社工机构还借力于基层党建的系列组织活动，如三会一课、党员党情定期分析、民主评议党员、发展有政治觉悟的业务骨干、关爱机构成员等，不仅有助于通过机构成员之间的频繁互动交流提高社工机构内部的协作水平，而且有助于增进机构成员的组织认同度、参与度与归属感，从而巩固了社工机构的内部合法性。D社工机构借力于党建，不断完善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高社工机构的运作效能，最终不断增强社会资本、扩展社会网络，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发展空间。社工机构党建在强化党对基层社会政治整合的同时，也使社工机构反向性地嵌入到党的组织体系或者“体制”之中，借力于党建所带来的资源展现出了社工机构拓展行动空间和达成自我目标的自主性活力，有助于共同形塑一种基于互惠性关系纽带的共同体。^①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广州D社工机构将机构发展与党建融合、突出党建引领作用、不断创新党建模式来主动推进党建的案例回溯，发现了社会组织主动推进党建的借力逻辑。社工机构在面向社会提供专业化服务过程中，借力于党建引领，在积极回应党和社会需求的基础上，缓解了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合法性和资源困境。从结构来看，社工机构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由此获得了重要的政治资源，夯实了机构的政治合法性，进而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能够更为充分地扮演“治理伙伴”的角色。从行动来看，社工机构落实党建工作要求并不只是基于特定政治压力下的反应，而是充分利用基层党委和政府部门的“注意力分配”，在项目和服务中突出党建元素，以在更大空间中拓展机构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不断提高其执行力、服务力和影响力。

上述发现意味着，一方面，有助于深化社会组织党建中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统一性研究。本文立足于社会组织视角，发现社工机构具有主动推进党建的内在动力，通过结构和行动的借力，使机构发展与党建同步，不仅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促进了社工机构的专业化成长。社会组织党建既能够将社会组织塑造成为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战斗堡垒，确保了社会组织的正确发展方向，又能够促进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成长和活力释放。因此，社会组织党建能够实现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化社会组织党建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创造力研究。政党中心视角的社会组织党建研究，不管是政党统合观点，或是“双向嵌入”、赋权增能观点，都突出了党组织“全覆盖”而忽略党建工作开展过程中社会组织的能动性，无助于在当代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性制度环境中让社会组织原本受限的自主运作空间得以拓展。^②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社会组织能动性，通过增强社会组织组织力、行动力、影响力进而激发其活力与创造力来促使社会组织主动开展党建，无疑是提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质量的关键要素。为此，新时代的社会组织党建，必须在实现“全覆盖”和强化政治统合功能的基础上，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使其能在公共治理、政治整合、政治监督与民主协商等中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③

责任编辑：王冰

^① 唐文玉：《借力于政治的嵌入式发展——“党社关系”视域中的民办社会组织发展考察》，《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② 沈永东、虞志红：《社会组织党党建动力机制问题：制度契合与资源拓展》，《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③ 唐兴军：《从嵌入耦合到驱动引领：社会组织党建的逻辑与路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福利国家模式、增长悖论与再平衡： 对中国现代化及共同富裕的启示

袁富华 吴湛

[摘要]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创造，福利国家模式确立的初衷旨在达成兼顾效率公平的社会进步秩序。但这种基于福特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自身蕴含了一个增长悖论，即经济增长可能引致更多的福利支出需求，福利负担的加重反过来会削弱经济增长和福利支出的基础。19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服务化、老龄化使得增长悖论凸显，各国不得不在财政约束、收入公平和就业增长“三难困境”中做出权衡，由此持续至今的结构改革加剧了福利国家模式分化。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福利国家模式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有诸多启发价值。

[关键词]现代化 福利国家 福利组合 均衡社会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085-11

二战后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的转型，大致沿着强、中、弱三种理论版本展开，其共同点是重视均衡社会的重要性。一是加尔布雷斯的强理论版本，即垄断资本的权力与控制。在丰裕社会概念下，加尔布雷斯提出均衡社会的图景，即私人投资与国家公共品提供之间的平衡。新工业国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大型企业成为主导甚至取代市场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生产体系对消费体系或总需求的控制，国家和消费者成为资本谋利的工具。^{①②}二是法国调节主义的中理论版本。该理论以劳资关系在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中的决定性作用为立论依据，从福特主义工业化的制度互补、系统调节角度给出福利国家内部矛盾的动态分析。其认为福特主义第一次创造了自己的消费模式，在经济社会协调机制的理解上与加尔布雷斯存在相似之处。三是福利国家理论的弱理论版本。该理论在最近30年的发展中，发生了与调节主义相互融合的趋势。它基于国家、市场（企业）、家庭的组合，对福利国家结构进行分析，以社会权利的分配为研究重心，并将效率分析隐含在福利组合之中。这种理论试图以福利国家的建设缓和阶级冲突，并以阶层或群体概念替代阶级概念。但福利国家作为法治国模式，从其确立之初（二战后黄金时代）便蕴含了“增长悖论”：更多的经济增长可能引致更多的福利服务需求，同时也增加了提供服务的费用，反过来又会削弱这些活动的筹资基础。这个悖论导致了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的不可持续。1980年代以来，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向积极福利国家模式转型，福利组合结构在各国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显著。面对“财

作者简介 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36）。

① Galbraith J. K., *The Affluent Societ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1, Chapter X VII.

② [美]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1-3页、第301-307页。

政收支平衡、收入公平、就业增长”的三难困境，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换取财政平衡和就业增长；社团主义福利国家以牺牲就业增长为代价，换取财政平衡和公平；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以牺牲财政平衡为代价，换取就业增长和公平。这些困难与再平衡发生在城市化、服务业和老龄化趋势之下，而这些趋势和挑战恰是中国迈向高质量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明确了共同富裕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图景，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考察，获得一些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启示。

一、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均衡社会模式的确立、结构及变化

二战后，随着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和制度完善，福利国家作为一种替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模式在发达国家确立。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福利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受到了理论关注。比如，法国调节主义称之为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以区别于泰勒主义及以前的自由主义模式，这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消费调节方式的演化而言的；新发展主义称之为社会发展型资本主义（1940—1979年）、食利者—金融家资本主义（1979—2008年），以区别于自由竞争产业资本主义（1834—1929年），这是就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导力量的演化而言的（Bresser-Pereira, 2017）；^①哈贝马斯称之为福利国家范式、程序主义的法治国范式，以区别于自由主义的法律范式，这是就资本主义民主规范模式的演化而言的；福利国家理论重新定义了福利国家，称之为一种维持凝聚的积极力量，以区别于福利体制作为工业化副产品的视角，这是就资本主义权利体系演化而言的。因此，上述几种理论中的福利国家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工业化的黄金时代（1950—1970年代），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快速建成为标志，即福特主义主导的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建设时期；第二阶段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后，至今仍然处于过渡、整合与调整阶段，以新自由主义和去管制化思潮的兴起为标志，即后福特主义主导的积极福利国家探索时期。

（一）福利国家发展引致的理论视角的变化

1. 原则。自由竞争产业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建立在劳动力市场、金本位、自由贸易三大原则之上（波兰尼，2017）。^②这套原则在1830年代确立，经历了百年发展，但未能经受住大萧条的打击，最终被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模式取代。为了适应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福利国家的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权利、去商品化、阶层化三大原则之上（Esping-Andersen, 1990），^③目的是通过再分配促进公平与效率、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社会权利是去商品化和阶层化的制度保障，^④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成为福利国家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核心标志。

2. 调节机制。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调节机制，是国家对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竞争的保障。这个机制蕴含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三个假设：自由竞争实现市场出清，促进社会总体福利增长；普遍平等权利保障名义上的社会公平，促进财产平等分配；市场主体具有追求平等的能力，能够抵抗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与之不同，福利国家的核心调节机制是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三方互动关系，强调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其原因主要是二战后福特制的兴起导致经济领域发生了诸多变化，如扩大生产规模以适应技术进步、大型企业的计划能力使得组织取代市场、垄断力量将国家调节总需求的功能纳入生产体系等（加尔布雷斯，2012）。^⑤大型企业与国家的这种关系表现在社会领域中，就是生产体系对消费体系的控制，

^① Bresser-Pereira L. C., “The Two Forms of Capit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7, no.4, 2017, pp.680-703.

^② [匈]卡尔·波兰尼，《巨变》，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3-207页。

^③ Esping-Andersen Gøsta,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3, pp.26-33.

^④ 按照Esping-Andersen（1990）的解释：去商品化，就是为离开劳动市场的人员提供失业、失能、养老等保障；阶层化，就是通过社会权利的确立，让不同职业、不同群体在同意或共识的基础上参与发展分享，阶层化作为阶级分化的替代，用于缓解社会冲突、增加社会凝聚。

^⑤ [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前言第1-3页、第301-307页。

如国家通过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提升家庭消费。作为一种生产模式，福特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自己的消费模式（Aglietta 和 Fernbach, 2015）。^①这种创造最核心的特征在于政治公共领域中公民参与能力的提高，如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三方伙伴关系的建立对社会福利权利谈判提供的支持等。

3. 规范模式的总体特征。哈贝马斯（2014）把总体特征的变化，称为自由主义法律范式向福利国家范式的变化。^②自由主义模式描绘的是一种经典的分权格局，这种格局中的社会与国家是对立的，宪法原则把国家领域与社会经济领域严格划分开来。在社会经济领域中，个人自主追求幸福和利益，个体基本权利旨在抵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国家的任务是创建规范和制定政策，为自由竞争提供最基本的秩序保障，反对经济自由的滥用。战后福利国家模式的确立反映了日益复杂的关系，尤其是工会、大型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服务提出越来越多的新要求。于是，福利国家的目的转向机会公平的保证和分配。

（二）福利国家模式的结构及其变化

作为第二代福利国家理论的阐述者，艾斯平—安德森认为这种理论与黄金时期第一代福利主义的区别在于，强调福利国家是一种结构或者一种制度化的社会机制，即上文所说的福利国家模式。这种新的福利国家理论既认同法国调节学派的福特主义分析方法，又包含了福利组合理论关于权利体系的认识，属于一种较为综合的框架。福利国家模式的结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1. 调节主义理论。调节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葛兰西的“福特主义”分析思想，基本立足点是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之间的相互调节与适应，核心观点是劳资关系及其变化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作用，认为福特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是战后资本主义区别于自由主义的关键。^③第一代调节主义者确立了一种基于整体观的制度互补分析框架。根据 Aglietta 和 Fernbach (2015) 的论述，构成总体积累方式的制度结构形式包括四种：一是劳资关系，集体工资谈判确保名义工资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维持生产所必需的消费支出能力；二是国家的社会保障，维护家庭和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三是市场组织，大型企业之间的竞争确保生产条件更新和效率改进；四是金融体系，维持生产消费的循环。四种制度形式构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构架，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国际竞争，确立国际分工地位。^④概言之，福特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创造了自己的消费模式，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1990 年代以来第二代调节主义理论的发展将研究重心转向资本主义模式多样性分析，这是另外一种福利国家结构分析方法。例如，基于福特主义和劳资关系这个分析传统，Boyer (1997) 将资本主义模式划分为四类：市场取向（英国、美国、加拿大）、社团主义或企业主义取向（德国、日本）、社会民主取向（瑞典、奥地利）、国家主义取向（法国、意大利）。^⑤

2. 福利组合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调节主义第一次打开了劳资关系的黑箱，确立了社会权利在国家、市场（企业）、家庭联系中的重要作用。但就社会权利体系的理解而言，其分析仍然处于抽象层面。福利组合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进一步将社会权利的分析具体化，从而形成至今在政策领域影响甚广的一种认识框架。（1）福利组合理论。Rose (1986) 系统考察了社会总福利的三个来源——国家、市场（企业）、家庭，并且根据三个来源的不同组合及其动态，对福利国家模式多样性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描述，得出结论：尽管发达国家在福利提供标准上具有收敛迹象，但是鉴于国家、市场（企业）、家庭福利组合存在结构上的差异，各国呈现了不同的福利制度模式。^⑥这种分析方法抓住了区分模式多样性的重要因素，

① Aglietta M. and Fernbach D.,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England: Verso, 2015, Chapter 3.

② [德]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303-313、497-506、516-527 页。

③ 袁富华、李兆辰：《嵌入、调节与治理：历史时间与现代化路径》，《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 年第 2 期。

④ Aglietta M. and Fernbach D.,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England: Vreso, 2015, General Conclusion.

⑤ Boyer R., “French Statism at the Crossroads”, in Colin Crouch and Wolfgang Streeck,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 Mapp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7, p.90.

⑥ Rose Richard, “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 The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 in Richard Rose and Rei Shiratori, eds., *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3-39.

如制度和文化。其后，爱沃斯和拉维尔（Evers 和 Laville, 2004）通过纳入合作组织、互助组织、社团等“第三部门”，将“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三因素基本框架予以拓展，进一步打开了福利国家模式多样性的分析视野。^①这种扩展的启发性在于，吸收了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论述，把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权利放在公共政治协商过程中进行分析，揭示出经济社会政策与利益诉求的现实联系方式，并因此产生了与福利国家理论的交叉点。（2）福利国家理论。尽管像福利组合理论一样关注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但福利国家理论建立在社会权利这个根本因素上，抓住了理论问题的本质，艾斯平—安德森对此作出了创新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重新定义福利国家，它不仅是一种干预、矫正社会不平等结构的机制，本质上还是一种阶层化系统、一种维持凝聚的积极力量；第二，它的理论前提是社会权利的制度化为公民提供保障、以社会政策应对社会不平等；第三，它的分类包括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这些福利国家模式的形成，是制度建设适应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模式演化的不可逆性。这种不可逆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特定经济社会政治的关联促成了福利国家模式，二是既有模式需要根据变化进行修补，以适应新形势下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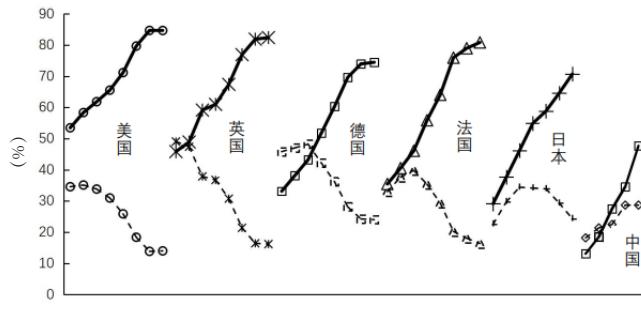


图1 各国第二产业（下方虚线）、第三产业（上方实线）就业比重变动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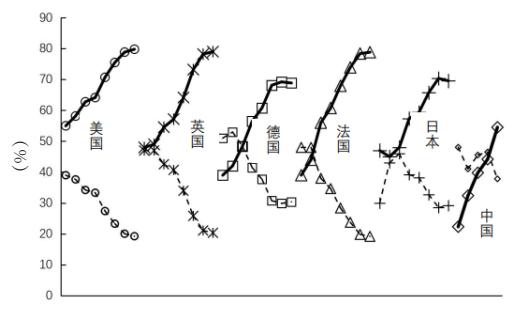


图2 各国第二产业（下方虚线）、第三产业（上方实线）增加值比重变动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 Mitchell (2007)、UNdata、中国统计年鉴。图1：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样本点是1950、1960、1970、1980、1990、2000、2010、2018年（日本截止到2010年）；中国的样本点是1980、1990、2000、2010、2020年。图2：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样本点是1950、1960、1970、1980、1990、2000、2010、2018年；中国的样本点是1980、1990、2000、2010、2020年。

二、增长悖论、三难困境与再平衡机制

总体来看，1950—1970年代的福特主义（或以被动转移支付为特征的传统福利国家）为发达国家创造了生产/消费协调发展的宽松环境，推动了知识中产群体崛起，培育了社会活力，从而奠定了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的发展基础。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权利要求的扩大，福利国家也因此日益陷入“增长悖论”：在现有福利体制下，经济增长可能引致更多的福利支出需求，从而提高生产经营成本、抑制效率提升。石油危机、服务化、老龄化凸显了增长悖论，传统福利制度变得不可持续。1980年代以来，旨在寻求效率/福利再平衡的积极福利国家模式探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福利国家视角下的经济社会条件变化

图1、图2直观显示了195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第一，根据米歇尔的历史数据统计，自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1830年代确立以来，欧美老牌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高于30%的持续时期一般在百年左右，且在1950—1970年代的福特主义时期达到峰值。第二产业作为蓝领工人就业的主阵地，吸收农业部门劳动力且培育产业工人。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知识中产群体主导的均衡社会（Mitchell, 2007）。第二，与老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中国等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追赶的国家，不仅第二产业就业水平偏低，而且作为产业工人主阵地的时期较短。日本大概是在1960—2000年处于这个阶

^① Evers A. and Laville J., “Defining the Third Sector in Europe”, in Evers A. and Laville J., eds., *The Third Sector in Europe*, Edward Elgar, 2004, pp.11-38.

段。第三，1980—1990年代是一个朝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过渡时期，服务业替代第二产业成为就业比重主阵地，城市化率持续提高，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演进，后福特主义时代开启。第四，这个过渡时期也见证了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支撑战后福特主义工业化的有利年龄结构消失，代之以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中国等时间压缩的工业化对人口红利的消耗更快。^① 战后福利国家模式的确立，除了得益于较好的经济社会条件之外，也得益于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三方合作的建设。对此，左大培、裴小革（2009）给出了系统分析，福特主义的利润分享和劳资谈判机制，在获得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得以确立。^② 在综合考虑国家/社会关系、企业内部组织的基础上，这类分析给出了更加具体的国别福利模式，如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日本集体协调的市场经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等。但正如前文所述，1980年代之后，以社会权利和劳资关系调整为核心，福利国家着手进行福利国家改革。随着积极劳动市场、工作福利等理念的提出，社会投资的效率导向在1990年代之后受到重视。于是，去管制的自由主义转向更加温和且符合现实的弹性安全政策（Morel et al., 2009），^③ 旨在缓解福利国家模式特有的增长悖论。

（二）福利国家模式中的增长悖论

福利国家模式中的增长悖论可以直观理解为：公共支出扩大，倾向于削弱公共支出赖以增长的经济活动基础。在安德森等人的认识中，悖论是内生于福利国家模式的现象，它产生于以下经济社会条件变化（Andersen et al., 2007）。^④ 第一，瓦格纳定律。总体来看，随着国家概念的发展、文明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国家服务需求的增多，国家活动范围更加广泛。同时，这种趋势导致了国家税收的持续增长，税收增长速度甚至比国家活动范围的增加还要快。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国家政策手段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综合和昂贵。也就是说，同样的需求需要一种更完善、高级和精致的方式来满足。以教育系统为例，这种现象在政治经济中具有“规律”的性质和重要性，人类的进步对国家的要求不断提高（Chaloupek, 2018）。^⑤ 显然，瓦格纳定律与恩格尔定律密切相关，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逐渐转移到与生活质量有关的服务上来，如日托、就业、健康照料、老年照料等。第二，服务化趋势也带来了其他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鲍莫尔成本病（或者说服务业效率改进与质量提升之间的矛盾）。不同于制造业的规模经济，鲍莫尔成本病针对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是服务业效率提升与服务质量提升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典型表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中；二是服务业内部分工导致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⑥ 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行业吸收了有限的高端人力资本，大部分劳动力在中低端服务业积累。按照鲍莫尔的解释，技术结构决定了服务业的效率会相对低下，服务业总体上缺乏工业那样的规模经济和累积性效率改进动力。换句话说，服务业缺乏较高的产业关联效应。

安德森等研究者进一步考察了增长悖论的发生机制，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更高的增长意味着更多的产出和收入，从而导致更大的税基和更高的税收收入。^⑦ 这是一种通常认识，即试图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来解决公共财政面临的福利支出压力。第二，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力量和工会的协调导致私营部门生产率提高，这不仅会提高私营部门的实际工资，而且会提高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包括公共部门的实际工资。公共部门工资的上涨增加了公共开支，并吸收了部分税收收入的增加。第三，在工资普遍提高的条件下，除非工资通过指数化得到保护，公共养老金和其他转移支付将相对于工资下降。面对这

① Mitchell B. R.,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6th ed) : 1750-200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② 左大培、裴小革：《世界市场经济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③ Morel N., Palier B. and Palme J., “What Future for Social Investment?”,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Research Report, 2009, pp.28-31.

④ Andersen T. M., et al., *The Nordic Model*, Helsinki: Taloustieto Oy, 2007, pp.83-100.

⑤ Chaloupek G., “Wagner’s Law, Money and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Crisis”, in Backhaus J., Chaloupek G. and Frambach H. A., eds., *Gustav von Schmoller and Adolph Wagner*, Springer, 2018, p.86.

⑥ Baumol William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no.3, 1967, pp.415-426.

⑦ Andersen T. M., et al., *The Nordic Model*, Helsinki: Taloustieto Oy, 2007, pp.83-100.

种情况，出于维护退休者和其他弱势群体利益的考虑，政治压力通常会阻止福利收益的相对下降。假设这种分配约束得以维持，用于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增加，私营部门税收负担也增加，最终将阻碍公共财政的进一步改善。第四，收入增加可能会导致服务需求增加，包括公共福利服务的需求。在社会权利得到确立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本身可能导致公共财政状况恶化，而不是改善。只有在公共部门工资和转移支付低于平均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才可能减轻公共财政负担。第五，福利国家普遍出现的问题是，较高收入可能增加对休闲的需求，并减少给定工资率下的劳动力供给，税基因此受到削弱。总之，促进增长的政策不会同时获得生活水平提高和财政稳健的双重红利。面对这种困境，为了确保福利国家的稳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权衡。

（三）三种福利国家模式的再平衡及其后果

全球化、服务化和老龄化对传统福利体制造成了更大压力。1980年代以来，围绕福利国家的效率/福利再平衡问题，形成了一类政治经济模型，即艾弗森和雷恩（Iversen 和 Wren, 1998）的所谓“三难困境”问题：财政收支平衡、收入公平和就业增长三个目标不能同时达成，只能以牺牲一个目标为代价而选择实现其他两个目标。^①结合艾斯平—安德森关于福利模式的分类，雷恩提出了三类组合模式。一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以牺牲收入公平目标为代价，换取财政收支平衡和私人部门就业增长目标的实现。这种权衡模式的基础是洛克自由主义传统，认为市场具有内在的福利最大化功能，反对政府干预可能导致的资源错配。因此，这种福利国家模式重视个体对劳动市场的积极参与，重视自力更生，强调工作道德，认为市场工资足以体现个人贡献和综合福利水平。福利制度以家计调查、有限的转移支付和有限的社会保障规划为主导，并将给付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对那些数量居于劣势、政治上边缘化的贫困群体坚持“剩余原则”，总体上是为了避免福利代替工作。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英国。二是社团主义福利国家，以牺牲就业增长目标为代价，换取财政收支平衡和收入公平目标的实现。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相比，这类国家并不崇尚自由市场经济与个体自力更生，也不像社会民主福利国家那样重视普遍的社会权利，而是努力维持既有的地位分化。在这类模式中，再分配政策不起重要作用。这种权衡模式的基础是欧洲大陆的教会—社团主义传统，重视共同体、家庭的保护作用，既抵制来自市场经济的冲击，又抵制来自国家的过度干预。这种模式重视传统家庭关系的维系，不重视充分就业水平，福利给付鼓励女性以家庭照料为主。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德国、法国、意大利与奥地利。三是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以牺牲财政收支平衡目标为代价，换取就业增长和收入公平目标的实现。这种模式源于社会民主信念，注重福利与工作道德的融合，在社会权利确认上奉行“普遍主义原则”，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不像自由主义和社团主义福利模式所追求的最小需求的平等，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追求最大程度的平等，并将这种追求视为社会团结的基础；第二，这种模式更加重视社会整合，蓝领与白领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所有社会阶层都被纳入一个普遍的保障体系之中，但福利收益根据通常的收入分级；第三，与社团主义的辅助性原则不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更加主动地担负起老弱照顾责任，鼓励女性参与劳动市场。为了维持福利支出和税收之间的平衡，积极劳动市场和充分就业一直是该模式重要的政策目标，政府部门就业比重较高。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按照雷恩的说明方式，以公平目标的表现为例，表1和图3对各类福利模式给出了一个直观比较（Wren, 2003）。^②第一，最低收入与中位数收入比值（D1/D5）在三类福利模式中呈现出来的一般趋势是：注重就业增长和收入公平目标的社会民主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如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社团主义福利国家的平等程度介于二者之间。^③第二，

^① Iversen T. and Anne W., “Equality, Employment, and Budgetary Restraint: The Trilemma of the Service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50, no.4, 1998, pp.507-546.

^② Wren A., “The Challenge of De-industrialisation”, in Ebbinghaus B. and Manow P., eds., *Comparing Welfare Capital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239-269.

^③ 德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相比于原西德，1990年统一后，收入不平等呈现扩大趋势。

中位数收入与较高收入比值 (D5/D9) 在三类福利模式中呈现出来的一般趋势与 D1/D5 类似。但从时间趋势看, D5/D9 在各类福利国家中普遍呈现下降趋势 (见图 3), 经济服务化并未从实质上改善中产者

表 1 1979—2020 年 OECD 主要国家收入差距 (单位: %)

D1/D5	1979—1982	1983—1986	1987—1990	1991—1994	1995—1998	1999—2002	2003—2006	2007—2010	2011—2014	2015—2018	2019—2020
瑞典	76	76	75	79	80	78	78	77	76	75	74
丹麦	71	71	72	—	—	71	71	70	69	68	68
挪威	71	73	69	76	78	77	75	73	72	70	70
德国	61	62	65	59	60	58	55	54	54	55	56
荷兰	—	65	64	64	—	63	62	62	61	62	—
法国	60	62	61	61	—	68	69	69	68	67	—
意大利	55	59	66	60	—	71	67	67	70	71	—
英国	56	56	54	54	54	55	55	55	56	57	59
澳大利亚	60	59	59	61	62	60	60	59	59	60	58
美国	51	50	49	48	48	49	48	48	47	48	50
加拿大	45	41	42	44	50	50	50	51	52	53	56
D5/D9	1979—1982	1983—1986	1987—1990	1991—1994	1995—1998	1999—2002	2003—2006	2007—2010	2011—2014	2015—2018	2019—2020
瑞典	65	65	64	65	67	64	64	63	63	63	63
丹麦	65	64	64	—	—	60	59	59	57	57	57
挪威	68	67	67	67	65	64	63	62	61	61	61
德国	—	61	61	59	57	57	58	56	54	54	54
荷兰	—	65	64	64	—	58	57	57	55	55	—
法国	52	51	51	50	—	51	52	52	53	52	—
意大利	68	68	66	64	—	57	56	57	55	55	—
英国	58	56	55	54	53	52	51	50	50	51	50
澳大利亚	41	49	59	58	56	54	53	51	50	53	51
美国	51	49	47	47	46	45	44	43	41	42	41
加拿大	56	55	54	54	56	55	54	53	52	53	54

注: 数据来源于 OECD 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Statistics-Decile Ratios of Gross Earning。D1、D5、D9 分别代表收入十分位中的最低收入分位、中位数收入分位、高收入分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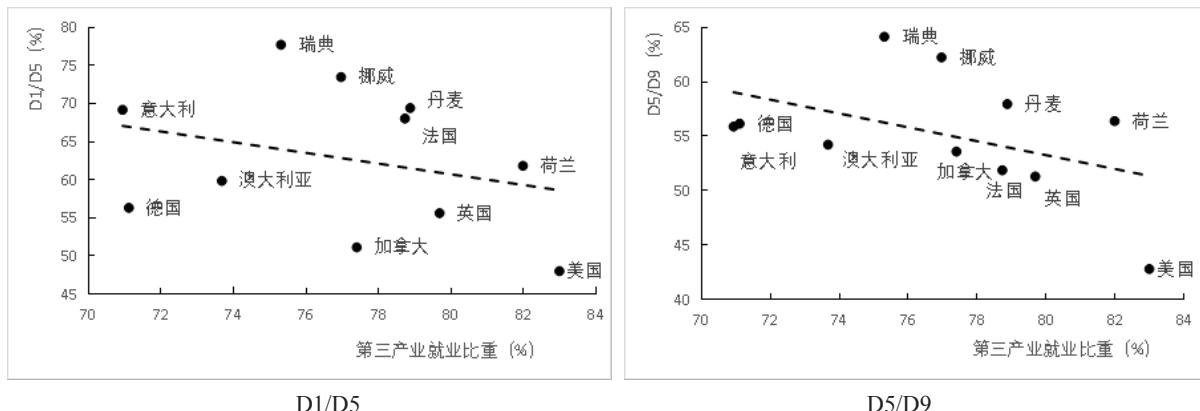


图 3 各国收入差距 (%) 与第三产业比重 (%) 的散点图

注: 数据来源同表 1 和图 1。按照 Wren (2003) 的处理方式, 图中各国 D1/D5 与服务业比重取时间序列平均值。

的地位。由此也可推测，主要福利国家总体上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城市化和经济服务化时代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①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再平衡

基于发展权利分析的福利国家理论，抓住了城市化和服务化的本质。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注重经济效率的做法对比，福利国家模式更加关注效率/福利的平衡，即社会均衡的实现条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用20年时间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并进一步提出共同富裕目标，这意味着均衡社会模式的确立。虑及这种规划是在城市化、服务化、老龄化背景下提出的，是由社会权利体系塑造的中国式现代化，因此也具有了前文所述福利国家模式的特征。

（一）中国式现代化构建的经济社会背景

作为一种发展图景与社会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由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三个基本理念概括，落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均衡发展。就国际比较的共性与中国特殊性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总体趋势的表现方面。2012年以来，经济结构性减速的新常态逐步显现，资本和人口红利驱动的高增长结束，中国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轨道。与发达国家经历的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趋势类似，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工业化高增长之后转向城市化和服务化，同时作为高增长基础的人口红利消失（见图1、图2）。但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发生在时间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第二产业作为就业主阵地的作用相对于发达国家偏弱，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在经历了最近30年的增长后呈现下降趋势，但峰值没有达到过30%以上的水平。第二，服务业的表现方面。与城市化发展相一致，中国经济总体上发生了经济服务化趋势，但服务业内部结构和发展水平却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最近20年，如图4、图5所示，从横向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传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较大，显著高于欧美国家20%左右的水平；从纵向历史比较来看，中国传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下降的同时，其就业比重却是上升的，因此在时间轴向上中国传统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是下降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和房地产部门近年来发展过快且增加值比重较大；中国服务业低端化、泡沫化趋势抑制了服务业结构升级，如中国高技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显著偏低。第三，社会发展的表现方面。受到初始条件的限制，中国过去40年的现代化主要围绕经济追赶展开，社会发展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结构中，初、中等教育程度比重较大，高技能、高等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显著提高，但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保障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较为突出；中等收入群体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的基础较为薄弱。值得期待的是，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有望得到逐步解决。

（二）立足国情探索中国现代化模式

从福利国家理论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效率/福利动态平衡机制之上，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均衡社会图景。对此，普遍共识有二点。一是，在经济服务化的背景之下，出现财政收支、公平和就业的“三难困境”。而这种困境在福特主义工业化时代并不明显，主要因为工业化提供了效率、税收和充分就业基础。二是，按照雷恩的说法（Wren, 2003），服务业的发展更易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②这是由该部门行业结构的特殊性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与知识信息有关的高端服务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有限，大部分就业被中低端服务业吸收。这在发达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且在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结合现代化模式建立的必要性，中国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现代化模式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多样性和分化的。各国不同的劳资谈判制度与福特主义结合，形成了多种福利国家模式，也即基于具体国情的现代化模式分化。这也是福利国家理论特别关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所在，尽管各国在效率水平和福利水平上可能存在收敛现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式”的意义，就像英美国家遵从自己的

^① 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有限的基尼系数估算来看，1990年代以来，英、美、德呈现不平等加剧趋势，法国稍好一些，基尼系数变动较小。

^② Wren A., *Comparing Welfare Capitalism*, pp.239-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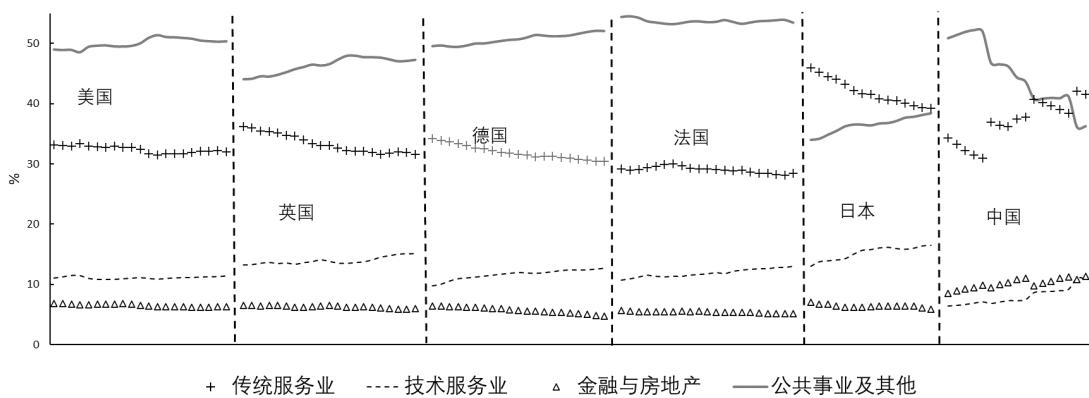


图4 各国服务业内部分行业就业比重^①

数据来源：UN Data、中国统计年鉴和OECD Structural Analysis Data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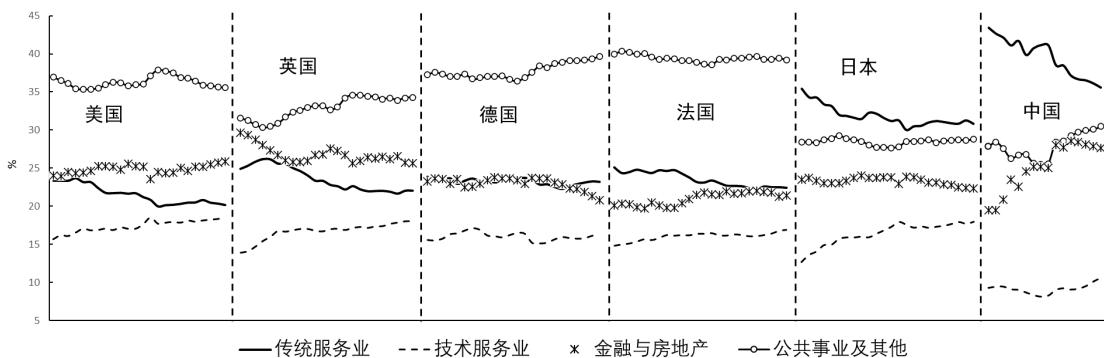


图5 各国服务业内部分行业增加值比重

数据来源：WDI 和中国统计年鉴。

自由主义传统、欧洲大陆国家遵从自己的社团主义传统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也需要依据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构建自己的模式。第二，基于条件变化更新理论视角。中国改革开放适逢发达国家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去管制化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推动了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要素比较优势是这波全球化的核心特征。这个时期的中国工业化带有显著的传统发展主义特征，如以生产供给为中心推动经济发展，效率和规模在较短时期内获得了提升。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些更加综合性的问题也呈现出来，如怎样培育内生动力、怎样理解经济服务化趋势、怎样理解广泛存在的失衡问题等。中国的城市化涉及经济、社会、国家治理等更加复杂的协调，需要立足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四五”规划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论述，以及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确立，可视为理论认识的巨大转变。第三，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进步或社会结构的合理性是根本，主要表现为白领取代蓝领成为新中产群体，并主导了二战后现代化的升级和演进。在主观上，福特主义对利润分享和公共服务的支持，是为了推动资本积累、维持生产扩张。但福利国家模式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知识中产群体的崛起，社会结构因此发生了本质变化，并为1980年代以来的知识经济奠定了基础。这种实践体现了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是城市化的内在要求。相比之下，在向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这个更高目标迈进过程中，效率/福利均衡取向的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构建、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一体化协同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本意。

① “传统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汽车和摩托车修理、运输仓储、住宿餐饮；“技术服务业”包括信息通信、科学和技术活动；“金融与房地产”包括金融和保险活动、房地产活动；“公共事业及其他”包括行政和辅助活动、公共管理和国防及强制性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及社会工作、艺术文娱、其他等。中国样本期是2004—2019年，其余国家样本期是1995—2018年。

(三)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与共同富裕

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图景来说，新发展理念确立了新时代发展纲领，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均衡社会实现路径，共同富裕指明了未来图景。针对经济服务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增长悖论”与财政、公平、就业的“三难困境”，经济社会政治层面的主要应对策略简述如下。

1. 推动产业协调发展，巩固创新与效率的基础。第一，中国服务业自身的弱质性，决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重要性。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传统服务业效率较低、金融房地产占比较高、科教文卫等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服务业的特征是知识经济，其质量直接取决于人力资本状况（袁富华，2021）。^①但鉴于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和社会发展滞后的现状，服务业升级需要一个过渡期。至少就未来10—20年来说，服务化还不足以支撑起城市化的效率/福利动态平衡要求。面对这种约束，扭转“脱实向虚”以获得稳固的效率和发展基础，就成为了势在必行的任务。第二，避免过早去工业化，产业协调发展仍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的服务化，是在经历了漫长工业化之后的发展升级。即使如此，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服务化趋势下的失业、不平等问题，更何况中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发生脱实向虚问题。就产业协调而言，需整顿金融秩序，消除经济泡沫，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宽松环境；在促进服务业态多样的同时，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创新和产业协同升级的基础；重视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化建设，特别是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培育创新生态。第三，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农业部门的脆弱性和重要性在城市化时期往往同时呈现出来，脆弱性源于城市化无序扩张对农业的侵蚀，重要性源于中国是人口大国。国家对这些问题已有充分认识，对“三农”支持的制度化、系统化、连续性建设仍是未来政策着力点。

2. 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打造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在国家、市场（企业）、家庭福利组合方面，偏向于效率的传统发展主义，通常是将家庭视为劳动力供给的一侧，并看作是资本积累的手段，即使注意到国家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但大多侧重于国家对资本积累的作用。这是由工业化追赶的客观要求决定的，有其特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福利国家模式则相反，聚焦于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其重心是以社会保障制度化维护社会权利。对于中国转型而言，面临着重新审视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三方关系的问题，因为人口红利耗尽之后，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将逐步显现出来，家庭发展在理论和实践的地位变得重要。中国现代化模式确立的基点应立足于养育、教育、婚姻、养老这个生命历程来设立社会政策，以形成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反馈。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所蕴含的“生产性”、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性，就是源于这种认识。第一，正反馈是内循环的有力支撑。从联系和过程角度来看，社会政策的正反馈是通过公共支出提高教育、医疗等广义人力资本，扩大知识中产群体。中产群体既是企业家精神的土壤和人力资本要素的提供者，有助于推动生产结构升级，又是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者，有助于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由此，国家、市场（企业）、家庭的联系得到增强，良性循环得以建立。第二，共同富裕是一项综合社会工程，需要有序推进。共同富裕规划了一种良好社会结构，在扶持弱势群体的基础上，实现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但作为一种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理念，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建立在有序规划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接下来要通过财政、金融、教育、就业等配套政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通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提升中产群体比重；通过再分配制度设计，促进社会公平，激发社会活力。

3. 加强法治国家建设，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作为制度保障，这是由新时代的条件和要求决定的。第一，市场秩序的规范方面。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不是自由放任，而是在规范约束下的合法竞争。现阶段的部分市场失序主要表现为金融化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冲击，如房地产、平台经济中的资本无序扩张，加剧了脱实向虚的被动局面。

^① 袁富华：《服务业结构升级、效率补偿效应与高质量城市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3期。

为此，需要加快推进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与完善，让市场回归有序。同时，应该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法规供给，满足国家治理和创新激励的需要。第二，参与和共享的规范方面。国家、市场（企业）、家庭福利组合在当代的重要作用，是将参与和分享的公共政治领域呈现出来，各种层次、各种议题借着这个平台进行公开讨论、协商、谈判。相应地，全过程民主作为一种鼓励参与的规范模式，目的在于回应社会各方权责诉求，达成现代化方案的广泛共识。第三，政府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合理化。这是就国家与市场、家庭的关系而言的，作为提供规范、社会保障、公共品的社会子系统，政府自身的决策应该得到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认同，特别是在社会分化和社会联系日益增加的福利国家模式下，政府行为的规范构成了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石。

四、结论

福特主义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劳动组织和社会关系，作为这种过程和联系的制度化，福利国家模式的确立赋予资本主义现代化更加完备的形式，即均衡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社会二分状态不同，福利国家模式下的国家、市场（企业）、家庭以社会权利为纽带形成了制度互补的共同体，并因各国历史、文化差异呈现出社会图景的多样性。但因受到石油危机冲击和自身蕴含的“增长悖论”的制约，发达国家在1980年代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并探索以弹性安全为原则的积极福利国家模式，试图找到一种适应高度城市化、服务化和老龄化的再平衡机制。总体来看，福利国家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从根本上更新了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认识，并且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提供了均衡发展的经验借鉴。中国40年的快速工业化，为更加均衡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总体上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就社会进步这个现代化本质要求而言，扶持弱势群体、培育中产群体、维持社会团结无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稳固基础。

责任编辑：张超

经济发展变迁中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

姜子莹 封凯栋

[摘要]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促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国家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重新成为关键议题。面对创新转型的目标和压力，中国亟需通过工业技术领域的国家能力建设来实现科技创新引领下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继承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中的国家理论传统，依托基于知识的能力观发展出一个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分析框架，并用于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历史变迁过程。国家工业理解能力以国家用来与产业互动的行政体系的自主性、专业性和渗透性作为基础，需要与特定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和工业技术系统的信息结构相协调。国家无论是要支持创新活动，还是要推动创新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变迁，都需要在与产业界的互动中获得信息，提升对工业创新活动的认识，据此形成有效的政策。

[关键词]工业技术政策 国家工业理解能力 自主性 专业性 渗透性

〔中图分类号〕F421; F062.4; 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 (2022) 06-0096-10

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新自由主义事实上已经破产的背景下，讨论国家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需要扮演双重角色。第一重角色是创新经济系统的重要参与者，国家需要搭建网络化平台以提供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和资源；第二重角色是社会技术转型的推动者，国家需要推动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调整。^①国家的重要角色已经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十四五”规划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需要在创新发展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引领整个社会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的领域取得重大科技突破。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中出现的“卡脖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既有工业技术政策在相关领域未能有效地引领战略性科技突破，这进一步引发人们反思国家角色和工业技术政策背后的国家能力问题。

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国家理论较早把国家放在分析的中心，研究国家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能力。这些能力需要以有效地获取政策对象的必要信息为前提：国家想要在实践中发展出有效的工业技术政策，就需要掌握工业活动的专业信息，形成对诸如“技术的瓶颈和前景如何”“创新应如何组织”等问题的认识，也即构建国家工业理解能力。近年来，很多学者采用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国家政策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效果。但由于信息经济学对工业技术知识这一复杂“信息”对象解释力有限，该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创新载体效率优势及其制度化整合机制研究”(71673012)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重点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姜子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国家能力建设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福建厦门，361005）；封凯栋（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① 封凯栋、姜子莹：《国家在工业体系系统转型中的双重角色》，《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6期。

视角仅适用于解释简单政策，难以有效分析作为复杂政策的工业技术政策。因此，本文继承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中的国家理论传统，根据工业技术的本质特征，在以知识为基础的能力观下发展出一个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分析框架，用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历史变迁过程。本文强调，国家工业理解能力依托于国家用来与产业互动的行政体系的自主性、专业性和渗透性，需要与特定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和工业技术系统的信息结构相协调。当前，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得中国需要更多地依托本土创新来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但中国在上一历史时期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渗透进工业创新活动、专业性的信息系统。因此，我们必须顺应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有针对性地推动体制机制革新，为发展创新政策奠定基础。本文尝试为讨论创新政策提供一个基于“国家能力”概念的分析框架，为人们思考转型背景下国家如何有效地参与经济活动、促进创新市场竞争提供新的思路。

一、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理论位置

本文继承 Theda Skocpol 等学者的观点，将国家视为一个行动者，聚焦于国家的决策行动。^①国家能力被看作国家通过实施政策来达成自身目标的能力，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第一，从国家获取信息并形成对治理对象的理解到它将这种理解转化为政策；第二，从国家的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第三，从国家的政策执行到最后市场机制检验政策的效用。学者们对第二、三层含义已经有丰富的讨论，但经常忽视了第一层含义。

在第一层含义中，信息获取和编码化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其中，Scott (1998) 的研究最具有影响力，他指出现代国家力图按照自己治理的需要，收集社会信息并将其变成简化的、清晰化的可见形式（如地图）。^②后续研究沿着“国家如何使得社会信息清晰化”这一方向发展，提出了认证能力、国家信息能力、国家能力的信息基础（informational foundations of state capacity）等相关概念。^③本文把这些研究归为将工业技术知识简化的信息经济学视角。这一视角往往把创新活动理解为可编码程度较高的指标或数据，国家政策目标以及信息收集和处理手段都是单一、清晰、标准化的，而国家能力被理解为在目标和手段确定的情况下信息能力。^④但客观上来说，不同领域的知识被简化和编码化的程度显然是不同的。在本文所分析的工业技术政策领域，关于创新实践的知识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缄默性。工业技术产品的发展过程涉及从研发到产业化应用多个环节之间的复杂反馈，涉及政产学研等多种类型主体之间以及市场、技术、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之间复杂的、系统性的协调关系。^⑤这些知识嵌入在具体的技术和市场情境中，而且不断变化，难以被简化为编码化知识，只能通过参与产业实践来获得。^⑥此时，国家的政策目标以及信息收集和处理手段变得复杂而模糊，国家获取信息目的是什么、向哪些主体获取信息、获取哪些信息、如何获取信息等都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国家如果想要发展出有效的工业技术政策，就应当根据政策对象的特征来形成对于工业实践的理解和认识。从主观上看，组织发展某种能力往往是出于特定目的和指向，对能力的分析也应当与特定的组织发展战略和组织结构紧密结合。^⑦

因此，本文将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界定为：国家对其当下所处情境中的工业技术活动的实际情况、工

^①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38.

^②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8-21.

^③ 欧树军：《认证：国家能力的基础》，《文化纵横》2014年第1期；韩志明：《在模糊与清晰之间——国家治理的信息逻辑》，《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3期；Melissa M. Lee and Nan Zhang, “Legibility and the Informational Foundations of State Capaci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9, no.1, 2017, pp.118-132。

^④ 吕方、梅琳：《“复杂政策”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连片开发扶贫项目的讨论》，《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

^⑤ Giovanni Dosi,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Directions of Technical Change”, *Research Policy*, vol.11, no.3, 1982, pp.147-162.

^⑥ [美]玛丽·奥沙利文：《公司治理百年：美国和德国公司治理演变》，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年，第18-21页。

^⑦ Richard R. Nelson, “Why Do Firms Differ, and How Does It Matte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2, no.S2, 1991, pp.61-74.

业技术发展规律、技术创新发展的瓶颈及解决方案、技术发展的总体布局和长远规划、与技术发展要求相匹配的组织方式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形成相对独立的立场、判断和观点的能力，它是国家在工业技术领域内能力的一部分。信息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能力理论分析的只是国家工业理解能力中强调信息获取和编码的那部分。国家信息能力发挥作用以国家的认知框架建立能力为前提，如国家需要理解什么、需要理解到什么程度、这种理解需要怎样一套组织基础作为支撑等。这些认识取决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信息结构所创设的特定情境下工业技术活动特征（本文在分析框架部分将具体解释发展战略和信息结构的含义）。这意味着国家工业理解能力不是抽象、固定的，而是需要根据发展战略和信息结构的变化来做动态调整。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治理有赖于国家掌握相对充分、精确和可靠的社会信息，并据此形成对治理对象的认识。^①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决定了国家能否有效识别有潜力的工业技术项目，并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来促进工业发展，这是国家在工业领域有效行政的基础。图1展示了学者们对国家能力的研究内容以及本文所提出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概念在理论图谱中所处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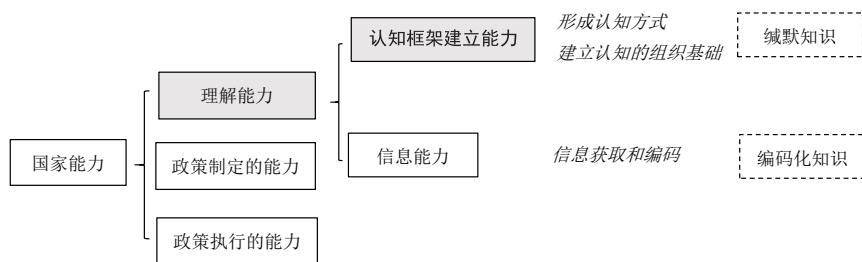


图1 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在国家能力研究中的理论位置

二、自主性、专业性和渗透性：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分析框架

本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能力观下提出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概念，整合发展了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中对国家能力三个基本条件（国家的自主性、国家对社会的渗透性和国家的专业性）的讨论，并进一步指出，需要在特定国家工业技术系统中的发展战略与信息结构协调的意义上来分析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适应性。

（一）基于知识的能力观下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

在基于知识的能力观下，国家想要发展出对工业活动的理解能力，就需要具备认知视角三个要素所要求的基本条件。认知视角认为，组织对特定领域理解能力的形成过程就是组织在认知预期的指导下基于认知框架来搜索、识别和吸收外部信息。由此，认知视角强调了三个要素：首先是认知预期，它取决于组织的发展战略，决定了认知的目的，即想认识什么；其次是认知框架，它受限于组织的专业化知识基础，决定了认知的程度，即能够认识到什么；最后是外部信息，这些信息是形成认识的原材料，往往是复杂和缄默的，组织需要进入实践情境、与对象建立参与式互动的信息渠道才能获得这些信息。^②

国家行政体系的自主性为国家形成独立的认知预期提供了前提。国家只有具备自主性才能形成对于自身需要了解哪些活动的独立看法。国家自主性在一国出现发展战略转变、工业技术系统转型等关键的转折性时刻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时国家需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超越市场理性和技术理性的逻辑。^③ 本文继承传统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认识，认为国家自主性的动力来源往往是政治性的，特别是国家安全职能，即国家由于处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交界处而需要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特殊职能。^④ 国

^①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8-21.

^② Wesley M. Cohen and Daniel A. Levinthal,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35, no.1, 1990, pp.128-152.

^③ 封凯栋、姜子莹：《国家在工业体系系统转型中的双重角色》，《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6期。

^④ Nettl J. P.,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vol.20, no.4, 1968, pp.559-592.

家要想实现自主性，就需要达成国家行政体系内部的政治共识并克服国家行政体系外部的阻力，形成整体和全局判断，而不是反映个体或局部利益。

国家行政体系对产业界的渗透性为国家获取外部信息提供了渠道。国家需要渗透进产业界，在与工业实践者的交流中获得信息。国家如果只有对产业界的渗透性而没有国家自主性，就容易被短期和局部的利益所左右，无法形成长远和整体的判断。不论是基础性国家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还是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被治理的相互依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等概念，都强调了国家通过与社会集团进行惯例化、制度化的协商来渗透社会以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①本文继承传统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认识，并把渗透性的概念推进到国家制定政策前的认知形成阶段。

国家行政体系的专业性为国家形成有效的认知框架提供了基础。国家只有具备专业性，才能形成有效的认知框架，用来指导其在什么情况下向哪些主体获取信息、获取哪些信息、如何获取信息等。传统政治学和社会学在讨论国家的专业性时侧重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官僚组织的专职化，强调官僚组织通过人事管理和工作程序来提高官僚组织效率、塑造官僚整体认同。^②为了应对工业技术政策领域信息复杂性和缄默性特征，本文强调国家行政体系在知识层面的专业性，将国家的专业性界定为国家官员团队对工业技术专业知识的掌握。这些知识包括两类：一类是关于工业技术的一般性知识，如技术创新是如何发生的、需要具备什么组织和社会条件等；另一类是关于特定产业的知识，如本国汽车产业的资源、能力和发展瓶颈是什么，还需要哪些政策支持等。国家专业性的形成有赖于国家官员团队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并长期扎根产业实践。^③

（二）发展战略、信息结构与国家工业理解能力

对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强弱的分析应当放在特定国家工业技术系统中来进行。当国家结构能够与发展战略及其所决定的信息结构相匹配时，国家更容易发展出工业理解能力。发展战略及其所决定的信息结构会发生动态变化，国家结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适配性变化。

发展战略是从事赶超发展研究的学者们在分析国家在工业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时的起点。^④发展战略往往是超越了经济逻辑和工业技术逻辑的政治决策，它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工业发展上的抱负水平，规定了该国的工业发展任务，如期望达到的技术水平（如技术跟随或创新前沿）、要采取怎样的技术发展方式（如对外依赖或自主研发）来达到这一水平。^⑤由此，它规定了国家需要扮演的角色以及国家为此需要建立的工业理解能力，特别是规定了国家的自主性（认知预期），即国家应当认识什么以及认识到何种程度。

国家结构是学者们在分析国家作用时经常提及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国家结构是国家实际用以渗透社会的行政结构，在本文中特指国家用来管理工业活动的行政结构。该结构影响了国家能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程度和方式，也决定了国家实际能够达到的工业理解能力，特别是国家行政体系实际的专业性（认知框架）及其对产业界的渗透性（外部信息获取）。虽然发展战略规定了应然的国家结构形态，可以直接决定形式上的制度安排，但想要按照发展战略的要求来彻底改变国家实际运转中的行政结构，则

^①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5, no.2, 1984, pp.185-213;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2-13; Linda Weiss, “Infrastructural Powe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Globalisation”, in John A. Hall and Schroeder R. eds., *An Anatomy of Power: The Social Theory of Michael Man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67-186.

^② Kaidong Feng and Ziyi Jiang, “State Capacity in China’s Innovation Subsidy Policy: A Perspective on Government Knowledge”, *China Review*, vol.21, no.3, 2021, pp.89-122.

^③ Fred Block,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36, no.2, 2008, pp.169-206.

^④ 宋磊：《被忽视的政治逻辑和管理实践》，《文化纵横》2016年第6期。

^⑤ 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0-191页。

是一件成本高昂、耗时很长的事情。^①这意味着，国家结构既有可能适应发展战略的要求，也可能与其脱节。为区分发展战略所要求的结构与实际结构，并突出国家工业理解能力（而不是更为一般化的国家能力或是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在信息层面上的意涵，本文提出了信息结构的概念。信息结构决定了国家应该获取和处理信息的程度和方式，特别是规定了国家应然的专业性及其对产业界的渗透性。

当发展战略发生转变时，其所要求的信息结构也发生相应的转变。但既有的国家结构有可能适应曾经的战略及其信息结构，而不能适应新的战略及其信息结构。此时，依赖于既有的国家结构所建立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不能适应新发展战略的要求。本文将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分析框架归纳为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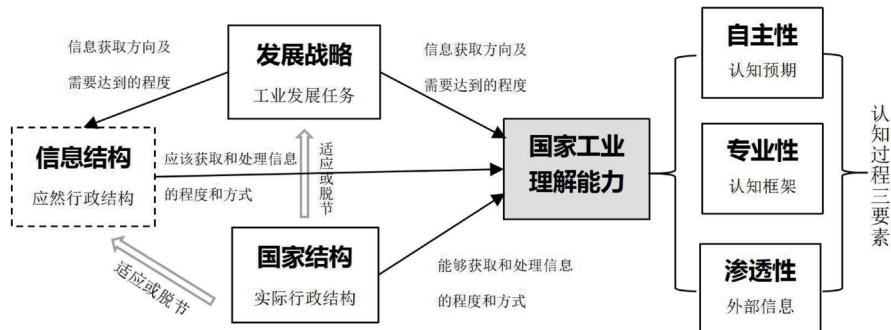


图 2 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分析框架

下文将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变迁过程，用来强调在工业创新系统的发展战略与信息结构变化的情境下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适用性问题，以及这种能力的历史演化过程对当下中国创新转型的影响。

三、发展任务与国家工业行政结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变迁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保障国家安全，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建设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并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建立一个由计划部门来统合的资源配置结构，由此形成一个中央集中的国家结构，并发展出相应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依托苏联援助，制定了独立自主建设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力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以确保经济发展和国家主权安全。^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既需要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保证建立众多工业部门所需的大规模资源投入，又需要建立专业化的政府部门分工体系，组织管理具体工业门类的生产，协调工业间的相互联系。于是，国家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工业部委行政管理体系，即一个集中式的资源配置结构。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经济委员会负责工业部委之间的统筹协调。各工业部委基于工业门类，按照职能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则来划分，包括科技部、国防科工委、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等。^③部委的分工可能是高度专业化的。例如在机械工业领域内，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根据具体产业同时设有8个以序号命名的“机械工业部”，分管民用机械、核工业和核武器、航空、电子工业等。在每个工业部委系统内部，各中央职能部门在地方各级政府层层设置对口机构，并且把最基层所有企事业单位（包括各级各类企业、科研院所和院校）都纳入到行政管辖系统之内。中央政府同时掌握了国家、地方和企业层次上的战略决策权，甚至拥有地方和企业层次上的部分日常决策权；地方政府负责政策和信息的上传下达，在人事、财政、审批

^① Linsu Kim, “Korea’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Transition”, in Linsu Kim and Richard R. Nelson eds., *Technolog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Experience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35-360; 封凯栋、姜子莹：《国家在工业体系系统转型中的双重角色》，《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6期。

^② 萧冬连：《计划经济时代影响中共经济决策的主要因素》，《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Yu Zhou and Xielin Liu, “Evolution of Chinese State Policies on Innovation”, in Yu Zhou, William Lazonick, Yifei Sun eds., *China as an Innovation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34-36.

等各方面都只能听命于中央政府，自由裁量权较小；企业是一个完成国家下达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它的投资、研发、组织设置、营销、企业间协调等战略管理职能由中央主管工业部门来承担。^①

国家通过这套集中式的资源配置结构以及其他制度安排，促进了政府系统内部的共识形成并减小了外部阻力，从而形成了与该时期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国家自主性。这一发展战略要求国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领域，也就是要利用“剪刀差”，尽可能地通过提高农业剩余和压缩居民消费来保障重工业发展所需的粮食和资金积累。为此，国家通过实行强制性的统购统销政策来保证“剪刀差”的资源流向制度化，提供单位制下的“铁饭碗”以及其他福利待遇来维持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并通过集体主义精神的宣传和培养让社会各群体接受这一发展战略。^②同时，国家通过干部人事制度和政治教育来增强政府官员集体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形成了行政系统内部对发展战略的共识。^③

这套集中式的决策结构下各部门“一通到底”的行政体系和计划指令协调方式有利于实现该阶段的发展战略，保证了国家工业行政体系对产业的渗透性。国家基于行政关系与产业界的广大主体建立了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渠道，以此获得实施发展战略所需的生产和运营信息，如对产品参数、资源投入和产出数量的掌握。以铁路部门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形成了一个铁道部集中统一领导、层级分明而深入基层（部—局—分局—站段）、覆盖范围广泛全面（包括铁路运输、工业、基本建设、科研、教育等）的行政管理系统。铁道部拥有多个科研院所和遍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学校。铁道部通过计划生产运输指标和运营指标体系、劳动竞赛和学习交流等方式实现了系统内的信息流通，保证了铁路系统内研发、生产、技术改造、维修、运营等功能的发挥，维持了整个系统正常有序的运转。^④

各工业部委的产业实践以及部属科研院所的决策支持有助于提高国家行政体系的专业性。每个中央工业部委专门负责一个工业门类的管理与发展，而且官员在工作中会深入接触产业实践。比如，为了规范和完善机车的使用与检修，铁道部的官员通过例行考察制度了解机车的磨耗规律和机能作用情况，总结优秀企业的做法，建立了细致的可操作化的检修规则，并根据车型更新、工艺和设备改善等情况变化改进规则。^⑤工业部委直属的产业科研院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科研人员都根据计划安排钻研特定的专业方向。^⑥他们既负责本部门的应用工程开发，也扮演了部委的决策参与者或者事实上的“参谋”角色。^⑦工业部委还设有专业化院校负责本部门的技术与技能教育，培养了大量的中青年干部。

在这一时期，国家结构较好地适应了该时期发展战略所规定的工业技术活动特征，并形成了一定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在独立自主建设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中国没有像同期很多拉美国家那样陷入对外来技术的依赖，而是在工业实践中发展出对技术和部门协调的理解。国家要负责每个工业部门的建设和工业部门间的协调，所以需要了解特定产业的知识，如国外的先进技术有哪些、如何根据既有产品实施反求工程、如何建立产业链上下游工业、如何综合平衡不同工业部门间的资源配置等。

但该时期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建设也受限于这套高度集中式的国家结构，专业技术官员的知识无法突破国家行政工业结构所设定的认知框架，地方政府、企业和基层的创造力未被充分激活。当国家转而追求经济快速增长时，这套国家结构束缚经济活力的弊端就充分暴露了出来。

^①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②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和学》1989年第1期；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 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④ 封凯栋、姜子莹、赵亭亭：《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基于中国铁路机车与汽车产业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

^⑤ 封凯栋、姜子莹、赵亭亭：《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基于中国铁路机车与汽车产业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

^⑥ 资料来源于《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1961）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1961）。

^⑦ Zhou Yu and Liu Xielin, “Evolution of Chinese State Policies on Innovation”, In Yu Zhou, William Lazonick, Yifei Sun eds., *China as an Innovation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34-36.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制定了以“市场换技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并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责和资源分配关系。国家逐渐取消以专业工业部委为中心的工业行政体系，为多元主体的进入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发展创造空间。这无疑顺应了当时世界的发展潮流，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规模的迅速增长。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改革一套旧的工业行政体系之后，国家并没有建立起高国家自主性、高国家专业性以及对产业界具有高渗透性的信息网络来支撑其与产业的互动。因此，国家的创新政策只能从总体上强调对创新的重视，却难以有针对性地激励企业和产业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在实践中，中国工业技术更多地被嵌入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全球体系中，甚至一度产生了对外来技术体系的依赖。^①

在这一时期，国家领导人把国家建设的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采用“市场换技术”战略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是实现进口替代和加速本土工业技术能力，但实际却采用国营骨干企业和跨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的方式，以中国市场份额来换取跨国公司对中国的产品图纸和技术资本品输出。中国实际上将国外技术资本品输入而不是本土的自主创新当作最重要的技术来源，而本土工业的中心任务是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和技术转移，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国家的任务转为创造有助于招商引资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为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管得太多太死，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基层发展经济的活力”的问题，国家实施了行政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②行政体制改革中的一项主要举措就是解散工业部委体系，实现放权于地方、还权于企业。国家对中央工业部委进行大幅度削减和撤并，并且打散了中央工业部委下属的行政体系。国家将原来中央工业部委直属的大量科研机构和工厂进行解体、企业化改制或下放，只保留极少数骨干科研机构和工厂作为中央政府直属的企事业单位。^③在把部分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国家还把原来各工业部委所拥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权、物资分配权、技术改造权等对工业资源的支配权和工业活动的管理权授予地方政府。此外，国家把原来工业部委体系下很多中央部门对地方部门的行政领导权变为业务指导权。财税体制改革最直接的效果是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支配权。^④中央政府转而主要通过干部人事制度和政治领导来影响地方政府，通过财税工具等市场化手段来引导企业。^⑤这导致更多的信息特别是那些缄默信息保留在了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手中。

这些改革直接改变了国家行政体系对产业界的渗透性。中央政府丧失了原有的渗透进基层的组织基础，更多地依赖地方政府来获取信息。中央政府获取信息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很难获得那些高度依赖于特定情境中的实践和互动所产生的缄默信息。^⑥地方政府获得部分企事业单位的直接管辖权，与之建立了行政联系，再加上地理临近性，更容易发展对当地产业界的渗透性网络，如通过组织实地调研、收集地方性消息等方式来获取信息。

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国家自主性经常受到地方政府出于局部与短期利益考量的干扰。在行政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成为经济投资决策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试验做法

① 封凯株、姜子莹、张立：《产学研组织方式变革：路径依赖与改革前瞻》，《学术研究》2020年第10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

③ Yu Zhou and Xielin Liu, “Evolution of Chinese State Policies on Innovation”, In Yu Zhou, William Lazonick, Yifei Sun eds., *China as an Innovation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34-36.

④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⑤ Hongbin Cai and Daniel Treisman,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cy Experiment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no.1, 2006, pp.35-58.

⑥ 吕方、梅琳：《“复杂政策”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连片开发扶贫项目的讨论》，《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

下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①有限的任期和地方政府之间以 GDP 为导向的激烈政绩竞争使得各地政府的决策更具有局部化和短期化的特征。^②这种模式也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在工业活动中的系统协调性职能。中国同时出现了中央和地方多个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在政策实践中由中央政府推动的整体目标和各地方政府推动的局部目标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甚至在部分重要的工业决策中，中央政府和部分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③

国家专业性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有中央工业部委及其下属产业科研机构精简后，国家积累的工业技术专业知识往往由于储存载体的缺乏而难以存续。原有中央工业部委的官员只有相对少数进入新的部委，另一部分在大幅度缩编后作为研究中心、协会、学会等“智库”专家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更多的官员选择“下海经商”。同时，由中央政府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人员数到 2005 年缩减了 30%。^④在追求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原则下，中央政府选拔了更多在市场、外贸和金融等经济领域具备经济知识优势和管理能力的新一代干部。^⑤由于成长路径的差异和人手的有限，这些干部很难长期接触工业实践，所以他们在掌握与工业相关的复杂知识、缄默知识方面存在不足。虽然中央政府的工业技术专业知识有所削弱，但相比于地方政府而言，它还是通过一套高标准、成熟专业的人员选拔和培训系统建立起一个更加专业的官员团队，而且凭借与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紧密的合作网络而获得较为充分的专业支持。然而，由于中央政府本身专业官员团队的规模有限，再加上央地之间专业资源共享机制薄弱，中央政府的专业性力量并未“惠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仅拥有有限的官员规模，且财政资源和影响力相对有限，能够吸引到的官员和咨询专家的水平明显不如中央政府。此外，大多数地方政府未能与高水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深入的合作关系，难以在决策上得到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下，中国主要依靠作为其合资伙伴的跨国公司来获得产品图纸、技术设备、生产工艺等技术载体。这些活动所涉及的技术成熟、产品需求明确，所以工业技术活动本身及其治理的复杂性和缄默性较低，中外合资企业的生产实践往往不涉及复杂技术和产品系统平台的开发。^⑥于是，各级政府在实践中倾向于为引进技术创造资源和政策条件，如提供土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资源、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实施与国际接轨的制度改革等，而忽视了发展复杂产品系统及其组织协调等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更重视从哪里可以引进产业先进技术、用什么方式可以引进技术、提供什么资源和政策条件有利于招商引资等信息和知识。在以 GDP 指标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中，各地的竞争又大大强化了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偏好。^⑦这些促成了该时期以大规模制造为主的“世界工厂”模式。

以上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及本土工业对产业技术活动的统一协调。^⑧当转向强调自主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时，国家对复杂创新活动的理解能力短板就显现了出来。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年至今）

在新时期，中国制定了以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但上一时期延续下来的国家结构以及由

^①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Sebastian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43, no.1, 2007, pp.1-26.

^②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

^③ 瞿宛文：《多层级模式：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文化纵横》2018 年第 2 期。

^④ 1986 年有 43.17 万人，2005 年有 30.1 万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⑤ 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 年第 6 期。

^⑥ Kaidong Feng,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1-16.

^⑦ Yuen Yuen Ang, “Do Weberian Bureaucracies Lead to Markets or Vice Versa? A Co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in Miguel Centeno, Atul Kohli and Deborah Yashar eds., *Stat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80-306.

^⑧ 封凯栋、姜子莹、张立：《产学研组织方式变革：路径依赖与改革前瞻》，《学术研究》2020 年第 10 期。

此构建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不再适应该时期国家工业技术系统的需求。虽然以前形成的创新政策体系涵盖面广、财政投入大，但很多政策的实际结果与政策预期依然存在差距，不少政策只是起到了修补既有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框架的效果，很难推动创新转型。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本国经济必须要进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将经济发展模式从以大规模模仿和制造为主的“世界工厂”模式转变为以前沿技术创新引领的“创新竞争”模式。中国需要更多地凭借以本土工业为主的技术能力来完成产品和系统开发，并在关键技术上达到国际前沿水平。部分本土工业不再拥有清晰的、可以直接模仿的国外对象，前沿创新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了技术活动及其治理的复杂性与缄默性。^⑨

在这一情境下，国家若想继续培育创新型竞争性企业、引领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和平台型技术的突破，就必须了解企业当下的发展状况和实现创新发展的难点、了解哪些是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和平台型技术，发展促进企业间协作的机制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显然不应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通过建立集中式的国家结构来获取和处理信息。新时代的发展任务要求国家在政企边界明晰的情况下，通过与广泛、多样化的市场主体建立制度化、参与式的信息结构来及时获取和处理信息，由此发展适应性的工业理解能力。^⑩

中国此前的工业行政结构在应对新时期创新经济的不适应性主要体现在：首先，由于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不足，很多创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地方政府局部和短期利益影响时会呈现地方化和短期化的倾向，这导致国家很难针对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和平台型技术制定出有效的政策。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和平台型技术往往是复杂技术系统，具有长期性、高风险性和系统性，需要长期培育和多地方、多领域联动。^⑪但在政治锦标赛的逻辑下，地方政府作为政策执行主体，一是倾向于将资源投入短期见效、低风险的领域，并在实施过程中通过选择国有、规模较大或经济指标较好的企业来规避风险；二是经常实施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于支持有利于本地的产业发展，对资源的跨地域配置设置政策障碍。这使得国家面向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和平台型技术的政策举措难以在部门、地区之间形成协同，往往被弱化为区域性的项目，或者被弱化为单个产业领域的试点。^⑫

其次，由于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不足，特别是国家专业性及其对产业界的渗透性不足，国家难以高效地定位到真正有潜力的创新型竞争性企业，引导和激励其持续开展创新活动，而只能依赖数量型指标来筛选和评估企业创新情况。中国多数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专业能力有限，未能掌握甄别产业企业创新的专业知识，只能依赖财务指标（如企业资产、企业营业收入等）、科研投入产出指标（如科研论文数量、研发投资强度、专利数量等）等数量型指标来筛选企业。这造成了显著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很多企业采取策略性创新行为，为了迎合政府政策要求而操纵指标，而不专注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开发有用的技术和产品。^⑬中央政府虽然相较于地方政府具有更高专业性，但缺乏足够的对产业界的渗透性来及时发现并有效监管这些企业的策略性行为。由此，出现了企业科研投入、专利数量等形式创新繁荣，但就长期来看，研发投入和真实有效的创新产出却没有实现同步增长。^⑭

⑨ 封凯栋、姜子莹：《国家在工业体系系统转型中的双重角色》，《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6期。

⑩ 封凯栋、姜子莹：《国家在工业体系系统转型中的双重角色》，《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6期。

⑪ 封凯栋：《百年变局中的国家创新系统》，《中国科技论坛》2021年第6期。

⑫ 封凯栋、姜子莹：《政府政策如何未能有效激励企业创新：从科技补贴的定量分析谈起》，《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期；张杰、郑姣姣、于浩：《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性质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⑬ Kaidong Feng and Ziyi Jiang, “State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Policy Perform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wo Types of Innovation Projects in China”, *The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2021, vol.38, no.4, 2021, pp.427-453; 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

⑭ Xibao Li, “Behind the Recent Surge of Chinese Patenting: An Institutional View”, *Research Policy*, vol.41, no.1, 2012, pp.236-249.

因此，中国亟需构建一套与当前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工业行政结构，保证其自主性、专业性及对产业界的渗透性，发展出适应性的国家工业理解能力，为实现有效的工业技术政策提供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等，有效增强了国家工业理解能力。

四、新型举国体制所需的制度基础

为有效扮演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国家需要制定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工业技术政策，这种政策的调适离不开国家从工业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本文继承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中国家理论的传统，提出“国家工业理解能力”这一概念，简要分析了我国在过去70多年来三个不同时期的体制框架。在国际创新竞争中，国家扮演了两重关键角色。第一重角色是作为本国“创新经济的参与者”，这一角色的作用发挥需要以国家工业理解能力作为后盾，该能力有赖于国家建立与产业界有效的互动机制以获取信息。这些互动机制既不会由市场自发形成，也不是国家简单地通过文件下达和政策宣传就能建立。发展战略对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在国家行政体系的自主性、专业性及其对产业界的渗透性上有特定要求，这意味着互动机制的形成需要政治性、资源性和组织性的保障。为了构建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互动机制，国家需要以超越短期经济偏好的政治意志来保障资源的持续投入，并建立互补性的制度安排。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大部分后发国家难以在长期的国际竞争中实现持续发展。

国家在中长期的创新竞争中，还具有作为本国“社会技术转型推动者”的第二重角色。这一角色的作用发挥有赖于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适应性演进。作为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组织基础，国家与产业的互动方式必须与特定阶段的发展任务相适应，进一步地，国家结构必须与发展战略所需要的信息结构相适应。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中国在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后势必会遇到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问题：前一阶段国家信息网络建设的薄弱导致国家在当前阶段工业理解能力不足，因而国家政策未能有效推动本土关键技术突破。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的历史时刻，在创新转型的新发展战略下，本土工业需要通过实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高的关键技术创新来增强产业链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这时国家工业理解能力显得更为重要。在制定和执行工业技术政策时，国家需要在更具体、更准确的信息基础上深入认识技术的瓶颈和前景以及创新的组织过程，这样才能保证战略性资源投入的针对性和有效规模。国家只有具备充足的工业理解能力才能更好地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起来，在创新经济中实现精准介入，在达成政策目标的同时避免过度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充分发挥和协调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机制效率两方面的优势。^①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兼具国家行政体系自主性、专业性及其对产业界的渗透性的信息网络是新型举国体制最核心的制度基础。在新时期，中国需要在国家和产业界互动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具体机制，为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建设积累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张超

^① 封凯栋、姜子莹、赵亭亭：《国家工业理解能力：基于中国铁路机车与汽车产业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

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与效应

——基于 S 生态农业公司的案例研究^{*}

许 悅 陈卫平

[摘要]本文依托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构建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系统性框架，从预嵌入、嵌入行为和嵌入结果三个环节对资本下乡本地嵌入的机制与效应展开分析。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本文重点关注创业者的能动性及村企双方的直接互动过程，结果发现：（1）预嵌入因素（包括创业者资本和村企共识基础）有助于促进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而这一因素在以往研究中一直被忽视；（2）在嵌入过程中，下乡资本会通过文化嵌入（包括了解并遵从本地文化规则和变革并创新本地文化活动）、关系嵌入（包括采取曲尽人情的矛盾处理方式和构建本地社交关系）、结构嵌入（包括使用嵌入式人员和提供非契约贡献）三个维度实现本地嵌入；（3）本地嵌入不仅有助于下乡资本获取本地资源、创业者获得归属感，还会为本地农村社区创造共享价值。

[关键词]资本下乡 农村社区 本地嵌入 结构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F3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106-10

资本下乡是指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村资源开发等农业创业活动。^①近年来，随着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资本下乡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和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在我国乡土社会特殊的文化规则下，以“陌生人”身份出现的下乡资本也遭到了来自本地居民的本能反抗和歧视，^②在资源获取和经营管理中屡遭拒斥、矛盾频发，^③面临诸多不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危机。由于农村创业情境中正式制度和市场规则不够完善，下乡创业者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难以依靠传统商业范畴的经济手段完全化解，只能通过嵌入本地社会结构来弥补。^④尽管学界已经意识到嵌入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对于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已有研究多主张利用本地代理人或分包制等间接方式化解嵌入困境，^⑤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交媒体时代下农产品网商线上社会资本的获取途径与转化利用机制研究”(7207313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农人微信营销行为及其对消费者购买决策机制的影响研究”(717731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研究”(21ZDA0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许悦，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卫平（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① 陆文荣、卢汉龙：《部门下乡、资本下乡与农户再合作——基于村社自主性的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2期。

② 付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③ 陈义媛：《资本下乡的社会困境与化解策略——资本对村庄社会资源的动员》，《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8期。

④ 邢小强、葛沪飞等：《社会嵌入与BOP网络演化：一个纵向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

⑤ 徐宗阳：《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

缺乏对下乡资本如何直接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讨论，也鲜有考虑嵌入活动发生前的创业者资本和村企共识基础可能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效应，现有文献大多侧重于嵌入结果对嵌入主体（下乡资本）的影响，^①却忽略了嵌入过程给嵌入客体（本地农村社区）带来的变化。鉴于此，本研究依托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建立预嵌入—嵌入机制—嵌入结果的理论机制模型，以一家资本下乡的生态农业公司为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下乡资本融入本地农村社区的预嵌入基础和嵌入行为，并讨论嵌入对下乡资本和本地社区双方的影响，以期为资本下乡稳健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参考以往研究，本文将本地嵌入性描述为外来资本融入本地农村环境的程度，^②本地嵌入即指下乡资本与农村各行为主体相互联系和互动的过程。^③该定义强调本地嵌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固定状态；嵌入性则代表村企双方在社会交往和合作互惠中长期累积的关系紧密程度，需要通过双方的共同参与来维持。如前所述，下乡资本在本地农村社区的发展深受农村社会环境的影响，其经营成功需要建立在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同时，下乡资本实现本地嵌入还会给主客体双方都带来一定影响。本文依托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解释这一互动过程的作用机理和结果。

（一）嵌入性理论

嵌入性理论认为，行动者（actor）的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④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方法论，该理论强调行动者会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动态互动，以交换经济活动所需的关键信息和资源。所以，行动者的行为既是独立的，也嵌入在互动网络中，受到社会脉络的制约。具体来讲，嵌入可划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种形式。关系嵌入是指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直接的二元关系，侧重关系强弱对主体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结构嵌入则是从整个网络结构的角度来看待整个网络中关系的分布情况，侧重围绕中心主体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结构对主体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先前研究表明，企业可以通过调整主体间的网络关系和结构位置来影响其本地嵌入状态。已发现的策略包括与本地相关利益者建立信任，共享细化信息，联合解决问题；^⑤与本地社区建立共同利益，利用已嵌入角色作为连接，让村民和外部行为者参与决策过程，使用相同的参与者迭代，加入新的外部行动者；^⑥与本地成员频繁交互，占据产业链核心位置等。^⑦尽管此类研究为解释嵌入机制提供了依据，但上述互动策略大多以交易为导向，建立在“公平法则”基础上，^⑧忽略了社会情境对构建嵌入性关系和网络的影响。面对我国农村社区特殊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习俗，下乡资本如何在中国乡土社会“人情法则”^⑨的基础上实现嵌入，现有研究鲜有讨论。虽然也有部分研究注意到资本下乡所面临的“熟人社会”特性，但大多研究主张利用本地关键成员的既有嵌入性资源、采用雇佣本地代理人或分包制的间接策略化解嵌入困境，对创业者如何依托自身能动性构建自有嵌入性资源，实现直接嵌入，仍缺乏考虑。

① 陈义媛：《农产品经纪人与经济作物产品流通：地方市场的村庄嵌入性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2期。

② Jack Sarah L. and Anderson Alistair R., “The Effects of Embeddednes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17, no.5, 2002, pp.467-487.

③ Munkejord Mai Camilla, “Becoming Spatially Embedded: Findings from a Study on Rural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Norway”,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view*, vol.5, no.1, 2017, pp.111-130.

④ 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1, no.3, 1985, pp.481-510.

⑤ Uzzi Brian,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42, no.1, 1997, pp.35-67.

⑥ Vestrum Ingebjørg, “The Embedding Process of Community Ventures: Creating a Music Festival in a Rural Commun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vol.26, no.7-8, 2014, pp.619-644.

⑦ 田宇、杨艳玲等：《欠发达地区本地能力、社会嵌入与商业模式构建分析——基于武陵山片区的多案例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6年第1期。

⑧ 黄光国、胡先缙：《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领导文萃》2005年第7期。

⑨ 陈柏峰：《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社会》2011年第1期。

(二) 结构化理论

结构化理论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了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的关系，指出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并非是完全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发生作用的。^①该理论认为，社会结构同时具有制约性（constraining）与使动性（enabling）。一方面，个体在进入某一特定社会结构时，会形成某种固定的社会定位，并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个体在环境中也具有能动性（agency），可以通过运用社会中包含的丰富规则和资源，使其本身的定位发生变动，进而建构新的社会结构。因此，该理论不仅认识到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形塑（shape）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个体在环境中的能动性。运用结构化理论既为本文解释下乡创业者依托能动性采取一系列直接嵌入行为改变自身社会结构位置提供了有力支持，也有助于厘清本地嵌入对下乡资本和本地农村社区双方产生的影响。

具体来讲，基于我国农村社区的特殊情境，下乡创业者在入驻本地农村社区时，其社会结构位置最初会被设定为“外来者”或“陌生人”。这一社会结构定位导致其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拒斥和歧视，并面临生产经营受阻或资源互动不畅等结构环境制约带来的本地嵌入困境。但环境并不会完全限制其在本地社区中的活动自由。环境的形塑作用会使创业者主动改变行为，适应本地社会规范。创业者将发挥能动性，主动与本地居民接触，了解当地文化和社会规则，并与本地居民构建社交和合作关系，从而与环境结构发生互动。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嵌入行为，本地居民会逐渐认可并接受下乡创业者，下乡创业者在本地社会结构中的身份位置也转变为“自己人”。由此，下乡资本获得了本地环境中的有限资源，同时也会给本地农村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变化。

(三) 本文理论框架

依托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起“预嵌入—嵌入行为—嵌入结果”的分析框架。首先，关注下乡资本的预嵌入环节。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侧重于剖析嵌入活动的发生过程，对嵌入活动发生前的“预嵌入”基础缺乏考虑。虽然部分研究指出创业环境会对嵌入性产生影响，但这类研究着重于强调下乡资本所在的外部环境因素，缺乏对创业者内部因素和村企互动因素的关注。事实上，从结构化视角来看，在预嵌入环节，既有的个体资源条件和双方互动基础会影响行为主体的嵌入行为。具体来讲，创业者的能动性是建立在个体资源储备基础上的。创业者本身资本积累的差异，会使不同创业者拥有不同的网络和关系建构能力，也会导致他们在面临嵌入困境时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②同时，创业者的能动性是体现在与本地社区的互动过程中的。双方对创业活动内容和发展规划的信息沟通是村企互动的第一步，能否就此达成一致共识是双方构建嵌入性关系和网络的重要前提。良好的村企共识基础会使创业者获得更多的本地支持，并对村企双方的发展都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在预嵌入环节，本文从创业者资本和村企共识基础两个维度讨论下乡资本在本地嵌入前所具备的条件。在创业者资本方面，参考 Bourdieu 的实践理论，^③创业者的资本具有不同的形态或类型，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本研究将创业资本定义为创始人在进入村庄之前拥有的所有类型资本的总和。在村企共识基础方面，本文将村企共识基础定义为创业者与本地农村社区在创业活动的内容和发展规划方面的共同兴趣和目标一致性。

其次，从文化、关系和结构嵌入三个维度解读创业者的嵌入行为。如前所述，先前研究在资本下乡嵌入机制的探讨中，主要基于关系和结构嵌入的二元框架分析了下乡资本利用委托代理人实现嵌入的间接策略。这类观点虽然为解释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机制提供了经验借鉴，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

^①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② Shaw Eleanor and Carter Sara,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oretical Antecedent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ia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vol.14, no.3, 2007, pp.418-434.

^③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pp.241-250.

在利用本地既有嵌入性资源的间接嵌入机制中，创业者仅通过少数关键成员与本地社区建立间接关系，其本身仍脱嵌于本地农村社区，无法克服下乡资本与乡土社会互动不畅的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源上解决下乡资本的外来者劣势问题。第二，虽然已有少量研究关注到创业者的直接嵌入策略，^①但一方面，目前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关系嵌入中的关系构建机制，缺乏对其中矛盾化解机制的分析，对结构嵌入的内涵建构也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先前研究忽略了“文化嵌入”在中国农村情境中的重要作用，与此相关的文化嵌入机制也无法涵盖在关系和结构的二元框架中。鉴于此，在嵌入行为环节，本文提出文化嵌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三元分析框架。对于文化嵌入维度，我国乡土社会久为流传的文化规则定义了特定区域范围内社区成员的身份、意义和共识，并约束其经济和社会活动开展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惯例。下乡创业者在农村情境中所要面对的宗族、风水、风俗讲究等乡土社会规则和文化习俗，对下乡资本的嵌入性发展产生独特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本文所述的文化嵌入即指下乡创业者与本地农村社区就社会规则和文化惯习等达成一致认识的过程，主要关注行动者之间社会文化认知的互动和重构。对于关系嵌入维度，我国乡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本地社群成员之间会表现为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②且行事注重“人情”和“面子”。下乡创业者能否利用乡土逻辑，会影响下乡资本面临的处事原则。因此，本文所述的关系嵌入即指创业者与本地居民化解矛盾，构建并维持良好社交关系的过程，涉及行动者之间的信任、信誉和亲密度感知。对于结构嵌入维度，下乡资本与本地农村社区的互动网络会创造更多机会，并影响创业者的行动。一方面，利用本地关键行动者（如村权威）可以搭建与本地其他成员互动的桥梁，减少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作为连接本地网络和外部资源的重要节点，下乡资本通过为本地农村社区提供外部连接桥梁，可以占据嵌入性网络中的关键位置，弥合网络中的结构洞。因此，本文所述的结构嵌入即指下乡创业者联接本地环境与外部资源形成利益合作关系和网络的过程，主要考察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最后，从嵌入主体（下乡资本）和嵌入客体（本地农村社区）两个维度检验下乡资本的本地嵌入效应。在嵌入主体方面，已有不少研究表明，嵌入能够帮助企业获取难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本地资源，并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③因此，通过嵌入获取本地资源（包括有形的要素资源以及无形的信息资源），是下乡资本实现嵌入的首要动机。^④在这一过程中，嵌入本地社区会提升创业者的身份认同感，激发创业者的本地热爱主义。^⑤所以，本地嵌入也会给创业者自身的本地归属感带来影响。而在嵌入客体方面，已有研究则关注较少。事实上，结构化理论表明，行动者是具备能动性的，可以自由修正结构。随着创业者与本地环境互动，本地农村社区的资源状态和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下乡资本可能会与本地情境联合发展，为本地社区创造共享价值。由此，本文将从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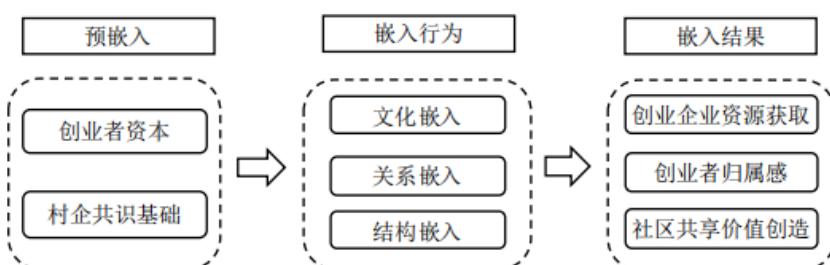


图1 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① 许悦、陈卫平：《资本下乡如何嵌入本地农村社区？——基于117家生态农场的实证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

^③ Czernek-Marszałek Katarzyna,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Its Benefits for Cooperation in a Tourism Destination",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vol.15, 2020, p.100401.

^④ Vestrum Ingebjørg and Rasmussen Einar, "How Community Ventures Mobilise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Research*, vol.19, no.3, 2013, pp.283-302.

^⑤ Salder Jacob and Bryson John, "Plac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Firming Small Town Economies: Manufacturing Firms, Adaptive Embeddedness, Survival and Linked Enterprise Structures",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vol.31, no.9-10, 2019, pp.806-825.

业企业资源获取、创业者归属感和社区共享价值创造三个维度考察下乡资本的嵌入结果。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法最适合解释“如何”和“怎么样”这类的研究议题，^①而单案例研究可以更好地对单个情境进行深入剖析与详尽说明，帮助提取基于复杂现象的理论或规律，^②非常适于本文的研究情境。根据案例研究的理论抽样原则，本研究选取 S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 公司）这一单案例展开分析。S 公司于 2012 年由 120 位消费者每人众筹 5 万元农产品预付款成立，由创始人 ZHP 带领的专业团队运营管理。公司经过多方磨合、选址，在广东惠州 ZT 村流转土地 200 亩，建立生态农场，以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生态种养产品，同时积极拓展电商渠道，采取预付制和会员制并行的经营模式扩大产能，年销售额达 2000 万，经营较为成熟。

以 S 公司为研究样本是因为它是外来资本进入农村社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典型案例，经营类型符合本文的研究对象要求。更为重要的是，S 公司不以委托“本地代理人”的方式来管理农场，而是由 ZHP（外来者）自主经营管理，且 ZHP 及员工均住在村里。在 S 公司的本地嵌入过程中，创业者、创业企业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嵌入变化过程：由最初矛盾频发到创业者被本地社区接纳，并被授予“荣誉村民”称号。因此，该案例为剖析资本下乡如何自主嵌入本地农村社区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且合适的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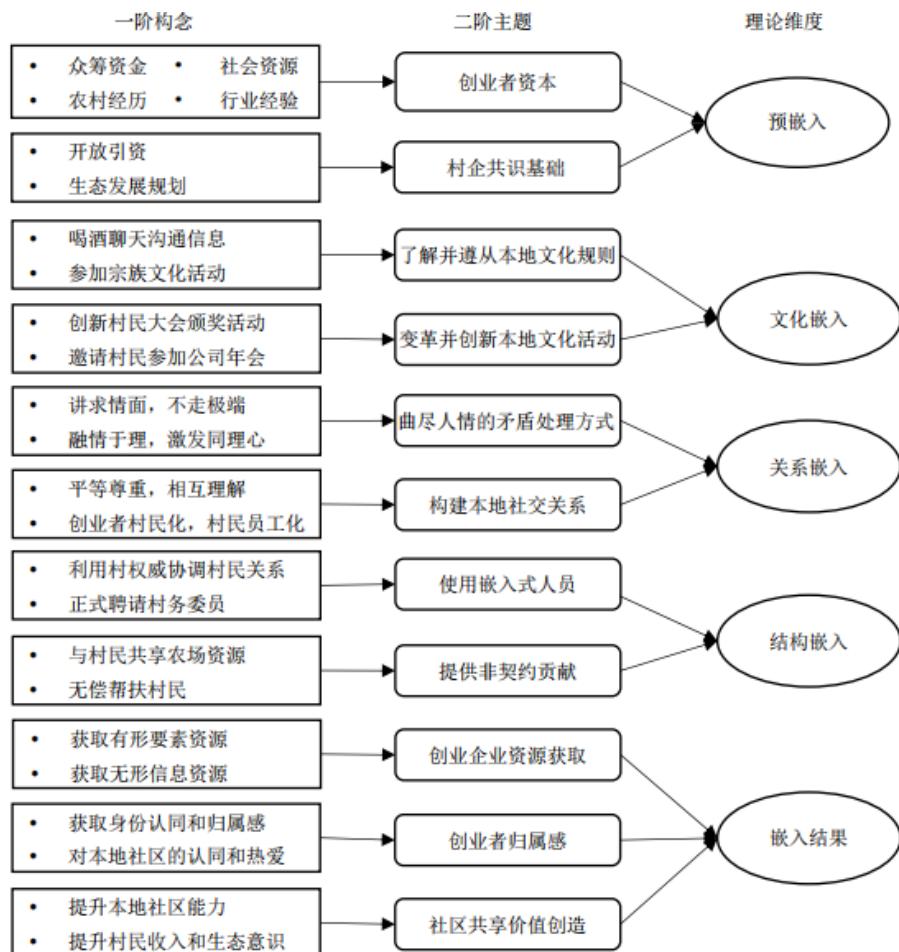


图 2 本研究的数据结构

① Yin Robert,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3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 2003.

② Eisenhardt Kathleen and Granebner Melissa,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0, no.1, 2007, pp.25-32.

究情境。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实地观察、收集档案资料的方法获取 S 公司的研究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三角验证，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数据收集共计三轮，分别为 2017 年 5 月、2018 年 2 月和 2020 年 12 月，访谈对象包括了 S 公司创始人、员工以及 ZT 村的村委和村民。每次访谈持续 45 分钟到 3 个小时不等，最终整理得到访谈文字稿 56 万余字。本文采用归纳演绎法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通过识别理论构念对数据进行三级编码，最终数据结构如图 2 所示。

三、案例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 预嵌入

1. 创业者资本。

数据显示，ZHP 的创业资本对于 S 公司进驻村庄及之后与村庄的关系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首先，S 公司是以众筹方式建立的，在进入村庄之前已有 600 万元无息的启动资金（经济资本），这使得 ZHP 有充裕的资金来支付土地租金，并在与村民发生矛盾冲突时可满足村民的利益需求。ZHP 在访谈中说，“我制定了全村（土地租金）最高标准，全部都一千五，不准八九百、一千”。面对用地和日常生产生活中与公司发生矛盾的村民，除了建立私人社交关系外，S 公司在解决矛盾冲突时也会给予经济补偿。正如 ZHP 所说，“你给他些利益是好事，没有什么回避金钱的问题。金钱就是金钱，大家和谐就是润滑剂”，“合理的给，不给不行。一分钱都不给，那你就完了”。

其次，S 公司的 120 个众筹会员不仅是农场的忠实消费者群体，也是农场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访谈中，ZHP 谈到了在农场初创时期通过众筹会员的社会资源来发展或加强与本地镇政府、村委的关系。他说，“这里面我安排了一件事。2013 年春节前后，我们会员帮助联系了当地政府领导到村里来调研，并与村委座谈”。

再次，在创办 S 公司之前，ZHP 已经有农村生活经历和农村创业的经验（文化资本），这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乡土社会，并正确认识和处理与村民的关系。ZHP 之前曾有因合作者和农户起冲突而导致创业失败的经历，正是这种经历，使得 ZHP 对村民关系“开始觉悟”。他在创立 S 农场时与村里有话语权的村权威、意见领袖、宗族长老先沟通，在他们的帮助下和村民一家一户签约发钱，“彻底做到一家一户心甘情愿”，避免了租地问题带来的隐患。此外，儿时的农村生活经历使 ZHP 与村民更容易亲近，遇事时也知道用什么方式解决更妥当。正如他在访谈中解释的，“想想小时候老家之间的邻居关系，宗族的这些斗争，不同姓氏会有斗争，甚至是敌对的，我对小时候事情都有印象。所以现在做的时候，就是应该找谁我有印象，这都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

最后，ZHP 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生态农人，他在当地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象征资本）。当 ZHP 找 ZT 村村委表示要租地做生态农场时，村委欣然接受。这既是因为做生态农业与 ZT 村创建生态示范村的定位相符合，也是因为 ZHP 在生态行业的声誉让村委相信他是真实的农业创业者。访谈时多个村干部表示，在租地之前就已听说过 ZHP 的生态农业经历，并“相信他做的是真的，如果是假的早就发财走了”。

2. 村企共识基础。

在村企互动初期，双方对创业活动的认知一致性为后续合作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方面，ZT 村有强烈开放引资的意愿，鼓励并支持外来者创业。在农场初创期，村委就尽力帮助 ZHP 解决嵌入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S 公司的生态经营理念与 ZT 村的发展原则是一致的。早在 2003 年，ZT 村就提出创建生态示范村的目标，村支书在访谈中也提到，“如果不是做生态的来，我们一定排斥。因为他农药会很厉害，对我们这田地和环境的损害很大”。鉴于此，S 公司的经营内容在嵌入前已基本得到了当地认可。

(二) 嵌入行为

1. 文化嵌入。

(1) 了解并遵从本地文化规则。对于外来者而言，掌握本地社区的文化规则（如宗族文化、风水信仰等）以及社会结构信息（如村民个性、矛盾及交往方式等），是采取高效、正确的嵌入行为的重要线索。为此，ZHP 采取和村委村民喝酒聊天的方式，获取本地的缄默化信息。他提到：“每天晚上我就是炒两小菜，买一箱啤酒，谁愿意来喝谁来，谁愿意聊天谁聊。这样大家说话就没戒备心了嘛，话匣子一打开，你聊上个十天八天不就基本上什么都了解了么。”在此基础上，ZHP 了解到 ZT 村族姓特征明显，村中大姓占人口数 95% 以上，整个村落遵从宗族关系和传统文化的社会规则，每年都会举办近千人参加的大型祭祖活动。因此，他主动向村里表达非常尊重并重视本地宗族文化，并愿意参加祭祖活动。这样的态度受到了村委和村民的认可，双方在文化规则方面达成了一致认识。

(2) 变革并创新本地文化活动。随着 S 公司嵌入过程的推进，2015 年村委在村民大会上专门加了一个颁奖环节，授予 ZHP 首个“荣誉村民”奖，表彰他是“做得最好的外来人”。这一称号的获得标志着 ZHP 本地嵌入的初步实现，ZHP 也在本地社区获取了更多的话语权。第二年，在他的建议下，村委会在村民大会上又设立了“孝敬老人奖”，表彰敬老爱老的本村居民，并由 ZHP 为获奖者颁奖。之后每年村委都会根据村民的表现调整奖项设置，有时还会询问 ZHP 的意见。这一行为表现了 ZHP 对本地既有文化活动的创新，新型的文化规则增加了其与本地村民的互动联系，同时提升了创业者和农场的象征资本。此外，S 公司每年年会都会邀请村委、小组长、村民等一起参加，后来这也成为 ZT 村每年必会举行的文化活动。这一外来者与本地村民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是在农场的惯习规则下由农场主动发起的，它使得农场在文化嵌入中逐渐由受既定的文化规范影响到向本地居民输出新的企业文化，实现了文化关系的联合依赖转化。

2. 关系嵌入。

(1) 曲尽人情的矛盾处理方式。曲尽人情是指农场在处理与村民的矛盾时，能站在村民的立场上，委婉周到地把人之常情或人情世故予以充分考虑。曲尽人情之所以能促进农场的本地嵌入，是因为它遵循了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首先，它体现了讲究情面的处事原则，在处理关系时，顾及人情和面子，讲究忍让；其次，曲尽人情意味着当情与理发生冲突时不“认死理”，而是“通情达理”，与乡土逻辑中的“不走极端原则”相契合。具体来讲，ZHP 对处理村民冲突问题始终强调，一是要讲究情面，不能和村民直接对立，要尽量满足村民要求，让利于村民；二是既要理解村民的难处，也要融情于理激发村民的同理心，让他们理解公司的不易。因此，当面对村民偷菜的问题时，农场首先是以不计较的态度，不追究赔偿。此外，ZHP 也试图融情于理让村民理解农场的处境，和村民平等沟通，“你想吃啥你说嘛，但不能自己拿。你去拔会带动示范效果，老百姓都认为农场的菜谁都可以去拔，那我们不就不用干了么”。后来，农场又推行了几条举措：一是村民如果需要免费的菜，可以向管理人员索要配送盈余的部分；二是村民可享受员工折扣到农场买菜。这些举措并没有以文字或规章制度形式呈现，而是通过口头方式让村民们知晓。诸如此类情境化的解决方案使村民对企业和创业者的行为和身份有了新的认知，也给足了村民“面子”，此后类似偷菜的事件也没再发生。

(2) 构建本地社交关系。ZHP 始终秉持“平等尊重、相互理解”的态度与村民交往，并向员工传递两种核心理念。一是“ZT 是我家，我是 ZT 人”；二是“村民就是我们的员工，必须把他们当成一家人看待”。该理念具体可归纳为两个层面，即“创业者村民化”和“村民员工化”。一方面，为实现创业者村民化，S 公司建立了开放式农场。农场没有大门和围墙，村民可以自由出入农场的生产场所，观察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农场员工随时沟通。这样主动开放的经营模式让村民逐渐放下了对外来者的警惕，相信 ZHP 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发展农业。在与村民的交往中，ZHP 从不以外来老板自居，而是充分地尊重村民，平等地和农民相处。他一开始就跟村长申请“村民待遇”，提出“我是你的村民，你要关照我，你不要把我当老板任人宰割”。他自己也和员工一起，在农场创立之初就搬进了 ZT 村，农场

员工在访谈时也说道，“他（ZHP）反正把村里这地方当家了”。ZHP 创业者村民化的态度和行动向本地社区和居民传递了真诚友好的交往信号，为构建本地社交网络、实现关系嵌入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村民员工化”的交往理念让 S 公司在日常交往中能够妥善处理和村民的关系。ZHP 和员工在日常交往中会与村民保持问候，见面常打招呼。如 ZHP 所说，“这是跟老百姓之间的互相尊重”，“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甚至你不打招呼，人家都不舒服。有的老板，走路脸都抬到天上去了，看不上一切的表情，那就完蛋了”。平时走访村民遵循“礼尚往来”原则，把村民当作在农村的亲戚，当作“一家人”，如逢年过节要送节礼、红白事时随礼帮忙等。此外，ZHP 和员工还会经常和村民一起喝酒吃饭，平等随意地对话、聊天，通过频繁地社交建立情感联系。农场还给村民以员工福利，让其同享员工折扣。这样的处事规则与农村的社会交往惯习相适应，村民也逐渐接纳了 ZHP 和农场员工，平时不再故意找他们的麻烦，发生摩擦时也会尽量相互理解包容，将他们纳入了讲“人情”和“面子”的熟人社会圈子。

3. 结构嵌入。

（1）使用嵌入式人员。由于 ZHP 的外来者身份，S 公司在嵌入本地时尤其是在刚进入村庄时，面临着与村民沟通相处的诸多困难。为此，ZHP 利用本地嵌入式人员（主要是 ZT 村的村干部和宗族长老等村权威人员）作为连接桥梁，帮助农场更好地融入本地。在访谈中，ZHP 多次强调了嵌入式人员的作用，如“这个事因为他是村里的头头，你得跟他商量”，“你得首先跟头头沟通好，他去沟通比你沟通强”。村权威之所以能发挥桥梁作用，有三点原因。一是他们在村庄的社会关系网能帮助农场动员村民和协调处理农场与村民关系；二是村权威与村民们的信任关系也能为农场和村民之间提供信任担保；三是村权威在村庄中的人情和面子不仅可以在化解农场与村民之间矛盾中发挥关键作用，还有助于农场规避村庄社会对外地人的歧视。除了私下邀请村权威出面协调村民矛盾，ZHP 还在 2016 年正式聘请农场主要地块所在小组的村小组长作为村务委员，专门负责协调处理公司与村民关系。对此，农场一位员工评价道，“我们的村务委员，每天就来农场逛一逛，但我觉得值得。因为他在这儿，村民闹事的这种事情就不发生了”。聘请的村务委员不仅能帮农场避免和村民的摩擦，还在 2017 年农场扩张租地时代表公司去和其他村小组长、村民谈价，为公司节省了诸多交易成本。ZHP 在访谈中评价道，“他（村务委员）去帮我谈和我去不是一回事。跟老百姓谈工作的时候，他去谈实实在在，我去谈一定偏高，这不用说”。通过正式聘用的利益联结，S 公司将村权威内化为公司内部成员，利用其既有的嵌入资源架起本地沟通桥梁，占据了更多的结构洞，并在信息和要素资源竞争中获得优势。

（2）提供非契约贡献。提供非契约贡献是指企业出于自愿，主动调动企业内外部资源带动村庄发展，并承担村庄的社会责任。一方面，S 公司与本地共享企业资源，如与村民分享市场资源，将来访的消费者引流至本地村民开设的民宿和餐馆；在公司网店中开设特别栏目，帮销村民生产的客家黄酒、艾饼等。S 公司受到不少媒体采访和报道，也吸引了另外两家生态农场入驻 ZT 村。另一方面，S 公司主动承担了村庄的社会责任，如帮扶患癌老人义卖蜂蜜，为村里受伤的小女孩捐款等。通过提供非契约贡献，S 公司建立了适应当地需求的桥梁和网络，并重新配置与本地环境的关系，实现由不平等依赖向联合依赖关系的转化。

（三）嵌入结果

1. 创业企业资源获取。

在前述嵌入行为的作用下，S 公司的本地嵌入过程对嵌入主客体双方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创业企业来说，它获取了创业活动所需的关键资源，包括有形的要素资源和无形的信息资源。一方面，嵌入有效减少了 S 公司土地租用的交易成本和合同治理的不确定性风险。例如，在土地租用过程中，ZHP 发现“这个村宗族会很有帮助，既然同意你在这里，他们宗族内部会统一。你做通了主要的人，就等于全村人”，于是他没有直接出面和村民谈判，而是通过与村委、宗族长老就租地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再实现土地连片租用。同时，嵌入关系弥补了正式制度漏洞。S 公司所租土地在租期内未出现毁约占地的

情况，到期后在同等条件下村民也愿意与其优先续约。ZHP 也指出，这是因为“农村都是做熟不做生”。

另一方面，嵌入也有助于 S 公司获取缄默化的信息资源。访谈数据显示，在 S 公司帮销村民产品的第 1 年，一位种植龙眼的村民主动告知 ZHP，不确定自己使用的杀虫剂是否算生态生产的禁用品，怕给公司造成麻烦。ZHP 得知后及时取消了上架该产品的计划，避免了一次品牌信任危机。正是由于已有嵌入性关系，村民才会提前告知这一隐性的风险信息。此外，隐性资源的获取也有助于创业者在面对矛盾时采取情境化的解决方案。例如，村民 L 叔是村里出了名的暴脾气，最初常因生产生活琐事（如打药污染农场菜地、农场使用公共区域停车等）与 S 公司发生冲突。对此，ZHP 在日常交往中逐渐了解到 L 叔孝顺的本性，通过每年给他 90 岁老母亲买补品的方式获得了 L 叔的认可，化解了双方矛盾。ZHP 指出，“我跟他交往这么久，我发现他也有守规矩的那一面。你给他钱，他不一定有感觉。你孝顺他妈的时候，他心里一定对你无比尊重；你的方式得是他接受得舒服，你孝敬老人，他就舒服了”。

2. 创业者归属感。

对于创业者本人而言，嵌入本地的过程不仅使 ZHP 积累了更多的个体资本，还帮助 ZHP 规避了外在性，实现了本地情感归属，获得了身份认同感。从 ZHP “荣誉村民”的称号可以看出，他已获得了本地村民的认可和接纳，他也由衷地把自己当作本村人。他评价说，“我觉得我（在 ZT 村）住得挺好，和老百姓喝酒、说话，我没觉得我是外人”，并表示自己“愿意葬在 ZT 村的青山绿水中”。这种对本地社区正向的依恋情感，能够很好地提升创业者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也带来了情感归属的第二个体现，即对本地社区的认同和热爱，并产生为本地社区获益而作出贡献的意愿。就像 ZHP 所说，当他向消费者介绍 ZT 村时，“我讲的和他们（村民）那个情绪是一样的。就像一家人嘛，我为他们的历史而自豪”。同时，ZHP 也会主动从发展理念和市场资源等多方面助力本地社区的发展。

3. 社区共享价值创造。

对于 ZT 村来说，S 公司的嵌入使本地社区与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社区的本地能力在联合依赖关系构建中得到了提升。一是提升市场联结能力。S 公司带动村民增加经济收入，并促进村民与市场的联结，在诸多媒体报道下让 ZT 村吸引了更多外部投资。二是优化村庄自然禀赋。S 公司的生态种植方式“把大部分的耕地变成生态”，“空气也不会臭臭的了”，为村民的生产生活营造了更优质的生态环境。三是改善 ZT 村的民风。数据显示，大多数受访者都谈到村庄比以前变得更加和睦，吵架打架现在很少发生。如村里老支书所说的，“你都不知道，那个小组长调皮捣蛋，那个村民以前是赖子，都难搞啊！农场这几年把他们全变成了良民”。四是强化生态环保理念。在 S 公司的影响下，ZT 村更加坚定发展生态农业的规划，村民们更加认同生态生产方式，并逐渐掌握了生态种植的相关知识。调研时，研究者观察到有村民在自家土地边堆肥，村民主动夸赞，“这都是和 S 农场学来的”。此外，部分村民还成为了农场生态农产品的消费者，更加关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一个资本下乡创业的典型案例，剖析了下乡资本在我国农村社区的嵌入过程与结果。立足于嵌入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本文重点关注下乡资本的能动性和双方的直接互动过程，提出了包含预嵌入、嵌入行为和嵌入结果三个层面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第一，创新性提出预嵌入概念，关注嵌入活动发生前的资源和互动基础。一方面，创业者个体资本积累的差异，会导致其网络建构能力不同。研究结果显示，创业者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象征资本积累为其采取情境化的问题解决方案提供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创业者与本地农村社区建立共同兴趣是影响其调动本地资源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与本地社区有一致目标和共识基础会使创业者在嵌入过程中获得更多权威支持。

第二，基于中国乡土情境，从文化嵌入、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三个维度对下乡资本的嵌入行为展开分析。在文化嵌入维度，乡土社会厚重的文化积淀构成了特定区域、民族的思想理念和行为规范，不断

传承延续的风俗礼制也成为人们表达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下乡资本可通过扩展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惯习知识，参与本地文化互动，在初创期的非对称依赖关系中获得资源供给者的认可。进一步地，创业者还可变革甚至创新本地文化活动，调动本地社区对企业的依赖和热情。在关系嵌入维度，曲尽人情的矛盾处理方式符合乡土社会讲求情面和不走极端的社会规范，有助于避免直接冲突并唤起本地居民的同理心，化解歧视和拒斥困境。同时，建立开放式农场展示企业信息，遵从本地社交习俗，与村民保持平等尊重的日常互动关系，有助于创业者跨越社区本地边界，内化成为本地社群成员，化解外来者劣势。在结构嵌入维度，利用本地权威的既有嵌入性资源是下乡资本弥合结构洞的常用策略。正式聘用能够将村权威内化为企业成员，有效化解冲突，降低企业资源获取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同时，下乡资本向本地提供非契约贡献（如共享企业资源、承担社会责任等），可使创业企业以战略伙伴的形式出现在外部资源和本地网络之间。^①由此体现出的关系前景可以用来形成资源的可能性，增强本地社区对下乡资本的依赖，形成利益共同体。^②

第三，基于结构化视角，从下乡资本和本地农村社区两个方面回顾嵌入效应。对于下乡资本而言，嵌入本地给企业带来了资源获取优势，让企业更易获得关键要素资源及信息资源，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本地嵌入还提升了创业者的身份认同感和个体资本积累，有助于激发创业者的本地热爱主义，增进创业者留驻并建设本地社区的意愿。对于本地农村社区而言，下乡资本嵌入本地带来了经济、关系、思维、能力等多维度的本地能力提升，实现了共享价值创造。

本文基于 S 公司这一典型个案剖析下乡资本的嵌入性问题，其本地嵌入的实现机制也许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例如，创业者的文化资本积累、本地社区的宗族文化特征等，都在嵌入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 S 公司的预嵌入基础及其嵌入活动为其他下乡资本提供了可行的经验借鉴。一方面，下乡资本在创业活动开始前应提前了解农村营商环境，并尽可能与村庄达成共识，以构建良好的嵌入基础。另一方面，在经营过程中，下乡资本可采取文化、关系和结构嵌入的多维策略，尝试与本地社区保持共同的文化认知及良好的社交互动，并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而化解外来者劣势。与此同时，S 公司这一案例本身虽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但其行为逻辑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对拓展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后续研究可在此基础上选取更多案例或定量样本数据进一步验证分析下乡资本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机制和效应。

责任编辑：张超

^① Kalantaridis Christos and Bika Zografa, “Local Embeddedness and Rural Entrepreneurship: Case-study Evidence from Cumbria, Englan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vol.38, no.8, 2006, pp.1561-1579.

^② Ozcan Pinar and Eisenhardt Kathleen M., “Origin of Alliance Portfolios: Entrepreneurs, Network Strateg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2, no.2, 2009, pp.246-279.

历史学

章学诚学术成就析论

陈其泰

[摘要]章学诚在近世学术史上是一位公认的名家，然则由于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复杂性，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流俗的强烈反差性，以及其价值观的超前性等项，使人难以究其底蕴。本文的撰述宗旨是立足于学术史演进的视角，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作全面、联系的辩证分析，在纵向上力求揭示章学诚对传统学术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在横向上考察其学术主张如何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以鲜明的批判性思维体现出其使命意识、担当精神。

[关键词]章学诚 《文史通义》 “道”的探索 倡导转变学风 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116-08

一、引言

章学诚(1738—1801)研究是当前特别值得关注的课题，这是因为章学诚在近世学术史上是一位公认的名家，然则由于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复杂性，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流俗的强烈反差性，以及其价值观的超前性等项，使人难以究其底蕴。尤其对章氏著述的初衷，对其深刻的哲理性探索未能恰当地把握。而当今时代，要求我们对《文史通义》这部传统经典名著的思想精华和文化价值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总结。这就需要从学术史的视野作更加深入的研究，探索这部名著所蕴涵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国精神、中国智慧；进而作出具有系统性的论述，以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并一直持续到晚年，不少篇章都经过反复修改。纵观《文史通义》成书以来200余年间学术界的反响，大体经过三个阶段。一是章学诚生前和身后一段时间，因训诂考证之学大盛于世，而章氏学术不投时好，因而知己寥落，时人对之冷漠甚至歧视。二是至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之时，《文史通义》开始受到一些名家的重视，梁启超于1921年著《清代学术概论》，指出《文史通义》中多有关于历史哲学的论述，成为晚清“思想解放之源泉”；^①胡适于1922年著《章实斋先生年谱》，论述章氏学术产生的社会环境，摘录书中诸多精义，多有表彰。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史通义》得到一些思想史或史学史名家的重视，如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1956)中指出章学诚对于人类历史进程有一些极具创见的论述，一些论点具有“天才猜测”的意义；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商榷》(1964)、《谈史书的编撰》(1981)、《中国史学史》第1册(1986)等论著中高度评价章学诚为中国历史编纂学作出的贡献，“提出了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刘节《中国史学史稿》(1982)中专设有“章学诚的历史哲学”作专章论述。笔者先后撰有《〈文史通义〉：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1988)、《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2009)、《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2013)

作者简介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0页。

等文，冀图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具有初步系统性的探讨，论述了“探索二千年史学的演变”“对考据学风的有力针砭”“探讨学术与社会史的关系”“辩证分析——《文史通义》的精髓”等问题。

回顾以往，经过几代人努力所积累的成果弥足珍贵，是继续前进的基础。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与当前发掘传统文化珍品所应达到的实质性、科学性、系统性的时代要求，仍有很大距离，尤其是，因袭旧规的惯性思维和方法运用上的不恰当，阻碍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因囿于以单纯考证标准作学术评价，将这位在中国行将进入近代社会出现的杰出学者加以贬低，无视其在哲理探索、倡导转变学风、提出历史编纂改革方向等方面影响深远的成就，甚至视之为“乡曲之士”。这种认识确实与章学诚贡献之间圆枘方凿，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务必大力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更新观念，深入探讨，勇于开拓新境。本文的撰述宗旨是立足于学术史演进的视角，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作全面、联系的辩证分析，在纵向上力求揭示章学诚对传统学术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在横向上考察其学术主张如何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以鲜明的批判性思维体现出其使命意识、担当精神。

二、学术成就

《文史通义》的命名，体现了全书探讨的范围和著述的宗旨。它包涵三层意义：先标“文史”，突出表明书中探讨的范围包括“文史著作之林”，即整个学术领域，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然后强调“通”，昌言要继承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作贯通古今的探讨，求“通”求“变”；并将文史的不同门类打通研究，强调与只作狭窄范围研究者不同的治学路数。最后归结到“义”，揭示出要以思想、观点、哲理作为贯穿全书的灵魂，彰显其与当时盛行的以训诂考据为追求目标不同的学术旨趣。由此决定了《文史通义》与《史通》虽然同被评价为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时人也每将章学诚刘知幾相比拟，而实际上两书有同有不同。《文史通义》论述的范围既包括历史编纂理论，又包括古代学术的源流演变和当今学术趋向隐藏的弊病，并且对儒家经典的真正价值从哲理的高度予以阐释。

《文史通义》(《章学诚遗书》本)共有内篇6卷，外篇3卷。其主体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阐释和对“道”的探索。打开《文史通义》全书目录，首先列在“内篇一”“内篇二”的，便是《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礼教》《经解》(上中下)、《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浙东学术》《朱陆》等篇，说明对儒家经典价值的阐释和哲理的探索，在章氏学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篇章实际上是围绕“六经皆史”说和“道在事中”两大核心论题而展开。

首篇《易教上》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①章学诚首倡“六经皆史”说，其理论意义是鲜明提出“儒家经典究竟是圣人头脑制造出来的，还是古代治国实践的产物”即“儒家经典是如何生成的”这一问题，这在全书中实有理论基石的意义。章氏理论中的诸多重要命题的立论基础正在于此，这是他将此置于全书首倡之说的深意所在。他明确提出：“六经”是古代治理国家的制度和智慧的记载，“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儒家经典虽然地位很高，但不是古代圣贤周公、孔子专门写出的一部包含极其高深的“道”的书，六经中的“道”和“理”，都是与古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乃先王治理国家的历史记载，所以，“六经皆史也”。章学诚又提出，六经是先王之政典，以《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的内容言，应当容易理解，而《易》是讲阴阳变化的，为何也是“先王之政典”呢？答曰：“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故《易》不但与五经同为政典、具有“与史同科”之义，而且《易》之道是具体典章制度之本原。庖羲、神农、黄帝有“三《易》”，都是根据“天理之自然”，即对自然现象观察、总结而得出的规律性知识来教民。章学诚又引孔子所说：“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可证《易经》究明阴阳道理，是与观象授时、制定历法同为一代法宪，故也是有关治世之记录，并不是圣人“空言著述”。章氏认为《左传》昭公二年所载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

^①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1《易教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页。

得见《易》《春秋》，以为周礼尽在鲁”这一史实很有意义。“夫《春秋》乃周公之故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则又明矣。”^①以往研究者曾认为“六经皆史”扩大了史学的范围，或有抹去儒家经典神圣光环的意义，这些看法对于理解章氏观点有积极意义，但认识仅限于此显然是不够的，须要不断向前推进。“六经皆史”这一理论创造的深刻意义在于：首次提出和辨析古代经典不是圣人头脑演绎、构建出来的，而是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一哲学根本性范畴的命题。在乾嘉时期考证之风盛行、理论思维相对弱化的现实条件下，章氏的论点具有别树一帜、引导学者向哲理探索方向努力的重要意义。至于有的文章曾经争论“六经皆史”是谁首创的问题，这显然并不重要。因为前人都只是行文中涉及，并无专门论述。而章学诚是作为重要理论主张提出，并且针对时弊加以论证，这是与他强调学术必须“经世”的主张密切相关的。

对“道”的探索是章学诚理论创造的重点，其深刻论述集中在《原道》上中下3篇。挈其要旨，有以下三项。

一是论“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演进趋势，明确阐述了“道”的客观性和历史渐进性。在《原道上》开篇，章学诚即提出该篇主要论点：“道”并不是玄妙、神秘的，作为根本原理和社会法则的“道”，是随着社会生活逐步发展的，有其客观的演进过程，国家制度等等都是后起的。其论云：“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②

章学诚首先发问：“天难道真的是不知疲倦地指挥号令着吗？”通过回答，逐层递进，强调“道”是客观趋势推演形成的，否定了是由有意志的“天”的安排的神秘观念。首先，当混沌之初，刚刚有人类时，天地阴阳变化，四时运行的“道”就存在了，但作为社会生活的“道”却未出现。这是鲜明亮出其唯物的、发展的观点：未有圣人之前，“道”就存在了，可见“道”不是圣人头脑里创造出来的，而是由社会一步步演变而产生和发展的。其次，在远古人类数量很少，即群居生活（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规定社会生活法则的“道”的最早形态已经出现。再次，随着群居的人类数量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复杂，不同的部落、部族，不同的阶层、等级的出现，作为社会生活法则性的“道”便越来越复杂、显著。最后归结为：仁、义、忠、孝这些观念，刑、政、礼、乐各种制度，都是由于客观趋势的推动而在后来逐步形成的。《原道上》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讨论，证明章氏继承了传统思想如《周易》《荀子·礼论》中有关礼制起源和国家制度的观点，并大大向前推进。由此可以看出，后圣效法前圣，并不是效法前圣的具体做法，而是效法前圣依据客观的理、势所推动，把制度创制得更加显著、更加完善的道理。可见，客观趋势（或言“事物法则性”）的道，“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③章学诚以极其形象、简洁明了的语言，解答了“道”与国家制度、“圣人制作”的关系。

二是“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④千百年来儒生对经书极度崇拜，认为圣人和儒家经典就是“道”的化身，圣人一六经一“道”三位一体，成为根深蒂固的观点。章氏却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道”与圣人不能等同。“道”是客观进程的演进，是无意志、无知觉的，圣人是对理与势的需要有所认识而创设。言“圣人体道”符合实际，言“圣人与道同体”则大错特错，表面上只是字句稍有不同，实质上是非相反。圣人不是“道”的化身，只是对当时理势的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历代儒者却因为错误地把圣人以及六经当作“道”的化身，所以忘记了认识新事物、总结理势的新变化、创设新制度的责任，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了澄清千百年来视圣人为“天纵之才”，神秘莫测，众人则是芸芸众生，只能盲目服从的观念，章学诚进而提出“圣人学于众人”的新观点。圣人的作为只是体现了客

① 以上引文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1《易教上》，第1-2页。

②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原道上》，第94页。

③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原道上》，第95页。

④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原道上》，第95页。

观理势的需要，圣人如果不从众人的行为、欲望中得到正确认识，就不能称其为“圣人”。

三是“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对此，章学诚分三层进行论证。第一层是：孔子未尝离开三代之政教，而以空言存其私说。章氏指出，欲学孔子而离开事功，是不知孔子。世儒欲学孔子而摒弃事功，抱着经书而不作为，这恰恰违背了孔子的学说。六经是明道之器，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后代儒者却视六经为圣人专门言“道”的书，把“道”与社会生活相割裂，将“道”与“器”相割裂，这是完全错误的。而最具有实际行动意义的是：事物不断发展，“道”也要发展，当代学者应担负“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的时代责任，对后世事变予以总结，以推进对社会生活演进法则性之认识。这是《原道下》的核心观点，也是章学诚在哲学探讨上高于同时代学者之处。章氏强调当时考证学者以训诂章句专攻一经为学问的极致，实则只得一隅，未能认识古大学问的全体。古代圣贤是由于总结出客观社会生活的规则性而后不得不发之为言，那么，当今学者也应当具有高度的使命感，担负阐明穷变通久，总结六经之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推进和究明大道的时代责任：“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①因此，当今对待六经、对待学术的正确态度是，改变以为凭训诂章句即能获得古人学术真谛的错误态度，树立“道”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因事物发展“道”也向前发展的正确观点，明确学者的责任是针对现实社会中“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问题，着力探究、总结出哲理性的新认识，勇于创造，回答时代的要求。

其他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如《诗教上》中论述战国之文多出于《诗》教，后世文章各种体裁发端皆在战国；《书教》强调发挥《尚书》“因事命篇”、灵活变化的特点，在当时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对学术史演变的审视和对当时盛行的醉心考据、不问世事的学风流弊作有力针砭。《浙东学术》即为评论宋代以来学术变迁的名文。章学诚提出，浙东学术的渊源，是在朱熹之学，但从南宋三袁(袁燮及其子袁肅、袁甫)之后，宗陆九渊“本心”学说。章学诚首次揭示出自明末至清初“浙东学派”的统绪，是刘宗周一黄宗羲一王夫之、王船山一全祖望。从理学学派关系言，浙东学者主要尊陆王之学，但对朱学并不抵斥，“宗陆而不悖于朱”，故一向有不争门户的传统。章学诚梳理出“浙东学术”的源头和传习，揭示出自刘宗周、黄宗羲以下，其学术特征是“宗陆而不悖于朱”，既重视个人修养，又重视通过研治史学以总结治国的经验。自刘宗周、黄宗羲以下，至王夫之、全祖望，学术前后相承，而又能摆脱门户之见。他认为，清代浙东学术源远流长，以及传承人物摒弃门户之见而尊其他学派成就这两大特点，值得揭示和发扬。章学诚进而总结浙东学术的精髓所在是：言天人性命必切于人事；讲性理与精研史学相结合，“言性命必究于史”。他所针对的就是当时盛行的“舍今而求古”的烦琐考证学风和“舍人事而言性天”的理学空谈。对于当时不为人们所知的浙东学派人物邵廷采，章学诚亦予以肯定。总之，章学诚在该篇中首次阐述的清代“浙东学派”，对于20世纪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何炳松、钱穆等学者都赞同并引申章氏的见解。

当时的学术风气，是考证盛行，由考经而考史。大多数学者穷年累月所做的是版本校勘、训诂注解、排比材料、辨伪辑佚等工作。如梁启超云：“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②而章学诚所确立的原则，是治学要别出己见，“不为训诂牢笼”，他注重的是“史义”，是纵贯分析、别识心裁，强调观点、思想，强调变通、改革，因而在学术方向、治学方法、价值认识上，都与当时的学术风气相对立，“颇乖时人好恶”。

围绕“究竟治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究竟考据在治学中应占据什么地位？”这些根本性问题，章学诚从多方面针砭了烦琐考据学风的流弊，提出一系列与流行观念对立的价值认识。首先，他倡导学术经世的思想。对于治学的根本目的何在的问题，章学诚作出精辟的回答：“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

^①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原道下》，第104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53页。

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肇端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①他明确主张学术要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反对脱离实际的无用空谈，是对清初进步思潮的继承。清初顾炎武等思想家痛责明代理学空谈，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实学”。章学诚接过清初学者的经世旗帜，批评当时学者埋头考据，“尊汉学，尚郑、许，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也，居然唾弃一切”，^②是自炫所得寸木，以为胜过别人的高楼，满足于细小的收获，忘记了根本的目的，形式上学古而抛弃了古人学术的精华。章学诚进一步把文章著述比作“药石”，必须针对社会的弊病而发：“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③他反对逐于时趋，人云亦云，贬斥沽名钓誉，私心胜气。他在书中反复提出告诫：“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救挽焉，亦轻重相权之义也。”^④到他晚年所写《上尹楚珍阁学书》中，对自己一生“经世”和“救弊”的宗旨作了这样深刻的总结：“学诚……读史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⑤“耻为无实空言”，正是他与脱离实际学风相对立的独特风格。

其次，章学诚提出区分“功力”与“学问”的命题，旨在说明考据只是做学问的基础，它在学术工作中居于较低的层次。章学诚认为，同是治学，按其性质和造诣，有两种不同的境界。“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⑥考据家搜集、考订材料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只是罗列现象，属于表层的东西，只能称之为“功力”；而从材料中提出独到的见解，才是真正的“学问”。他的分析说明了搜集原始材料与加工提炼出精品二者质的不同。他进而指出，真正的学问，是在掌握丰富材料之后，再进一步深入，以求明白其所以然的道理。他说：“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彻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⑦他指出误把功力当做学问，造成了学术方向的迷误，告诫人们不要盲目跟风，这些都切中了当时学风弊病的症结所在。

再次，章学诚指出，如果沉溺于烦琐考据而忘掉治学的目的，那么下功夫越大，离开正确的方向也就越远。《申郑》篇云：“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⑧只有冲破琐屑考订的束缚，发扬《史记》《汉书》成一家之言的传统，史学才能发展。他把考证譬作治学的舟车：“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⑨做学问需要以考据作为手段，但是不能沉溺于考据而忘记经世的目的。清代学术的发展充分证明，章学诚从学术方向、价值认识、治学方法等方面对脱离实际的考证学风的针砭，都切中肯綮，具有进步意义。章学诚对烦琐学风的批判既坚决又切中要害。他对学风流弊的针砭，亦已达到自觉的程度，有意识地以逆时趋而持风气为己任。他曾写信给钱大昕：“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⑩章学诚把挽救风气流弊视为不可推卸的时

①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5《史释》，第271页。

②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4《说林》，第226页。

③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4《说林》，第228页。

④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答沈枫墀论学》，第714页。

⑤ 章学诚：《上尹楚珍阁学书》，《章学诚遗书》卷2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30页。

⑥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博约中》，第117页。

⑦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又与正甫论文》，第807页。

⑧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4《申郑》，第249页。

⑨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3《辨似》，第158页。

⑩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上辛楣宫詹书》，第657页。

代责任，自觉地担负起来。在考据习尚风靡于世的情况下，他却看到危害，所以不顾从达官显贵到整个学者社会所构成的巨大压力，即使感到像刑狱那样的威胁，也毫无顾惜。烦琐考据的学风既然脱离实际的需要，违反学术发展的规律，那么它终将被抛弃。章学诚的批判针砭，预示着学术风气变化的新趋势。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价值超过史学的范围，对于整个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有积极意义。

章学诚观察当时学术问题眼光之敏锐，见解之深刻，还可以从他对戴震的评论中反映出来。章学诚与戴震在修地方志和评论郑樵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对戴学之“绝诣”确有卓见，评论中肯。章学诚对戴震的总评价是：“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巨儒。”^①“一时通人……而求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惟戴氏可与几此。”但许多考据家认为，考据才是戴学的“绝诣”。而戴氏著《原善》《论性》一类哲学著作，则“空谈义理，可以无作”，甚至指责为“精神耗于无用之地”。这正说明当时学术界的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朱筠、钱大昕也持这种看法，“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戴震《原善》等篇与《孟子字义疏证》相联系，都是反理学进步著作，揭露“以法杀人者人犹怜之，以‘理’杀人者有谁怜之。”是对理学杀人的抗议。章学诚恰恰是戴震的知音，他认为《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者，实有发前人未发者”，“能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②围绕评价戴震这些事实，说明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乾嘉时期崇尚考据的风气怎样把具有进步意义的学问精华掩盖了，把成就卓著的学者的形象扭曲了。二是充分说明章学诚见识卓越。章学诚有关戴震的评论，见《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章学诚遗书·佚篇·答邵二云书》等篇中，很值得再作深入研究。

(三) 历史编纂理论。《文史通义》对此作了广泛深入的探索，举其影响最大者有以下几点。

1. 以“史义”为指导，纵贯分析3000年史学的演变。章学诚以纵贯的眼光分析了3000年史学的演变。他认为，史学是发展进化的。由《尚书》变为《春秋》的编年体，由编年体到纪传体，都是史学的重大进步。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③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又因为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灵活变通，不愧为撰述的典范。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人至千名，卷盈数百”，^④“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塞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⑤以上论述集中见于《书教下》《史学别录例议》《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这些论述总结了中国史学演变的主要趋势，指出了传统史学后期严重积弊之所在。

2. 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既然正史编纂的末流已到了酿成灾难性的局面，至此亟须有清醒的认识，努力开创新局，探求历史编纂的新路。首先，章学诚不但看到正史末流表明的史家创造才能反而成为史例奴隶的严重病态，而且分析了纪传体本身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他重视《史记》的伟大创造力，称其体裁“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是三代以后著史之良法。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纪传体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⑥历史事件和趋势本来复杂，而到了正史编纂的末流，修史者难以驾驭，官修制度更严重限制史家表达独到见识，所以“本纪”部分便失去如《史记》中的纲领作用，成为如“胥吏之簿书”。如此观者茫然、人杂体猥、繁不可删的局面，已到了非革除不可的地步。其次，章学诚主张彰显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中的独特作用。纪事本末体虽然至明清甚为流行，但理论上的认识却落后于这种实际：“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

①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书〈朱陆〉篇后》，第132页。

②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答邵二云书》，第683页。

③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4《申郑》，第249页。

④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1《史篇别录例议》，第427页。

⑤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第671页。

⑥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1《史篇别录例议》，第426页。

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①因此，他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总的主张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②并且提出了两种设想：一种是设立包含多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的“传”来记人、记事，以代替书志；一种是采用“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件事之下将有关的篇章注明。其主张详见《书教》篇和《史学别录例议》。这是章学诚很大胆的设想，实是综合了他一生辨析体例的真知灼见。他将表面上似乎不相干的两大体裁打通，让它们互相补充。既保留了纪传体范围广阔、兼备几种体裁、包容量大、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又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如、记载方法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变化的优点，而用来补救后期正史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是在史学发展上打开了一条新路。

3. 区分古今著述为“撰述”“记注”两大类，二者居于不同层次，但又互相补充。论述“圆而神”与“方以智”二者不可偏废。古今著作浩如烟海，章学诚将其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也即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③“撰述”居于较高层次，它体现了高明的史识，抉择去取，灵活变通，对历史作出阐释，帮助人们预见未来。“记注”则居于较低层次，它的任务是汇集丰富的历史知识，有一定的体例，兼备各方面的记载。章学诚这种分类法，说明历史家的见识高低决定了史书不同的价值。同样体现这一指导思想，他在别的地方具体的提法略有不同。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他又用“著述”与“比类”对两大类加以概括，指出二者相辅相成，“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④其标准，同样以是否体现“史义”“史识”来衡量。章学诚认为史部著作中能称得上“史学”者并不多，而更有意义和更加需要的正是“史学”。所以他一再强调区分“史学”与“史考”“史选”“史纂”之间的不同：“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⑤只有以“史义”“史识”为指导，才能称为“史学”。

4. 善于从学术史演进及当前现实需要中提炼出一系列范畴、命题，成为18世纪史学理论领域珍贵的成果。章学诚为此作了自觉的努力，曾在书信中提出与友人共勉，务必要使精心提炼而得的命题体现出“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达到“一言蔽而万绪该”。^⑥如上文所论及的“六经皆史”“道出自然，渐形渐著”“道在事中”“开发前蕴”“圣人学于众人”“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别识心裁”“学贵著述成家”“持世救偏”“逆于时趋”“功力与学问”“撰述与记注”“圆而神与方以智”“仍纪传体而参本末之法”等都在此列。限于篇幅，这里仅再列举三项。一是“通史家风”，以此表彰司马迁著《史记》贯通古今、成一家之言的杰出成就，并概括历代史家如李延寿、杜佑、司马光、郑樵等相继撰成上下贯通的史著而形成的优良传统。又总结了通史之作有“六便”和“二长”。二是“史德”论，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尽其天而不益人”，^⑦务必秉持鉴空衡平的原则，不因个人的好恶或情绪等因素，造成对史实的曲解或掩盖真相。三是“文德”论，强调临文必敬，评论适度，知人论世。“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⑧书中这一类精心提炼的范畴、命题，或是对优良传统作了创造性阐发，或是

①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1《书教下》，第38页。

②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第671页。

③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1《书教下》，第36页。

④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2《报黄大俞先生》，第633页。

⑤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浙东史学》，第122页。

⑥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与邵二云》，第666页。

⑦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5《史德》，第265页。

⑧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2《文德》，第136页。

对面临的困境提出切中要害的救弊办法，或是预示了未来演进的方向，均给后人以宝贵启示。

书中还有多篇论治学方法和培养人才的文章、书信；大梁本《文史通义》中有《方志立三书议》，提出“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①凡此皆为切中肯綮之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章学诚学术的历史地位

章学诚有开阔的视野，他打通文史，不仅对传统学术精华有极高的造诣，同时对于时代变迁的特点有敏锐的观察，因此《文史通义》一书具有继承往哲、回应当代、预示未来的宝贵价值。

首先是在历史哲学探索上的意义。章学诚对学术史演进有全局性的看法，所以自觉探讨社会演进和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努力阐释经典的现代价值。与只会背诵儒家经典词句、因循守旧的儒生不同，他集中探讨的是经典中的“道”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提出“道”在事中，“道”随着客观情势的发展而发展，立言之士要直面“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现实需要，而勇于创造出新的“道”。这些正是长期受到忽视、亟须大力倡导的重要命题。章学诚对此有充分的自信，在《与陈鉴亭论学》中说：“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窾”。^②至20世纪初，梁启超处于近代学术潮流之中，对章氏的观点有深切的体会，因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誉他“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③钱穆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章实斋与戴东原都主张“道”在六经，而章实斋认为六经合乎道而并非等同于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不然者也亦将随而变，时会不同，固六经不足以尽夫道也。

其次，章学诚勇于“持世救偏”，批判考证学末流的琐屑鉅订、无益世事，预示学术风气行将转变。乾嘉考证之学有其价值和成就，但是从乾隆末年起社会危机已日益暴露。当时考证阵营中已有学者认识到脱离实际的考证之学不是治学的正途。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倡言要探究“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④钱大昕读后大为赞许，称该书是“儒者有体有用之学”。^⑤《说文解字注》作者段玉裁晚年亦作了深刻反思，后悔自己一生只作具体问题考证，未能达到深一层的学问：“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恨已晚。”^⑥有的考证学者的著作已关注到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俞正燮撰《癸巳类稿》，书中有多篇与“经世”密切相关，如撰写有《驻扎大臣原始》《俄罗斯事辑》《总河近事表》等。此后继起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思潮的勃兴。事实证明，章学诚大力针砭烦琐考证学风的主张符合时代的需要，反映了学术前进的客观要求。

复次，章学诚将传统史学理论探索推向新阶段。《文史通义》与《史通》并称为古代史学评论之杰作，而两部书所面对问题不同，关注的重点亦有别。刘知幾处在纪传体正史纂修的高峰时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他的任务是对于众多的纂修成果进行总结和提出编纂的范式，厘清体裁、体例。而章学诚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冗繁芜杂不可究诘，他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即指出正史编纂陷入积弊，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史家的别识心裁被严重压抑，反映客观历史、再现演进大势的要求根本无法实现；而救治这种积弊的办法，就是重视并吸收后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恰当叙述史事的因果始终的优点，主张对纪传体加以改造，创立新的体裁。章氏揭示出传统史学后期历史编纂的内在逻辑发展方向，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超前性。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4《方志立三书议》，第827页。

②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3《与陈鉴亭论学》，第717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50页。

④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小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⑤ 《钱大昕序》，载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附录二“旧序与题跋”，第885页。

⑥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8《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开明的心智，不凡的史书

——评苏克拉提及其《教会史》^{*}

林中泽

[摘要]苏克拉提是继优西比乌之后心智最开明的古代教会史家。他的《教会史》涵盖了从305年至439年共134年基督教官方化最为关键的时段，从而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一手研究资料。该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具有丰厚的古代文化涵养，而且揭示出其拥有容纳异言异行的伟大胸襟。作为一名具有理性头脑的教会学者，他在融合基督教信仰与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坚持君主事功与教会事务并叙的原则，这便使得其作品大大超过了狭义教会史的界限，变成了一部政教并重的历史，这一点是优西比乌、苏佐门及提奥多雷等同名作品所不及的。他坚持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体现了一名历史学家的基本品格和素养。其作品文辞简朴平实，用语雅而不涩，俗而不粗，可谓雅俗皆宜，是一部不同凡响的教会史杰作。

[关键词]苏克拉提 《教会史》 开明心智 不凡史书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124-12

对于苏克拉提的《教会史》，西方学界历来评价较高。20世纪初著名的教会史作家亨利·瓦士，称该书超越了仇恨和敌对的意识形态局限，用最为完善的形式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教会历史，其所保存的教会史原始资料尤为珍贵。^① 1978年，另一位西方作者切斯纳特在《最初一批教会史书》一书中，认为苏克拉提虽然对神学争端不太感兴趣，但他具有自觉纠错和追求真相的历史学家之本能和素养。^② 1990年，《早期基督教百科全书》的撰述者弗里古森指出，苏克拉提谙熟古典文化，具有包容精神，是一名当之无愧的“人文主义者”。^③ 21世纪初的研究继承了上个世纪的传统。例如罗厄巴切尔就断言，苏克拉提的古典学识，比起优西比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④ 勒品也对苏克拉提学养的丰厚和学风的严谨表示了高度的赞赏。^⑤ 不过，这些研究往往只侧重于问题的某个方面。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地缘政治角度看4—8世纪地中海区域政教关系”(21BSS0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林中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631)。

① Henry Wace ed., *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Biography and Literature to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A. D., with An Account of the Principal Sects and Heresies*, Grand Rapids, MI: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http://www.ccel.org/ccel/wace/biodict.html>, 2000-07-15, pp.1485-1486.

② Cros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513.

③ Everett Ferguson ed., *Encyclopedia of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0, p.859.

④ David Rohrbacher, *The Historians of Late Antiqu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109-115.

⑤ Hartmut Leppin, “The Church Historians (1): Socrates, Sozomenus and Theodoretu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Fourth to Sixth Century A. D.*, ed. by Gabriele Marasco,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3, pp.220-221.

苏克拉提及其《教会史》作出较为系统的综合性评述，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行家。

一、生平事迹及著述构架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晚期古代是一个连接古典文明与中世纪文明的至关重要的时代。根据当代史家约翰森的说法，在晚期古代，社会的中心价值日益由政治向宗教转化，信仰逐渐成为联结个体、国家及社会的主渠道，先前政治优先的原则最终被信仰优先的原则所取代。^①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专门记述人民信仰生活的教会史应运而生，优西比乌在这方面无疑拥有开创之功。可是，优西比乌的卓越，却丝毫未能遮蔽住另一位著名教会史家苏克拉提的光芒，尽管后者从前者中获益良多，但后者的独特优势也是不可小觑的。

众所周知，提奥多修二世统治的时代（408—450）相继出现了三部同名的历史作品，即苏克拉提的《教会史》、苏佐门的《教会史》及提奥多雷的《教会史》。由于这三部作品在基本构架、叙述脉络及主体内容等方面大致相似，6世纪中叶的教会作家卡西欧多鲁（Cassiodorus）便将其摘抄后汇编到一起，取名为《三部教会史概要》（*Tripartite History*），目的在于方便人们互相参照和研究。后人依据新约中对观福音书的先例，将这三部作品称作“对观教会史”（*Synoptical Church Histories*）。就这三部作品的重要性而言，苏克拉提的《教会史》无疑名列前茅，因为后两部教会史均主要从它那里获取创作资料，汲取创造灵感。

苏克拉提（Socrates）是早期基督教时代最有趣和最有价值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于380年前后出生在君士坦丁堡，至少活至439年，亦即其《教会史》完成的那一年，一生经历过阿卡狄乌和提奥多修二世两朝皇帝的统治。由于除了《教会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有关其生活情况的其他信息，故对其生平，大多属于推测。我们可以从《教会史》中得知，苏克拉提是在故乡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老师是赫拉狄乌（Helladius）和阿蒙尼乌（Ammonius），这两人均是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异教语法学家，前者曾担任朱庇特神（天神）的祭司，后者曾担任希米乌神（猿猴之神）的祭司。在当地宗主教提奥菲鲁的命令下，亚历山大里亚的塞拉皮斯神庙被毁，庙内神像被游街示众，由此引发了异教徒与基督徒的严重冲突，这两名语法学家也卷入其中。赫拉狄乌后来还夸口说，自己在该次冲突中曾亲手杀死了9名基督徒。^② 他们为了逃避基督徒的报复，从亚历山大里亚逃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教授语法。

据亨利·瓦士的说法，苏克拉提也学习修辞，并协助修辞学家和智者特罗依鲁（Troilus）打理法律事务，因而他便拥有了“斯古拉斯狄库”（Scholasticus）这一别名，其意为法律学家。^③ 弗里古森主编的《早期基督教百科全书》也认可这一说法，断言苏克拉提的专业是法律。^④ 克洛斯甚至认为苏克拉提就是一名律师。^⑤ 该书的编辑和英译者瓦勒修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苏克拉提是“君士坦丁堡法庭上的一名特别辩护人”。^⑥ 不过近年来，这一传统说法开始受到质疑。例如优尔班克（Urbanczyk）便

^① Scott Fitzgerald Johnso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te Antiq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Introduction”, p.16.

^②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urnamed Scholasticus, Or the Advocate: Comprising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even Books, from the Accession of Constantine, A.D. 305, to the 38th Year of Theodosius II, Including a Period of 140 Years*,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notes selected from Valesius London: Henry G. Bohn, 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 John Childs and son, Bungay. MDCCCLIII, Book V, Chapters 16;24. 本文使用这个较为古旧的版本，主要理由是，它是由最权威的希腊原文英译而成，并附有作者详尽的解释和说明，其编者又是19世纪最有名的经典文献编译者瓦勒修，因此是一个相当可靠的和有价值的版本。以下引用仅注明卷数和章数，直接标示于引文后，其中罗马数字代表卷数，阿拉伯数字代表章数。

^③ Henry Wace ed., *A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Biography and Literature to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A. D., with An Account of the Principal Sects and Heresies*, Grand Rapids, MI: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http://www.ccel.org/ccel/wace/biodict.html>, 2000-07-15, p.1485.

^④ Everett Ferguson ed., *Encyclopedia of Early Christianity*, p.858.

^⑤ Cros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p.1513.

^⑥ Valesius, “The Life of Socrates, and An Account of His Writings”, in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指出，“斯古拉斯狄库”这一头衔，应该是后来才被附加在苏克拉提《教会史》抄本上的，有可能是抄写员将其与后来的教会史家埃瓦格里乌·斯古拉斯狄库的名字混淆了，而后者的确是一名法律学家。^①布里安·科洛克（Brian Croke）也对苏克拉提的律师身份表示怀疑。^②笔者比较赞同后面这一说法。从苏克拉提的书中，的确无法看出其具有专业法律学的知识；而且，对于皇帝提奥多修二世组织编撰法典的准备工作这样一件重大的法律事件，苏克拉提在书中竟只字未提，这至少证明他与法律专业没有多少联系。

苏克拉提一生几乎都待在君士坦丁堡，因此在他的历史书中，描述的大量事件均与该城有关。正如他本人所坦承的，他对该城所发生的著名事件描述得更为充分，这是不足为奇的，这部分原因是他聆听过或目睹过该城的大多数事件，部分原因是这些事件更加著名，而且被认为比起其他事件来，更值得记录。（V, 23）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真正精神之所在，即某种为了矫正错误而产生的有价值的焦虑感。苏克拉提的真诚还体现在他在第6卷开头所使用的类似表达中，他说，比起过往时期的历史，他对自己时代的历史更有兴趣，因为他对过往历史没有任何的亲身体验。直接促使他去撰述一部教会历史的，是一个叫做提奥多尔（Theodore）的不太知名的人物；他在该作品中，曾几次提到此人的名字。苏克拉提本人的身份也不太明确，哈特姆·勒品（Hartmut Leppin）认为他很可能在教会中担任某种职务，^③这只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从他谈及政教关系的超然态度看，他即便担任过教职，级别也不可能太高。他续写了优西比乌以后直到他自己的时代为止的历史。其作品划分为7卷，涵盖了从305年君士坦丁称帝起，至439年即提奥多修二世执政第31年为止共134年的历史。他自己在该书的末尾，则给出了一个象征着圆满的整数，即140年。（VII, 48）在最初的第1和第2卷中，翻译过优西比乌《教会史》并对其作过增补的拉丁学者鲁菲努斯，似乎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在不久后，由于阿塔纳修的作品及其他著名人物的信函屡屡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发现鲁菲努斯的一些信息并不太可靠，自己有可能受其误导。他自己的陈述似乎表明，为了交出一部满意的作品，他曾对这两卷进行过重写。（II, 1）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克拉提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其认真和严谨是不容置疑的。

苏克拉提的总体写作结构，仍然沿袭优西比乌的做法，即以罗马皇帝的统治为中心。如第1卷涵盖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305—337）；第2卷涵盖君士坦丁三个儿子小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及君士坦斯统治时期（337—361）；第3卷涵盖“叛教者”尤利安及约维安统治时期（361—364）；第4卷涵盖瓦伦提尼安及瓦伦斯统治时期（364—378）；第5卷涵盖提奥多修大帝统治时期（378—395）；第6卷涵盖阿卡狄乌统治时期（395—408）；第7卷亦即最后一卷涵盖提奥多修二世统治的前半段（408—439）。不过，苏克拉提毕竟是一名大公教会的正统信徒，因此他的作品就不得不以突显正统派英雄人物为主轴，例如在该书的前4卷中，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阿塔纳修的事迹几乎贯穿始终；而在后2卷中，则基本上以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姆为主角。

从苏克拉提的这一作品中，我们不难窥见作者的某些重要思想内涵和基本特色。

二、对古典异教学问的偏爱

基督教诞生不久，教会内部就存在着反古典与亲古典两大趋势。使徒保罗应当是反古典派的始作俑者，他在传道过程中，明确提醒信徒们要防止哲学家们的欺骗。^④而《约翰福音》的作者则有一种将

Surnamed Scholasticus, Or the Advocate: Comprising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even Books, from the Accession of Constantine, A.D.305, to the 38th Year of Theodosius II, Including a Period of 140 Years.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notes selected from Valesius, p.iv.

① David Rohrbacher, *The Historians of Late Antiquity*, p.108.

② Brian Croke, “Late Antique Historiography, 250-650 CE”, in *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 ed. by John Marincola, West Sussex: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1, p.576.

③ Hartmut Leppin, “The Church Historians (1): Socrates, Sozomenus and Theodoretu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Fourth to Sixth Century A.D.*, ed. by Gabriele Marasco, p.222.

④ 见《歌罗西书》第2章第8节。本文所用圣经版本为 *Good News Bible, Today's English Version*, New York: United Bible Society, 1976.

希伯来传统融入希腊文化的明显意图，因为他把基督等同于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和“一”。^① 3世纪上半叶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继承了保罗的传统，对希腊文化采取拒斥的态度。^② 但2世纪时的教父查士丁则极力拉近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距离，他在为基督教做辩护时指出：虽然苏格拉底和赫拉克里图等人被认为是无神论者，亚伯拉罕和亚纳尼亚斯等人被看作是野蛮人，可是由于他们均过着理性的生活，因此他们都可以成为基督徒；^③ 柏拉图的学说和基督的教导虽然有些许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④ 3世纪上半叶的奥利金更是系统地借用了犹太学者菲洛的寓意解经法，以希腊哲学语言为工具去挖掘圣经中的微言大义，从而达到将希腊思想纳入基督教神学体系的目的。^⑤ 3世纪中叶以后，地中海区域崛起了新柏拉图主义，该思潮对基督教教义的完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而言之，尽管存在着历史的曲折性，但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融合是大势所趋。苏克拉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名教会史家脱颖而出的。

苏克拉提小时候的异教徒老师赫拉狄乌、阿蒙尼乌及特罗依鲁等人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而持久的，这可以从其作品中看得出来。例如他在第3卷第16章中，以极其赞赏的态度谈及阿波利纳里父子研究古典学问的热情。而当有人对后者的行进行攻击时，苏克拉提立刻起而为之辩护：

希腊文学的确从未被基督或其门徒认可为神圣的启示，可是它也并未完全被拒绝为有害的东西。因此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轻率地放弃它。因为在希腊人当中存在着许多哲学家，他们并非不认识上帝；那些得到过逻辑科学训练的人们，奋力反对伊壁鸠鲁主义者以及否定神意的其他好争斗的诡辩学者，驳斥他们的无知。这些人的作品总是受到所有真正虔诚热爱者的欣赏……既然我们并没有被禁止去研究希腊人的学问和作品，我们就应当随心所欲地去做这一事情。这是我们为我们所采取的立场进行辩护的第一个论点：另一个论点因此也要被提出来。神启的圣经所谆谆教导的教义，无疑其本身就是绝妙的，而且其特性也是超凡脱俗的：它们倾向于在那些受其教诫指引的人们当中产生出生活的虔诚和正直，并指出某种为上帝高度赞许的信仰行为。可是它们并没有教导我们有关推理的艺术，借助这些艺术，我们或许得以成功地抵制那些反对真理的人们。此外，当我们能够将我们自身的武器转向敌人之时，他们就更容易被挫败……使徒不仅没有禁止我们被教以希腊学问，而且他本人似乎就根本未曾忽视过它，因为他经常援引希腊作者的话语。……在古代，教会的博士们便通过不停地使用习惯用法去练习自己的希腊文，直至他们年高德劭：他们这样做既是为了强化和磨砺心智，也是为了改善口才；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据之驳斥异教徒的错误。（III, 16）

在苏克拉提看来，希腊异教学问不仅不会与基督教真理相悖逆，它甚至可以被用来作为论证宗教真理和驳斥异教错误的有力武器；神启的圣经与理性真理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因此阿波利纳里父子的哲学兴趣，不仅不应受到指责，相反应当受到鼓励。

苏克拉提谈及盲者狄底姆斯时，说他从孩童开始，就拥有了杰出的能力，并很快远远超过那些拥有最敏锐视力的年轻同伴；他以惊人的能力掌握了语法和修辞的原理，据此进一步学习哲学、逻辑学、算术、音乐及其他其注意力所及的各种知识门类，他是如此热爱这些科学分支，以至于他极为欣然地准备进入对那些别人借助书本才得以精通的话题的讨论。（IV, 25）可见苏克拉提是非常偏爱科学理性的。

① 《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

② 德尔图良曾经说道：“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学园与教堂有何一致之处？异教徒与基督徒有何相同之处？”

见 Tertullian, *The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Chapter VII.

③ Justin Martyr, *The First Apology of Justin*, Chapter XLVI, in *Translation of the Epistles of Clement of Rome, Polycarp and Ignatius, and of the Apologies of Justin Martyr and Tertullian*, Chevallier Temple 1794-1873 Ed. & Tr., Hardpress Publishing, 2013.

④ Justin Martyr, *The Second Apology of Justin For Christians*, Chapter XIII, in *Translation of the Epistles of Clement of Rome, Polycarp and Ignatius, and of the Apologies of Justin Martyr and Tertullian*, Chevallier Temple 1794-1873 Ed. & Tr., Hardpress Publishing, 2013.

⑤ 奥利金的主要思想，可参看其《论首要原理》，石敏敏译，香港：道风书社，2002年。

苏克拉提还向我们透露，皇帝约维安曾任命一位叫做瑟米斯提乌的哲学家为执政官，该执政官因皇帝的宽容而撰写了一篇称赞皇帝的颂文，苏克拉提对此也表示赞赏。（III, 25）在第4卷第23章中，苏克拉提借助本都的埃瓦格里乌之口，列举了大量具有哲学家秉性的修士们的言行，证明修道就是一种哲学的践履。他在谈及本都人格里高利·绍马图尔古时，特别指出后者先是在雅典接受哲学教育，后来又到伯里图学习民法，最后才进入圣经研究领域。（IV, 27）其意在表明，古典学问对于理解神圣学问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学者麦克吉佛特博士在评价优西比乌的历史作品时曾经指出：在优西比乌看来，“知识的每一个领域都可以被放置在对宗教的支持和贡献之下；他足够大胆地确信，历史、哲学及科学均为人们对神学真理的理解作出了贡献，因此，历史、哲学和科学均被他自由自在和无所畏惧地研究和掌握；他并不觉得有必要去歪曲任何真理，因为这种真理对他所承认的宗教实无害处，相反，他拥有一种崇高的信念，该信念导致他相信，一切真理必然有其地位和使命，基督教的事业将会因这些真理的发现和传播而受益。”^①这一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苏克拉提，因为在古典理性主义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问题上，苏克拉提与优西比乌是一脉相承的。

为了使读者对苏克拉提的古典观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我们有必要简单回溯一下教会最初的情形。早期基督教的崛起，本质上就是东方信仰文明与希腊罗马理性文明艰难磨合的过程。耶稣的第一批门徒对希腊哲学传统基本上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如使徒保罗就曾提醒基督徒要提防上哲学家的当。^②可是没有哲学理性做支撑的纯粹信仰，终究是无法发展成为真正的普世性宗教的。于是，一些最初的教父开始主动谋求向古典文化作出妥协，如2世纪的著名基督教辩护家查斯丁就明确指出，虽然苏格拉底和赫拉克里图等人被认为是无神论者，亚伯拉罕和亚纳尼阿斯等人被看作是蛮人，可是由于他们均过着理性的生活，因此他们都可以成为基督徒；^③柏拉图的学说和基督的教导虽然有些许差异，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④3世纪上半叶的奥利金更是借用犹太学者菲洛的寓意解经法，以希腊哲学语言为工具去挖掘圣经中的微言大义，从而达到将希腊思想纳入基督教神学体系的目的。奥利金对于古典思想的过分痴迷引起了其同时代一些人的担忧，他们力求在基督教信仰与古典文化之间作出切割，例如德尔图良就公开责问：“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学园与教堂有何一致之处？异教徒与基督徒有何相同之处？”^⑤可是德尔图良自身假若没有得到过古典文化的福泽，他又如何能够就三位一体问题作出令人叹服的哲理解释呢？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耶路撒冷”与“雅典”之间的对立，亦即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张力，便逐渐回归到了新的平衡。苏克拉提正是这一新时代的见证者和突出代表，他作为一名具有理性头脑的历史学家，在融合基督教信仰与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对异言异行的充分宽容

古典文化的特质就是包容和鼓励自由思想。也许正由于其内里流淌着古典文化的血液，导致苏克拉提对教会在教义分歧上的高度宽容。虽然苏克拉提个人在教会中发挥的作用不可能太大，但他作为一名大公教会正统派基督徒的身份，则是确凿无疑的。可是他的正统派身份并没有妨碍他对不同见解的宽容和尊重。的确，他的《教会史》是从谴责阿里乌争端开始的，但他天生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他对阿里乌

^①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Volum I—Eusebius: *Church History, Lif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Oration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 New York: Cosimo, Inc., 2007, p.28: “Prolegomena to the Church History of Eusebius”, by McGiffert.

^② 见《歌罗西书》第2章第8节。

^③ Justin Martyr, *The First Apology of Justin*, Chapter XLVI, in *Translation of the Epistles of Clement of Rome, Polycarp and Ignatius, and of the Apologies of Justin Martyr and Tertullian*, Chevallier Temple 1794-1873 Ed. & Tr., Hardpress Publishing, 2013.

^④ Justin Martyr, *The Second Apology of Justin For Christians*, Chapter XIII, in *Translation of the Epistles of Clement of Rome, Polycarp and Ignatius, and of the Apologies of Justin Martyr and Tertullian*, Chevallier Temple 1794-1873 Ed. & Tr., Hardpress Publishing, 2013.

^⑤ Tertullian, *The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 Chapter VII.

派的谴责，与其说是基于教义上的分歧，不如说是基于教会由此而发生的分裂。

苏克拉提对异言异行的宽容，首先表现在他对诺瓦替安派的态度上。诺瓦替安派虽然早在3世纪中叶就被正统教会认定为异端教派，但苏克拉提却对其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好感，在其作品中屡屡提及这一教派及其杰出人物。例如，在谈及尼西亚公会议时，他特别提到君士坦丁大帝曾召集诺瓦替安派主教阿歇修斯参加会议，(I, 10)此事在优西比乌的作品中并没有被提及。他在总结诺瓦替安派人士遭到皇帝瓦伦斯疯狂迫害的原因时，将其归咎于该教派能够坚持正统的信仰。(IV, 9)在叙及该派主教希欣尼乌的轶事时，他也以极其钦佩的口吻，赞扬其具备高度的哲学素养，雄辩、敏捷而又不失幽默，尤其熟悉逻辑学，其圣经学的底蕴也极为深厚，与人相处，常常妙语连珠。他还补充说道：“他非同寻常的学识，为其赢得了接替他的主教们的敬重；他为元老院中的所有主要成员所爱戴和尊崇。他是许多作品的作者……他与其说是作为一名作家，不如说是作为一名演说家而受到赞赏；因为无论是他的气色和声音，还是形态和容貌，均带有某种高贵，他身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优雅的。这些优点受到所有党派的称赞，他特别为主教阿提库斯所喜爱。”(VI, 22)在说到该派另一名主教保罗时，他称赞其为人正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因此在其去世之后，包括正统派在内的各种不同教派的人士均自愿到场哀悼。(VII, 46)正由于苏克拉提屡次表现出对诺瓦替安派人士的敬重，有人便据以认为他从属于该派，而且这一主张还得到不少人的支持。^①这其实并不符合史实，因为他在提及该派时，是将其与“大公教会”严格区别开来的。他对诺瓦替安教派的好感，完全出于其宗教宽容的本能。

苏克拉提不仅对诺瓦替安派表现出好感，他对其他非正统教派也并不歧视。例如他赞扬希普里安派主教斯皮里顿“圣洁”“伟大”和“极端谦卑”；(I, 13)他在评价提奥多修大帝的宗教政策时，对他的仁慈表示赞赏，并怀着感恩的心情报道这位皇帝“没有迫害他们（指各式各样的异端分子——引者）中的任何人……允许他们所有人举行自己的秘密集会，在基督教信仰方面采纳自己的观点。其他所有人均被允许在城外建造自己的礼拜堂。”(V, 20)他称赞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提库斯宽宏大量，能容纳异端人士，做善事惠及不同党派，救济对象普及异端人群。(VII, 2; 23)锡纳达的主教提奥多修残暴对待异端分子，遭到苏克拉提的强烈谴责，称其贪婪丑恶，不配充当上帝的牧人。(VII, 3)他还以极其欣赏的口吻谈及阿里乌派人物提摩太和乔治的博学多才。(VII, 6)他长篇累牍地引用本都人埃瓦格里乌的话语，赞扬诺斯替派对隐修的哲理性论证。(IV, 23)他甚至还为聂斯脱利辩解，认为是聂斯脱利的支持者歪曲了其作品的原意：“在亲自细读过聂斯脱利的作品之后，我将诚实地表达我对有关他的个人看法：因为我对本人没有任何反感，但我早已提到他的过错，我将以同样的方式去除其敌手指控他时抹杀其功绩的偏见。那么我无法承认，他是其被归类的异端邪说的一名追随者，也无法承认，他否定基督的神性：他似乎对‘上帝之母’一词感到吃惊，似乎它是一种可怕的幽灵。……因此之故，就我所知，他只是反对这一表述：因为他所发表的布道文充分证明他与萨摩撒塔的保罗是完全不同的，后者不虔诚地断言基督只有人性。”(VII, 32)不过，当聂斯脱利走上了疯狂迫害其他异端教派的道路之时，他又对之表达了极度的反感。(VII, 29)

苏克拉提对于主教从一地调任到另一地的做法也表示高度理解。尽管公会议的法规规定，原则上一名主教不可以从原任职地调到另一个地方去任职；可是苏克拉提认为，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这条教规是完全可以被打破的，比如某主教不适应原任职地的严酷气候，出于人道的考虑，就应当将其调任到一个更适合于其身体条件的地方去。他列举了大量的先例，证明对教规的灵活运用是符合大会教会的传统习惯的。(VII, 36)

苏克拉提对于基督徒应当在每年的哪一天过复活节的问题，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复活节日期问题是早期基督教会中仅次于三位一体问题的又一个引发长期争论的话题。由于各地的习惯差异，人们过复

^① 详见 Hartmut Leppin, “The Church Historians (1): Socrates, Sozomenus and Theodoretu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Fourth to Sixth Century A. D.*, ed. by Gabriele Marasco, pp.221-222.

活节的日期五花八门，受犹太教影响较深的人群，其复活节日期与犹太人的逾越节同日（即所谓“十四日派”）；坚持与犹太人保持距离的正统派人士，则通过尼西亚公会议规定，复活节日期应当是在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可是由于不同地方存在着历法计算方面的分歧，结果人们根本就无法在相同的时间过复活节。许多教会人士因此而大受困扰，而苏克拉提则不以为然，他引经据典，论证选择哪一天过复活节是各地教会的自由。他指出：“无论是使徒，还是福音书作者，均从未将束缚之轭套在接纳福音的人们身上，而是将复活节和每一个其他节日留给恩典接受者去感恩。人们热爱节日，因为节日让他们在劳作之余得以歇息。因此，每个地方的每个个体，均应根据其自身的爱好，依据某种流行的习惯，去持守救主受难的纪念日。救主及其使徒们并没有用任何律法责成我们去持守这一节日；在新约中，我们也没有因忽视它而将会遭受任何惩罚或咒诅的威胁，如同摩西律法对犹太人所做的那样。……使徒们并没有想过要指定节日的日期，他们想的是促进一种无可指摘的和虔诚的生活。”（V, 22）至于对待节日期间的具体仪式，苏克拉提的开明态度，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道，斋戒的时间和天数、禁食的食物种类、哪些人有资格主持节日仪式以及仪式中的具体程序等等，各地教会尽可以因地制宜，按照祖先留下的传统习惯办理，不一定要强求一致。（V, 22）他对待教会礼俗的这些宽容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有关他并非教会重要领导成员的推论，因为假如他是一名主持教区事务的主教，他考虑的重点就很可能会放在礼俗的统一上而不是多元化上。

四、对正统君主的高度敬重

苏克拉提既然属于正统派，他对于像叛教者尤利安那样的异教徒君主以及像君士坦提乌和瓦伦斯那样的阿里乌派异端君主，便不得不持明确的批判态度。不过他对于坚持正统学说的君主，则极为尊崇。他十分看重世俗君主对于教会事业的作用，因此他的《教会史》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坚持君主事功与教会事务并叙的原则，这便使得他的作品大大超过了狭义教会史的界限，变成一部政教并重的历史，这一点是优西比乌、提奥多雷及苏佐门等同名作品所不及的。据其本人的说法，他之所以要如此处理，理由如下：

我们必须请求那些可能要细读此书的人们，不要太过急于指责我们将教会事务与同时代的战争报道掺和在一起……我们之所以要特意遵循这一计划，理由有几个：首先，是为了将一种确切的事实陈述放置在我们读者的面前；其次，是为了减缓他们因主教们不断重复的争端及其他们相互之间的奸诈阴谋而感到的心智疲累；尤其重要的是，显而易见，每当国家事务受到困扰之时，教会事务就仿佛借助某种至关重要的共振作用而同时也变得烦乱不堪。的确，留心检视过该话题的任何人均会发现，国家的不幸与教会的麻烦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因为他会觉察到，它们或是一道出现，或是相互交替发生。有时教会的灾难出现在先，国家的骚乱紧跟其后：于是我们便无法相信，这种不断的更迭变化仅仅是偶然的意外，我们不得不被迫承认，这源自于我们的罪恶，这些交互的灾变正是为了实现对于这些罪恶的惩戒。……在这些历史细节中，我们从不会遗漏掉诸位皇帝；因为从他们开始承认基督徒宗教的那时起，他们就对教会的事务施加了一种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最重要的公会议曾经是并仍然是按他们的指令来召开。（V, Preface）

这里提出的三个理由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最后一个，即国家事务与教会事务在客观上被捆绑得如此之紧，以至于没有一件教会事务与国家无关，也没有一件国家事务与教会无关；在苏克拉提看来，这正是教会大公会议需要由皇帝来召集的关键之所在。苏克拉提继承了优西比乌的传统，在处理皇帝与大公会议的关系时，始终突出皇帝在其中的协调作用，例如他在描述尼西亚公会议时，就刻意将君士坦丁塑造成为一位争端双方的仲裁者。（I, 8）相比之下，苏佐门和提奥多雷则更在意教会的自主性，他们力图避免皇帝过多干预教会事务，因此在他们的描述中，君士坦丁在会议争端中始终保持沉默；只是等到主

教们做出决议之后，皇帝才负责去执行和落实。^①

显而易见，苏克拉提的主要兴趣，集中于教会在强有力单一君主统治下的和平，因此他盛赞君士坦丁时代教会的团结和鼎盛，(I, 16-18) 尽管实际情况未必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好。约维安在位时间虽然极其短暂，可是由于他能够维护教会的统一，故也受到了苏克拉提的称颂：“皇帝（约维安）决心要尽其所能地减缓各党派因意见分歧所激起的好斗精神，对他们所有人均采取了温和的方式和说服教育的语言。他宣布，他将不因自己的宗教观点而妨碍任何人，他将热爱和高度尊重那些热情地促成教会统一的人们。哲学家瑟米斯提乌在其执政官任内撰写的演讲辞中，证实了这便是他的所作所为。在该演讲辞中，他称颂皇帝非常开明地允许每个人均得以依据自己良心的支配去崇拜上帝。”(III, 25) 尽管有证据表明，这位君主的私生活并不可取。^② 提奥多修二世作为一名皇帝，在历史上以平庸著称，可是在苏克拉提的眼里，他在处理教会事务上的无为而治反倒成了其心目中理想君主必不可少的一种美德。他是如此评价这位皇帝的：

这位君王虽然出生并成长于宫廷，但他并不因为自身的出身和教育环境而昏庸和柔弱。他很早就表现出如此的审慎，以至于在与其交往的人们看来，他已经获得了长者的智慧和经验。他面对艰难困苦却坚韧不拔，勇敢地忍受人间冷暖；出于竭尽全力准确遵循基督徒宗教所规定的所有形式的一种热诚，他频频实施斋戒，尤其是在星期三和星期五。他的宫殿布置得与一所修道院几乎没有什两样：因为他与其姐妹们早上很早就起床，吟唱赞美上帝的应答轮唱圣歌。借助这一训练，他将圣经牢记心里；他经常与主教们就圣经话题进行商讨，仿佛他长期以来就是一位教会人员。他乐此不疲地收集神圣经书及被撰述于经书上的阐释，其兴趣丝毫不亚于在他之前的托勒密·费拉德尔弗；而在怜悯和人道方面，他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人。……提奥多修虽然告别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却通过控制生气、忧伤和愉悦而在行为上践履了哲学。他从来未曾对伤害过自己的人报私仇，甚至从未表现得怒形于色。……他已经养成了仁慈的习惯，因此如有罪犯通过死刑判决，并被护送去到执行地点，他从不忍心到达城门，除非他发出了赦免令，并命其立即归来。……他的虔诚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他用一种尊敬的态度对待所有献身于服侍上帝的人们，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尊重那些他知道以生活圣洁著称的人物。切伯隆的主教辞世于君士坦丁堡，据报道皇帝曾表示希望得到他的套头粗麻布法衣，尽管它非常肮脏，但他将其当作外套来穿，希望由此分享到死者某种程度的圣洁。某一年天气特别不好，风暴成灾，他被人民的热望所迫在竞技场上举行通常的娱乐表演；在竞技场上挤满了观众之时，风暴的强度加剧了，大雪从天而降。当时皇帝力求表明他是如何心系上帝的；他让传令官向人民颁布了一个敕令，大意为：“最好是停止表演，大家集中一起向上帝祷告，这样我们就可以免除迫在眉睫的大风暴的伤害。”传令官一旦执行了这一任务，所有人均带着最大的喜悦向上帝发出祈求并唱颂歌，于是整个城市便成了一个巨大的圣事集会场所；皇帝本人也除去了皇袍，去到民众当中，开始唱圣歌。他对自己的期待没有失望，因为天气重新转为惯常的晴朗；神的仁慈赐予所有人丰产足食，而不是所预料的那样歉收饥馑。如果在任何时候发生战争，他就会像大卫王那样求助于上帝，因为知晓他便是战斗的处置者，故借助祷告将它们引入到一种有利的结局。(VII, 22)

在苏克拉提看来，提奥多修二世表面软弱的性格中，隐藏着某种虔诚和灵性的智慧，因为一位仅靠祷告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敌人的帝王，远胜于一名靠刀剑取胜的君主。

^① Sozomen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Comprising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A.D.324 to A. D.440*, London: Henry G. Bohn, 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 1855, Book I, Chapters 8、19; Book VI, Chapter 7 Theodoret,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odoret*, edited by Philip Schaff,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2, Book I, Chapters 7-10; Book IV, Chapter 7. In: <http://www.ccel.org/ccel/schaff/npnf203.html>.

^② 阿米安·马切林告诉我们，皇帝约维安十分贪恋酒色。转引自 Peter Brown, *The Body and Society: Men, Women 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2.

苏克拉提还借助安布罗斯在米兰的任职一事，表明世俗权力的干预对于教会统一的重要性。米兰的阿里乌教会主教去世后，人们因主教人选问题陷入了混乱；米兰总督安布罗斯平息了即将发生的暴乱，并以一篇感人至深的演讲获得公众的爱戴并被选举为主教，遭到了他本人的拒绝；于是人们请求皇帝瓦伦提尼安的裁决；皇帝以人民是上帝的代表为由，裁定安布罗斯为米兰主教。这一故事既成为“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的嚆矢，(IV, 30)同时也被苏克拉提拿来作为王权与教权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之重要证据。

据苏佐门的记载，安布罗斯任职后不久，帖撒罗尼迦的居民因无法忍受行政长官布舍里库的野蛮统治而将其刺杀。提奥多修大帝勃然大怒，对帖撒罗尼迦居民采取了报复性的大屠杀。事后，安布罗斯严厉谴责了皇帝的罪行，并强力阻止其进入教堂祷告。在安布罗斯的压力下，皇帝只好除去皇服，在米兰大教堂前面当众痛哭流涕，表示悔罪。^①对于如此重要的一项历史事件，苏克拉提却只字未提。他肯定并非不了解此事，而是有意加以忽略，因为他看来，如此不光彩事实的叙述，不仅有损于一名正统君主的自尊和威严，而且不利于教育子孙后代。与此相反，一名异教皇帝的尊严则是无足轻重的，苏克拉提讲述的一个故事很能够说明问题。查尔西顿的盲人主教马里斯曾经被人带到叛教者尤利安的面前，十分严厉地指责皇帝的不虔诚、叛教和无神论。皇帝的回答极其傲慢无礼，他说道，“你这个瞎眼的老蠢货，你们那个加利利人的神（指耶稣基督——引者）永远也治不好你的病。”而马里斯则更加大胆地回答，“我感谢上帝剥夺了我的视力，因为这样我就不会瞧见陷入如此可怕不虔诚之人的嘴脸。”(III, 12)此外，苏克拉提还斥责阿里乌派皇帝君士坦提乌废黜民选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保罗，命异端分子马其顿尼取而代之。(II, 7)这充分说明苏克拉提所要维护的是正统皇帝的尊严，而对于异教或异端君主的批判，则是不留情面的。

由此可以推知，苏克拉提心目中理想的政教关系应当是：正统君主为保护基督教臣民和维护正统基督教学说而战斗，正统教会则为维护正统皇帝的尊严而祈祷，二者的利益即便会偶尔出现不协调，为了帝国的整体利益和信徒的长远福祉，教会一方作出某种非原则性让步是完全必要的。这一思想与优西比乌较为契合，而与苏佐门及提奥多雷却迥然相异，后两人认为教权应当独立于王权，这从他们对于安布罗斯处理帖撒罗尼迦屠杀事件的态度中可以体现出来。

五、对教会中某些有趣细节的描述

根据哈特姆·勒品的说法，313年《米兰敕令》颁行之后，教会受迫害的外部压力基本去除，而教会内部的矛盾则开始激化。因此对于教会而言，4—5世纪主要就不再是反异教的世纪，而是反异端的世纪。^②不过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官方化也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刻。这正是苏克拉提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之所在，因为他借助对教会内部纷争的详尽记载，向读者展现了基督教官方化的生动历程，并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苏克拉提要处理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阿里乌争端。他在第1卷第1章的序言中写道：虽然优西比乌在《君士坦丁传》中曾经极其简略地提到过阿里乌争端，不过他只是写到君士坦丁统治时代为止，而且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称颂君士坦丁，“因此我们打算对教会中所发生的事件细节作充分的叙述，从他曾忽略的那些事项的某种关联开始，将随后发生的事情写至我们自己的时代为止。”这种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撰述原则，体现了一名历史学家的基本品格和素养。从苏克拉提的这部作品中，我们会发现，阿里乌争端的来龙去脉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例如，他通过转述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亚历山大的信函和叙述梅勒提乌教派出现的细节，基本厘清了阿里乌教派兴起的渊源及其广泛的社会基础，以此告

^① Sozomen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Comprising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A.D.324 to A. D.440*, London: Henry G. Bohn, 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 1855, Book VII, Chapter 25.

^② Hartmut Leppin, “The Church Historians(1): Socrates, Sozomenus and Theodoretu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Fourth to Sixth Century A. D.*, ed. by Gabriele Marasco, p.220.

诉读者，阿里乌派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甚至暗示，促成这场旷日持久的教义争端的，不独有阿里乌及其支持者，还包括正统派的亚历山大等人，他们对于教会的分裂，也难辞其咎。(I, 6)而且，阿里乌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随着局势的变动，他们分裂了许多不同的帮派，其中最主要的是纯阿里乌派和半阿里乌派，后者也叫马其顿尼派。值得注意的是，苏克拉提认为阿里乌派在整体上丧失起码的政治道德，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巴结皇室和讨好权贵，如阿里乌本人为了逃避制裁而假装承认正统学说。(I, 13)苏克拉提还借助阿塔纳修的信函痛斥阿里乌派将耶稣基督与世俗皇帝混淆一起：“他们常常喜欢写到有关主，他们指称他们心目中的另一个主，甚至连君士坦提乌也纵容他们的不虔诚，以至于那些否定子为不朽的人们，曾称他是不朽的皇帝。他们就是以此种亵渎言论证明是基督的敌人。”(II, 37)苏克拉提告诉我们，马其顿尼分子在不同的场合竟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张，改变信仰就像换衣服那么简单。(III, 25; IV, 4)与此相应，苏克拉提也揭露了正统派内部的一些是非纠纷。例如他提到，属于正统派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提奥菲鲁，为了压制同属于正统派的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在君士坦丁堡教会安插自己的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此人曾在提奥多修大帝与僭主优杰尼乌的对峙中，采取投机观望的态度，因此而面临被告发的危险。(VI, 2)他还谈到提奥菲鲁为一方，埃及修士和约翰·克里索斯托姆为另一方所形成的对垒和较量。(VI, 7-10)这些材料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们是首次被公之于世。

对于正统派与各种异端教派之间的论争，苏克拉提有时会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例如他把各派的争执比作黑暗中的赛跑，选手们根本就没弄清自己的路径：“当他们着手对它的涵义进行了一次极为细致的调查时，讨论便采用了一种论辩的方式，尽管这看来无不像是一场黑暗中的赛跑；因为对立双方均似乎无法清晰地理解他们据以相互诽谤的理据。……由于这些误解，他们每个人均写书作文以驳斥自己的对手：尽管双方均承认，上帝之子拥有一个独特的位格和存在，所有人均认可，在三位一体的诸位格中存在着同一个上帝，然而，由于我所无法觉察到的原因，他们当中无法达成一致，于是从未有过和平。”(I, 23)他在另一个场合中还说道：“如今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免职的案子上，没有一个派别是受宗教上的考虑所影响，而是受到大有问题的品格动机所影响：因为尽管他们就信仰问题存在意见分歧，可是他们相互废黜的理由却并非教义上的错误。”(II, 42)由此可见，在苏克拉提的心目中，教会分裂的后果比教义分歧要严重得多。

苏克拉提对于基督徒在受迫害期间的逃跑行为采取了同情的态度。虽然他也主张信徒在暴力的折磨之下要坚守信仰，坚韧不屈，(III, 19)不过他并不希望人们为了信仰作出无谓的牺牲。他整整用了一章的篇幅，长篇累牍地摘引了阿塔纳修为自己的逃亡所作的辩解词；该辩解词引经据典，从耶稣的教导到使徒的榜样，甚至异教人士的先例，铿锵有力地证明了自己逃亡生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III, 8)苏克拉提本人没有对之作出过多评论，不过显然他的引用本身就意味着他的赞许。他无疑与阿塔纳修一样认为，迫害下的逃亡并不代表要放弃战斗，相反，是为了更好地为信仰而战斗，因为成功的战斗是不能不讲策略的。

苏克拉提及君士坦丁堡的助祭塞拉皮昂，因在见到主教塞维里安时仍然坐着而受到后者的指控。(VI, 11)这一轶事使我们得知，按古代教会的礼俗，普通人和一般教士见到主教时必须站起来表示敬意，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失礼和不敬，情节严重者甚至面临吃官司的危险。根据恰德维克的考证，在古代晚期，人们在路上遇见主教时必须鞠躬致意，他就像一名皇帝或元老一样，人们可以亲吻其手，甚至称其为“殿下”，而他则往往称人们为“爱徒”。^①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作出进一步的推想，主教的特权和教会等级制在苏克拉提的时代即便仍不太明显，但也开始初显端倪。

与优西比乌一样，苏克拉提是奥利金的忠诚崇拜者，他多次表达了对奥利金的好感，并为他的学说辩护。(III, 23; VI, 13)此外，苏克拉提虽然钦佩约翰·克里索斯托姆的正直，却也毫不讳言地批评其

^① Henry Chadwick, *Studies on Ancient Christianit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51.

脾气暴躁、孤僻和对下属态度不好。(VI, 3-4)他还揭示了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希里尔与埃及总督奥列斯特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一系列暴行。(VII, 14-15)他告诉我们，上底比斯主教帕弗努提乌本人虽不结婚，却坚决反对教士独身，称其既违反人之自然本性，也与圣经原意不符，从而受到他的赞赏。(I, 11)他还向我们披露，竞技场上的赛会，尽管在君士坦丁时代就受到了限制，可是直至提奥多修二世时代，这种异教活动仍频频出现。(VII, 22-23)^①苏克拉提还谴责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希里尔将自己的受控案绕过教会法庭，直接上诉到了世俗法庭，认为这在历史上开了一个恶例，影响极坏。(II, 40)他还提到了摩尼的传奇式身世和经历，以及其创立摩尼教的经过，(I, 22)等等。这些细节的描述，无疑有助于后人对早期教会生活作纵深的理解。

六、平实的写作风格及明确的写作目的

有关这部作品的写作风格，作者在对他的第一读者提奥多尔所说的一番话中，作出了这样的披露：

你将会发觉，我根本就没有着意于风格；因为我认为，太过分讲究表达的优雅将会损害我所在意的目标。可是即使设想我的目的得以实现，我也完全被排除出运用自行裁定的权力之范围。对于这种权力，古代历史学家似乎如此广泛地加以利用，故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均自我想象可以自由地放大或缩小事实。此外，精致的作品根本就无法教育头脑简单和没有学识的人们，这些人只是想要知道所发生的真实事情是什么，他们对于用词之美不会给予丝毫的注意。因此，为了使我的作品对于两个读者阶层均不会毫无获益——一方面对于知识阶层，如果没有语言的优雅，他们习惯于古代作者的虚夸表达的嗜好就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对于无学问的阶层，他们的理解能力将会被言辞的夸饰所遮蔽——我有意采纳某种风格，即既摆脱掉所有极致的矫揉造作，又不失清晰和简明易懂。(VI, Preface)

苏克拉提虽然带有古典文化的基因，但他对于古典作家为了取宠于上流阶层所表现出来的华而不实的文风却颇有微词，并引以为戒。他显然认为，既要顾及学者阶层的优雅品味，又要照顾到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这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可事实上我们在阅读全书后却发现，作者对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的协调功夫，虽不算是十全十美，却也称得上甚为成功。该作品文辞简朴平实，用语雅而不涩，俗而不粗，可谓雅俗皆宜，既适合文人学者的鉴赏，也适合普通人群的阅读。他在说到自己作品的文风时特别指出：“我没能称主教们为‘上帝所最亲爱的’‘最圣洁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名堂。……我没能给予皇帝们‘最神圣的’和‘主人’等名称，也未能赋予他们通常被别人用于他们身上的其他称号。……(我将)进行简朴和诚实的叙述，而不会被任何的遮蔽物所掩盖。因此，我的方针就是准确地记载我目睹的东西，或者从实际目击者那里得来的并经证实为真的东西；以不遗余力的劳作去检验真相，并借助我所能够驾驭的每一种方法，对于许多不同派别当中所陈述的哪怕是最小的差异，都要征询那些被公认为密切了解事情真谛的人们。”(IV, 1, Preface)他既不讨好世俗权贵，又不巴结教会高官，唯一的想法就是为了上帝的事业，用一种平实的写作手段，将历史的真相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一种写作风格与他的写作目的刚好契合。他在谈到自己为何目的而写作之时指出：

倘若教会安然而不被分裂所烦扰的话，我本人是会保持沉默的：因为凡是话题与所关注事项没有关联的地方，对于一名叙述者而言均不存在任何叙述的必要。然而，由于基督教的使徒信条受到了破坏，同时被一种徒劳而又难以捉摸的争执形式所撕裂，我便认为记录下这些事情是合宜的，以便教会的事务不会淹没于暗淡之中。有关这些方面的准确信息，尽管其在许多的信息当中获得了名声，但它给熟悉它们的人带来的是免除错误的危险，并教导他不要被任何他所偶尔听到的充满诡辩论点的空洞声音所烦扰。(I, 18)

^① 有证据表明，迟至6世纪，约旦的杰拉撒城仍经常举行裸体姑娘水上表演活动，观看者主要是该城的要人和基督徒。见Peter Brown, *The Body and Society: Men, Women 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4.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使教会事务不至于被淹没于时间的烟尘之中，这是苏克拉提的第一个写作目的，该目的显然是对希腊罗马古典史学传统的继承。此外，由于教会史牵涉到教义方面的复杂争端，其历史最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阉割和歪曲，故溯本求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苏克拉提写作的另一个目的，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一目的。其第三个目的则贯穿于他的整部作品中，那就是通过客观地叙述教会的历史，给子孙后代提供生活与信仰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使他们不至于因为对历史的无知而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误入歧途。如此一来，他的写作目的与写作风格就获得了高度的一致，正如他本人所说：“因为我的目标是编辑一套有关基督徒宗教的历史，为了得到更好的理解，坚持一种简朴和毫不矫揉造作的风格，便既合适，又与我最初的目的相协调。”（III, 1）

他在作品的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愿景：但愿教会争端尽早结束，世界和平最终实现，这样的话，历史学家就再也找不到写作的素材；而自己作品的写作，也并非出于自我表现的冲动，而是为情势所逼，最理想的境界是让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历史学家无事可做。（VII, 48）

七、结语

苏克拉提作为一名继优西比乌之后脱颖而出的教会史家，其古典教育背景及特殊的个人身份，决定了其作品的党派色彩相对较淡，从而使它拥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既然政治权力和教会利益均没有对他构成太大的压力，他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对既往的历史事件作出相对独立和公正的判断。他以平实流畅的笔调，详尽叙述了基督教官方化最关键的 100 多年里地中海东部地区教俗关系互动的历史细节，从而为后人理解这段非凡历史提供了权威依据。他在具体叙述到某个悬而未决的疑难事项时，常常是谨慎地回避武断的论定，让读者自行寻找答案。（III, 1；VI, 19）在谈及有关皇太后海伦娜在圣地发现真十字架一事时，他坦承：“我的确是通过别人的报道而写下这件事情的”。（I, 17）^①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示出一名真正历史学家的本色。他所引用的原始资料来源也比较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教会文献包括优西比乌的《君士坦丁传》、阿塔纳修的作品、赫拉克雷亚的萨比努斯所编撰的公会议教令集及主教名录等；世俗文献包括优特洛皮乌等人的作品，甚至还包括利巴尼乌和叛教者尤利安等异教人士的作品以及一些叙事诗；此外还包括了大量的口述资料以及苏克拉提本人的目击证据。这使得该部教会史显得较为充实和可信。

当然，苏克拉提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由于他长期居住和生活于君士坦丁堡，与该城以外尤其是与西部拉丁世界的联系比较有限，因此他所记述的事项，多集中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区域，对于西部教会的事情涉及不多，这使得其作品带有某种片面性，读者无法通过其作品了解当时东西部之间复杂的政教关系之基本脉络。其次，与其同时代的基督徒作家一样，苏克拉提相信上帝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会借助超自然的手段对人间事务进行必要干预，于是他描述了不少他信以为真的神迹和征兆，这明显与他的理性精神相冲突，多少降低了叙述的可信度。最后，在个别情况下，他存在着某种叙述上的混乱，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第 4 卷第 28 章中，他误认为诺瓦图斯就是诺瓦替安派的创建者。然而，尽管存在着或这或那的不足和缺陷，从总体上看，尤其与其后的历史学家相比，苏克拉提仍不失为一名具有卓识远见的和非同凡俗的历史学家，其《教会史》也不失为一部垂范后世的不朽之作。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 实际上，就有关皇太后海伦娜在圣地发现真十字架一事的真实性问题，在后世的学术界中是充满着争议的。详见 Maribel Dietz, *Wandering Monks, Virgins and Pilgrims: Ascetic Travel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D. 300-800*,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13-115.

张文彬领导广东党组织对余汉谋部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1937—1942）*

王英俊

[摘要]抗战初期，广东党组织与余汉谋部的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并发展，这与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国共关系的状况及张文彬本人统战理念直接相关。但随着国内反共高潮延展至广东，余汉谋的反共面目彻底暴露，双方合作关系最终破裂。此后，广东党组织因应局势变化，作出了把工作重心放在敌后根据地独立自主发展武装力量的决策。抗战前期广东党组织对余汉谋部的统战过程，映射出战时广东国共关系的复杂性。

[关键词]张文彬 统一战线 余汉谋 国共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136-10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共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与阎锡山、刘湘等地方实力派都曾有过一段“蜜月期”，这既与中共本身的努力密切相关，也与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之间缺乏互信不无关联，而中共也抓住时机，实现了自身力量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力量也不一样，中共在各地的统战工作同中有异，笔者所关注的广东就颇具代表性。

抗战爆发初期，国共在广东力量对比悬殊，在这样自身实力较弱的地区，地方党组织是如何通过贯彻中央指示，通过统战工作打开局面，进而站稳脚跟并得到发展，又极具特殊意义。抗战前期负责广东党组织统战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是张文彬，而他主持开展统战工作的重点目标则是地方实力派余汉谋。学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选址等问题，对余汉谋与中共关系的研究则关注较少。^①作为中共要直接面对的地方实力派，余汉谋在不同时段及背景下对中共态度有何变化？中共为何选定余汉谋作为统战的主要目标，实际成效及影响如何？本文立足于国共两方面的史料，尝试对1937年至1942年间张文彬领导的广东党组织对余汉谋部的统战工作，再加梳理和探讨，希望借此加深对于战时广东国共关系复杂性的理解。

一、中共广东党组织确立以余汉谋部为统战目标的背景

抗战初期，广东党组织确立以余汉谋部作为统战目标，既有中共中央层面的因素，也与广东的国共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37)、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2020年度重大委托项目“抗战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党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英俊，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510515）。

① 参见叶文益：《张文彬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尹智博、左双文：《国共离合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发展（1940—1943）》，《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杨新新：《在“统战”与“敌后游击”间徘徊：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建立及发展（1938—1943）》，《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李翔：《东江抗日根据地选址考析》，《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等。

关系状况及张文彬本人的统战理念有关。

中共中央层面，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再度实现合作，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把统战工作作为重点方针加以贯彻。1937年6月，中央指示国统区内的地方党组织，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去团结“一切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实力派”与“最广大的中间群众”，改造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使之走向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民生幸福的革命三民主义道路”。^①8月15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各地最要紧的任务，就是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②

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于广东尤为适合，这是由抗战初期广东国共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就中共方面而言，1936年9月，以薛尚实为负责人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香港组建，标志着华南各地党组织的活动开始恢复。此时，在土地革命后期被破坏殆尽的中共广东地下党组织，力量极为薄弱，经过薛尚实、王均予（广州市委书记）等人的努力，广东党组织的力量虽有所恢复，但主要是在广州、香港等大城市打下了一定根基，而薛尚实、王均予之间，因沟通衔接不够以及工作方式、工作作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亦严重影响了党的正常工作的开展。在此情势下，力量极为薄弱的广东党组织，欲求自身力量发展与壮大，亟需寻求一个突破口。

对于此时广东党组织的情况，中共中央非常清楚，也有意通过统战工作在广东打开局面。1937年5月，中央派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前往华南，联络两广和福建军政当局，开展统战工作。^③6月，中央指示广东党组织一定要重视和慎重地做好余汉谋的工作。^④9月，中央派张文彬南下主持广东党组织工作，明确要求他要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推动国共合作。^⑤中央之所以选择张文彬，正是看重他丰富的统战经验。1936年夏，张文彬前往西安领导中共西北特支，开展对西北军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取得显著成效。^⑥这一系列的人事部署，不难看出中共中央这一时期对在华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视和期望。

而国民党广东政权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则为中共与余汉谋的合作提供了契机。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后，国民党中央迅速向广东作全面的军事和政治渗透，“主要企图似在首先抓取广东的财政权及党务，透过财政及党务的力量以控制广东的军政。”^⑦而地方实力派余汉谋则视广东为禁脔，对国民党中央力量介入广东一直高度警惕。围绕人事任免及地方武装归属问题，余汉谋与政学系吴铁城、CC系曾养甫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⑧作为对南京潜在威胁的抗衡，余汉谋极欲“排挤蒋中央进入广东的势力”，^⑨试图通过中共力量的引入，抵消南京的影响。

故全面抗战爆发后，余汉谋对各方力量采取开放态度，予中共活动以很大便利，中共文件也谈到此时的状况：“当七七抗战以后，《救国时报》、王明等在国外出的小册子即能在广州、香港一带公开出卖，十一月以后即能公开翻印《解放》等刊物，而不加查禁。”南京失陷后，日军积极南进，更推动了余汉谋坚决守土的决心，他采取了倡办自卫团、启用部分左翼分子等举措。余汉谋亲信李煦寰、钟天心等也

^① 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24-228页。

^② 《中央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1937年7月15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587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历史资料丛书：《华南抗日游击队敌军工作史》，总政治部联络部，1997年，第43页。

^⑤ 尹林平：《纪念张文彬同志》，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怀念张文彬》，1998年，第52-53页。

^⑥ 详见叶文益：《张文彬传》，第163-180页。

^⑦ 《广东的情况》（1938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37—1939），1986年，第268页。

^⑧ 参见王英俊：《日军侵粤前夕的广东军政关系》，《民国档案》2019年第2期。

^⑨ 《访问尹林平同志记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001583/18/4/55。

都比较开明，均公开赞同统一战线，倡导成立群众组织。^①抗战初期广东国共关系的缓和，为广东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创造了条件。

张文彬到广东后，对统一战线的重视，从下面一段话中体现得颇为明显：“坚持统一战线，灵活的运用统一战线。这在党派性复杂的广东，有特殊重要的意义。”^②这个意义，在张文彬看来，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是要借助统战打开广东工作的局面，他表示要“下决心在这个地方创造出一个我们自己的解放区，创造一个根据地。”而关于统战工作的主要目标，张文彬并不认同薛尚实把重点放在李章达、何思敬等民主党派人物身上的做法，他提出要以国民党当局为主要对象开展统战工作，^③在他看来，广东党组织统战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余汉谋。^④

之所以确定将余汉谋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余汉谋手握军权，地位举足轻重，且非蒋介石嫡系的身份，使得他与蒋介石之间始终心存芥蒂。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使中共看到了机会，统一战线尤其是偏于上层的统一战线自然而然地成为工作的重心。二是余汉谋在与中共的交往过程中，给中共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早在1927年4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密令时任高雷守备司令的余汉谋“清党”，然而他并未遵令，而是秘密通知中共负责人提前离开后，再查封工农会和工人纠察队。^⑤抗战初期，福建发生“何鸣事件”，^⑥中央派张云逸和余汉谋交涉，余汉谋拿出蒋介石的电报，称他也是被迫执行，表示同意恢复部队建制，发还部分枪支。^⑦1937年11月，经张云逸与余汉谋磋商，他同意中共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⑧同月，中共的《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余汉谋还捐助了毫洋2000元作为开办费用以示支持。^⑨余汉谋上述举动，即是对中共的政治表态。

在上述背景下，抗战爆发之初，张文彬明确提出把余汉谋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目标。1937年12月，他在向中央汇报时，列举了余汉谋在“解放民运、释（放）政治犯……反对行营逮捕爱国份子”等方面的进步表现，提出中共在广东的口号，就是“拥护余汉谋四个主张，继续动员北上。”^⑩1938年4月，广东省委成立后，他又明确提出，广东工作在策略上应利用国民党中央较开明的余汉谋、谌小岑等，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⑪此后，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广东党组织与余汉谋部展开了较为紧密的合作。

二、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广东党组织与余汉谋部的合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至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延伸到广东这一时期，是广东党组织与余汉谋部合作的“蜜月期”，具体表现在，广东党组织根据中央“凡我们的帮助能推动国民党及其军队之进步，有利于整个抗战者，应决心帮助之”^⑫的指示，派出大量党员到余汉谋部队中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全力支持其抗日。

①《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37—1939），第299页。

②《中共广东省委四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1938年8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37—1939），第221页。

③《孙大光谈张文彬》，《怀念张文彬》，第163页。

④《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40），第170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军事志办公室编：《广东军事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0页。

⑥指1937年7月，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长兼政治委员的何鸣，因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闽粤边区红军的阴谋毫无察觉，致使独三团近千人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事件。

⑦《访问尹林平同志记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00158/18/4/55。

⑧《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第587页。

⑨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410页。

⑩《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给中央报告提纲》（1937年3月28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37—1939），第10、11页。

⑪《中共广东党组织革命斗争大事记》（1919.5—1950.5），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002002/16/1/14。

⑫《中央关于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原则的决定》（1939年1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1938年8月，由李煦寰任主任的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余汉谋延揽中山大学教授尚仲衣担任主管宣传教育的第三组组长。鉴于此时中共在广东的活动仍采取隐蔽方式，张文彬认为统一战线的联系，应“多依靠左翼分子与非正式公开的正式党员而又在群众中较有地位的同志去进行”，^①故他先后派石辟澜、叶兆南等中共党员加入第三组。广东党组织利用该阵地，以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②如在“七七抗战”周年火炬游行和“八一三抗战”周年活动中，石辟澜、尚仲衣在工作上紧密配合，“都搞得如火如荼”。^③

在对余汉谋部开展统战工作的过程中，广东党组织注重统战工作的方式，十分重视对余汉谋身边的将领、亲信和幕僚的统战工作，通过他们对其施加影响。张文彬指出：“在统一战线中遇事与国民党干部商量，并多多经过他们的干部，先同他们的干部弄好，由他的干部去包围他、推动他是最重要的。”^④这点尤其体现在对李煦寰的工作中。李煦寰是余汉谋的结拜兄弟，深得其信任，^⑤张文彬遂决定从李煦寰处寻求突破。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后，李煦寰决定招收青年学生成立政治工作大队（简称“四政大”）。张文彬获悉后，一方面派人直接同李煦寰打交道，如云广英以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多次与他见面，^⑥另一方面，动员杨重华、朱慕湛等一批年轻党员前去投考，并在队内建立了党支部，由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尹林平亲自领导，从而使“四政大”实际上为中共所影响与控制。^⑦

通过对广东国民党当局上层的争取，中共获得了合法的发展空间，使其擅长的群众动员有用武之地。在国共合作的态势下，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为代表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广东党组织的力量得到较快发展，至1938年8月，广东中共党员人数已经达到4700多人，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4倍多。^⑧

然而，就在中共与余汉谋部的合作取得进展之时，华南战场形势却发生重大变化。1938年10月12日，日军突袭大亚湾，10日后广州即落入敌手。是年底，蒋介石改组粤局，委张发奎为第四战区司令，李汉魂任省主席，余汉谋则被降为第12集团军司令。余汉谋感到“极度羞耻”，^⑨因而“少讲话，颇为隐忍，埋头苦干，整顿内部。”^⑩他主动向云广英提出，派给他一些有能力的干部，帮助他整顿部队，^⑪李煦寰还多次前往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与云广英接洽，商讨合作问题。^⑫

在此背景下，广东党组织一方面指示云广英向余汉谋、李煦寰等建议，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发动群众参加抗战，^⑬另一方面，第12集团军政工总队成立后，中共先后动员800多名进步青年加入，其中包括共产党员120人，并在其中成立了以廖锦涛为书记的党总支。广东省委明确指出，党组织在第12集团军中的任务就是促进地方实力派抗日和进步。^⑭

①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年），第328页。

②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踏遍青山——纪念左洪涛》，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③ 洪流：《石辟澜传略》，《广东党史资料》第2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

④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1938年），第327页。

⑤ 《李煦寰》，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典藏号：129-020000-3069。

⑥ 陈健：《陈健自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⑦ 《尹林平》专集编委会编：《尹林平》，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37页。

⑧ 参见《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报告》（1938年8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37—1939），第237-238页；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共广东省组织史资料》第1辑，1986年，第232-233页。

⑨ Mr Healey to P.W.J.C, March 25, 1944, Burma-Chinese freight rates (Folder 2), FO371 /1747, p.10. FO即英国外交档案。

⑩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3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40），第87页。

⑪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第170页。

⑫ 张华：《我在八路军韶关办事处工作的回忆》，《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第670页。

⑬ 云广英：《八路军办事处在韶关》，《韶关文史资料》第5辑，1985年8月，第5页。

⑭ 《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广东党史资料》第14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4、144页。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中共继续以余汉谋作为统战目标，其背后的考量与广州沦陷前有所不同。广州沦陷后，余汉谋的威望急速下降，而李汉魂任省主席后，亦处处限制其发展，加之二人又属粤军不同派系，故而积怨甚深。就对中共态度而言，相较余汉谋，因李汉魂的权力来自国民党中央，故他对中共采取敌视态度，戒备甚深。在中共眼中，李汉魂“在党派关系上最顽固”，^①日方情报也指出，李汉魂“对于其党之活动严重警戒，不予稍缓之故，致其党在华南方面之军事活动甚不自由。”^②广东政局的变化及现实的形势，是广东党组织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

政工队员分配至第 12 集团军各部队后，注重对士兵开展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通过出黑板报、上政治课、作时事报告及上识字课等形式，提升士兵对抗战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中处处可以看到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影子，如上政治课按照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编写教材，对士兵教育基本按照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精神去做等。^③政工队员们还注重做好军中比较进步开明的师级以上将领的统战工作，如 186 师师长赵一肩、184 师师长梁世骥等，这些将领多是邓演达的门生故旧，对中共亲善，梁世骥还曾为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代买过枪支。^④政工队员们主动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出版油印刊物请其题词等，以示尊重。他们还注重运用人情政治，打“感情牌”，派女队员做上层人物的随军家属工作，如独 20 旅女党员陈淑莲，经常跟正副旅长、参谋长的太太打交道，“关系搞的很好”。对于团营连排级军官，政工队员则采取广交朋友，建立私人感情的策略，以促其团结合作，“共同搞好连队工作”。^⑤

对于这一时期中共对余汉谋部统战工作的情形，在此前后担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和中区特委书记的罗范群回忆，中共着重打入部队中层和基层中进行政治工作，“即到连、营、团里去。特别是政工队中，我们市委派去的同志很多。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搞宣传，而且争取改造整个部队。”^⑥罗氏这番话，从余部 151 师的蜕变中可窥一斑。该师在广州沦陷前曾驻防惠阳一带，由于风纪废弛，日军进犯大亚湾时即迅速溃败。^⑦后余汉谋委林伟俦任师长，重新整训。^⑧1939 年春，20 多位中共党员到该师后，通过向官兵宣讲抗战形势、上政治课等形式，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救亡主张，改善部队内部团结和军民关系，^⑨有力地配合了部队整训，使该师在短期内恢复了战斗力。1939 年 8 月，第 66 军军长叶肇向蒋介石汇报说，自林伟俦上任以来，该师“生气蓬勃，官兵咸知振奋。四月中旬增城、派潭之役，战果甚佳”。^⑩

151 师的进步，与中共政治工作的助力密不可分，有文件指出：“十二集团军，近来更为进步……他这次对于广州附近的反攻战斗，确实表现了英勇坚决，取得一些有意义的胜利，说明了他们最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我们对于他的帮助，也是不可否认有相当作用的。”^⑪而对中共来说，也可以藉此掩护，进一步发展自身力量。这一点，张文彬说得很直白：“我们对他的要求，只要他能坚持抗战和进步团结，

① 《中共广东省委青委给中央青委的报告》(1939 年 11 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37—1939)，第 458 页。

② 《毛庆祥电蒋中正》(1939 年 3 月 23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19-053。

③ 《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第 146-149 页。

④ 《访问云广英同志记录》(1964 年 3 月 12、26 日)，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003594/16/5/65。

⑤ 《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第 156-158 页。

⑥ 罗范群：《我对抗战初期广东军事工作的再认识》，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51 页。

⑦ 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粤桂黔滇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年，第 10 页。

⑧ 《余汉谋电蒋中正》(1939 年 1 月 1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200-00049-266。

⑨ 梁钧：《回忆抗战初期在第四战区政治工作大队中的活动》，《广东文史资料》第 62 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56 页。

⑩ 《叶肇函蒋中正》(1939 年 8 月 1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00516-201。

⑪ 《中共广东省委综合报告》(1939 年 4 月 19 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37—1939)，第 378 页。

就可以在政治上起推动的作用，也可以对我们起掩护作用。”^①可以说，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与余汉谋部的合作实现了双赢，有力促进了国共协同抗日。然而，随着国内反共高潮蔓延到广东，中共与余部的合作也面临着严峻考验。

三、国民党反共逆流下余汉谋的转向与中共的应对

中共与余汉谋在统一战线下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而这又是抗战开始后国共关系持续演变的结果。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明确提出“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严格防制政策。”^②此后，各地对中共活动的限制明显加强。1939年4月，复兴社分子邱誉任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后，第三组内尚仲衣、石辟澜等中共党员被尽数革职。^③10月，李汉魂到东江各县作反共动员，撤换了一批支持抗战活动的县长和党部书记。^④

广东国共关系趋紧之初，与邱誉、李汉魂大肆反共有所区别，余汉谋则稍有不同。^⑤一方面，余汉谋与中共有事实上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共领导的群众活动的不断发展，也引起了余汉谋的警惕。1939年5月，余汉谋向蒋介石报告称，广东党“通过国民党形式隐匿活动实力，参加政府机关、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各级低层组织”，并“吸收青年学生、工农干部取得领导，建立其所谓统一战线”，对此，他提出要“严密侦查防范”。^⑥不过，尽管余汉谋对中共有所戒备，但总体而言，此间其对中共多是政治上的防范。这也表现在1939年初经余汉谋同意，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建立了与中共中央联系的电台。^⑦第一次粤北战役后，因政工队员“在部队中与余、李面前的信仰上都更提高”，余汉谋甚至表示愿给他们“当连、排长，作下级军事干部”，并“决再招收青年四百名，要求抗战给以帮助。”对此，广东省委决定再给予帮助，在中共看来，争取12集团军的巩固与进步，“不仅是争取广东主要武装力量的进步意义，而是整个统线上有重要意义的。”^⑧可见，中共把余汉谋部视作广东抗战的中坚。正因如此，为维护与余部的统一战线，中共甚至部分错失了发展武装力量的良机。

广州沦陷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广东地区的武装斗争工作，明确指示广东党组织应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⑨为了贯彻中央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派曾生、周伯明等人到惠阳县坪山，借助统一战线和民众武装，筹建抗日武装。1938年12月，由曾生任总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1939年初，王作尧带领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和黄木芬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重新合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⑩曾生、王作尧两部建立后，“给当局帮助很大，收下三四百散兵，收复东莞、惠阳两县的政权。有三千正规军愿到我们新四军来和接受我党的领导。”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军事干部，为了顾全大局以争取余汉谋，中共放弃了对该部的争取，并把该部送回国民党当局，“曾、黄部得到了当局的谅解”。^⑪从“谅解”一语中，可以感受到张文彬对余汉谋的看重。

不过，到了1939年底1940年初，余汉谋对中共的态度却发生了明显转变，这与当时广东的政治生态、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暗中博弈都息息相关。1939年11月，陈诚到韶关作反共动员，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此后，广东国共关系更趋紧张。一直敌视中共的李汉魂，此时更加变本加厉。

^①《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第171页。

^②《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藏特种档案：特29/21.15。

^③《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第157页。

^④《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

^⑤《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书记处报告》(1940年2月12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40)，第25页。

^⑥《余汉谋电蒋中正》(1939年5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300-00015-522。

^⑦陈健：《陈健自述》，第55页。

^⑧《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3月7日)，第85-86页。

^⑨《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17页。

^⑩《吴有恒关于粤东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41年1月13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东南特委、西江特委文件和报刊资料选辑)(1937—1944)，1987年，第70页。

^⑪《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第185-186页。

1940年4月，他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中共掌握的组织全数解散。^①

日益紧张的广东国共关系，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余汉谋对中共的态度，不仅如此，他还感受到来自国民党中央方面的压力。余汉谋非蒋介石嫡系，且是广东人的身份，使得蒋介石对他始终无法完全放心。1939年6月，蒋介石委王俊任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而王俊在粤“态度甚为不好，且有联络该集团军官兵挟中央以自重，使余醒奇为难之势。”^②蒋介石将王俊安插在余汉谋身边，不无对他有提防监视之意。在此情势下，善于见风使舵的余汉谋迅速与中共拉开距离，据云广英回忆，到1939年冬，“余对我们的态度就不同了，很怕接近我们。我们的工作受到了阻碍，以后我们介绍到延安去的人便很少了。”^③到1940年3月，八路军通讯处的活动范围已大大缩小，“不仅是省政府与党部、政治部中无可联络了，就是十二集团军中余汉谋也已不敢见面谈话，仅只是派副官接见敷衍了事。”^④

不过，相较于此时余汉谋态度的迅速转变，广东党组织的反应则稍显滞后。1940年2月，张文彬在向中央报告广东工作时，仍认为余汉谋“为人忠厚软弱”，估计此后“余之相当进步等，都会向前发展。”^⑤收到广东报告后，3月11日，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对余李冲突问题，须利用余之较进步倾向派进步分子帮助余汉谋，并设法在余掩护或默许之下，建立抗日群众团体。”^⑥需要指出的是，中央对广东的指示，固然与广东省委报告有关，也与此时中共所执行的对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策略有关。1940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统战方针，明确指出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⑦4月初，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也强调要切实加强对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⑧

1940年4月，张文彬抵达延安向中央汇报广东工作，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余曾在逆流的时候，在部队中进行了反共的动员。所以，我们在他的部队中，也不能有过分的幻想。”尽管张文彬对余汉谋已有了戒备之心，但他仍对广东形势保持乐观，认为余汉谋“为人忠厚”，仍强调“今天真正能维持他的力量的还是依靠我们和青年”。^⑨事实上，远离广东的张文彬或许并不知道，此时的余汉谋不仅与中共渐行渐远，面对中共东江武装力量的发展，他甚至不惜与中共兵戎相见。

1939年春，日军从惠州地区撤出后，国民党军随即重返东江地区，并设立了由香翰屏任主任的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前已述及，广州沦陷后中共也在东江组建抗日武装，而香翰屏对中共在自己地盘内发展武装，深感戒惧，这使得国共间的相处变得更为复杂。1940年2月，香翰屏命令曾生、王作尧两部限期到惠州集训，企图将其包围缴械，一网打尽。中共洞察其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3月，他纠集兵力约3000人，准备武力消灭曾王二部。3月17日，余汉谋向蒋介石汇报称东江情势日趋严重，请求将调驻外地的第159师回粤支援。^⑩

东江抗日武装刚刚打开局面，余汉谋就欲极力清除之，这表明其与中共的合作是极不可靠的，一旦中共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其立场就会随时发生改变。虽然余汉谋与蒋介石之间有矛盾，但两人在防共

① 《广东省执委会主委李汉魂上中执会呈》(1940年4月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藏特种档案：特20/4.6。

② 《蒋中正电令何应钦》(1939年6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10300-00024-009。

③ 《访问尹林平同志记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001583/18/4/55。

④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第162页。

⑤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书记处报告》(1940年2月12日)，第23-26页。

⑥ 《中共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1940年3月11日)，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44页。

⑦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5-748页。

⑧ 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⑨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第171页。

⑩ 《余汉谋电蒋中正》(1940年3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300-00202-109。

方面却是一致的。对此，曾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要用各种方法来限制和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自不用说”，余汉谋“也不容许在其势力范围内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存在和发展。在反共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①可谓一语中的。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由于事发突然，又无法及时向中央报告，东江军委做出了东移海陆丰的决策，而在东移过程中，队伍又遭受重挫，人数从700多人锐减至100多人。^②在得知东江地区国共冲突和曾生、王作尧二部命运后，1940年4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批评广东省委对局势过于乐观，没有认清时局的严重性。^③5月8日，中央指示曾王二部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大胆坚持抗战与打摩擦仗。^④收到中央指示后，5月17日，广东省委向中央和南方局紧急发出一个特别注有“万万火急”字样的电报，表示完全赞同中央决定，曾王二部应不怕打摩擦仗，要坚持独立自主与敌后应战。^⑤可见，广东党组织已经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为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1940年6月，广东省委在南雄召开会议，张文彬在会上总结了曾生、王作尧二部东移海陆丰的教训，提出广东党组织要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派尹林平赴东江加强对武装工作的领导。^⑥可见，时局的发展促使中共进一步意识到，只有独立自主发展武装力量，才能妥善应对国共摩擦，争取时局好转。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共统一战线未破裂前，中共为了维护与余汉谋部的统一战线，对于发展武装力量是较为谨慎的。为避免摩擦，中共更多的时候是委曲求全，专注通过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去改造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掌握群众自卫武装。^⑦1940年4月，张文彬就曾言：“过去我们为了统一战线，争取余和中间势力，我们在广东不做武装力量的发展，就是做了一些也是很慎重的。”^⑧但余汉谋欲消灭东江抗日武装的图谋，使得国共双方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合作难以为继。曾王二部的惨痛教训及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也使张文彬对余汉谋的认识有了明显的转变。

这种转变在他此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有所体现。1940年9月，曾王二部返回东宝惠后，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对实力大减的曾王二部，余汉谋欲除之而后快。12月26日，他向蒋介石报告说，已令独九旅、保安第八团等负责清剿两部。^⑨在此背景下，1941年2月，张文彬在向中央汇报时说，据情报余汉谋已调一个团围剿曾生部。他也密切关注着中共党员在余汉谋军中的处境：“我在十二集团军中之党员，除少数坚定已撤外，尚未被捕事。”^⑩可见，此时的张文彬对余汉谋之举动保持着一定警惕。事实上，曾王二部东移事件后，余汉谋已充分暴露出其精于算计、翻脸无情的个性，这也体现在他对中共琼崖武装和第12集团军政工队中中共党员的态度上。

抗战初期，由冯白驹领导的琼崖抗日武装是中共在华南唯一一支较具规模的武装力量，而余汉谋对

①《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

②《曾生回忆录》，第156页。

③《中央关于时局逆转与党的应付措施给粤委的指示》（1940年4月1日），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7-18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曾生、王作尧两部回应防东莞、宝安、惠阳地区及行前应注意事项的指示（摘录）》（1940年5月8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第46页。

⑤《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并南方局报告》（1940年5月1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40），第259页。

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

⑦罗范群：《我对抗战初期广东军事工作的再认识》，《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651页。

⑧《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第191页。

⑨《余汉谋关于“肃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26日），《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图片、表册、参考资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146页。

⑩《张文彬给康生并中央书记处电》（1941年2月28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广东省委文件）（1941—1945），1986年，第147-148页。

中共在琼崖的发展保持相当警觉，1939年10月，他向蒋介石汇报称“共党冯康部颇形活跃”。^①此前不久，吴道南出任琼崖地区行政专员后，极力推行反共政策，百般阻挠中共武装力量发展，琼崖国共关系更趋紧张。^②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军集中3000多兵力向中共美合根据地进攻，试图消灭琼崖抗日武装。得知琼崖国共冲突后，12月26日，余汉谋向蒋介石报告说已令守备司令王毅迅速将冯康部彻底肃清。^③27日，余汉谋又向蒋介石“报捷”请功，称已将冯康大部解决，是役“毙共党一百余人，俘卅余，缴获步枪七十余杆等”。^④可见，为了在政治上取信于蒋介石，余汉谋已经全然不在乎得罪中共。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随着国共关系再度恶化，广东国共冲突也进一步加剧。1940年12月，陈诚指出第12集团军中“左倾”分子太多，严令余汉谋制止中共在军中的活动。^⑤同月，第七战区政治部成立后，国民党中央派有军统背景的广东省三青团总干事李国俊任政治部副主任，以此加强对政治部的控制。在此情势下，素来对中共友善的李煦寰态度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公开指斥中共为“奸匪”，政工总队队报也被迫停办。^⑥6月，第12集团军拘捕了一批在政工总队部工作的中共政工队员，并秘密杀害廖锦涛、王珠等人，中共被迫停止在国民党军中的公开活动。^⑦

随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到1942年初，张文彬对在敌后根据地独立自主发展武装力量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转变背后又与他对东江游击区地位认识的变化相关。抗战时期中共广东抗日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东江流域，对于素来侧重依托山地发展武装力量的中共党人来说，对能否在水网密布、地域狭小的东江建立敌后根据地是存疑的。1940年4月，张文彬在延安时就此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指出，东江游击区横直有几十里，比井冈山初期的地域还大，但井冈山地形险要，东江则有到处被敌进攻的可能。^⑧但毛泽东也指示广东，今后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斗争和敌后。^⑨一直到1941年8月，张文彬仍认为：“东江游击区象一条带子一样”，即地方狭小，缺乏发展空间。^⑩

1941年年底香港沦陷后，因东江抗日武装成功地把在港的部分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撤退到东江游击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这促使张文彬认识到“没有东江部队就无法完成中央的任务”，^⑪因此，原本只准备在东江游击区待上两三天就离开的他，住了长达三个月时间。期间，他对东江游击区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东江地区虽无险要的崇山峻岭，但丘峦起伏，地形复杂，而且又新辟九龙新界和增博地区，大有回旋余地；同时又有群众基础和革命传统，人心所望是团结抗战”，因此，“只要指挥得当，是能够取胜的”。^⑫可以说，这样的认识是更符合实际的。

在东江游击区多次干部会议上，张文彬还明确指出，要认识到国民党“要灭我之心是不会死的，一定会继续向我们进攻，我们可能会遇到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但是必须认识，武装斗争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他反复强调，不论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一定要坚持抗日自卫斗争，一定

① 《余汉谋电蒋中正》（1939年10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300-00203-308。

② 沙东迅编著：《广东抗日战争纪事》，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

③ 《余汉谋关于“肃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26日），第146页。

④ 《余汉谋电蒋中正》（1940年1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300-00209-056。

⑤ 《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大事纪要》（1938年至1942年），《广东党史资料》第14辑，第183页。

⑥ 《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第156-158、161页。

⑦ 《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内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大事纪要》，第184-186页。

⑧ 杨康华：《杨康华回忆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

⑨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

⑩ 《访问尹林平同志记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001583/18/4/55。

⑪ 《访问尹林平同志记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001583/18/4/55。

⑫ 杨康华：《杨康华回忆录》，第237页。

要坚持到底。”^①因应形势发展，他决定将东江游击队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并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以加强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张文彬在东江游击区期间，不仅对反摩擦斗争给予了具体的指示，还涉及到部队军政建设、发展武装等根据地建设的各个方面，使得广东党组织在敌后的斗争与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对进一步开展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1942年4月，在离开东江游击区不久，张文彬即遭遇不测，在大埔被国民党特务抓捕。他在狱中备受折磨，却始终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34岁。

四、结语

“我们在广东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就是余汉谋。广州没有失守前与我们关系最好的是他。广州失守以后和我们关系最好的也是他。”^②1940年张文彬的这一席话，是抗战前期中共广东党组织统战工作的缩影。

就当日之情势来看，广东党组织投入大量精力与时间在统战工作上，有着特定的客观环境。一方面，广东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主力，“总的方面是我党力量较弱”。在这种形势下，尽量运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出现，将有利于我党力量的生存、发展。^③另一方面，张文彬初到广东时，广东党组织正处于重建与恢复阶段，力量的弱小及外来支持有限，中共只能尽其所能，寻找在这里相对可能的生存发展方式，借助国民党地方当局中开明人士之力，亦是重要途径。对此，张文彬有句话讲得很精辟：“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是为了更有利于我们发展基本群众工作。”^④事实上，正因为广东党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统战工作，才使中共藉此获得活动空间，广泛发展群众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力，进而在广东站稳脚跟，迎来发展。

当然，在肯定张文彬领导统战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1937年至1942年间张文彬在广东的工作，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即对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投入和关注较多，而对独立自主发展武装力量投入不够。这固然与其时中共在广东所处的环境有关，也与余汉谋的复杂多变密不可分。应该说，抗战初期中共在广东的生存、发展，与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与余汉谋的合作直接相关。但也应该看到，余汉谋终究是国民党地方大员，正统思想浓厚，他各方面不得不受国民党中央方面的掣肘。

1940年以后，余汉谋对中共态度的转变就表明，他绝非中共眼中的“忠厚”之人，而是圆滑、颇有心机之人。在与中共关系上，他始终以己方利益为依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更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实用主义者，而绝不是一个值得中共信赖的盟友。余汉谋身上复杂的两面性，不可避免地对地方工作经验不足，但又必须在局势异常复杂的华南独当一面的张文彬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得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发展一度不够大胆和主动。1937年至1942年间及以后中共在广东的发展历程说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作为中共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三者应齐头并进，不可偏废，对于像广东这样中共力量薄弱而国民党势力强大的地区，尤其如此。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 杨康华：《杨康华回忆录》，第110、112页。

②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第170-171页。

③ 罗范群：《我对抗战初期广东军事工作的再认识》，《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655-656页。

④ 杨康华：《杨康华回忆录》，第331页。

看见她，歌谣中的理想美人

——董作宾歌谣研究的百年对话

施爱东

[摘要]1924年，董作宾根据各地歌谣《看见她》而写成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被认为是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最重要的成绩之一，一直被民俗学者奉为歌谣研究的经典。奇怪的是，时隔一百年，经过了多次全国性的歌谣搜集运动，这首被胡适和常惠等人认为风行全国的歌谣，搜集总数依然不足一百篇。究其原因，除了董作宾曾经指出的该歌谣只能流行于南北官话系统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是一首主要由清代旗人子弟带往全国各军事重镇的儿童游戏歌。辛亥革命之后，旗人逐渐星散，这首歌谣也开始走向衰落，1950年之后几乎绝迹。歌谣中对于“理想美人”的夸耀，处处都能看出歌唱者以“贵”为“美”、以“相”取“貌”的审美标准。与其说该歌谣夸耀了一个美丽的女孩，不如说表达了一种对于富足生活的热切向往。

[关键词]北京大学歌谣运动 《歌谣周刊》 游戏歌 童谣 董作宾

[中图分类号] I207.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146-09

很难说清末民初最流行的歌谣是哪一首，但是被记录和讨论得最多的当属《看见她》无疑。胡适1922年在《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中说：“这首歌是全中国都有的，我们若去搜集，至少可得一两百种大同小异的歌谣，他们的‘母题’是‘到丈人家里，看见了未婚的妻子’，此外都是枝节了。”^①几乎同一时间，常惠也注意到这首歌谣。他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号上发表《对于投稿诸君进一解》，拿它来举例说明歌谣研究很有价值也很有必要。大概当时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语言不统一，他认为把各地的这首歌谣都拿来比较一下，正可以用来做国语流变的实证研究。一般来说，民间文学——无论是传说、故事，还是歌谣，都是没有标题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民歌标题，都是文人整理时取其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字，或者开头几个字命名的。常惠举例的时候，就用《隔着竹帘看见她》作为这首歌谣的标题。到了1924年，董作宾对这首歌谣展开研究的时候，只取其中三个字，将歌谣定名为《看见她》。

一、隔着竹帘儿看见她

意大利男爵韦大列 (Guido Vitale) 是对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西方人。他1890年来到中国，任职于意大利驻北京使馆，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了许多民间文学作品。他说自己“吃尽一切劳苦，尽力的搜集”，然后将这些歌谣和笑话做成中英文对照读本，当作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入门教材。1896年，韦大列编了一本《北京歌谣》，并且预言：“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

作者简介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

① 胡适：《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努力周报》第31期，1922年12月3日，原署名Q。

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①书中最著名的一首，便是《看见她》：“沙土地儿跑白马，一跑到丈人家，大舅儿往里让，小舅儿往里拉，隔着竹帘儿看见她：银盘大脸黑头发，月白缎子棉袄银疙瘩。”（北京）^②这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记录的《看见她》。在20世纪20年代搜集的歌谣中，多数异文后面还有男主人公的实际行动：“等我到了家，告诉爹和妈，就是典了房子出了地，也要娶来她！”（北京）一种更激烈的方式是，男主人公以死相逼，要求父母赶紧地把女孩儿娶过来：“‘娘娘，娶打了吧！’‘今年小，过年大，缓缓年头儿再娶吧。’大嫂借绺丝，二嫂借绺麻，后花园里吊死去吧。”（河北完县）

《看见她》的男主角是小男孩，歌谣中的身份通常是一名小学生：“东边来个小学生，辫子拖到脚后跟，骑花马，坐花轿，走到丈人家。”“爬草根，两头分，路中来了个小学生，骑花马，拜丈人。”或者小孩：“小孩，骑花马，花马不走使鞭打，一走走到丈人家。”有些歌谣中会明确说男孩骑的是“竹马”“花马”。男孩骑着竹马，转来转去就转到了未来的丈人家。男孩的篇幅虽然占据了歌谣十分之八，但是，歌谣中最风光的人物并不是他，一切细节的铺陈，都是为了引出即将看到的那个“她”：“东风儿刮，西风儿刮，刮起门帘儿看见她。”

二、歌谣的南方官话系统和北方官话系统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歌谣。到1924年秋天，六年共征集一万多首。董作宾从中找出45首《看见她》异文，根据这些异文写成了他的经典名篇《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③

董作宾在翻检过程中发现：“检到福建、广东、浙江、广西、云南、贵州等省时，看到他们的歌谣很少和北方各省相同的，据我的比例，可以认为这几省没有。”因为《看见她》流行的前提条件，就是“她”必须押a韵，因此大凡不讲官话的地区，这首歌谣就很难流传。南方的“她”一般都写作“佢”，有时也会写作“渠”，吴方言的人还会写作“伊”。“佢”字标在字典上的读音是qú，但现实中的读音不是这样，各地相差非常大。“佢”在吴语中一般读作ghi或者gei，在粤语中读成keoi5，在客家话中也有好几种读法。我的出生地江西石城读ge，可是，隔壁的瑞金就读gu；再往南，过了赣州，就读ji或者gi；但如果往北进入赣方言区，又会读成kie或者jie。换了韵脚，失去了歌谣的韵味就没法唱。歌谣转韵就得换词，换词往往意味着内容的更新，很可能导致这首歌不再是那首歌。民俗学者陈泳超认为：“不同方言区的歌谣交流一向很少，因为处理韵脚很费事。而故事传说只管情节不管语言，所以流通顺畅。”^④

董作宾把所有《看见她》的流传地区标在地图上，发现这首歌谣的传播是紧跟着水陆交通的孔道而行的，尤其是水便于陆。北方主要是沿着黄河流域走，也就是北方官话的领土；南方主要是沿着长江流域走，也就是南方官话的领土。为了确证这一推论，董作宾使用统计表格，区分出了“确实没有”的省区有浙江、广东、广西、云南，与他原来的猜测基本吻合；而“可能有，但没搜集到”的省区有六处。然后得出结论：“歌谣不同，也可以说就是语言不通。福建、浙江、广东的语言，和南北两大官话区的语言特别不同，所以这一首歌谣，虽游遍了十二个省区，竟不曾跑到他们那边。”他把所谓北系南系的流布分别列了两份表，厘清它们流传散布的踪迹。北系的发源地假定在陕西中部，由此分出四大支派；在南系中，又分出成都和南京两大干系。比较之下，成都一系乃由陕西传入，由此南北两系连在了一起。据此，董作宾根据各地歌谣的相似度，画出一个复杂的传播路线图。不过，路线图越复杂，就越有可能出错。最主要的问题是，董作宾没有区分“流行于该地”和“流传到该地”两种情况。比如胡适搜集的

^① 转引自《发刊词》，《歌谣周刊》第1号，1922年12月17日。不同译者对这段话的翻译不太一致，《歌谣周刊》第20号《北京的歌谣序》译为：“根于这种歌谣和民族的感情，新的一种民族的诗或者可以发生出来。”

^② 本文所录出的《看见她》歌谣句段，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62号（1924年10月5日），以及娄子匡主编《看见她》（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影印“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第23种，1970年）。

^③ 董作宾：《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歌谣周刊》第63号，1924年10月12日。下文不再出注。

^④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阅读此文初稿时的批注。下同。

两首《看见她》，一首是南京人带到安徽旌德的，一首是成都人带到安徽绩溪的，旌德和绩溪本地并没有这首歌谣的流行。

董作宾还在南北两系的比较中发现了风俗上的差异。比如，从对女子容貌和装束的描绘中，可以知道南北之间审美标准的不同，“北方多穿高底鞋，南方则否，北尚朴素，南多奢靡”；从“招待情形”一段，还可看出更多南北差异；从菜式可见北方的朴实，南方的奢华；从席上动作，可以看出民间交际的实际状态；从使用器具，可以看出各地特产的不同。

三、北方官话系统：经济条件最重要

关于清末民初的美人标准，我们大致可以从《看见她》中看出来。董作宾说：“叙述女子妆束和容貌的美丽，是‘看见她’一段的精彩处，而全首的最精彩处也就在此。这一段叙述的本是小学生眼中标准的未婚妻，其实可以说是该地方女子衣饰容貌的一个具体写真，也可以说是民俗文学家理想中的美人。”我们就以省区为界，分别看看各地歌谣中的“理想美人”是什么样子。

京津冀一带，民国时称作直隶，除了前面韦大列搜集的一首，还有其他许多异文。比如：“推开门来看见她：粉红脸，赛桃花，小小脚，一衲挓，樱桃小口，糯米银牙。”（北京）分别从脸蛋、唇齿、小脚三个角度描述理想美人。还有一些不直接说长相的，只是含蓄地拿女孩着装说事：“隔着竹帘瞧见她：青缎中衣袴桶扎，月白小袄狗牙掐，小红鞋儿二寸八，上头绣着喇叭花。”（北京）这里的重点是说小脚，但是不直接说脚小，而是通过“小红鞋儿”来暗示小姑娘的脚还不到二寸八，比起传说中的“三寸金莲”还小二分。总体看来，发黑、面白、脚小，是1920年前后直隶美人的三大标志性特征。小女孩身上色彩一定要尽量地鲜艳，漆黑的头发，粉白的手脸，鲜红的头绳：“东风刮，西风刮，刮起帘子儿来看见她：漆黑的头发一大掐，鲜红的头绳没根扎，脚儿在如锥锥把，手儿在如面疙瘩。”（河北完县）

这首歌谣在山东的传播，仅次于直隶。山东歌谣比较质朴，“她”是个白白净净的女孩，乌黑头发，大红大绿的衣服，高底鞋上还画着牡丹花。男孩看了一眼，喜欢得不行，接着就是“看个日子娶了吧”。理由也非常简单：“天上的白云配黑云，地下的小姐配郎君，园里的菠菜配葱韭，指甲桃子配石榴。”（山东长山）讲究门当户对，相互般配。从山东沿黄河上溯，就是河南。河南人对富足生活的渴望似乎更加强烈一些，他们更重视女孩身上的穿戴和档次，不那么在意女孩的形体长相。脸上要抹得起官粉，脚上要穿得起高底鞋；耳上要有玉环，手上要有戒指；布衫要缀边子，裤子要绣银花。一句话，物质条件好就好。比如：“隔着门帘看见大小姐，青丝头发，红丝头绳扎，鬓角还插海棠花，耳带白玉环，手带戒指唿喇喇，红鞋粉高底，绿缨颤撒撒，月白布衫对莲花。”（河南南阳）

继续上溯到山西、陕西。山陕歌谣对女孩的要求最多，先看山西晋城这首：“隔着门帘看见她：通红舌头雪白牙，青丝头发黑黝黝，两鬓还插海棠花；耳戴金耳环，手戴戒指忽喇喇；高底鞋，鳌梅花，左梳头，右插花，俊死她来爱死我。”再看陕东南这首：“风摆门帘看见她：白白脸，黑头发，包包嘴，糯米牙，白白手，红指甲；银镯子，十两八，银筒箍，珐琅花；缎子鞋，打子花，还是奴家亲手扎，步步走路踩莲花。走路好像风摆柳，立下就像一股香，坐下就像活娘娘。”这些歌谣如果是男孩唱的，那简直就是做白日梦。做梦当然是朝着最理想的方向做去，梦中的女孩总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歌谣中，女孩家的经济条件是最重要的，银筒箍、高底鞋、金耳环、大戒指，银镯子得有十两八；长相当然也要好，脸要白，发要黑，妆饰要得体；此外，仪态也要优雅才行，站有站姿，坐有坐相，走起路来要像风摆柳一样摇曳生姿。这还不够，别以为长得好、家境好就行，这手上工夫可不能落下了，缎子鞋上的绣花得是亲手扎的。但我始终怀疑这些歌谣不再是男孩的歌，而是女孩自己的歌，是一首女孩“自我教育”的歌谣。歌谣中将女孩的妆饰和仪态唱得这么仔细，很难想象一个男孩能够如数家珍般将这一串首饰数落得出来。因此这类歌谣很可能是女孩唱的，她们一边游戏一边唱着歌谣，告诫自己也互相告诫：梳洗打扮要贵气，立姿坐姿要大方，针线女红要熟练。陈泳超认为，“还是奴家亲手扎”一句，正好能证明这是女孩唱的歌，属于“一不留神露出的马脚”。

最后是甘肃。甘肃的民间小调发达，对于“她”的身体描述最仔细：“丈人丈母不在家，窗眼里照见小姐娃，黑油油头发红头绳扎，八丝耳坠两肩膀搭，弯溜溜眉毛两张弓，毛乎乎眼睛两盏灯。箭杆的鼻子端上端，红扑扑脸蛋真好看。糯米银牙尖对尖，樱桃小嘴一点点。站着好像一炷香，走路好像风摆浪。身上穿的花袄袄，八幅子罗裙紧系腰。扎花的裤裤鸳鸯带，小金莲走路咯塞塞。叫人越看越喜爱，啥时花轿接你来。”（甘肃兰州）^①这一看就已经不是童谣了，同样的内容，加入了成年男子的审美趣味。小调中诸如“糯米银牙尖对尖，樱桃小嘴一点点”“身穿一领花棉袄，八幅子罗裙紧系腰”之类，都是西北情歌中的常用套语。童谣已经变异为青年男子自我抚慰的幻想歌。

四、南方官话系统：金簪子、玉耳挖及其他变异

就目前搜集到的《看见她》来看，这首歌谣主要流行于海河、黄河以及长江的中下游地区，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地区相对少见。长江流域《看见她》的主要流传地是南京、武汉、成都三地。湖南境内洞庭湖支流的沅江流域，也有部分异文流传。

先看江苏南京的：“帘背后，看见她：金簪子，玉耳挖；雪白脸，淀粉搽；雪白手，银指甲；梳了个元宝头，戴了一头好翠花；大红棉袄绣兰花，天青背心蝴蝶花。”这里的色彩搭配，比之黄河流域的大红大绿，显然精致多了。南京周边江苏镇江、安徽和县的异文，基本上可以视作南京歌谣的简略版。湖北的几乎全部出自武汉。武汉歌谣最基本的程式，就是从“格子眼”望见她：“格子眼，望见她：樱桃口，糯米牙，上穿绫罗下穿纱，红缎子鞋撒梅花，一根葱的耳挖当头插。”另一个常见程式是莲蓬的比喻，歌谣最后一句，女孩告诫男孩说：“再等三年不来娶，老了莲蓬谢了花！”湖南异文的变异也略大一些。沅陵歌谣对于女孩装饰的想象，在长江流域是最丰富的：“风吹门帘瞧见她：红头绳，紧紧扎；金扁簪，拦腰架；金耳挖，当头插；金耳环，两面挂；金镯头，四两八；金戒指，配指甲；缎子背心洒菊花；红绸裙，牡丹花；红绸鞋，满面花。”一溜的全是金首饰，从头顶一直装备到指甲，连银饰都不用一件。沿着长江继续西溯，四川成都唱得比较简单：“风吹门帘看见她：粉白脸，黑头发；倒丫角，插翠花；八宝耳环三钱八；步步走的是莲花。”有些异文只有一句，“粉红脸儿黑头发”或者“粉白脸儿赛白花”，成都人似乎特别注重肤色。

长江流域的女孩首饰，出现频次最高的是耳挖，如：“一根葱的耳挖当头插。”“金扁簪，拦腰架；金耳挖，当头插。”“金簪子，玉耳挖；雪白脸，淀粉搽。”安徽和江苏的歌谣中，多次出现“梳油头”的时尚发型，如：“梳的油头插翠花。”“梳油头，戴翠花。”“梳油头，插红花。”董作宾甚至怀疑：“像其中的梳油头、戴翠花，再等三年不来娶……云云，都是南系特有的色彩。”不过，董作宾的推测也可能错的。因为20世纪末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都收录了许多黄河流域的《梳油头》小调。比如陕西《梳油头》：“梳油头，巧打扮，鬓角儿又插海棠花，鬓角儿又插海棠花。”^②不过，长江流域的《梳油头》似乎更火辣一些，比如湖北这首：“奴在房中梳油头，胆大的情郎哥哥一步跳上楼，站至在奴的背后。”^③梳头用的油，可能就是普通的菜油，因为湖北的歌谣是这样唱的：“正月梳头梳得光，姐儿头上菜油香。”^④山东女孩用芝麻油，香味更浓：“一碗芝麻，两碗油，大姐二姐梳油头，梳油头，光溜溜，苍蝇上去站不住，蚊子上去翻跟头。”^⑤

《看见她》在长江流域的变异明显大于北方官话区，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许多异文连起兴的“骑马”动作都不见了。比如南京的一则异文是这样起兴的：“扯呵呵，摇呵呵，撑船去，接丈母，丈母不在家，窗户眼里望见她。”撑船代替了骑马，把江南的水乡生活特点融入了歌谣。武汉异文的起兴句

^①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甘肃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歌谣集成·甘肃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0年，第392页。

^② 曹世玉编：《绥德文库·民歌卷》（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3649页。

^③ 武汉说唱团有限责任公司“非遗”办公室编：《湖北小曲》（上），武汉：武汉出版社，2018年，第73页。

^④ 罗田县文化局、罗田县文化馆编：《罗田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精选·第2辑》（内部资料），2009年，第272页。

^⑤ 济南市历下区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辑：《历下民间文学集成》（资料本），1988年，第335页。

则是：“七岁伢，会卖花，卖花卖到丈人家。”“白纸扇，手中拿，亲哥听见走人家。”还有一首打伞看丈人的：“半边落雨半边晴，女婿打伞看丈人。”^①从湖北武汉传到安徽桐城、江苏苏州一带，歌谣就被彻底“江南化”了：“半边晴天半边阴，撑把雨伞看丈人；丈人丈母不在家，推开门来看见她：瓜子脸，白粉搽，一红一白海棠花。”^②这跟北方官话系统的《看见她》已经不是一种韵味。另外，沈兼士提供的一则江西丰城歌谣，变异更加严重，嫁接了南方最通行的歌谣起兴句“月光光”：“月光光，通透明，撑把伞，看丈人；丈人丈母不在家，掀开门帘看见她：粉红脸，赛桃花，小小金莲一拉抓；等得来年庄稼好，一顶花轿娶到家。”沈兼士并不是江西人，这首歌不知道从哪里采录的，可是用丰城话根本念不出童谣的韵味。

五、游戏歌：男方唱罢女登场

董作宾是将《看见她》当作叙事歌分析的，但这其实是首游戏歌。

韦大列搜集的北京歌谣很多是“二手歌谣”。比如，他曾就歌谣的搜集问题请教过他的中文先生，可是这位先生很不屑于这些不入流的小玩艺，固执而且肯定地说中国没有这种东西。只是在韦大列付出洋钱后，这位先生才表示会尽力帮助多搜集一些歌谣。最后，这位不承认歌谣存在的中文先生居然搜罗提供了40多首。^③可见韦大列搜集的歌谣中，许多都是脱离了具体语境的纯文本。北京大学歌谣运动中，绝大多数搜集者都只是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搜集歌谣，并不在意歌谣的语境和功能。

未见实体，单看文字，是很容易误读的。事实上，大部分歌谣在具体语境中都有其实际功能，情歌、仪式歌、劳动歌自不必说，即便童谣，也有语言、教化或游戏的功能。韦大列之后，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也在美国出了一本《孺子歌图》，英文书名叫*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中国鹅妈妈童谣》)。常惠评说：“一本在1900年出版的，共有152首歌谣，是一位美国女士所辑，不但有中文，还译成英文的韵文，而且还有极好的照像。”^④常惠未见实体，单看名字上的“兰”字，就将何德兰理解成了一位女士。其实这是位男士，他妻子给许多皇室女眷担任私人医生，夫妻俩都活跃于满族上层社会，据说光绪皇帝第一次骑的自行车就是何德兰提供的。《孺子歌图》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每一首童谣都配了一幅或多幅具有唱诵语境的照片。该书所录《看见她》：“爬草根，两头分，路中来了个小学生，骑花马，拜丈人，丈人丈母不在家。推开门来看见她，粉红脸，赛桃花，小小脚，一衲咤，樱桃小口糯米银牙。”所配的照片中，两个满族男孩各执一根竹马，一个将竹马骑在胯下，一个握着竹马站在边上。很明显，这就是一则儿童骑竹马转圈玩的游戏歌。^⑤

韦大列和何德兰录出的歌谣都很简单，主要用来介绍给欧美儿童，还得配合中英文阅读。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征集到的异文中，这首歌谣还有许多繁复的游戏动作。有些地方的游戏侧重于社交活动，男孩将竹马骑到丈人家之后：“大舅子出来接着鞭，二舅子出来拢着马，大姨子扯，二姨子拉，羞羞答答到她家，大马拴在梧桐树，小马拴在后园一枝花。”(河南卫辉)另外一些地方则可能会侧重于“过家家”的待客游戏：“拉拉扯扯吃杯茶，吃了清茶吃换茶，八把椅子是摆家，红漆桌子抹布抹，十二碟，摆下它，风吹竹帘瞧见她。”(湖北武汉)最主要的是，不同地区的游戏主体还略有差别。孩子们会根据角色的变化，改变歌谣的唱词。比如，北京的游戏角色主要由男孩担任，所以游戏中是“大舅子扯，二舅子拉”。到了河南河北，游戏队伍加大，歌谣长度也随之增加，大舅子、二舅子、大姨子、二姨子全都出场。到了山陕一带，女孩的妆饰和仪态唱得特别仔细，我们前文怀疑这是女孩唱的歌，这一点从

^① 彭翔华编著：《武汉民间童谣辑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5、166页。

^② 马汉民、高福民主编：《水乡情歌》，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年，第120页。另，陈泳超说：“我读了一下，也是可以押韵的。苏州其实不读‘她(ta)’，本身应该发‘ei’，理论上与前后都不押韵。但方言有文读、白读之分，经常可以文读方式调节，比如这里的‘她’，很可能会发成‘to’，这样就与‘家(go)’‘花(ho)’押韵了。”

^③ 男爵 Guido Vitale：《北京的歌谣序》，《歌谣周刊》第20号，1923年5月27日。

^④ 常惠：《谈北京的歌谣》，《歌谣周刊》第42号，1924年1月20日。

^⑤ [美]何德兰编著：《孺子歌图(汉英对照)》，徐晓东译，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127、126页。

游戏角色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来。北京歌谣中，出来接待的一般都是大舅子、二舅子，但在山陕歌谣中，接待方全变成了女性：“大嫂子留，二嫂子拉，拉拉扯扯到她家。”“大姨子留，小姨子拉，拉拉扯扯就坐下。”“大姨子出来拴大马，小姨子出来拴小马。”“大舅媳妇把马拴，小舅媳妇把马拉，一拉拉到她的家。”传统社会的男孩子是不会愿意在游戏中扮演女性角色的，所以，我们只能设想这个游戏在山陕一带主要是女孩的游戏，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山陕歌谣对于女孩的妆饰和仪态能够唱得这么仔细，这是男孩很难做到的。还有一点似乎可以用来佐证这一猜想，从董作宾与搜集者们《关于“看见她”的通讯》中可以看到，许多南方歌谣的搜集者都曾提到，歌谣是从“母亲”或者“夫人”“大嫂”处得到。

歌谣沿着黄河一路西溯，来到甘肃的时候，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童谣终于变成了成年人唱的民间小调，不再有游戏意味。小调聚焦于女性的身体想象，着重抒发“叫人越看越喜爱，啥时花轿接你来”的美好愿望，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六、源出于清代民族杂居地的儿童游戏

对于《看见她》的讨论，董作宾最重要的判断是发现了歌谣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关系。但是，我们很难同意他的其他一些判断，比如他认为这首歌谣起源于陕西中部。他说：“因为我们见到的三原和陕西东南部两首大同小异的歌谣，实可以为南北各分系一切歌谣之母。”但我的判断是，《看见她》产生于清代中期甚至更晚，它起源于清代旗人与汉族这块民族杂居地的儿童游戏，这个杂居地最大可能就是北京，不仅因为这首歌谣在北京最著名，在北京搜集到的也最多，仅董作宾见到的就有五首，而且北京歌谣的游戏特征最明显。

胡适和常惠都认为《看见她》是一首广泛流行于全国各地的歌谣，比如胡适认为“我们若去搜集，至少可得一两百首”。但事实上，这首歌谣的流行程度远远低于胡适的预期，一百年后的今天，其总数量也没到一百首。1937年董作宾曾经写过一篇《“看见她”之回顾》，称十三年间“一共又搜求得二十三首”，^①总数达到68首，这大概已近绝响。1950年之后的几次民歌调查运动，很少见到这首歌谣的新异文，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在1950年之后就逐渐绝迹了。董作宾将歌谣标上地图的时候，发现其流传地集中在黄河、长江流经的省份，却没有注意到这首歌谣主要出自中心城市和军事重镇，这些地区基本上都有旗人聚居地。1960年代在广州和镇江分别搜集到一首异文。广州的是：“沙子地，跑白马，一跑跑到丈人丈母家，丈人丈母不在家，大舅爷出来请，二舅爷往里拉，三舅爷象牙筷子喇一把，又买槟榔又沏茶。”^②搜集者汪宗猷特别注明这首歌谣是“满族童谣”，搜集时已经不大完整，这是几个老人一起凑出来的。镇江的是：“萨童阿哥骑白马，一直跑到丈人家，丈人丈母不在家，大舅子忙拉马，二舅子忙倒茶，一盅热茶没喝了，窗户洞里来看她。”^③这首歌谣是1962年从敬老院包季青老人处采录，老人说这是小时候父母教唱的蒙古族童谣，所谓蒙古族显然指清代驻扎到镇江的旗人。

就目前所见，这首歌谣在北方官话系统中的分布相对分散，主要流行于京津冀直隶地区（14首），以及黄河沿线的部分军事重镇；在长江流域也呈多点分布，但主要流行于有旗人聚居的中心城市，集中在南京（4首）、武汉（5首）、成都（3首）三个城市。辛亥革命中止了这首歌谣的进一步扩散，类似上海这种未曾长期驻扎旗兵的新兴城市基本见不到这首歌谣的流传，即便有部分内容相似，也是变异得很厉害的情歌。清代不重海防，沿海城市除了威海卫（2首），其他没有旗兵驻防的城市基本上没有这首歌谣。至于那些旗人到达不了的广大农村地区，更是罕见。董作宾说：“就地理上寻求一首歌谣流传的路径，足见得轮轨未通以前水路交通的重要，黄河长江所以操纵南北两大区的势力，也可略见一斑。”但是，

^① 董作宾：《看见她》，娄子匡主编“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第23种，附录“‘看见她’之回顾”，第3页。

^② 汪宗猷编著：《广州满族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3页。

^③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江苏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歌谣集成·江苏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年，第585页。

如果把《看见她》换成旗人传播的视角，我们就可以将“传播”的观点更换成“布局”的观点：从这首歌谣的分布，可以大致了解清代旗兵布防的格局，在以水路运输为交通命脉的旧中国，扼守住了黄河与长江，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歌谣中对于女孩衣着的描绘，满族或旗人的特征尤其明显。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高底鞋”的高频出现。这是典型的满族女鞋样式：“高底鞋，鳌梅花。”“高底子鞋，牡丹花。”“木底鞋，带绒尖。”“凤头小鞋高三寸，好比当初西子娘。”“高底鞋扎的五彩花，看了一人也不差。”“红鞋粉高底，绿缨颤撒撒。”其次是“红头绳”的高频出现。满族少女到了十岁左右，一般要用红头绳紧束发根，服丧时用黑绳或白绳，不能使用其他颜色。这一习俗在歌谣中出现的频次最多：“红头绳，把尾扎。”“青丝头发，红丝头绳扎。”“漆黑的头发一大掐，鲜红的头绳没根扎。”“红红的嘴唇白白的牙，黑黑的头发红绳扎。”此外，满族少女“倒爬角”发型也多次出现：“乌黑的头发倒巴角，正白的耳朵渡金卡。”“黑顶顶的黑头发，得愣愣的大爬角。”“黑丝头发大抓家，正梳抓家倒插花。”董作宾认为爬角就是髻。据《头发与发饰民俗》介绍，满族少女“到及笄之年才梳单、双抓髻，将发扎成双角形，或扎单只。单髻顺梳头顶，双髻横梳两旁，至结婚日方改”。^①歌谣中凡是出现爬角总是与“倒”字连在一起，往往还会配套出现高底鞋或木底子鞋。更值得关注的是，高底鞋、红头绳、倒爬角，这些歌谣中反复出现的具有满族特色的少女装束，几乎全都出现在黄河流域，正如董作宾看到的：“北方多穿高底鞋，南方则否。”《看见她》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旗人的人口基数和聚居地的分布，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清代的旗兵布防，黄河流域大于长江流域。

由于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汉族士兵编为绿营，也称绿旗兵，这一部分人也讲官话，他们很可能也在《看见她》的传播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以河南为例，提督府设在开封，另有两个总兵府，分设在南阳镇和河北镇，但是军士构成主要是汉族绿旗兵，其次才是蒙古族和满族的八旗子弟。董作宾收录的 68 首歌谣中，河南歌谣几乎全部出自开封（2 首）、南阳镇（4 首）、河北镇（2 首）三个地区。附近山西晋城的 2 首，很可能也是传自河北镇一脉，两地歌谣相似度比较高。再以西南地区为例。云南提督驻扎在大理，所以，张四维搜集到两首云南异文，均来自大理。广西方言比较复杂，但柳州一带说的是官话，清初的广西提督府就设在这里，提督移驻龙州之后，柳州改置总兵，长期驻军，而广西唯一搜集到的一首《看见她》，就是搜集者刘策奇的母亲从柳州听来的。可见这首歌谣的早期传播，与清代旗兵的长期布防，也即官话流行区域关系密切。《歌谣周刊》第 13 号还刊登了两首异文。搜集者臧玉海罕见地将这首歌谣的搜集地写得特别具体，一首“通行完县城北”，另一首“通行完县城西”。^②可见这些歌谣只是在县城的局部地区流行，至少有材料能证明当时的完县（今河北省顺平县）城北就是旗人的主要聚居地。自清兵入关以后，大量旗人迁居、驻防直隶，过去完县城关北郊的南腰山村、阳各庄，以及城关东郊的显阳村一带，都是“旗租地”，直到 1928 年才由政府统一征收，称为“绝旗租”。^③

七、时尚女孩：小小金莲长指甲

《看见她》是典型的民族融合的口头传统，其产生应该不会早于清军入关的 1644 年，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逐渐消亡。1918 年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时期，正处于这首歌谣的退潮期。1950 年之后，这首歌谣基本上退出口头传统。我们前面说到，《看见她》含有大量满族元素，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这就是满族歌谣，因为其中的汉族元素也一样丰富，比如歌谣起首的“骑竹马”。骑竹马是典型的汉族儿童游戏，一般都是几个男孩，甚至一队男孩一起跑。《看见她》虽然是以一个男孩的视角来叙述，但是从很多异文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多名男孩共同参与的竹马游戏，比如异文中提到“你骑驴儿我骑马，看

^① 叶大兵、叶丽娅：《头发与发饰民俗——中国的发文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6 页。

^② 臧玉海：《姑娘吊孝二首》，《歌谣周刊》第 13 号，1923 年 4 月 8 日。

^③ 邹琳：《绝旗租的经过》，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完县委员会编：《完县文史资料·第 1 辑》（内部资料），1986 年，第 79-82 页。

谁先到丈人家”，或者“大马跑回家，小马跑到丈人家”等。可以想象，这是一首由汉族、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儿童共同参与、共同创作的游戏歌谣，很可能起源于清军入关以后。

歌谣中更明显的文化融合，体现在对于缠脚习俗的迷恋。虽然在现代人看来缠脚是一种陋俗，但在当时的汉族妇女中非常流行。满族妇女本来没有这一恶习，康熙三年（1644）朝廷还曾下诏禁止裹足。但在民族杂居地，民俗风尚必然互相影响，一种流行了近千年的身体民俗，不是一两条禁令就能改变的。康熙七年（1668），时任左都御史的王熙上奏请求开禁，居然获准，王熙因此还被许多汉人誉为“直言”。^①到了乾隆年间，满族妇女也开始盛行缠足，乾隆皇帝屡次降旨严责，但难以遏制。追求时尚的满族女子为了做到既不裹脚，又能达到小脚效果，于是发明一种“高底鞋”。这种鞋以木为底，鞋底高达十几厘米，或上敞下敛，或中细下宽，外裱鳌花白绫，多为贵族女子穿用。在《看见她》的各种异文中，歌谣中凡是涉及脚和鞋的，黄河流域以“高底鞋”为多，也有提到“小小脚，一衲挖”“两只小脚丢地下”或者“脚儿小得针锤把”的。但是到了长江流域，高底鞋彻底退出，足下之美就只剩小脚了：“小小金莲一捺叉”，“丁丁小脚在地下”，“小小金莲一把抓”。

歌谣中的美人，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孩。从她们的身体描述中可见，这是一些不需要劳作的贵族家庭的孩子。歌中除了反复提及的“高底鞋”，还有经常提及的“长指甲”：“白白手儿长指甲。”“白白手，红指甲。”“红扑扑脸儿黑头发，白嫩嫩手儿红指甲。”“雪白手，银指甲。”清代贵族女性不仅蓄指甲、染指甲，还有一种金银质地的指甲套，专门用来保护这种长指甲，兼起装饰作用。蓄甲习俗也是满汉通行，但以满族为甚。指甲长了，意味着什么活也干不了，当然也就意味着什么活也不用干，正好用来显摆“贵气”。这样的女子娶进家门，是不用干活的，所以有些异文还会加上一段歌词：“卖田卖地来接她，接在家里供着她，又怕香灰冲过她。”“娶回来莫当人看待，一天三根香，三天九根香；后来三天下了炕，扫脚底，腰吊腿长，尻子跟着薄櫈櫈。”当然，歌谣表达的只是一种愿望。

八、银盘大脸：以“相”夸“貌”

韦大列记录的歌谣中，看到“她”的第一眼是“银盘大脸黑头发”，意思是看见一个白白净净的大圆脸。《红楼梦》第28回就是这么描写薛宝钗的：“只见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这大圆脸虽然不招现代人喜爱，好歹也能接受，但天津武清有一首《看见她》，夸的却是“四方大脸黑头发”，这四方大脸的美人形象让今天的读者接受起来，恐怕有点困难。不过，1924年的董作宾认为这很正常，他觉得北京歌谣中的美人就应该是这样的：“脸儿大大的、四方方白静静的，长得赛似银盘；头发黑黝黝的，梳了个大辫子，用鲜红的头绳扎了辫尾；上身穿一件月白色缎子小棉袄，掐着‘狗牙’的边儿，缀着银疙瘩似的纽扣儿；下身中衣是表缎子做的，裤筒紧紧扎着；脚上穿的一双小红鞋儿哪有三寸？刚刚二寸八分，鞋面上还绣着喇叭花呢。”

银盘大脸未必是“形体美”，但在民间歌谣和曲艺唱段中，却是典型的“富贵美”，往往用来描述女人的“福相”。“银盘大脸白生生，杏子眼睛活灵灵”是陕北说书中描述美女的程式性套语。“银盘大脸脸，樱桃小口亲”是西北民歌中形容美女的常用套语。河南豫剧唱词中也有“一对大眼水灵灵，银盘大脸好齐整”的常用套语，专门用来赞颂正能量的年轻女子。明清小说中，常用“正大”来描述女仙的美貌。《水浒全传》第42回，宋江来到九天玄女庙，朦朦胧胧之间，舒眼望去，七宝九龙床上端坐着一位娘娘，但见她：“脸如莲萼，天然眉目映云鬟。唇似樱桃，自在规模端雪体。犹如王母宴蟠桃，却似嫦娥居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严形像画难成。”这样的描写也出现在《九云记》第17回，完全一样的程式性套语，几乎一字不差。金圣叹认为，仙容妙就妙在“正大”二字。所以说，银盘大脸、四方大脸、面如秋月、面如满月，都是正大仙容的大脸盘。中国佛像的造像艺术中，就有“颜容奇妙，常

^① 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邓焱：《中国宗族父权制建构史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若少年；男如好女，面如满月；眼如垂凤，鼻如悬胆……两耳垂肩，双手过膝”^①的要求。中国人认为这是“贵美之相、大人之相”。

这种审美标准主要源于相术中的“以大为美”。江西有句俗语：“脸大鼻大耳朵长，嘴大吃四方。”虽然说的是男相，但“脸大”这一部分，似乎也适用于女相，民间相术认为小脸窄膀的女人生不出富贵儿。民间相术素以“面如满月，唇若涂脂。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为大福大贵之相。《金瓶梅》中有一个叫吴神仙的相士，西门庆请他来给女眷们看相。吴神仙一见到吴月娘，肃然起敬，赶紧站起来说道：“娘子面如满月，家道兴隆；唇若红莲，衣食丰足，必得贵而生子。”^②由此可见，以“银盘大脸”和“四方大脸”为美，本质上就是“以贵为美”，把“相”当成“貌”来夸。越是苦寒之地，对于物质条件的在意程度越高，在大多数人都还吃不饱的年代，以胖为美，圆润为美，表达了人们对于富足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看看黄河流域的“她”主要美在哪里：脸大、脚小、皮肤白，穿金、戴银、高底鞋，官粉、插花、长指甲。样样都显着富足和贵气，表明这是一个被富裕家庭“贵养”的女孩。否则，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孩，粉嫩的脸庞天然就是最美的肤色，何至于需要再涂一层官粉？他们不觉得多此一举，反而认为锦上添花。

不过，以大脸、丰润为美的标准似乎不大适用于江南富庶之地。长江流域对于“理想美人”的想象，与黄河流域的确有差别。“大脸盘”在长江流域的歌谣中一次都没有出现。苏州时尚是“瓜子脸，白粉搽”，南京歌谣也偏爱“瓜子脸，糯米牙，弯弯眉毛黑头发”。尽管南方的美人标准略有不同，但是，穿金、戴银、樱桃小口、粉白皮肤、金簪子、玉耳挖，小小金莲一把抓的要求并没有降低。相对于北方歌谣“叫人越看越喜爱，啥时花轿接你来”的愿望表达，南方歌谣似乎更悲观、更现实一些，甚至唱出了“有钱的阿哥来娶她，没钱的阿哥白望着她”的辛酸与无奈。总的说来，歌谣中的理想美人，其实就是富家千金，白日梦中的女孩儿。1950年之后，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看见她》日渐远去，成为旧时代的一个审美记忆。

九、结语：歌谣形态学

董作宾曾经明确地说他的研究受到胡适《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的影响。到底什么是“比较的研究法”呢？胡适说：“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这种研究法，叫做‘比较研究法’。”那么，“母题”是什么呢？胡适又说：“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的地方是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motif）’，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的枝叶细节。”^③这段话对现代学术影响非常大，许多学者往往不加辨析。随着学术发展，歌谣研究法也在不断精进。首先，胡适对母题的理解是有偏颇的，胡适理解的母题，其实应该叫做“主题”，主题是用来划定边界、明确比较对象的。其次，真正用作比较的母题，指的是民间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能够用以表达一种传统寓意的最小的结构单元。第三，光析出母题是不够的，因为母题是所有歌谣通用的结构要素，只有找到这一主题歌谣所独有的母题或母题组合——程式，才能进入有效分析。所谓程式，是指同一歌唱传统中在描述一个特定事物或表达一种特定观念时常用的习惯性片语。第四，在此基础上，借助程式要素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歌谣的特定内涵和时空变异，进而进行文化分析，做出文化阐释。这一套歌谣研究的工具和方法，我们称之为“歌谣形态学”。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祁志祥：《佛教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4页。

②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上），《李渔全集》第12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7页。

③ 胡适：《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努力周报》第31期，1922年12月3日，原署名Q。

知识与趣味的内在张力

——以五本梅谱为例

薛富兴

[摘要]《范村梅谱》奠定了梅树与梅花自然类核心信息与人文类拓展信息并举的叙述模式，尤可贵者在其以自身梅树栽培经验撰写梅谱。《梅品》集中提炼梅审美欣赏经验，其理想性赏梅因素与语境总结体现了人文趣味对自然审美经验的渗透。《梅花喜神谱》与《画梅谱》集梅谱与画谱为一身，典型地体现了赏梅自然审美经验与画梅艺术趣味的相互影响，代表了中华梅审美史的新阶段。《广群芳谱》梅卷是梅谱之集大成性作品，其关于梅树内外在生物特性核心信息单薄，关于历代赏梅的诗文文献丰富，成为一部简约的梅文化史，典型地体现了历代花谱中自然知识与自然审美趣味的交融与内在张力。立足于博物学视野，由诸梅谱所体现的知识与趣味之间的张力，正可成为考察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意识发育程度的典型个案，从中可以体察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困境。

[关键词]梅谱 自然知识 自然审美趣味 博物学

[中图分类号] B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155-09

梅花被奉为“国花”其来有自。它最先出现于《诗经》，南朝时始成为士人们热情关注与称颂的对象。宋元时期，梅力挫众木，形成在花木审美中一木独秀的局面。清人编纂《广群芳谱》即以梅开篇，且有三卷之繁，这不仅证明梅受到最高度的关注，同时也足以说明关于梅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最为丰富的。正因如此，本文拟以历史上五本梅谱为个案，以此透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意识与自然知识观念间的关系。在博物学(natural history)视野下，我们会对历代花谱提出如下问题：关于自然有机界的花木类植物，中国古代形成了什么样的认识，得到了哪些相关知识，人们又是如何认识这些植物的？

一、《范村梅谱》：梅谱之祖

南宋范成大的《范村梅谱》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梅谱》。其时，梅已为天下所喜，稳居花主之位，故而范成大有言：“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①《范村梅谱》列梅十二种，皆其自家园圃所栽种。

《范村梅谱》的叙梅模式均为先列梅名，继以对其形态、色香，进而生长地域、生长特性等作简述，为后世梅谱乃至花谱奠定了核心要素与结构。细言之，《范村梅谱》的叙梅模式可析为两类。首先为纯述物形物性者，如：“江梅：遗核野生，不经栽接者。又名直脚梅，或谓之野梅。凡山间水滨，荒寒清绝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疏瘦，有韵，香最清，实小而硬。”^②其次为述梅之物性与关于梅之诗文、

作者简介 薛富兴，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天津，300353）。

^① [宋]范成大等著，刘向培整理校点：《范村梅谱（外十二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1页。

^② [宋]范成大等著，刘向培整理校点：《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2页。

掌故者，如：“红梅：粉红色。标格犹是梅，而繁密则如杏，香亦类杏。诗人有‘北人全未识，浑作杏花看’之句，与江梅同开，红白相映，园林初春绝景也。梅圣俞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当时以为著题。东坡诗云：‘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时与青枝。’盖谓其不韵，为红梅解嘲云。承平时，此花独盛于姑苏，晏元献公始移植西冈圃中。一日，贵游赐园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尝与客饮花下，赋诗云：‘若更开迟三二月，北人应作杏花看。’客曰：‘公诗固佳，待北俗何浅耶？’晏笑曰：‘伧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时守吴郡，闻盗花种事，以诗遗公曰：‘馆娃宫北发精神，粉瘦琼寒露蕊新。园吏无端偷折去，凤城从此有双身。’当时罕得如此。比年展转移接，殆不可胜数矣。世传吴下红梅诗甚多，惟方子通一篇绝唱，有‘紫府与丹来换骨，春风吹酒上凝脂’之句。”^①如何理解《范村梅谱》中述梅物性之外有关梅的诗文与掌故部分？它们应当被归为“梅文化”部分，即梅谱之拓展性部分，而非与梅之物形、物性直接相关者。此部分对我们了解梅的栽培史、时人对梅的人文态度，特别是审美趣味甚有益。然而，在后代梅谱中，这一拓展性，即与梅仅间接相关的部分却得到极大发展，乃至成喧宾夺主之势。这不得不引人反思：在以植物为主题的梅谱中，人们对梅的拓展性人文趣味似远超越于他们对梅的植物特性的认识，究竟幸耶不幸耶？

范成大对梅的认知之细，表现在其梅谱中已然引入一种自觉的生物特性比较眼光，这使人们对梅家族的认识更为精准、细腻。如：“消梅：花与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实圆小松脆，多液无滓。多液则不耐日干，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北梨亦有一种轻松者名消梨，与此同意。”^②“绿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绛紫色，惟此纯绿。枝梗亦青，特为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萼绿华。京师艮岳有萼绿华堂，其下专植此本，人间亦不多有，为时所贵重。吴下又有一种，萼亦微绿，四边犹浅绛，亦自难得。”^③概言之，作为历代梅谱的开篇之作，《范村梅谱》不仅自觉总结了前人关于梅的知识，使其系统化。尤为重要者，它开辟了撰写梅谱的理想典范——以亲植梅树的第一手经验为基础，为梅树家族作传。到底谁才是梅之真正知音，是陆游还是范成大，是诗人与画家还是亲植梅树、为梅写谱之人？我们认为，无论是解梅之宽度、深度与细度，当是后者而非前者。哪种文本才是我们对梅进行恰当审美欣赏之正确门径，是关于梅之诗与画，还是专以梅自身生命特性为主题之梅谱？当是后者而非前者。前者最多只能引起我们对梅的审美关注，激发我们爱梅的审美热情，至于正确、完善地认识梅花，还当从直接与梅树相遇开始，从关于梅的准确、完善的知识汇聚地——梅谱开始。

二、《梅品》：赏梅之自觉

南宋张镃的《梅品》虽然篇幅至简，却仍颇具代表性。它开辟了梅谱的另一模式：不是以植梅，而是以赏梅为中心。它关注的是如何审美地对梅进行欣赏，故而题为《梅品》实不如《品梅》更为贴切。此著的主题是：如何才能恰当地欣赏梅花之美，或曰梅花的魅力如何才能在观者的审美欣赏中恰当地得到呈现，使梅之高格逸韵不受委屈？作者发现，喜梅、观梅之人虽众，然而绝大多数赏梅者实不足为梅之解人，因而许多情形下，其赏梅过程实在是一个让梅花大受委屈的过程：“标韵孤特，若三闾大夫、首阳二子，宁槁山泽，终不肯俯首屏气，受世俗湔拂。间有身亲貌悦，而此心落落不相领会，甚至于污亵附近，略不自揆者。花虽眷客，然我辈胸中空洞，几为花呼号称冤，不特三叹，屡叹不一叹而足也。”^④

《梅品》将赏梅之规列为四个方面，分别曰“花宜称”（凡二十六条）、“花荣宠”（凡六条）、“花憎嫉”（凡十四条）与“花屈辱”（凡十二条）。概言之，此四类又可分为两类：一曰积极言之，赏梅之理想情境；二曰消极言之，赏梅应当避免的败兴情境。且看作者为梅花审美欣赏所列之理想情境——“花宜称”：“淡阴。晓日。薄（寒）[云]。细雨。轻烟。佳月。夕阳。微雪。晚霞。珍禽。孤鹤。清溪。小桥。竹

① [宋]范成大等著，刘向培整理校点：《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4-5页。

② [宋]范成大等著，刘向培整理校点：《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3页。

③ [宋]范成大等著，刘向培整理校点：《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4页。

④ [宋]张镃：《梅品》，《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8页。

边。松下。明窗。疏篱。苍崖。绿苔。铜瓶。纸帐。林间吹笛。膝上横琴。石枰下棋。扫雪煎茶。美人淡妆簪戴。”^①显然，本条为赏梅设置了二十六种理想性审美语境，作者认为这些语境实乃在审美风格上与梅花内在气质和外在风貌正相匹配的二十六种相关环境因素。若此类因素能与梅同框，便会构成一种相称相宜的赏梅情境。此二十六因素又可分为两种：一曰自然因素，如前十九项；二曰人文因素与活动，如后七项。就赏梅实情而言，上述诸因素若能出现，诚然为美，然而大部分情形下它们不一定会出现，故而才言其为理想性因素、理想性情景。既如此，《梅品》的意义何在？它所列举的诸理想性赏梅因素或语境于人们现实的赏梅活动实无大助，因为这些因素，特别是前十九种是否会出现并不取决于赏梅者，而取决于所赏梅树周围当下的特定地理与气候条件。故而真正起作用的当是后一种所述七项人文类因素。这七项因素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赏梅成果的拓展性转化形态——作为自然艺术的以梅为主题的诗文与绘画。在此情形下，上述诸自然因素已同七项人文因素一样，可依诗人与画家的主观人文审美趣味自由地被调遣与设置。在艺术家审美意识中，它们被作为应当与赏梅高度相关的意象性因素，被随意安置于特定的梅诗与梅画中，作为此类作品中经常与梅相伴之物，以便与梅这一叙事或表现之核心要素合作，形成一种关于梅的最当如此的整体性审美氛围或格调。在此情形下，梅树与梅花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具有怎样的内在生物特性似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赏梅者心目中应当有的样子。表面上看，《梅品》的主题是什么样的自然与人文要素应当为梅而出场，实际上已被转化为梅应当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形中。换言之，梅至此已然身不由己，成为一种任赏梅者在其主观意识中任意调遣的观念性符号，以表达其内心的特定审美趣味与文化理想。

这种赏梅理想语境的主观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后七项人文性因素中。从理想上说，《梅品》的主题是如何欣赏梅花，而梅花是一种自然审美对象，以梅为主角的审美欣赏为何一定要让从铜瓶到美人的出场呢？到底谁才是此审美欣赏之中心，梅还是人及其活动？也许在作者心目中，这些人文因素若不出场，恐会造成赏梅之重大审美缺憾，是不完善的。于是此类人文要素对作者而言便成为赏梅之重要甚至必要因素。也许，当且仅当此类因素在场时赏梅才能尽兴。然而我们担心的是，赏梅中此类人文因素的在场也许会无意中造成对作为自然审美的赏梅之干扰甚至改铸，使赏梅在无意中发生李代桃僵、喧宾夺主的情况，最终使赏梅这种自然审美活动名存实亡。那么，赏梅者怎样表现才算对梅花的最大爱惜与尊重呢？且观其“花荣宠”：“烟尘不染。铃索护持。除地径净，落瓣不淄。王公旦夕留盼。诗人阁笔评量。妙伎淡妆雅歌。”^②前三项属于对梅花护持爱惜之举，似为贴切。“旦夕留盼”谓对梅之痴情，言赏梅者乐于长时间对梅顾盼细赏。“阁笔评量”谓士人面对梅花时当忘掉其诗笔，关注梅花自身之美。最后一项“妙伎”“雅歌”则言对梅雅歌起舞。虽要求“淡妆”，然而“歌舞”毕竟属人艺，非天造也。

再看《梅品》所列关于梅审美之消极性因素：“狂风。连雨。烈日。苦寒。丑妇。俗子。老鸦。恶诗。谈时事。论差除。花径喝道。对花张绯幙。赏花动鼓板。作诗用调羹驿使事。”^③此条为“花憎嫉”，言梅花畏惧之物，亦分两类。一为自然因素，如狂风、连雨、烈日，皆有即时摧毁梅朵之效，故极为确当。二为人文对象与事件，诸如丑妇、俗子，以及花径喝道。在此，丑妇与老鸦受到审美歧视，似均无资格与梅同框，即使是赏梅。以此论作者对梅之极端热爱则可，若论对梅进行审美欣赏则不可，因为每个人均当有赏梅之充分资格或权利。对“谈时事”“论差除”与“花径喝道”的排斥似可找到充足的理论依据——应当以一种非功利的精神性态度面对梅花。其实，不止赏梅当如此，一切审美活动均当如此。“对花张绯幙”是一种对梅花的有意识拒斥行为，自然当为梅所不喜。“赏花对鼓板”，作者也许嫌其太闹，赏梅当以静境。然而笔者以为，此二事之不类关键在于一为天籁之美，一为人艺之喧。对赏梅而言，后者实大可不必，非因其闹，乃因其人为。最可怪的当为论及诗之二事：一曰“恶诗”，二曰“作

① [宋]张镃：《梅品》，《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8-9页。

② [宋]张镃：《梅品》，《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9页。

③ [宋]张镃：《梅品》，《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9页。

诗用调羹驿使事”。依作者，边赏梅边吟妙诗并非不韵，观梅时若能为作诗而使韵事，当为相谐。其实，赏梅者若真对梅本身上心，真为梅韵所动，最自然且理想的情境当是根本想不起诗来，无论是作诗还是吟诗，更无论诗之美恶。因为梅乃天造，赏梅乃对天籁之美的诚心折服。既有梅，何关乎诗？然而，时人似并不如此理解，此可以宋人卢梅坡的一首诗为证：“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薄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①在当时，人们似乎已然觉得梅与诗的缘分十分自然，就像人们于雪天见到梅朵灿然绽放的景观一样。

再看作者论赏梅消极情境之又一例：“主人不好事。主人悭鄙。种富家园内。与粗婢命名。蟠结作屏。赏花命猥伎。庸僧窗下种。酒食店内插瓶。树下有狗屎。枝上晒衣裳。青纸屏粉画。生猥巷秽沟边。”^②此条为“花屈辱”，在作者心目中，赏梅乃天下第一等雅事，此处所列者则皆为对赏梅最无趣的情景。“不好事”与“悭吝”看似两事，实为一情——无超越物质利害计虑之非功利心，即超越性、追求赏心悦目的审美态度。“不好事”谓凡事求好处，凡无明确物质益者皆无兴趣，因而不上心，不投入。然而赏梅明显是一种无谓闲事，讲究的正是无利而起兴，不好事者当然不会关心、投入。“悭鄙”者往往极度关心所有行为的物质成本，凡从物质考量上会造成不必要成本浪费者，皆无兴趣。准此，则栽种与观赏梅花均为非理性之举，故不乐有所涉也。“种富家园内”者，谓主人虽爱梅，然只愿独赏，不乐与天下众多爱梅者共享也。宋人普遍以为，梅当为士大夫精英阶层所专有，他人无力赏梅，故而若不幸落入没文化的“粗婢”之手，她们很可能会为某株梅树起个粗俗之名，如此便大煞风景。在此意义上，“蟠结作屏”“赏花命猥伎”“庸僧窗下种”“酒食店内插瓶”“枝上晒衣裳”与“青纸屏粉画”均属此类。只不过，“庸僧窗下种”与“酒食店内插瓶”乃有意识的附庸风雅，其余则为无意识地慢待梅花。至于“树下有狗屎”与“生猥巷秽沟边”则属于不期然而然的纯自然性偶然事件。

张镃《梅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梅审美史上欣赏的自觉，它成功地建构起一套梅审美理想语境。自此著出，梅之形象与意义再难出新，梅审美进入一个稳定的自我重复的程式化阶段，梅诗与梅画也开始进入一个滥俗阶段。因为关于梅的典型意象已然在此，后人实难出其藩篱。

三、《梅花喜神谱》与《画梅谱》：自然与艺术之姻缘

南宋时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与元代华光道人的《画梅谱》属于一类，为梅谱与画谱的结合物，当是有宋一代梅审美达到高峰时期，士大夫阶层首先在自然审美意义上普遍地将梅奉为花王之后，继而在绘画领域自然地将此趣味转化为一种特殊的美术趣味——画梅风尚。它们是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双向影响的典型案例：没有时人在自然审美意义上对梅花的特别推崇，便很难想象美术领域中作为花鸟画科的梅画之盛，而没有花鸟画科中的画梅风尚，也就很难想象《梅花喜神谱》与《画梅谱》这样的谱录之作会出现。

宋人俗称画像为“喜神”，故《梅花喜神谱》(后简称《喜神谱》)实为一部梅花写真集，然而它又不止于此。由于其体例一幅梅图配一首梅诗，故而它实际上是一部关于梅的诗画集。于是，我们便可据此追寻宋人关于梅花的美术与诗歌趣味。《喜神谱》首先由一百幅梅图构成。这些梅图均由一些关于梅花与梅枝的白描或曰特写构成，乃梅之折枝画也。这些梅图既无梅树之全体形象，亦无梅树之外他物相衬，故为纯梅图。又，《喜神谱》中的梅花图仅由一些梅枝与梅花之简约线描构成，全无墨趣。依世上所流行大多数梅画之构图与趣味评价，作为梅画册页集，《喜神谱》似乎不算成熟、完善的花鸟画，更像用于普及或教学用的课徒稿，一些关于如何画梅的基础性示范草稿，因其构图要素单一，画意单薄，似不成画境。然而，若立足宋代自然审美史考察这些梅图，其意义便大为不同。实际上，这些特写极为精准地呈现了不同花期梅朵的花瓣造型(见图1、图2、图3)。画家对梅朵与梅枝如此细微、精准之呈

^① [宋]卢梅坡：《雪梅》之二，[宋]谢枋得：《增补重订千家诗注解》卷上，长春：长春古籍书店，1982年，第25页。

^② [宋]张镃：《梅品》，《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9页。

现，构成如此上乘的梅之喜神图。它们首先是精微的工笔画，在为梅赋形写神方面取得了很高的美术成就，体现了画家以线造型的一流功夫，笔触细腻，概括精准，线条洗练、劲健。在此意义上，这些梅图是极其成功的，是上乘的美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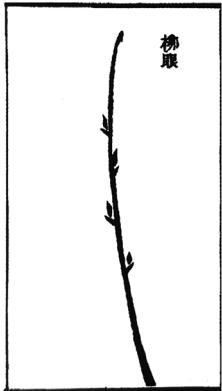


图1 柳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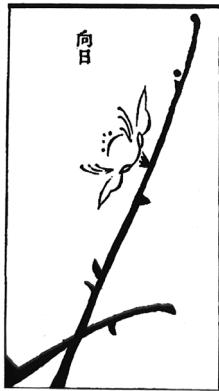


图2 向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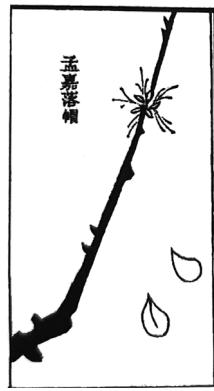


图3 孟嘉落帽

更重要的是，这一百幅简约的梅图——关于梅朵与梅枝的白描背后，便是一双特别的赏梅之眼。它首先代表了画家赏梅之眼的精细度。这些梅图实为画家对梅树所做的一番格物致知功课，是画家俯察梅枝与梅朵的结果，它们代表画家对自己所喜梅花做了零距离考察的功课，几乎是将眼睛贴到了梅枝与梅朵上，然后才会对梅有如此精致细微的了解与呈现。因此，这些梅图首先意味着画家赏梅的一种特别细微的观赏视角。其次，它更揭示了作者精微赏梅视角背后对梅的态度——爱梅之极度热情。若无对梅树与梅花痴迷般的审美热情，画家便难以对梅下如此这般的细腻俯察功夫。

然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从《喜神谱》中发现了一种内在张力。若论梅图之细腻、精准，我们从画家视角与态度的背后，发现了一种忠实地呈现梅形、梅态之客观写实精神，这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审美——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确有的内外在审美特性与价值，欣赏梅自身所具有的内外植物特性。可是，《喜神谱》又并非仅止梅图，它还有另一半——梅诗。且看这些梅诗：“静看隋堤人，纷纷几荣辱。蛮腰休呈妍，所见元非俗。”（柳眼）“献颂侈春朝，争期千岁寿。凌寒傲岁时，自与冰霜久。”（椒眼）“三窟不须营，蒙恬素心友。识尽天下书，只要文章手。”（兔唇）^①在此，作者所呈现的主要不是梅形与梅态，而是所谓“梅品”——梅花与梅枝所独具的可贵精神品格。这些梅诗与历史上绝大多数咏物诗相同，将梅拟人化，赋予梅花某种士大夫们最看重的价值观念或人格特性，比如自持、高洁等等。于是，审美趣味的内涵在这些梅诗中悄然发生了质的迁移——从刻画与欣赏梅花自身转化为以梅为喻以及人类对自身人文价值与情感的表达。表面上看，深化了梅花审美价值的内涵，实际上是对梅花的严重人化或主观化，梅花在此最终蜕化为人类自身情感抒发、价值表达的工具，使得对梅花本身的审美欣赏有名而无实。因此，这些梅诗便成为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趣味内在张力的典型文本：一方面是对自然对象自身内外在特性与价值的欣赏，此为其客观性视野；另一方面，则是以特定自然对象言说自我，通过人化或主观化自然的手段实现人类的自我言说，此为其主观性视野。这便是古人在自然审美经验中所表现出的关于自然的二重审美人格，且后者渐为主流。

《画梅谱》，元代华光道人所作。华光道人爱梅成癖，画梅近痴，最后终老于梅林。华光道人对梅画甚有功焉。他于梅画中发明了松、竹、梅同框模式，是对梅画题材与画面布局风格的拓展；他拒绝五彩艳色，纯以墨写梅，于梅画家族中独成“墨梅”一品，在题材与艺术语言内外两个层面对梅画做出历史性贡献。

《画梅谱》是一本以如何画梅为主题的专门性谱录著作。内容可分为两类，一为总论，一为分说。

^① [宋]张铉：《梅品》，《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13、13、17页。

总论部分是画家对自身画梅经验的原则性、系统性总结。原则性总结如开篇之“口诀”以及画梅“三十六病”，如果说“口诀”是人们对门类艺术成功创造经验的积极总结，那么“病”或“忌”则是对特定门类艺术创造经验中种种“败笔”的消极性总结。从艺术史特别是艺术理论的角度看，特定门类艺术的真正自觉需要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积累，因此梅画的自觉与成熟就同时需要关于画梅“口诀”与“病”的总结，二者相辅才能构成梅画的完善艺术经验，形成一个有机性的梅画艺术语言系统。分说部分是对画梅技法的总结。作者将画梅之技归纳为十种，这些技法有的根据梅枝与梅花的不同部位与形态，有的根据梅树之品类，最终将反映梅枝与梅花生物特性的技法高度抽象，甚至程式化。这种程式化之迹从其“一丁”“二体”到“九变”“十种”的命名即可见出。比如其中之“四向”：“其法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有自右而左者，有自左而右者，须布左、右、上、下取焉。”^①在此，技法与梅树、梅花自身的生物特性似已毫无关联，画家所重视的是画面中梅枝或梅花造型的完善与均衡，故而此技法已然成为一种抽象的形式美造型法则。严格来说，它与所画对象——梅无关，画家所关注的是对梅花与梅枝之画面安排。一个“布”字正道出其中秘密。如果有人认为这里所讨论的并非如何画梅，而是书法中字与段的章法布白，大概也不会大谬。

前面讨论了《喜神谱》所存在的内在张力——为梅写照与以梅抒情，特别是其梅诗的以梅拟人倾向。其实，在古代赏梅史上，对梅的人化是一极普遍情形，只不过具体表现形式会有所差异。比如，《画梅谱》为梅取象：“梅之有象，由制气也。花属阳而象天，木属阴而象地，而其故各有五，所以别奇偶而成变化。蒂者，花之所自出，象以太极，故有一丁。房者，华之所自彰，象以三才，故有三点。萼者，花之所自出，象以五行，故有五叶。须者，花之所自成，象以七政，故有七茎。谢者，花之所自究，复以极数，故有九变。此花之所自出皆阳，而成数皆奇也。根者，梅之所自始，象以二仪，故有二体。本者，梅之所自放，象以四时，故有四向。枝者，梅之所自成，象以六爻，故有六成。梢者，梅之所自备，象以八卦，故有八结。树者，梅之所自全，象以足数，故有十种。”^②表面上看，华光道人是在完整地介绍梅树与梅花的独特生物形态，实际上，他是将梅当成一种人类文化符号，以一种象征眼光——具体地讲，《易传》的眼光——给予梅一种独特的，实即人类文化的阐释。表面上看，是梅树与梅花的生物构成很严格，因而极神奇地符合了《易传》的一套概念系统，似乎梅这种特殊花木来到这个世界负有不俗的文化使命——呈现《易》理。其实，内在逻辑当正好相反，正因为华光道人服膺《易》理，因此他努力将梅这一自然花木物种描述成一副《易》的模样。简言之，他为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中的人化自然现象提供了一个典型模式——自然的玄学化：各以其所喜之玄学模型阐释自然。当然，这种玄学化模式不始于华光道人。早在春秋晚期，当老子宣布“上善若水”，孔子宣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时，这一伟大传统就开始了。

那么，应该怎样理解《画梅谱》这一作品呢？在梅谱系列中，它属于梅谱的拓展形态。因为梅谱的基础形态应当是集中介绍作为自然界特殊植物种类的梅，其内外在生物特性如何、有哪些品类等等，此当是梅谱的主体，范成大的《范村梅谱》为其典型代表。《画梅谱》则不同，其主题并非介绍梅形态如何、如何生长，而是如何以绘画这一特殊艺术媒介呈现梅，以怎样的技法画梅才能使梅花的审美价值得到最佳呈现。于是，这里就隐含着一个复杂问题：表面上看，它属于梅谱，但实际上，如何以绘画的独特媒介与技法呈现梅花才是其核心命意，在此意义上，它是一部画谱。前者属于自然审美，后者属于艺术审美。可以说，自然与人文两种视野在此交汇。首先，《画梅谱》的出现有一重要前提，即当在自然审美领域，梅花成为最重要的审美对象，成为时人最喜爱的花卉品种时，才可望在艺术审美领域出现专门的梅画与《画梅谱》。于是，《画梅谱》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梅审美史上一个重要信号：梅审美已然从自然审美领域进入艺术审美领域，实现了由自然审美向艺术审美的拓展与升华。其次，梅审美进入绘

① [元]华光道人：《画梅谱》，《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66页。

② [元]华光道人：《画梅谱》，《范村梅谱（外十二种）》，第65页。

画领域，成为画家们的重要表现对象，这不只是一种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制约，它意味着梅审美趣味自此将不再纯粹，作为艺术的美术趣味与眼光将必然进入，甚至改造原来的纯自然审美经验，使之高度复杂化，具体而言是人文化。自此，以梅抒情、以梅拟人与以梅喻理将不可避免。

在此意义上，《喜神谱》与《画梅谱》合起来构成中国古代梅审美史上的一个极重要阶段，那就是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的演化与融合。一方面，它以个案的形式（梅审美）说明自然审美对艺术审美的前提性奠定意义：没有自然审美意义上梅审美的自觉，始自南朝以来长久的关于梅树与梅花自然审美经验的积累，以及各个时代对梅的普遍、持久审美热情，便难以想象梅会在宋元以来成为花鸟画的重要表现对象，甚至出现专门的梅画、墨梅这样的花鸟画品类，此乃自然审美对绘画之成全；另一方面，绘画的技法，特别是宋元以来中国古代花鸟画的主观写意趣味又极大地濡染，甚至重铸了国人对梅花的自然审美趣味，国人对梅的审美重心日益由梅自身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生物特性转化为对梅的拟人化与抒情化，言志比德的诗性趣味日益淹没、替代了欣赏者对梅树与梅花自身植物信息的关注，以至于从本质上说，梅不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成为一种高度人文化的对象，一种人类自身文化态度与情感的符号：自然其表，人文其里。自然审美在此可谓徒有其名。这便是这两个个案对我们深入理解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复杂关系的启示。

四、《广群芳谱》梅卷：梅文化小史

清代汪灏等编撰的《御制佩文斋广群芳谱》梅卷继承了明代王象《群芳谱》的撰结格局，扩而充之，可谓历代梅谱的总结性作品，其典范意义不可替代。《广群芳谱》继承了宋代以来的自然审美趣味，将梅置于花谱之首，凡三卷（卷二十二至二十四），牢固地确立了梅作为花中之王的地位。

与此前同类型著作相比，《广群芳谱》建立起一个关于梅的知识体系。它由四部分构成，首曰“名状”，即梅之品类、名称，及其形态、生物特性；二曰“汇考”，即历代关于梅之传说性文献；三曰“集藻”，即有关梅之诗文；末曰“别录”，即梅的医食之用，以及栽培技术。这一系统覆盖了此前梅谱的知识视野，实可谓“集大成”。此四者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梅的核心知识系统，即“名状”与“别录”。前者言梅之内外生物特性，后者言梅之物质性利用与栽培技术。二是关于梅的拓展性知识，即梅之典故与诗文。这样的结构方式源于南宋陈景沂编的《全芳备祖》。后者亦以梅为花部开篇，凡两卷，分为事实祖、赋咏祖、乐府祖三部分，后两者实为一类，均为描述与歌颂梅的文学性作品。《全芳备祖》纯以文献出处并列相关信息，并未有意识地建立一套描述梅内外在信息的知识系统。因此，作为以格物致知为主旨的谱录性著作，它在建立系统性专业知识方面并不自觉。在此意义上，《广群芳谱》将梅信息分为“名状”“汇考”“集藻”“别录”四类，可谓梅谱类著作撰结方式的重大进步。从《全芳备祖》开始，梅谱建立起梅自身核心信息与关于梅之诗文二者相辅而成的写作模式。然而自从范成大《范村梅谱》建立起关于梅的核心知识——梅之名称、品类、生长习性与栽培技术等之后，历代梅谱关于梅自身核心信息的部分一直徘徊不前，相关知识未有稳定的增量推进，后起者往往照录前人而已，如《全芳备祖》即照录《范村梅谱》。《全芳备祖》真正的创新是系统性地拓展出“赋咏祖”与“乐府祖”这两部分，实为梅诗文一类。《广群芳谱》梅卷忠实地继承了此项遗产，且颇能光大之，实现相关知识量的稳定增长。但无论《全芳备祖》还是《广群芳谱》，作为梅谱，其核心部分与拓展部分皆严重不对称，审美趣味胜过知识追求，人文观念重于自然探索。它们是以梅审美为主，以梅知识为辅，兼具趣味与知识追求的作品。

《全芳备祖》对梅自身生物信息与关于梅的人文信息二者未分，均称为“事实祖”。《广群芳谱》梅卷的最大贡献是以“汇考”形式极大地挖掘了梅信息之人文一端，兹引数例：“《宋史·隐逸传》：林逋结庐西湖孤山，不娶无子。多植梅畜鹤，因谓妻梅子鹤。”^①“《荆州记》：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

^① [清]汪灏等编：《广群芳谱》（一），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515-516页。

一枝，诣长安与晔，因赠以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① “《金陵志》：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于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号‘梅花妆’，宫人皆效之。”^② 上述信息虽皆出于他书，然《广群芳谱》梅卷的编者将它们用心地搜罗、汇集于此，便形成一部极简约的梅文化史，为后人了解中华梅审美趣味的确立与演化提供了典型个案。林逋“妻梅子鹤”故事以极致的形式标识着中国人对梅花的审美热情，这是一种跨物种的人生伴侣之情，嗜梅如此，夫复何言？折梅赠友之习始于南朝，成为历代美谈。然而，若以今天环境伦理反思之，趣则趣矣，其中似少了些对梅树有机生命的慈悲仁心：既爱梅又何忍摧折之？始于南朝的“梅花妆”可谓梅花自然审美趣味向作为工艺美的美容领域拓展之精彩案例，它说明自然审美趣味对其他领域审美趣味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以及广泛的浸透、融合能力。又如：“天教桃李作舆台，故遣寒梅第一开。”^③ “巧画无盐丑不除，此花风韵更清殊。从教变白能为墨，桃李依然是仆奴。”^④ 这透露出宋人梅审美趣味之特殊形态——以极力贬低桃李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梅花的特殊宠爱。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无论梅花与桃李，都首先是造物之子，梅与桃李之审美差异，仅为横向审美个性或风格上的差异，实无审美价值或地位上的优劣尊卑之别。宋人因喜梅奉梅而表现出对桃李的审美歧视，实不足以自己的审美能力加分，反而表现出其审美胸怀、境界之偏狭与卑微，有悖于其喜爱与尊重天地自然之总体立场。

《广群芳谱》还收录王冕《梅华传》一文：“先生姓梅名华字魁，不知何许人。或谓出炎帝，其先有以滋味干商，高宗乃召与语，大悦，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因食采于梅，赐以为氏，梅之有姓自此始。至纣时，梅伯以直言谏妲己事被醢，族遂隐。迨周有摽有者始出仕，其实行著于《诗》，垂三十余世。当汉成帝时，梅福以文学补南昌尉，上书言朝廷事不纳，亦隐去。变姓名为吴市门卒云。自是子孙散处，不甚显。汉末绿林盗起，避地大林。大将军曹操行师失道，军士渴甚，愿见梅氏。梅聚族谋曰：‘老瞒垂涎汉鼎，人不韪之。吾家世清白，慎勿与语。’竟匿不出。厥后累生叶，叶生萼，萼生蕊，蕊生华，是为先生。先生为人修洁洒落，秀外莹中。玉立风尘之表，飘飘然真神仙中人。所居环堵，竹篱茅舍，洒如也。行者过其处，必徘徊指顾曰：‘是梅先生居也，勿翦勿伐。’溪山风月，其与之俱。先生雅与高人韵士游。徂徕十八公，山阴此君辈，皆岁寒友。何逊为扬州法曹掾，虚东阁待先生，先生遇之甚厚，相对移日，留数诗而归。先生南北两支，世传南暖北寒，先生盖居于南者也。先生诸子甚多，长云实，操行坚固，人谓其有乃父风味。居南京犀浦者为黄氏，其余别族，具载石湖谱。太史公曰：‘梅先生翩翩浊世之高士也。观其清标雅韵，有古君子之风焉。彼华腴绮丽，乌能辱之哉？’以故天下人士景仰爱慕，岂虚也耶？”^⑤ 元代画家王冕实林逋之后中华梅审美史上又一梅痴，以善画墨梅名世。其《梅华传》可谓一篇妙文，从梅谱的角度看，我们当然可将它理解为一个关于梅的词条——以一篇文章概括性地呈现梅的最基本信息。此文妙处首先在其独特的叙述策略——以为梅树与梅花做传的手法写梅，以史家之手眼将梅“人格化”，呈现为一部梅族群的生活史、命运史，即关于梅这一特殊植物物种的纪传体简史。在此视野下，此文诚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梅树的一些客观知识：比如先秦时代梅先以果而名，梅果在其时属于基础调味品，在中华饮食史早期，其地位与食盐等；《诗经》即有关于梅的诗章；梅树有叶、有萼、有花，其分布有南北，其色有差，等等。然而更需留意者，乃在此文将作为植物的梅树家族与人类物种中梅姓家族的历史合而为一，历数梅姓家族中名士如商之梅伯、汉之梅福，以及梅诗开创者何逊之行状，为梅树家族张本。在此如这般的过程中，它又将梅树家族的独特生物特性——早花耐寒转释为人类物种看中的一种独特审美人格，谓梅树“修洁洒落，秀外莹中”，“操行坚固”，“清标雅韵”，有“有

① [清]汪灏等编：《广群芳谱》(一)，第516页。

② [清]汪灏等编：《广群芳谱》(一)，第516页。

③ [宋]苏轼：《再和杨公济梅花韵》，[清]汪灏等编：《广群芳谱》(一)，第561页。

④ [宋]陈与义：《水墨梅》，[清]汪灏等编：《广群芳谱》(一)，第561页。

⑤ [清]汪灏等编：《广群芳谱》(一)，第525-526页。

古君子之风”。于是，此《梅华传》建立起一种梅树与君子互喻机制：以梅之早花耐寒赞人间君子之高洁自持，又以人间君子之孤傲自赏称颂梅树与梅花之耐寒素雅。至此，梅花与君子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舍难分矣。

今天，我们应当怎样评估这种梅与人之间互喻的审美趣味甚至智慧呢？若立足于人文视野，我们肯定会激赏之。然而若立足于博物学——人类主体对自然对象之客观、明晰、系统、深入的了解，即人类关于梅树与梅花植物学知识的系统性积累而言，似诚未为幸事。

五、余论

外在地看，谱录学从属于始于唐代《隋书·经籍志》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系统之子学部分。虽然汉代司马迁即以“究天人之际”为学问大要，然而就中国古代知识系统建立与分类之实际情形言，则万学基于一学——儒家经学，其余皆附庸也。换言之，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人文学科中之哲学、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古代学术重镇，由汉至清始终未能建立起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之严格区别，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始终处于人文知识的附属地位，未能自立为国。故而在文化地位上，关于自然的知识总摆不脱次级学问、旁枝末流的形象。内在地看，谱录学自身尚未形成知识的有机性，未能建立起内涵与外延明晰、逻辑关系严谨的知识系统，故而无论是哪个领域的专门性著录，深入地考察，均可发现其内部尚处于粗分与汇总阶段，类书乃其典型，可以说总体上处于知识学的不自觉阶段。

《广群芳谱》梅卷中“集藻”一项，关于梅文者有“序”“说”“文”“传”“记”“颂”“赋”；关于梅诗者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以及“词”，可谓备极。其“名状”“汇考”与“别录”中，唯“名状”与“别录”二者与梅树、梅花的自然事实——梅之性状与栽梅之术真正有关，“别录”仍是些关于梅的传说，特别是历代士人植梅、赏梅之习方面的人文信息。于是我们发现，作为专以“草木鸟兽虫鱼”，即自然界生物对象为主题的专业性知识著作，有关梅树与梅花自身生物特性者实乃其最薄弱部分，其重心则是有关梅的拓展性信息——集中反映前人关于梅文化，特别是审美趣味的信息。依理，《广群芳谱》乃花谱类集大成性质的作品，前代只要有相关信息，作者当乐于广为搜求，但实际上此类信息似甚寥寥。何以故？只能说明，在梅树与梅花的植物学知识方面，前代先贤实知之甚少，实无所积，因而无所记也。《范村梅谱》后，历代梅谱关于梅的品类与生物学性状方面的新知识增加很少，《范村梅谱》中那些少得可怜的基本知识不断被后人转抄，诚以此故。

“托兴群芳，寄情花木，可为风雅之助”，^①此为《广群芳谱》编者对王象《群芳谱》一书的评价，其实，用于《广群芳谱》本身也很贴切。不能把以梅谱为代表的众花谱视为纯粹的博物学或植物学类著作。诚然，对特定花木名称、形态与生物习性的介绍与总结乃其基础信息，然而在《全芳备祖》和《广群芳谱》这样的典范性花谱著作中，其拓展性的以特定花木为主题的相关诗文文献之汇集才是重心。实际上，在历代花谱类谱录著作中，一直存在着一对充满内在张力的矛盾性诉求——自然知识与审美趣味，且往往是后者反客为主。这说明，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先贤们就像未能整体上使关于自然的知识从人文性质的经学系统中真正获得独立那样，他们也未能使关于自然的知识追求真正独立于其审美趣味。这些著作中主观的审美趣味极大地冲击了作者们独立、客观，且细微、深入、系统地探求诸自然对象奥秘的科学意识，这致使花谱中关于特定花木的生物学知识陈陈相因，最终趣味压倒了知识。若立足于博物学乃至科学史视野，我们也许可将这些以梅谱为代表的众花谱视为典型个案，透过它们深入考察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意识的发达程度，体察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困境。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清]汪灏等编：《广群芳谱》(一)，第1页。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传统的建构

朱寿桐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两方面的学术基础，第一是中国文学的学术基础，第二是西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学术基础。鲁迅是将西方的文学研究传统引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开拓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开辟了以西方文学学术体制的文体研究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他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和勃兰兑斯式文学批评的首倡者和卓越的实践者。鲁迅自己的文学实践也为瞿秋白开创社会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准备了基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文学发生十数年后，在鲁迅等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开辟下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基础，只有在全面继承和发展新文学研究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才有可能建立起这个学科的学术辉煌。

[关键词]现代文学 学术传统 中外文学比较 文体研究 社团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164-0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两方面的学术基础，第一是中国文学的学术基础，第二是西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学术基础。鲁迅是将西方的文学研究传统引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开拓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开辟了以西方文学学术体制的文体研究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他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和勃兰兑斯式文学批评的首倡者和卓越的实践者。鲁迅自己的文学实践也为瞿秋白开创社会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准备了基础。

一、鲁迅的比较视野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传统

尊崇现实主义的理论传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基础的价值观念。从陈独秀开始，几乎所有新文学倡导者都热衷于介绍现实主义，力推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由此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尊崇的文学传统和学术传统。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办伊始便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乃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到了19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①尽管在他看来“自然主义”比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还要先进，但他重点强调的内容还是现实主义的。陈独秀在1915年致张永言信中即明确表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为什么不趋向更“进化”的自然主义？陈独秀1916年同样是在回复张永言的信中指出，“自然主义尤趋现实”，但“虽极淫鄙亦所不讳”，并提供一则参考材料，谓“此日本政府

作者简介 朱寿桐，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3-4号。

所以明令禁止自然主义之文学之输入也”。^①另在著名的文学革命檄文《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提出著名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同样明确打出了“写实文学”的旗号。胡适也从文学思潮和社会功能方面肯定现实主义，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③正是在现实主义的意义上，他倡导“易卜生主义”，明确指出“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④至于到了“为人生”的文学时期，沈雁冰也基本上是按照陈独秀对欧洲文艺历史进程的理解，分析出“西洋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进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表象主义（Symbol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并且也认为“我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⑤因而当务之急是倡导和实验现实主义，认同以现实主义为新文学的文化基础和学术基础。

革命文学兴起以后，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和真实性受到特别的尊重，左翼文学和以后的革命文学、战争文学都高张现实主义的大旗，于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抗战的现实主义”等等现实主义潮流此起彼伏。文学创作是这样，文学批评和研究也无不以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为基础观念。显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传统和理论基础，现实主义观念乃在其揭露现实、批判现实，倡导现实生活中积极的反抗的精神，而不是在于“写真实”以及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沈雁冰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等文章中，曾试图用文学的真实论和生活的广度要求现实主义创作，批评文学青年创作中爱情描写泛滥，而且多为“观念化”，即缺少生活真实性。他统计了三个月发表的120多篇小说创作，题材分类如次：“属于男女恋爱关系的，最多，共得七十余篇；农村生活的，只有八篇；城市劳动者生活的，更少了，只得三篇；家庭生活的，也不过九篇；学校生活的，五篇；一般社会生活的（小市民生活），约计二十篇。”随后又补充说，“写到一般社会生活的二十篇，实际上大多数还是把恋爱作为中心”，而“描写家庭生活的九篇，实在仍是描写了男女关系”，于是，“竟可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百分之九十八”。^⑥正因如此，他在编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时候，竭力推荐描写农民生活和城市贫民生活的小说，如利民的《三天劳工的自述》，王思玷的《偏枯》，李渺世的《买死的》，认为这些作品最能代表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和现实主义的倾向。以这样的“题材论”强调对于爱情以外的书写的偏爱，罔顾文学内容和文学技巧的“偏枯”，其价值观念显然并不适用于新文学的评判。沈雁冰的这种现实主义批评观并没有得到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有效继承，尽管一些文学史研究者也跟着给予利民、王思玷、李渺世等人的作品以较高评价，其实这些作品质量和技巧都相当薄弱，根本不足以被列举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代表作。

在遴选中国新文学初期的小说作品方面，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得最为精彩，包括蹇先艾的小说，高世华的作品，以及沉钟社、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现代评论社的小说创作，甚至他历来并不看好的凌叔华等人的作品，被选入此作品集的都是上乘之作——不仅是这些作家的优秀作品，也是那个时代难得的精粹之作。鲁迅之所以把握得那么准当，是因为他并不囿于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包括“世纪末的果汁”在内的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方法的作品，只要写出人生的深意，写出生命的怅然与喟叹，都可能入鲁迅的法眼。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奠基人，鲁迅不仅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超卓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和艺术创设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又以议论精警、风格犀利的杂文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本体的写作典范，而且还将敏锐、机锋的理论思维开拓了中国现

① 陈独秀，《答张永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28页。

②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

③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5卷第1号。

④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

⑤ 沈雁冰：《小说新潮栏宣言》，《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6页。

⑥ 沈雁冰：《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

代文学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传统。鲁迅不拘泥于他自己认同的现实主义理论，他对浪漫主义和各种新浪漫主义的创作也多有赞赏并作出深刻的学术剖析。他这样评述沉钟社的创作心情：“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e），尼采（Fr. Nietzsche），波特莱尔（Ch. Baudelaire），安特莱夫（L. Andreev）们所安排的。”^①鲁迅非常注重从具体的创作中探寻“异域的营养”，由“罗家伦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联想到易卜生《娜拉》和《群鬼》的机运；由冯沅君的放弃创作而转入文学史研究，联想到匈牙利诗人彼兑菲的名言；由“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联想到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论证的“侨民文学”；由黎锦明“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的创作联想到易卜生以及斯特林堡式的投枪，并在狂飙社的作品中听到了尼采的声音，从“向培良的这响亮的战叫，说明着半缓惠略夫（Sheveriov）式的‘憎恶’的前途”，如此等等。^②鲁迅的视野是那样开阔，思路是那样清晰，能从各种风格的文学创作中联系到外国文学家的作派与风格，思想与言论，并且反过来能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解读提供有价值和有说服力的意见，这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出了一条视阈开阔而见解精深的比较文学路数，为半个世纪之后趋于热门的以中外比较文学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作家作品的学术方法奠定了基础。

鲁迅并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比较文学的训练，但他的学术敏感和学术功力，以及对外国文学及外国文学史的稔熟与深彻的把握，使得他开创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外比较文学研究之路。这条学术之路是那样地坚实而宽广，以至于比较文学通常具有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都在鲁迅的这番卓越的学术展示中得以完备地呈现。鲁迅的这种比较文学研究法其实更多地来自他自己的创作体验和学术感悟，因此作为研究方法呈现得非常灵动而鲜活。鲁迅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这样的阐述：“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 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③鲁迅以自己的坦诚和谦逊，分析了自己的创作与俄国文学和德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以自己开创的中外文学比较的学术路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及作家作品，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拥有了借外国文学的“他山之石”来攻自己的文学之玉的广阔的学术天地。应该说，鲁迅的学术开创使得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具有了厚重的学术基础。

二、鲁迅的文体研究与社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方法的成熟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撰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重要的学术基础，其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分期框架与格局的确定，其二是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研究体制的成熟，其三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架构的建立。

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应该是从新文学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不过真正建立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资料体系和学术框架的，当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标志。该书的出版对中国新文学的定义和学科体系作了基础性的规定，并且从学术上定义了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框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已经采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说法，并且说编集《中国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1页。

②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263页。

③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6-247页。

新文学大系》之时（1935年）的“最近五年来”，“是新文学史上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①以后出现的各种新文学史基本上按照这个框架展开，后来又有新编《中国新文学大系》^②的出版项目，基本上是按照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的学术框架操作的。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完全按照十年为一单元机械地向前发展，故而以十年为一发展时期的研究框架只是一个大概的操作策略，并不是十分精准的时段把握。《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主编其实对这个时间段把握的也不完全一样。茅盾理解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是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这五年的期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而后半期是从1922年到1926年。^③胡适在“建设理论集”导言中也重申了良友图书公司的策划理念，是“替这个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作第一次的史料大结集”，但因为他所整理的是新文学“理论的发生”，所以他的工作重点则放在“民国六年到九年之间”。^④所谓“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等等的表述，不过是对各个新文学发展阶段的一个概略性的时间把握，就像习惯上讲述中国现代文学史概略性地表述为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文学一样，文学发展不可能每一个时段都正好是十年或者等距离一段时间。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撰系统确立的基本上以十年为一个发展周期的学术格局，既吻合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节奏，也初步描画出中国新文学思潮更迭、风气流变的“生代”构架。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而言，以“十年”为一个“生代”，大致是行得通的。

承担各卷编撰的人物多是当时的文学大家：《建设理论集》由胡适编选，《文学论争集》由郑振铎编选，“小说集”共分三卷，分别由茅盾、鲁迅、郑伯奇主持编选，“散文集”分两卷，由周作人和郁达夫分别编选，《诗歌集》由朱自清编选，《戏剧集》由洪深编选，另外《史料索引》则由阿英编选。此书系的主题部分是七集创作作品集，这清楚地表明，西方化文学体制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种文体格局，已经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形成了应有的体系。这种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学文体传统的四分法架构，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框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般也是根据这四种文体建立相互联系的学术分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撰著与出版，所显示的文体专门史研究意识在中国文学学术界非常超前。值得反思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体专题在此后的数十年学术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甚至各体文学的专门史著作撰著的意识都长期未能形成。直到1980年代初，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境外出版流转到内地，学者们才在惊异和错愕中猛然醒悟，此后，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专著纷纷涌现，中国现代戏剧史、中国现代诗歌史和中国现代散文史等等文体专史才呈现出热闹一时的局面。这些文体专史的研究全面铺开并各呈格局的局面，在1980—1990年代之交趋于稳定，而这时距《中国新文学大系》按文体分类进行系统研究的开端，已经过去了近一个甲子。

《中国新文学大系》还开辟了以文学社团为考察单元进行新文学研究的学术道路，这同样意味着一种有价值的学术建树。茅盾主持编集的“小说一集”主要收录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小说，同时，作为对新文学发展概况的研究与检阅，在《导言》中茅盾还对全国各地“社团蜂起”的文学史现象进行了认真的记录和论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社团运作为基本单位的学术意识。“这一时期，是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学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到十四年（一九二五），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百余。”^⑤鲁迅编集“小说二集”，本是对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外的重要文学社团所创作的小说进行检视、收集，但鲁迅具有更加明显的全局眼光和更加高超的文学史把握能力，还将《新青年》《新潮》群体纳入文学社团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且对每一个重要社团和创作群体的分析和概括，总是精辟、精炼、精到、精切，几乎每一条断语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定论。鲁迅还

① 茅盾：《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5年，第12页。

② 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0—1990年代后陆续编辑出版，从第二个十年开始，卷帙浩繁，因有“长篇小说卷”等大篇幅的作品收录。

③ 茅盾：《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第4页。

④ 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5年，第1-2页。

⑤ 茅盾：《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第5页。

对一向缺少专题研究的文学社团研究提出了非常精彩的学术判断：“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①这是告诫研究者，通过文学社团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既要准确、精到地解释一个社团内部共同的风格和倾向，同时也要注意社团内部的风格差异和文学趣味、习惯的差异，在这种差异性的识别中认知他们的共同性，这样的社团研究才丰富、深刻。鲁迅实际上提出了文学社团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积累一直都没有对鲁迅提出的这种方法论予以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继承鲁迅、茅盾等当年已经成功地、经典性地展开了的以社团为单元研究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方法。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社团研究还停滞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所开创的格局上，几乎无任何进展。直至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资料整理开始复苏，当年动员全国出版力量组织编写的大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定了新的学术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也陆续推出，其中社团资料的整理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启动。创造社研究率先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社团文学的研究才开始陆续展开。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②等较为综合性的著作，以及21世纪初出版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③算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作了一次简略的学术总结。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在文学史和文学运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明显，但对社团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尽管从目前来看，似乎各个重要的新文学社团都已经有了学术解读和资料整理，但社团研究总体情形还不能与社团在现代文学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媲美，而且更难以企及鲁迅等中国新文学学术开创者对社团的价值认知和研究水平。近40年来有多个学术团队专攻中国现代文学的社团研究，出版了一批丛书，虽一般都标示为“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丛书，而实际上则多为“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的研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需要整体讲述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社团出现、运作、活动、论争、创作以及消亡、解散的情况，并总结出现代文学社团上述“文学行为”的规律，而不是像上述丛书所显示的，只是以各个文学社团为单位陈列它们的文学行为和对它们的评论分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的学术把握继承了鲁迅等《中国新文学大系》编撰者的学术传统，是从社团的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学社团史”和“社团文学史”学术表述的参差，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理论准备不足、方法论建设不够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没有很好地继承《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术传统，没有充分重视、认真开发和应用鲁迅等人当年通过社团分析研究中国新文学历史的方法论基础。

鲁迅等人当年的社团研究还树立了非常优良的学术先例，这就是没有将社团的研究与文学流派和思潮等等勾连在一起。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从没有将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等各种流派与社团文学对应起来或者混淆在一起，即便是分析到王尔德等人的“世纪末的果汁”，也没有与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思潮和流派混淆，或者以相应的流派、思潮分析冲淡和取代社团文学的研究。茅盾是一直介绍和倡导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但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也没有滥用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流派、思潮硬套文学研究会及相应的小说创作方面。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对西方文学思潮作了历史性的梳理，也没有将这些“主义”对应于创造社文学的分析。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将成套的文学思潮、流派分析紧扣在相应的文学社团身上进行学术概括，说起文学研究会立即就对应现实主义，说起创造社立即就对应浪漫主义，新月派自然对应唯美主义，这样的社团研究往往陷入了固定的流派认知和思潮析理之中，社团自身的文学特性及其复杂性反而被淹没了。其实，将文学研究会理解成现实主义条块，就很难理解庐隐、孙俍工甚至冰心、许地山的小说特性，而他们的创作在这个社团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创造社的文学倾向更易被论证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64页。

② 贾植芳主编，范柏群、曾华鹏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③ 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按，此书的封面错题为《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

主要不是浪漫主义的。如果准确地阐释并认真地继承、合理地开发鲁迅等人当年社团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文学社团研究就会少走些弯路。

三、鲁迅的学术传统与鲁迅研究的基础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基础的建设中，鲁迅的地位非常突出，这表明鲁迅不但是新文学最杰出的创作者，最有特色和创造性的写作者，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传统最重要的缔造者和实践者。李何林在1939年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国新文学历史的书——《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文学思潮论》，这本书的前面有两幅照片作插页，一幅是鲁迅，另一幅是宋阳（瞿秋白）。李何林明确地将这两位伟大的文学家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坛的领袖人物。瞿秋白虽然是政治人物，但是长期从事文学工作，是左翼文学的灵魂人物，特别是在左翼文学运动的尾声中编撰此书，而瞿秋白、鲁迅都已潸然作古，这样的安排和定位应该能够被理解。

作为文学家和批评家，瞿秋白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鲁迅的研究，不仅为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所难以企及，而且也令鲁迅所深深折服。鲁迅给瞿秋白所写的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可说明问题。能够让鲁迅称为“知己”而且是“唯一知己”，可见鲁迅对瞿秋白的认同与佩服程度有多深。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鲁迅及其杂文作了精辟的学术分析，对后来的鲁迅研究起到了启发和引导作用。他首先对鲁迅杂感文体作了非常准确而很有个性的学术把握，认为这样的杂文属于“社会论文”，是文学家用来进行战斗的特别文章体格。他说：“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接着例举他所熟悉的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说高尔基在创作之余写作了许多“社会论文”，而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是“文艺性的论文”。^①这样的论述不仅给杂文特别是鲁迅体的“文艺性论文”作了文体论证，为以后的学者研究鲁迅和鲁迅杂文奠定了概念性、理论性和学术性的基础，而且还启发了鲁迅研究特别是鲁迅杂文研究的后续进展，也即关于鲁迅“批评本体”写作现象的论述。“批评本体”说运用于鲁迅的杂文写作相当贴切，因为鲁迅既是伟大的文学家，又长期热衷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写作，他的批评包含着一些文艺批评，不过更多的却是文学家身份的社会批评。^②批评本体写作既属于文学写作，又不属于文学的创作本体写作，这一定义直接的学术启发来自瞿秋白“战斗的阜利通”和“社会论文”“文艺性论文”的定位。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奠定的另一个学术基础，是从“思想革命”的视角看待鲁迅文学的价值与历史地位。王富仁认为，《呐喊》《彷徨》的独特思想意义在于：“首先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假若说它们是中国革命的镜子的话，那么，它们首先应当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③将鲁迅这位杰出的“革命家”定位在“思想革命”的领域与层面，并且认为鲁迅与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相比，后者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这些学术开拓与瞿秋白早先的学术开辟有密切关系。瞿秋白就是从“思想斗争”“思想革命”的角度肯定鲁迅的历史地位和时代贡献的。他认为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④鲁迅伟大的批判功绩及其无与伦比的价值主要在“思想革命”方面：“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伟大的分裂’；反映着群众的革命情绪和阶级关系的转变，中国的士大夫式的智识阶层就显然地划分了两个阵营：国故派和欧化派。这

^①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第1-2页。

^② 朱寿桐：《论鲁迅写作的批评本体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4期。

^③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④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第2页。

是在五四的前夜,《新青年》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期。当时德谟克拉西先生和赛因恩先生的联盟,继续开展了革命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深入,也就是现代式的智识阶层生长发展的结果。鲁迅的参加‘思想革命’是这时候就开始的。”^①这不仅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定论,而且也开辟了从思想史和时代思想的高度看待鲁迅和鲁迅文学的学术传统,并成为后来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论遗产。瞿秋白此文对鲁迅的人格所作的阶级分析非常深刻,也非常精辟。他不是简单地从鲁迅的阶级成分、家庭出身和社会经济地位论定鲁迅的政治属性和文化身份,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与社会文化学观点相结合的角度分析鲁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②作为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鲁迅的叛逆性格特别是思想上的叛逆性是其人格风范的集中体现。又由于他是从封建宗法社会中叛逆的“逆子”,是从“绅士阶级”逃脱出来的贰臣,他能够将自己原来所属的社会和阶级当作审视和批判对象,对于他而言,那个社会和阶级的内涵以及外延是那样地清晰,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此山中”,可以识得庐山真面目。同时,他又对那个自己浸淫已久的社会以及那个他曾经所属的阶级了解得特别深刻,因而他的叛逆从思想意义上意味着那个社会和那个阶级整体性的崩塌,他的批判也将达到从未有过的烈度与深度。

这种痛心疾首的、灵魂撕裂的人格分析和令当事者心惊肉跳的文化身份的确认,使得鲁迅不得不佩服瞿秋白犀利的学术观察和精切的学理分析能力,可以说,瞿秋白的观察和分析抵达了鲁迅灵魂深处的痛感,是心灵撕裂的隐隐作痛,还有触及精神隐秘的痛快淋漓。这样的观察和分析实际上帮助鲁迅揭示了这样的心理现实:为什么他在对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总是感觉到自己的文字中,其实也就是在自己的灵魂里,残留有浓重的“毒气和鬼气”。瞿秋白像一个没有身背桃木剑的高明的道士,只是在黄裱纸上随意点画了几笔,就将鲁迅身上的“毒气和鬼气”侦悉出来,挤逼出来,进而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原来这是他所属的阶级的自然留传的痕迹,是他所熟悉的社会必然熏染的一种色彩和斑点。鲁迅由此将瞿秋白引为唯一知己,明确地表示对他的阐述欣然接受。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带病为他的遗著出版四处奔走,这就是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内容不仅都是鲁迅收集、编定的,便是书籍的设计、装帧,也都是鲁迅亲自审定。该书上下两册,1936年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用重磅道林纸印制,配有玻璃版插图,封面分皮脊亚麻布品和蓝色天鹅绒品两种,俱是当年最上乘的装书材料。又以皮革镶书脊,书名烫金,书口刷金。这是在整个书籍印制工艺史上登峰造极的精品之作。鲁迅特意安排开明书店所属的美成印刷厂打纸型,然后通过内山完造寄到日本东京印装。很明显,鲁迅对自己书籍的出版从未如此上心、尽心,如此追求至善至美,由此可见鲁迅对这位知己的感怀是何等深挚。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十数年以后,在鲁迅等杰出的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筚路蓝缕而又精彩绝伦的开辟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基础。只是后来对先驱者学术传统的继承,对原已形成的研究基础的开发,表现得较为迟缓。对这些学术传统、研究基础的全面继承和开发,则需等到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形成气候以后。此前,倾向性的讲求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丰富性受到一定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是,受到批判和否定的新文学家越来越多,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对象的文学家越来越少,于是,鲁迅等开创的学术传统、研究基础,连同新文学研究所特有的学术伦理,都难以发挥正常的影响作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时代气氛,让中国现代文学恢复了原有的元气与活力,在全面继承和发展新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这个学科的学术辉煌。

责任编辑: 王法敏

①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第8页。

②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第3页。

论“风人之致”*

徐国荣 郭亚超

[摘要]“风人之致”指诗人具有温柔敦厚的内在情感及意在言外表达方式的审美旨趣。它包括三个逻辑层面：由作者身份而及的诗歌体貌、内在情感指向上的求中精神和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彼此之间既有差异又有关联。“风人”身份或有不同，而表达情致则相对一致，即内在情感指向体现出求中精神。诗人内在情感既应自然而然，也应自然而然止，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他者的关怀，具体表现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平和温厚的情感形态。与这种委婉的情感形态相适应的是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此即托物兴寄。《毛诗序》初步从理论上把《国风》语言表达方式归纳为意在言外，将比兴当作重要表达方法，后世论者又多有补充论述，角度不同而各有深切体味，不仅使意在言外表达方式的内容明晰化，也使表达象外无穷之意成为后世诗歌的审美准则。

[关键词]风人之致 作者身份 情感指向 求中精神 意在言外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2) 06-0171-06

“风人之致”又称“风人之旨”或“诗人之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指诗人秉承求中精神而具有温柔敦厚的情感及意在言外的审美旨趣。它源于《诗经·国风》，由于《国风》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为重要的源头之一，在体制、风格、语言表达、作者身份等方面皆影响着后世，因而后人广泛地使用此概念，经常称赞某诗“深得风人之旨”或“有风人之致”。但“风人之致”究竟指的是什么，一直较为含混，往往需要根据具体语境作不同理解。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对“风人之诗”在性情声气、语言体式、体制风格等方面作了集大成式的表述，有论者注意到这些，并据之而认为“‘风人’的完整内涵至此包括诸如风刺、考正、比兴、寄赠、微婉、温厚、言近旨远、不落言筌等一系列伦理价值或美感特质”。^①其实，除这些外还有现实关怀、身份特征等内涵。而这些内涵属于不同的逻辑层面，古人正是从其不同的逻辑层面论述某诗的“风人之致”，因而也易造成人们理解上的复杂性，甚至误解。同时，由于“风人”又常与“雅人”“骚人”相关联，古人在论述时或合而论之，或分而析之，使其所指非常复杂。如果我们沿波讨源，将“风人之致”归为三个不同的逻辑层面——作者身份、情感指向与表达方式来分析，也就可以厘清其具体内涵。

一、从“风人”到“风人之致”：作者身份与诗歌体貌

从最初的意义上说，“风人”当然指的是“风人之诗”的作者，而“风人之诗”指的是《诗经》中的《国风》部分。但在现存文献中，“风人”一词最早出自东汉光武帝刘秀《追爵谥阴贵人父弟诏》：“《小雅》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歌的语言艺术原理及其历史生成规律”(18ZDA279)子课题“诗骚传统里的诗歌语言艺术原理”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徐国荣，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亚超，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广东广州，510632）。

① 顾一心：《从“圣门”到“诗家”——“风人”意念的转向与明代诗论》，《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

‘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①这里的“风人”是指《小雅·谷风》的作者，如此称述，其实已是汉人将《诗经》作者视作“风人”的结果。由于《国风》基本上来自当时各地，其内容往往是根据某一具体事件而发，亦即“缘事而发”，其原始作者以及采诗者也大多湮没无闻，因此将这类诗歌作者或编者时称之为“风人”，使之成为诗人的代称。故明人锺惺曰：“古诗人曰‘风人’。风之为言，无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②从现存《国风》反映的现实内容来看，其原始作者较多来自社会下层，如元人杨维桢《吴复诗录序》曰：“古风人之诗类出于闾夫鄙隶，非尽公卿大夫士之作也。”^③但即便是“公卿大夫士之作”，也都是针对当时现实的有为而发，两者在采风观俗的性质上是相同的。同时，由于这些原始作者的姓名大多没有留传下来，有的诗歌也是经过多人之手的集体创作，作者身份更是无法确定。另外，“风人”也可指采风献上而通民情的采诗官，《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④采诗官承担采风职能，他们虽然是民间风谣的采编者，却是使其保存而传承下来的重要一环，也被视同“风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⑤此“风人”即指采诗官。而宋人张表臣则直接说：“古有采诗官，命曰‘风人’，以见风俗喜怒好恶。”^⑥

由此可见，“风人”是汉代后起的概念，用以指称先秦时期因感物而言志的诗歌作者，其中尤以“缘事而发”而又不知姓名的《诗经》作者为主。当人们统称《诗经》作者时，无论“风”还是“雅”，皆可称为“风人”，而在需要区分风与雅所指差异时，则会将其分别称述。所以，东汉末年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称赞孟子及其著作时说：“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他认为《孟子》一书既有“风人之托物”，又有“二雅之正言”，将“风”与“雅”的表现手法区别开来。对此，旧题宋孙奭的《孟子正义》解释为，所谓“风人之托物”即“曲其辞”，所谓“二雅之正言”即“直其辞”。^⑦两者虽然在表现手法上有异，但在以诗表达现实关怀的创作动机上则是一致的。所以，之后的建安时期，现存曹植作品中就几次论及“风人”，其具体篇章或出于“风”，或出于“雅”，并没有刻意区分“风人”与“雅人”的身份，而是将“风人”之意泛指为“诗人”，即古诗作者。嵇康友人郭遐周赠其诗云：“风人重离别，行道犹迟迟。”^⑧此“风人”亦是“诗人”之代称。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人不仅多用“风人”指称古诗的作者，还特指当时创作具有乐府民歌体貌的诗人，如《诗品》曰：“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⑨谢惠连因善于创作乐府诗而成为模仿民歌创作的佼佼者，因此被称为“风人”。与此同时，南朝确实出现了以艳情为主题、用双关谐音为手法的“风人诗”，如《炙毂子录》节录《乐府古题要解》曰：“风人，梁简文帝谓之风人，陈江总谓之吴歌，其文尽帷薄亵情，上句述一语，用下句释之以成云。‘围棋烧败袄，看子故依然’是此类也。”^⑩风人诗是具有南朝民歌体貌形式的杂体诗，而之所以用“风人”称呼其体，是以追溯《诗经》中具有民间渊源且经典化的风人身份以立其名。后来唐代杜甫、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等人有所谓“风人”体或“风人”诗，^⑪也是与此有渊源的，其共同指向就是民间风谣特征。这种“风人体”，与其说是一种诗歌体裁，不如说

①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79页。

② [明]锺惺：《隐秀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18页。

③ [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7，《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第408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0页。

④ [汉]班固：《汉书》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

⑤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5-66页。

⑥ [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5页。

⑦ [清]阮元校刻：《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792页。

⑧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卷1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56页。

⑨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72页。

⑩ [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13页。原文本为“围棋败看子故作然”，今据皮日休《杂体诗序》改为“围棋烧败袄，看子故依然”。

⑪ [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3，[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475页。

是一种诗歌体貌，也就是受到民歌民谣影响的、喜欢谐音歇后手法、多叙艳情的一类诗歌。“风人”作为民间诗人群体的代称，随着人们对《风》与《雅》《颂》作者群体身份的区分而更加明晰。南宋朱熹就把《诗经》作者群体分为“里巷歌谣”的民间作者群体与“圣人之徒”：“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①严粲则辨析了《诗经》因作者群体身份差异而形成不同的诗歌体貌：“盖优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风之体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也。”^②由于“风”带有明显民俗歌谣性质，所以无论是以“风人”泛指古诗人，还是指称具有民歌体貌形式的杂体诗，都是把“风人”当作古代理想民间诗人的象征。

虽然“风人”身份有别，但其“缘事而发”的言志方式则相一致。闻一多认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③“诗言志”之“志”近于怀抱之义。朱自清据《论语》载“言志”而把“志”辨析为事关政教的怀抱：“两处所记‘言志’，非关修身，即关治国，可正是发抒怀抱。”^④由此可知，“风人之志”即诗人所要表达的怀抱。“志”与“致”“旨”同音，“致”最初有志向之义，如《易·系辞下》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⑤思虑虽有千差万别，但均为志意取向。“致”衍生出情致之义后更近于“志”，如《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幹还，称瑜雅量高致。”^⑥“高致”是称赞周瑜有高雅情致。除“致”外，“旨”之义与“志”相近。《玉篇》曰：“旨，支耳切。美也，意也，志也。”^⑦因此，“风人之致”又可作“风人之志”“诗人之致”“风人之旨”，是诗人内在情致的表达。这种内在情致的表达，不是泛滥无拘的，而是要诗人一方面在内在的情感指向符合儒家求中的艺术精神，^⑧另一方面又需要外在的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与其相应。

二、求中精神：“风人之致”的内在情感指向

从内在情感角度讲，“风人之致”指诗人内心委婉曲折的情感得到自然表达，既发乎所当发，也止乎所当止。发乎所当发较易理解，但为何要止乎所当止？这与儒家求中艺术精神有关。所发情感合乎中，是求中艺术精神在诗歌中的体现，不可过激，也不可不及，要避免情感极端化倾向。《中庸》把情感分为未发与已发两种状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⑨情感未发之前为中，此时志未因感而适，则无思。当志因物动而生情，则有思。思之正邪关涉情之所发和与不和：“其思也正，则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而和矣。其思也邪，则喜怒哀乐发而不中节而不和矣。”^⑩人心所感无穷而导致所发情感各异，而只有情之所发中节，才能避免过或不及。儒家为防情感入邪，提出以礼义节之，使性情复归于正，此即发乎自然应发，止乎自然应止。

首先，“风人之致”源于诗人偶感而发，当内心情感累积到不得不发时，此时情致抒发自然且真。清人叶燮直接把这种偶感而自然所至之情称为“风人之旨”：“原夫创始作者之人，其兴会所至，每无意而出之，即为可法可则。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谣、思妇劳人之吟咏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诵读讲肄推求而为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极思、腐毫辍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鸣，斯以为风人之旨。”^⑪

① [宋]朱熹集撰：《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页。

② [宋]严粲：《诗绎》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0页。

③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0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页。

④ 朱自清：《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页。

⑤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61页。

⑥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65页。

⑦ [梁]顾野王：《珍本玉篇音义集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72页。

⑧ 参见陈桐生：《“求中”：儒家艺术精神的来源、内涵及其实现》，《学术研究》2021年第4期。

⑨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

⑩ [宋]李樗、黄樵：《毛诗集解》卷1，《文津阁四库全书》经部第23册，第643页。

⑪ [清]叶燮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3页。

叶嘉莹把情志感人之物分为自然界之感发与人事界之感发两类，^①或为触物起兴，或为缘事而发。一方面诗人或受自然界之感发而生情，自然万物的变化引发诗人内心情感波动，所抒情感由此而出，如清人刘榛《秋咏倡和序》曰：“适当乎秋，则适咏乎秋焉尔。夫触物起兴，流连讽叹，以自畅其情之所欲言者，古风人之旨也。”^②秋天外部景象引发诗人内在情感波动，而把所欲言之情自然地抒发出来就是古代风人情致。另一方面诗人内心或有感于具体事件而动情，客观事件触动诗人诗绪而有了言形于声的创作冲动，如魏禧《许士重诗叙》曰：“山静而草木生，人静而思虑出。诗之为物，触于境，感于事，而勃然发诸言，是动物也。”^③诗人感时伤物，因而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

从汉代《毛诗序》开始，古人就从理论高度认定诗歌事关百姓教化，从而赋予其崇高地位，尤其当出现“变风”时，其显得尤为重要：“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④王室史官清楚了解国政得失，感伤人伦失序和哀叹刑罚苛政，以诗来抒发情感而讽谏其上，表现世事变迁而怀念过去有序的风俗，这是关心社会现实及淑世情怀的表现。由关注现实而展现出道义责任感也是风人之旨的体现，如张瀚《刻吴清惠公诗文序》说：“凡其感于物而形于言者，要皆厚人伦，美教化，达于事变，关乎政治，协匡正之义，得风人之旨。”^⑤风人之旨要求诗人关注现实，把自身遭遇与国家命运相关，把自身情感与社稷民生相连，从关怀天下和国家中实现人生价值。如晚唐李商隐的诗虽有绮丽之词，但也多表现出对国家时局的关注，显示出诗人的忧患意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商隐诗与温庭筠齐名，词皆缛丽，然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⑥李商隐诗因感时伤事而作，故虽“词皆缛丽”而仍然“颇得风人之旨”。

其次，除了触物起兴和缘事而发，诗人情感也要止乎不得不止，即所发中节，合乎求中精神。这种传统可追溯至《尚书》：“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⑦至《毛诗序》则从理论高度对诗歌表达的中和思想进行了总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⑧《毛诗序》首先肯定“发乎情”，其次认为要“止乎礼义”，这不仅是中和思想对诗歌表达情感的要求，还于风化与风刺中得到体现。风化与风刺都是不直言，这是中和品性之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中和品性的人性格多内敛含蓄，表达情感也就委婉曲折。尤其是当“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变风”出现之时，社会整体价值失范，容易产生情感极端化的“怨以怒”乱世之音与“哀以思”亡国之音，而“主文谲谏”的方式，既符合“止乎礼义”的要求，同时也避免情感表达过激或不及，体现了温柔敦厚之意，符合表达要委婉含蓄的中和思想。

① 叶嘉莹：《迦陵文集》第3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② [清]刘榛：《虚直堂文集》卷1，《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③ [清]魏禧：《魏叔子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89页。

④ [宋]朱熹集撰：《诗集传》，第6页。

⑤ [明]张瀚：《奚囊蠹餘》卷1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04页。

⑥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97页。

⑦ [清]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76页。

⑧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63-567页。

《毛诗序》不仅总结了《国风》委婉含蓄的抒情模式，还从诗论角度确立了《国风》作为后世诗歌抒情的典范。明代许学夷认为：“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复得于声气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为万古诗人之经。”^①前人关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多有论述，它们实为“风人之致”情感表达的具体形式。或表现为哀而不伤，如高仲武评朱湾《秋夜燕王郎中宅赋得寒菊》曰：“如‘受气何曾异，开花独自迟’，所谓哀而不伤，《国风》之深也。”^②“《国风》之深”即“风人之旨”，谢榛就把高仲武这段话改为“哀而不伤，深得风人之旨”。^③诗人不直言感伤，而借物言情，由托物寄兴而使情感表达委婉含蓄，此即“风人之致”。或为怨而不怒，如王昌龄《长信秋词》之三：“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全诗无一句直接言明后妃之怨，虽有怨亦不至于怒，表达得委婉含蓄，故谢枋得说：“此篇怨而不怒，有风人之义。”^④

要之，诗人情感或为触物起兴，或为缘事而发，既应自然而发，也应自然而止。这体现了儒家中和思想，使诗人的情感表达委婉含蓄，具体形态表现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为了表达内心曲折难尽的情感，诗人需要托物寄兴，因而形成了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

三、意在言外：“风人之致”的表达方式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语言在表情达意时的局限性，尤其是所要表达之意深微曲折时，如何用语言表达难尽之意就成为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他们选择的方法是以象尽意。关于象如何尽意，王弼曾揭示言、象、意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⑤这里的“象”虽指卦象，但可衍伸为可感知的存在，尤其是形象化的存在。象可表达相似物事的意义，而言又把象显明地表现出来。反过来讲，可由言而观象，因象而观意。言不尽意而以象尽意，意在象中而借象知意，这是中国古代以象达意的语言表达方式。由于可以以象表达言外之意，所以也可称作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不仅拓展了思维想象空间的深度与广度，还使内心难以言传的含蓄情感借象得以表达。先秦时期的由乐歌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运用。

汉代《毛诗序》对先秦时代以“风”讽谏方式做了总结。讽谏多出现于“变风”之时，诗人通过“主文而谲谏”而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主文”就是借譬喻之象而言彼意，即“文虽主于此而意实寓于彼”。^⑥听者若能通过表面所言之“能指”，通晓言外之“所指”，即言外之意，便能像风感人于无形之中一样所感动，从而实现“闻之者足以戒”。《毛诗序》虽未直接明言意在言外是《国风》的语言表达方式，但其实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言在此”的“主文”只是表面所借譬喻之象，“意寄于彼”之意才是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意在言外适于表达难以直言的委婉情感，比兴为其重要方法。比兴最初是太师所教六诗之二种，后在《毛诗序》中演变为诗六义之二种。比是比譬其意，兴是触物感兴，比侧重于比方于物而言意，兴侧重于由物而起发内心情致。无论是比方于物，还是由物起兴，二者均离不开作为外物的象，所以孔颖达说：“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⑦比是意附托于象，而兴则追求象外之意，因而兴深于比，钟嵘就曾指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⑧兴是借“言在此”之象而表达言外无尽之意，侧重于“意寄于彼”的象外之意，如严粲评《国风·鹤巢》曰：“风人意在言外，凡言人之贤，但称其服饰之美，此言夫人之德，亦但称其坐享成业，是其有德以称之，自见于言外矣。”^⑨以服饰之美而譬喻人之贤，以表面写夫人坐享成业而实则暗指夫人有德而美。比则是

① [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页。

② 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85页。

③ [明]谢榛：《四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8页。

④ [唐]王昌龄著，胡问涛、罗琴校注：《王昌龄集编年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90页。

⑤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

⑥ [宋]李樗、黄櫱：《毛诗集解》卷1，《文津阁四库全书》经部第23册，第648页。

⑦ [清]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65页。

⑧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第47页。

⑨ [宋]严粲：《诗绎》第1册，第42-43页。

因物连类以喻志，侧重于“言在此”之象，但由于象本身很复杂，所以“比”在呈现“言在此”之象时也能表达象外之意，此时之“比”其实已为“兴”。刘勰《文心雕龙》专门设立《比兴》篇，对《诗经》比兴方法做了系统总结，从理论上使其真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语言表达艺术的重要方法。

宋人严粲已提出意在言外为“风之体”，明代许学夷在辨体思潮影响下，不但把“风人之诗”作为一种诗体，而且把此种诗体风格归纳为不落言筌，并对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做了具体的归纳与分类。徐光启对意在言外表达方式阐释得更为详尽，他说：“大概风人之致多是借有为机，倚无为用，说处不是诗，诗在不说处。譬如车轮之转，非轂非轴，妙在于空。又如鼓响于桴，声不在木；火传于薪，光不在烬。若将意思一句说尽，便如嚼蜡无味，又如力尽箭坠，气势索然矣。”^①“借有为机，倚无为用”是借所言之象托寄言外之意，说处只是表面之象，不说处则为象外之意，诗之妙处在于以意在言外方式展现未说尽的余味，否则若把诗意图直接言尽，那就索然无味而无法动人。近代《晚晴簃诗汇》在评诗时则直接提出味外之味就是“风人之致”：“又云味外有味、色外有色、音外有音、神外有神，言在此而意在彼，意在此而韵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有尽而韵无穷，风人之致也。”^②其以譬喻方式描述“风人之致”，如味、色、音、神都是表面之象，而味外味、色外色、音外音、神外神则为象外之意，“风人之致”以言在此之意寄在彼之韵，以有尽之言寄托无穷之意。

诗贵象外无穷之意不仅是“风人之致”的审美表达，还成为后世诗歌的一条审美准则，如王鏊《震泽长语》曰：“余读《诗》，至《绿衣》《燕燕》《硕人》《黍离》等篇，有言外无穷之感。后世唯唐人诗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寿王醒’，不涉讥刺，而讥刺之意溢于言外。‘君向潇湘我向秦’，不言怅别，而怅别之意溢于言外。‘凝碧池边奏管弦’，不言亡国，而亡国之痛溢于言外。‘溪水悠悠春自来’，不言怀友，而怀友之意溢于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感溢于言外。得风人之旨矣。”^③所举都是借此言彼，体现了追求意在言外的审美旨趣。如果诗歌没有表达言外之意，那么也就缺少风人之致。明代何景明认为杜诗因夫妇寄托深远之作少而缺乏风人之义，称“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④此论固然偏颇，因为从现实关怀角度而言，杜诗不缺“风人之义”，但从表达方式而言也有一定道理，或者说体现了一种对“风人之致”的狭窄理解。

总之，“风人之致”是古代正面评价诗歌的一个美学概念，包含三个不同的逻辑层面：由作者身份而及的诗歌体貌、内在情感指向上的求中精神、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每一个逻辑层面又有其不同的内涵。这三个逻辑层面虽有不同，却又相互关联。尽管“风人”的作者身份有别，但所表达的情致均为符合求中精神的温柔敦厚之情，具体表现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情感形式。这种内在情感是委婉含蓄的，又需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将其呈现出来。《毛诗序》初步从理论上通过对比兴方法的论述，把《国风》语言表达方式归纳为意在言外，经过钟嵘、刘勰以至后世严粲、许学夷、徐光启、王鏊、《晚晴簃诗汇》的补充论述，“风人之致”内涵更为明晰，从而使表达言外之意成为后世诗歌的重要审美准则。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明]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朱维铮、李天纲主编：《徐光启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9-160页。

^② 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第2册，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第746页。

^③ [明]王鏊：《王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82页。

^④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62页。

Main Abstracts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Neo-Darwinism Approach to Consciousness

An Hui 30

Based on the strict definition in science and the precise quantitative model, the Neo-Darwinism approach to consciousness focuses on 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relating to conscious experience. Firstly,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 does not mean something obscure in metaphysics. It presents a kind of naturalizing explanation about what is consciousness, which the Neo-Darwinism approach to consciousness desires to achieve. Secondly, consciousness is viewed as a mechanism sharing in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volution, which help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eneral modularity” and “the special modularity”. Finally, the Neo-Darwinism approach to consciousness is trying to provide a new explanatory modal for free will, self and panpsychism with such new research paradigm. All these show there is a conformity trend in the Neo-Darwinism approach to consciousness whose context are new findings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whose framework is the Neo-Darwinism evolutionism, which is trying to achieve a thorough comprehensiveness among topics in mind philosophy.

The Segregated Critique: From Marx's *Capital* to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n Jiantao 52

Karl Marx's *Capital* is a prophetic and critical work when the age of capital was just thriving. He launched a dual critique of capital and power, in which an ideal model of society is illustrated.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learly inherits Marx's intellectual legacy, as he continues to criticize capital at a time when it has already been celebrated globally. However, compared to Marx's dual critique of capital, Piketty limits the object he criticizes solely to the capital, as he avoids questioning power and believes that inequality caused by the capital will hopefully be reduced by power thus making his critique a segregated one. A segregated critique of capital that fails to question whether the state power can correct capital's wrongdoings will sacrifice its systematicity, comprehens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In the face of the two great forces of power and capital that affect how human society operates, as long as we adopt a critical attitude, we would be in an unequivocal situation where we either adhere to Marx's concept of criticism or abandon it.

The Logic of Overall Governance of the System Implementation: An the Study of the Case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Lv Zhikui and Zhong Xiaoxia 72

The system implementation is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which is motivated and constrained by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and various resources involved in it. Strengthen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system and transform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into efficient national governance, will inevitably require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lementation under the party's leadership, give full play to the party's leading core role of command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coordinating all entities, effectively mobilize and integrate governance bodies and various governance resource.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s a major system innovation of river basin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Resolut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Party's Centenary” adopted by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d listed the “River and Lake Chief System” as an important system achievement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key to strengthen the executive power of the system is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n D Count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vertical hierarchical docking and the horizontal multi-department coordination under the party's leadership form an overal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mplementation, which utilizes the embedment of the party-government overall coordina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led by party building in the river basin, and the vertical closed-loop management system to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entities, releases the system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achieves high-efficiency governance.

Patterns of Welfare States, Growth Paradox and Rebalance: Enlightenment to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Yuan Fuhua and Wu Zhan 85

As a system created by modernizatio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welfare state is to achieve an order of social progress which takes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to account. However, this Fordist-based welfare state model itself

contains a growth paradox that growth may lead to more demand for welfare cost, and the increased welfare burden in turn weakens the basi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welfare. Since the 1980s, the servitization and aging of welfare states have highlighted the paradox of growth, which drove them to make trade-offs among the trilemma of fiscal balance, income equity and employment growth. As a result, enduring structural reforms have intensified the divergency of welfare state model.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s an irreversible trend of moderniza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tterns of welfare states is still valuabl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Liberal Mind and a Remarkable Historical Book —An Evaluation of Socrates and Hi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Lin Zhongze 124

Socrates is the most liberal ancient church historian after Eusebius. Hi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covers the most critical period of Christianization, spanning 134 years, from AD 305 to 439, and thus provides a valuable first-hand sourc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work not only reflects his solid mastery of ancient culture, but also reveals his great mind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deeds. As a rational-minded ecclesiastical scholar, he undoubtedly plays a key role in integrating the Christian faith with the Greco-Roman classical tradition. He sticks to the principle of narrating the church affairs together with the deeds of the emperors, which makes his work exceed the limit of the narrow sense of church history and become a history of both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e very point being unrivaled by the other works of the same title written by Eusebius, Sozomen, or Theodoret. His persistence in the policy of elaborating on what others have ignored while briefing on what has been detailed embodies the basic character and cultivation of a historian. His work is simple and plain, with appropriate words that are elegant but not unnatural, vulgar but not coarse. Therefore, the work is a remarkable masterpiece of church history.

Seeing Her, the Ideal Beauty in Folksong: Revisiting Dong Zuobin's Folksong Study after 100 Years

Shi Aidong 146

Dong Zuobin wrote “An Attempt to Collate and Study a Folksong” based on the folksong “Seeing Her” in 1924. This article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the Folksong Move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as well as a classic in folksong study. Strangely enough, even though this folksong was believed to be popular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 by scholars such as Hu Shi and Chang Hui, less than 100 variations of this folksong were collected after many national movements of collecting folksongs. One reason for this fact was given by Dong Zuobin. He pointed out that this folksong could only become popular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mandarin systems. Another even more important reason is related to Manchu people. This folksong was a children play song brought to military towns across the country by Manchu people in Qing dynasty, and it gradually faded as Manchu people scattered after Xinhai Revolution. After 1950, it almost disappeared. Praise of the “ideal beauty” in this folksong reflects aesthetic standards taken by the singers, they considered wealth and facial features with good meanings as beauty. In general, this folksong is more about a strong desire towards an abundant life rather than praise of a pretty girl.

The Tens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Taste: Taking Five Books on Plum as Paradigms

Xue Fuxing 155

Fan Village Book of Plum (Fancun Mei Pu) provided a paradigm which made a balance between core natural information on plum trees and their flowers as well as expanding humane one, the author’s plum cultivating experience in this book was especially precious. *The Appreciation of Plum (Mei Pin)* focused on aesthetic experience on plum, its theorization on ideal elements and contexts o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plum showed the infiltration of humane taste into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nature. *Portraiture of Plum Flowers (Meihuan Xishen Pu)* and *Books on Plum Painting (Huamei Pu)* are a combination of book of plum and the one of painting. They typically embodied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plum and the artistic taste on plum painting. They indicated a new stage of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plum in China. The Part of Plum of *Enlarged Book on Flowers (Guang Qunfang Pu)* was a kind of integrated one on the books of plum, in which, the core information on plum’s biological features are very little; but the literature from poems and essays o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plums are quite rich. As a brief cultural history of plums, it well-incarnated the fusion and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natural knowledge and aesthetic taste of nature which existed in Chinese ancient books of plum. In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history, such tension can be viewed as typical paradigm on the evolution of consciousness of natural science, by which, we can find the unique difficul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in ancient China.